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WEN HUA DA GE MING DE QI YUAN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罗克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　译
何祚康　王泽槐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引自《水浒传》

编者的话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欢呼声中从天安门广场升起 17 年之后，在我国发动了一场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立的一切几乎毁之殆尽，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革命”。直到 1976 年，10 亿中国人才从恶梦中醒来。

正当全民族为此进行痛苦的反思和自省的时候，一个“局外人”，通过自己对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主要事件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入考察和思索，也拿出一份颇有份量、值得我们重视的答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部颇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专著。全书分三卷，100 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3 年由牛津大学和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三卷正在撰写之中，可望近期问世。

该书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先生是英裔美籍著名学者，英国工党前议员、政治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享有盛誉的中国问题专家。当1956年—1957年中国发生一系列事件的时候，麦克法夸尔刚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毕业，应聘担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他就开始撰述有关这些事件的文章。1962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更增强了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信心。196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新文献，从而越来越意识到，把当代和文化大革命所透露的材料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从1956—1965年的中国历史上追溯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71年秋，他被委任为英国皇家国际事物研究所研究员，1972年在该所的赞助下，第一次对中国进行了访问。1984年，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邀请，麦氏带着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前两卷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新开了一门基础课，名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选读这门课的学生达700多人，是本学期最大的一门课，麦氏应邀担任主讲教授，有20多名助教协助他。麦氏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百花齐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1960)《中苏论战》(与人合著，1961)《中美关系（1949—1971)》(1972)《封闭的城市》(1972)《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1979；第二卷，1983)。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其代表作。

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部宏篇巨著中，麦克法夸尔试图回答：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将经过巨大努力才建成1966年那个样

子的中国政权，下决心完全摧毁，然后再加以重建呢？

麦氏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应该从1956年开始，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源头。

合作化被认为是巩固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步。当合作化的完成近在咫尺时，毛泽东宣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以此作为一个机会开始发动中国两个经济上的“大跃进”，此后5年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花了很大力量谋求经济上的突破。1960年，在人民的痛苦声中结束了“大跃进”。这引发了领导层中的分歧，它使人们重新评价发展战略。

苏共二十大和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化，使毛和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关心苏联演化的方向，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及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更加引起了对苏联领导人的能力以及领导共产党集团的方法的疑虑，这些疑虑不安由于1959年赫鲁晓夫准备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加剧了。从1956年起，中国开始谴责苏联与帝国主义妥协，但是当这些责难没有能够使得苏联领导人回心转意时，毛开始重新审视苏联社会，试图理解是什么使苏联偏离了毛所认为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60年代中期，毛完成了对苏联社会的分析，认为必须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党和国家就需要重新建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试图为中国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对于它的发生原因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定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作者在本书中详细地考察了1956—1965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到第一次“跃进”，从“百花齐放”政策的制定到整风运动，从

整风到反右运动，第二次“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苏论战等等，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当然，这项研究不在于“提供一部1956—1965年的中国的全面历史，而是试图审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相互间关系的影响”，在上述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分歧和争论后来日趋激化，逐渐上升为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以“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毛为什么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共领导人行为的研究，尤其是有3个人物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被当作魔王抛弃了的刘少奇，和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反复的运动中幸存者周恩来。作者在本书中用了不少的篇幅叙述了他们的性格特征，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力图从中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某种原因。

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不能不引起毛等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中共八大的新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以便于强调集体领导，毛也决定他将逐渐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以避免苏联斯大林死后出现的那种拜占庭式的斗争在中国重演。但另一方面，毛也开始怀疑，他的一些同事倾向于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谴责作为削弱他的地位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自身的矛盾——他的让出权力的意愿和对他的同事们急于掌权的疑虑，在本项研究所涉及的10年中，随着两次“跃进”、整风运动的挫折，以及毛泽东年龄的增长，这种疑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悲剧，这场悲剧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给国内致力于这一研究的人们提供一本比较系统的专著，我们推出了麦克法夸尔先生的研究成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第一、二卷的中译本。我们认为，该书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麦氏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看法和见解，及其考察问题所依据的一些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赞同本书中的观点，而且有些观点与我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为了尊重作者的权利，我们只对个别的部分作了删节和技术处理，对于书中一些史实方面的明显舛误，我们一般采取加"译按"的形式予以说明。我们充分相信，读者们在阅读该书时，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如能给热心于这方面研究的国内读者提供一点微薄的帮助，将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为了保证该书的质量，我们邀请了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审阅了全部译稿，廖老还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

序

廖盖隆

还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西方的许多学者就已开始对它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种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以至几乎成为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正式把“文化大革命”列为一门基础课，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国外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无疑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一部。

在已出版的本书第一、二卷中，作者以严肃的态度，根据他所能掌握的大量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详细地考察了1956—1960年间中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党内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

释。

麦克法夸尔先生是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见长。但是，由于作者的研究资料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书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这种启发既有观点方面的，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例如虽然作者象西方许多史学家一样，注重对历史事件中人际关系的分析，但他又往往透过人际关系的表象，指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又例如，为了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搜集、整理、查阅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等各个层次，以及当代国际共运和东西方关系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周密的分析和研究，其功力和方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起来说，1966 年起发生的 10 年"文化大革命"，正如 1958 年起发生的 3 年"大跃进"，和毛泽东在这两个时期的其他失误一样，主要是毛泽东从 1957 的起形成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向所谓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乃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左"倾错误思想的产物，是他在一系列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欣赏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所造成的，也是从共产国际和苏联学来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的严重缺陷发生了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背离了他自己一直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则，从而同党的领导层的多数发生了和激化了意见分歧。所以在我看来，麦克法夸尔教授关于 50—60 年代中共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愈来愈发展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以

便避免今后重犯。

我认为，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一些国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方面的著作，不仅可以使我国史学界、党史学界及时了解国外同行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也有利于借鉴他们的一些研究方法并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对于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将是大有益处的。

1988年10月于北京

译者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当前国际上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部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专著，作者通过分析，引证大量历史资料而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看法和见解，及其考察问题所依据的一些方法，对于我们深入地总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避免“文革”一类灾祸的再度发生来说，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共三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一卷为《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第二卷为《大跃进 1958—1960》，第三卷正在撰写之中，可望于近期内问世。我们现将第一卷和第二卷译出，奉献给国内广大读者。

为保证译文质量，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们对作者引自我国《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红旗》、《人民手册》、《毛泽

东选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书报期刊及其它正规出版物的各种资料，均对照中文原版本做了核对校正。对原书中一些史实方面的明显错误，我们以加译注的方式做了订正或说明。所有这类注释，都加在圆括号内，以“译按”二字注明，并统一以文内夹注形式出现。原书正文的页码，我们都用阿拉伯数字在译文页旁一一标出，以便读者根据书末索引提供的原书页码数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检索。另外，对原书中的个别词句，我们做了删节处理，在此一并说明。

本书第一卷的译者是：王红续（第7章、附录1、结语、第16章注释、索引的一部分）1赵丽江（第12至13章、第1至4章注释）、宫力（前言、第2章第2节、第8章、第5至第9章注释、附录1注释）、马陶（第2章第1节、和19章、索引的一部分）、张沱生（第16章第1至3节、第14至15章注释）、李捷（第1章第1节、附录2至附录6、对书目和方法的说明、书目）、郑谦（附录7至附录8、附录7至附录8注释、第17至19章注释、结语部分的注释）、张霞（第17至18章）、招嘉炽（第4章第1节、第10至13章注释、附录2至附录6注释）、吕虹（第14章）、徐邦明（第15章）、翟海丹(第16章第4至5节)、谭一青（第1章第2节、第6章）、马文仓（第5章）、黎青平（第9章）、谢伟民（第10章）、王双梅（第11章）、陈子光（导言）、傅鹏鹏（第3章、第4章第6节）、杨先文（第4章第2至5节）。校译者是：何祚康、王泽槐。最后的中文统稿工作，由宫力、王红续、马陶、郑谦四人合作完成。

本书翻译中的疏漏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

1988年10月

前言

当 1956—1957 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的时候，我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开始撰述有关这些事件的文章。那时我刚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毕业。在哈佛期间，我在费正清的精心指导下，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我非常幸运地被伦敦《每日电报讯》已故副总编唐纳德·麦克拉克伦聘用，并在该报富有经验的苏联问题专家大卫·弗劳伊德手下工作。这使我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1962 年，在杰拉尔德·弗罗德安排下，我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研究。1968 年，由于约瑟夫·斯莱特和大卫·芬克尔斯坦的安排，我得到了福特基金的支持，重新回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贝尔是一位有耐心的赞助者，当他

听到我的论著要从原来的一卷扩大到三卷的消息时，仍然显得十分镇定。

1969年，在东亚研究所和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的共同资助下，我做为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在纽约继续进行我的工作。这两个研究所的所长约翰·林德贝克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给了我许多友好的鼓励和学业上的帮助。后来，在约翰·林德贝克不幸早逝之后，马丁·威尔伯又为我获得了东亚研究所的赞助。我从那些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其它地方从事相关论题研究的学者们的谈话中受益非浅，这些学者是：多克·巴尼特、帕里斯·张、詹姆斯·哈里逊、唐纳德·克莱因、米克尔·奥克森伯格、理查德·索里赫、弗雷德里克·泰维斯、唐纳德·扎戈里亚。我在该大学现代东亚研讨会上（我曾提交了一篇论文），也交流到许多有益的观点。帕里斯·张、保罗·哈珀、米克尔·奥克森伯格和弗雷德里克·泰维斯让我看了他们的论文，A·M·哈尔彭及（通过卢西恩·派伊和大卫·麦克依乔恩）对外关系委员会允许我从哈尔彭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文稿中做了大量的笔记。

在哥伦比亚大学斯间，我已意识到，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得到大量新文献，我断定，把当代和文化大革命所透露的材料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从1956—1965年的历史中追溯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理查德·索里赫让我看了他的全套的大量卷宗，T·K·董向我介绍了他为东亚图书馆获得的红卫兵小报，我的助手布鲁斯·雅各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浏览并复制了这些小报。陈志让和麦尼奥·耐克吉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我所要求的新材料。由于福特旅行基金的赞助，使我得以搜集更多的文件。我利用旅行基金去过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燕京研究所，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我还去过东京，去过台北的国际关系学院，以及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和联合研究院。在这些研究机构，我受到尤金·吴、王

茇（音译）、P·K·于、约赫·马、吴真哉（音译）、郭华伦、海拉尔德·雅各布森以及威廉·许的友好接待。当我返回英国之后，琼·勒斯特培德向我提供了从香港得到的其他材料，与此同时，毕尔·布鲁格和肯尼恩·沃克让我看了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收藏的微缩胶卷。

1971年秋季，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肯尼思·杨格委任我做为研究员以完成我的研究工作，自那以后，我在该所课题负责人詹姆斯·福西特的指导下工作。1972年秋季，该所的新负责人——安德鲁·肖恩菲尔德拨了一笔资金，赞助我对人民中国进行第一次访问。

在本卷最后阶段的工作中，我从米克尔·奥克森伯格和斯图尔特·施拉姆非常有见解的评论中受益非浅，他们极为认真地读完了书稿。我也从莫顿·亚伯赖姆维兹和本杰明·施沃兹对本卷的部分评论以及现代中国研究所的研讨会成员们在听了我关于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一个方面的书稿之后发表的评论，中受到很大启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我同霍华德·布曼、菲利普·布里格姆、爱德华·弗里德曼、里查德·哈里斯、谢兰莉（音译）、埃丽斯·乔菲、沃纳·克拉特、保罗·克赖斯伯格、伦纳德·夏皮罗、理查德·所罗门以及艾伦·惠廷就1956—1957年的历史曾进行长时间的、很有益处的思想交流。C·T·夏、殷夫人（C·刘）和H·F·西蒙使我不过份地将克里姆林宫学应用于中国语言上。

在查塔姆出版社，赫米亚·奥利弗是一位极为负责的编辑，她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我多次对原稿的修改。诺拉·贝纳姆以极大的热情承担了单调乏味的最后定稿的打字任务，艾琳·孟席勒不声不响地帮助我，使我得以按期交稿，莉莲娜·布里斯比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导言，并提出了很有帮助的建议，图书馆和报刊书库的工作人员极为迅速地为我提供了图书和文献。

当我从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得到了两本非常有价值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的选集（我已在书目及方法的注释中做了叙述）时，东方印刷厂马上准确无误地制作了校样。我已经吸收了所有有关的新资料，核对了不十分确切的引述，但由于这两本选集到得比较迟，所以我不得不将许多资料安排在注释里。

对于以上我所提到的诸位，我表示衷心地感谢，感谢他们的指点和支持，当然也感谢他们使我免于出错。而且，这许多年来，我还受益于范围更为广泛的同事们的聪明才智，我只能以在注释和书目中提及他们来部分地偿还他们对我的支持。

我的妻子要我说明“没有她这部著作也会写完”，但事实恰恰相反。她在照顾孩子和新闻写作的间隙，挤时间批判性地读了部份书稿，并运用她自己在中国政治方面的许多知识，使我把这部著作改得更好。这第一卷书是献给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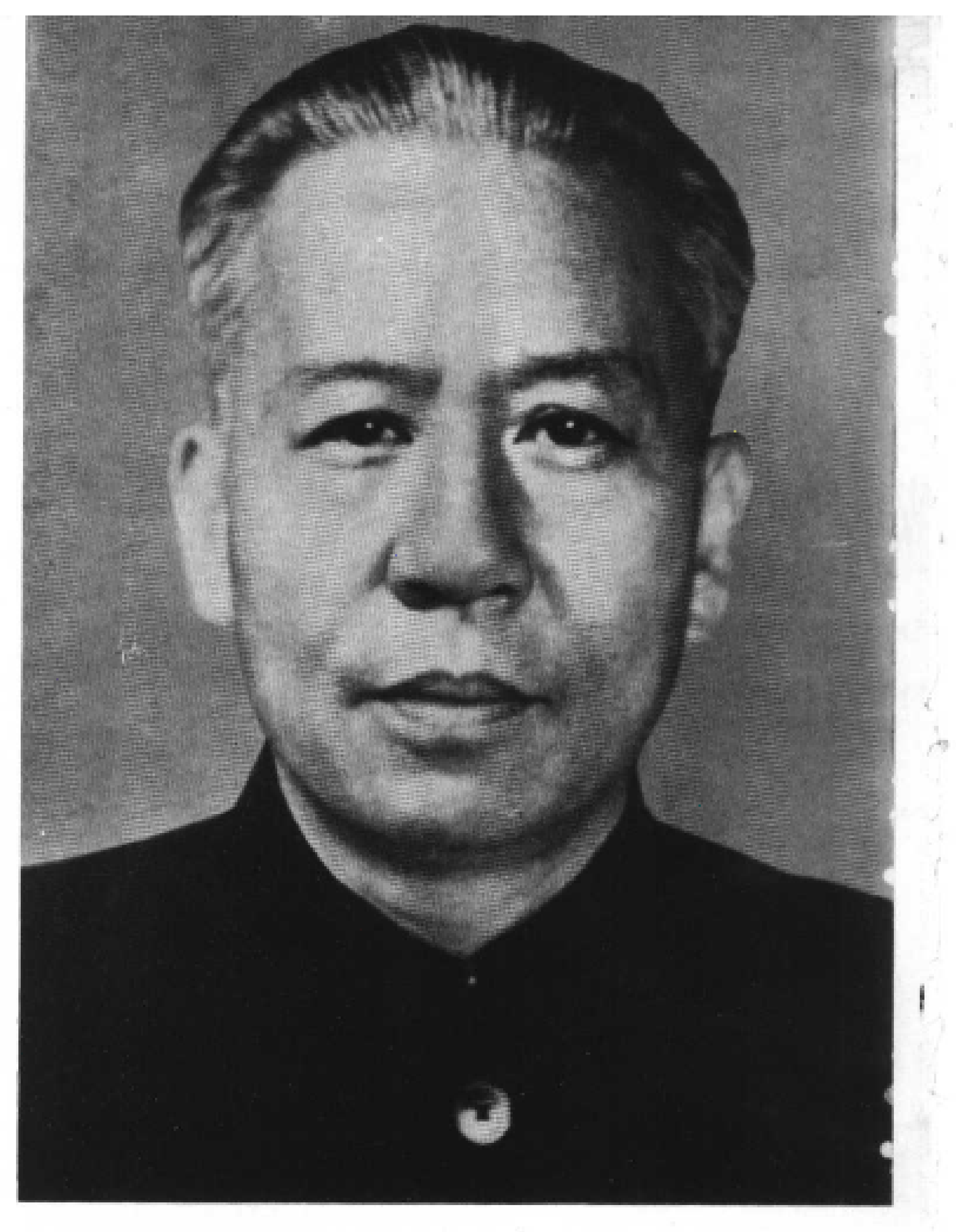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伦敦

1973年8月



1　毛泽东



2　刘少奇



3　周恩来



4 彭真

5 邓小平

目录

第二编　中共八大

第三编 整风运动

第四编　反右运动

1 导 言

1966年春天的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团结的国家。她正由一群在长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及内战中建立起同志友谊的人们领导着。他们进行了一场革命并大胆地改造了一个6亿人口的社会。他们统治和建设的手段无疑是极有效率的，他们是世界上富有朝气的共产党，虽然在这一点上，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250多万人民解放军（译按：原文如此）的支持，除了西藏事件外，从不需要大规模动用军队来支持国内政权。

但仅仅几个月间，这种和平统一的景象就破碎了。在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排炮就已经打响。1966年6月，在最高领导层中，第一批受迫害者被公开解除职务。在8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另一次大的改组。随后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系列狂热的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毛

泽东被称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受到群众的欢呼。当对毛的崇拜极度高涨时，毛从前的战友似乎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共产党的机构垮了，各地的领导人头戴高帽由红卫兵押解在大街上游斗，红卫兵的激情来自毛的令人震撼的“造反有理”的指示。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一直是党的卫护者，这时却受命支持那些伤害党的人。只是在当那些得意洋洋的红卫兵陷人激烈的、流血的自相残杀的争斗时，军队才被允许介人以恢复秩序。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在全国范围内有实权的组织。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否定毛最喜欢的那些原则。他一贯坚持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极大程度地使党的干部士气低落，并摧毁了他们在群众眼中的权威，而恢复这些权威则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毛特别注意党对枪杆子的领导；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军人控制了新组建的党的机构。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却在事实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终提倡“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1]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许多从前的同事，随之废弃的是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实践。

所有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并不都是毛可以精确预料到的。但是，他所发动的这场运动的危险性，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白。他为将中国政权建成到1966年春天那个样子，付出过很大努力，而现在为什么下决心摧毁它再加以重建？本书的研究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官方把文化大革命解释成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最后决战：一方是毛的正确路线；另一方是修正主义路线，其代表是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国家主席、毛的继承人刘少奇。在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这种认为两条路线是贯彻始终的说法，对毛来说是有利的，而对刘及被称之

为其追随者的人来说是不利的。这种说法，得到了红卫兵报纸上摘编的语录的论证。但是细心观察那些证据的人将会注意到，毛和刘的意见并不都是贯彻始终的，毛和刘并不总是对立的，许多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如著名的周恩来总理，曾在关键的问题上反对过毛，而刘则支持过毛。而那些据说是刘的支持者的人，如著名的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则经常站在毛的一边而不是刘的一边。总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

使用"两条路线"这个词意味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大部分问题上也确是如此。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要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定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问题。但是正象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

本项研究不在于提供一部 1956—1965 年的中国的全面历史，而是试图审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文化革命真正是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其主要演员都献身于中国革命。经过 15 年的错误和失败——主要是第三国际干预的结果——他们终于聚集在毛的领导下，从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后来又犯过不少错误，也遭到过不少的失败，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目的明确，富有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只要看一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2] 就可以看出这种凝聚力对中国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把他们国家引向独立的团结一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似乎在走同他们一样的道路。延安时代的"圆桌"（译按：指团结一致,不分尊卑）破碎了，一代领导人消失了。他们并不象斯大林时代受迫害者那样被处以死刑，但他们受到谴责，不仅由于在文化革命以前

的年代所犯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们一生中的行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被否认了，他们毕生的工作被认为毫无价值。

文化大革命涉及的人范围很广。这使我在这个研究中适当的地方简略地叙述了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的性格特征，以有助于解释他们在这关键年代中的行为。可惜的是，能作为评价根据的可靠资料非常少。有三个领导人物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想在正式叙述之前，先对他们作点描述。他们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被当作魔王抛弃了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反复运动中幸存的周恩来。

毛的性格在许多方面是三个人当中最容易描述的。他向世界提供了一份自述（通过埃德加·斯诺[3]）他并且经常讲话，写了很多文章[4]，还是许多研究和回忆录中的主角。[5] 所有这些资料翔实地揭示了他人格的各个方面。许多特点被认为来自他的农民出身，单纯但又机敏，性格和习惯中透着朴实，言谈通俗易懂，生活艰苦。他的政敌也承认他的魅力。特别是少数人在一起活动时。[6]他的推崇者承认当他被惹怒的时候脾气大得惊人[7]。他博览群书，似乎很喜欢用他广博的中国历史知识来使他的听众敬佩不已。他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一生都致力于体育锻炼；他是个诗人，崇尚英勇品德。他树立的自我形象，在中年时是帝王英雄，[8] 在 70 岁以后则是儒家导师。[9] 也许他智力上的特征在于“对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能进行正确分析”的能力。[10] 但是，不论何时，他突出的个人品质在于完全的自信，这种自信与忍耐相结合，曾支持着他承受失败和退却。

以上几点是一般人都同意的。当人们考虑他个人品质中相互矛盾的一面时，困难就出现了。这些矛盾使得他在不同的时期——包括本书所研究的时期在内——采用不同的政策。这些矛盾最完全地体现在毛的关于理想政体的陈述中。1957 年夏天，毛第一次对他的理想给予说明，并在 12 年后将其写入党章。毛

说，他的目标是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联在一起。在本卷所论述的两年中，毛强调的重点在于以上三个矛盾中的后一个，在早期叙述这些矛盾时，民主和自由是放在前边的。强调重点在最后叙述中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这表明毛在1957年下半年接受了那种需要更多纪律的观点。[11]

这些矛盾也渗入了毛与他的同事们的关系之中。1939年，正值斯大林60寿辰之际，毛清楚的说明了他认为需要有强有力的个人领导。他说："无论是革命或反革命阵线，必须有人当领袖，当他们的司令。谁是革命阵线的司令？是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由于他的存在，事情比较好办，众所周知，马克思死了，恩格斯和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斯大林，谁来下命令呢？"[12]这段讲话与刘少奇所坚持的毛虽是全党的领袖，"他也得服从于党"[13]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还应把毛的理论与其实践作一比较。有证据证明，他有权发布纲领性的意见，但并不坚持绝对服从。正如邓小平在1957年告诉青年团干部时所说的那样："毛主席从没说过他不会犯错误"。[14]在毛为首的政治局里存在着争论，这与斯大林不一样；而且主席的意见可以被否决。在60年代，毛对此逐渐不满起来，但是，这种情况首先正是由于他自己的民主领导方法才出现的。

毛总是试图同样强调他的矛盾目标中的正反两面，但他从没有成功过。在本卷后面所出现的毛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单向的"毛主义"的毛泽东，而是在不断改变他自己的毛泽东；他的政策变化不仅是毛本人个性的不同方面的反映，而且也是他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反应。

刘少奇是本书研究的主要人物中特征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那些领导人物像周恩来、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彭真，甚至和毛一样，都有着强有力的个人色彩。但是刘似

乎缄默到了腼腆，谦虚到了不出头露面的地步，一个受到组织大于个人原则教育的人，以至他的个性消失了。他过去的上级张国焘（张在30年代中期与毛的斗争中失去了对党的领导权）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23或24岁。张察觉到，许多年青的共产主义者都是热情而富于活力，而刘“很少表现出任何兴奋”。张刻画刘“有点书生气，富于思考，有点沉默寡言，但是明显的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是一个性情淡泊的人，他的步步高升“不是凭借天赋，而是凭借踏实的工作。”[15] 刘个人对工作和事业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受到攻击——可以由一句格言所归纳“吃小亏占大便宜”，（译按：这个归纳显然不符合刘少奇的本意，请读者明鉴。）这是他在1957年对学生提出的，他解释说：他们要做好参加长期艰苦和忘我的工作的准备，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最终得到承认和好处。[16]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经历，当他把这种哲学讲给他儿子听时，他说：如果你想出人头地，就必须首先艰苦的工作，而不要首先想到要出名，因为你越想使自己成名，你就越不容易做到。如果你根本不想出名，你就大有希望成名成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从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国家主席，我现在却处在这个职位上，名扬全国甚至全世界。[17]

刘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勤奋，不懈的努力把这个外表上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送到了高层地位。但是他是应该获得这种地位的，因为他很有天赋。印度驻北京大使告诉埃得加·斯诺：“刘少奇首先给人一个平凡的表面印象。5分钟的谈话展示了这个人具有极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很快的看出问题的核心并能作出有力和周密的简练回答。”[18]

刘主要是在敌占区长期从事城市工作，并长期与工人在一起，表现出并发展了他的组织才能，这一点他的政敌也是承认的。[19] 当毛在40年代要按自己的想法改造共产党的时候，之所

把握具体工作的耐心和技巧。没有这些，毛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无法取得成功。因此他愿意作为毛的下属，但刘并不打算放弃其批评的权利。[29] 他一直保持着这一看法，甚至在他失宠时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多次坦白交待是有理有据地回答对他的指控，而不是使自己蒙耻的自卑。这些坦白交待表明，刘在困境中仍有勇气和自尊在支持他。[30]

45 年来，周恩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创造了在共产党领导层工作时间上的最高纪录。无论是活着的人或是已死去的人，中国的和外国的，包括毛和斯大林在内，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在革命的年月里，他几乎在每个重要的事件中都扮演主要角色。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没有参加建党的会议，那时他在国外。自从 1949 年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以来他一直担任总理，他在本世纪任何大国中担任政府首脑的时间最长。确实，他长时间在领导层工作使得他的地位不可动摇。[31]

周成功的秘密看来很简单：他有巨大的能力，无限的魅力以及使不完的精力——在他 70 岁的时候，在那极为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似乎能够连续地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是周与毛的关系也许同他那历久的资格一样同样能解释在这两个人 38 年的共事中他始终处于显赫地位的原因。毛周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是在长征时建立起来的。在那以前，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在江西苏区，周取代了毛负责军事事务，而苏维埃主要是由毛建立的。当国民党的进攻再也难以抵抗时，据有些材料证实，正是周发布了开始长征的命令。

1935 年 1 月，长征中的红军部队在贵州遵义停了下来，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高级会议。在会议上，那些犯有军事错误从而使蒋介石能够把共产党人赶出江西苏区的人受到严厉的斥责。[32] 毛领导了这次批判，其主要目标是周恩来。（译按：此说不准确，当时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与中共临时

中央负责人博古。）从事后的事情来看，周在这场激烈争论中采取了比其它被批评的人更为灵活的态度，周作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可能提出辞去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译按：原文如此，有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担任军委主席而是军委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毛取得了主席的职位，（译按：原文如此，有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但没有担任主席职务）但保留了周的副主席职位。在他的新岗位上，周显然实际上执行着与从前一样的职责。也许由于周是自愿而无任何怨言地在毛的领导下工作，毛才感到他找到了一个忠实的助手。

这段插曲显示了周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当自我批评能使他仍然保留职务时，他是不愿把意见分歧上升到原则高度去撞墙的。无疑，这种态度能够解释周为什么能够在共产党的每一位领导人领导下的政治局里工作。这又是一个纪录。这使他受到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指责。但是，指导周的行动的动机更可能的似乎不仅是保存自己的地位，还有对革命的服务。他已经献身于革命，也决不会因为考虑"面子"而阻碍他继续献身于那个事业。

毛周的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一个谜。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之前，周常常证明自己是很激烈的革命者，但是自从取得政权，特别是在这本著作中所涉及的那些年代里，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他总是与那些温和而有节制的政策联在一起。他与处于节制状态的毛，或者说——用文化大革命的标准——"毛主义"色彩较淡的毛的关系较好。用传统的中国术语来说，周是阴——性格至柔，而毛则是阳——魁梧热烈而富有男性气息。

周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的解释，部份地可从他个性中明显一面中找到。毛，象其他伟人一样，是一个有点孤独的人，一个与别人保有一定距离的人，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他。[33] 而刘，虽然党的机构内有一小批人支持他，看起来总是个孤独的人。而周恩来则擅长与人接触，尽管接触并不密

切。甚至在1958年他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之后，即使无疑有很多其它的事在等着他去做，他仍然继续会见许多外国代表团，虽然这些代表团在外交上常常是不重要的。从他当学生时起，周就显示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忠诚多半来自他的个性而不是来自他的观点——明显的是他从未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理论家”，哪怕是一点点——而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能一直是个高超的谈判能手。无论谈判或调解都要求相互间做些让步，周在原则上的坚定性并不妨碍他在方式上的最大灵活性，可谓“外柔内刚”。[34]

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会常常妥协，也许在周的善于用人才能与其偏爱温和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由于这种偏爱使周与毛发生分歧，而毛总感到周一定会服从他的指示，甚至当他们两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既忠诚又有能力是使周能与毛结成毛——周两人政治合作关系的原因。

为什么是1956年？

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显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如果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话。

合作化被毛认为是巩固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步。当合作化的完成近在眼前时，毛宣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以此作为一个机会开始发动中国的两个经济上的“大跃进”中的第一个。[35] 此后5年毛及其同事们花了很大力量谋求经济上的突破。在3年（1959—1961）困苦的自然灾害中，1960年，在人民的哀怨声中结束了“大跃进”。这引发了领导层中的分歧，它使人们重新评价发展战略，从而把毛及其同事们放到了对立面上。此外，灾难在党内给了毛的权威当头一棒，从而引起了毛的疑虑：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剥夺他的权力。

毛在这方面的疑虑最初看上去有些荒谬，作为中国革命的列

宁和斯大林，毛处于一种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很难做到谴责毛或诋毁他的名誉而不严重影响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早在1956年非斯大林化时，毛就开始怀疑，尽管非毛化是不可能的。毛的一些同事倾向于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作为削弱他的地位的机会。形势的复杂化还在于毛亲自决定他将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以避免苏联斯大林死后出现的那种拜占庭式的斗争在中国重演。这里人们再次可以看到毛自身的矛盾——他的让出权力的意愿和对他的同事们急于掌权的怨恨。在本项研究所涉及的10年中，怨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后来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毛对党群关系的重视。中国应如何统治，这是毛1957年试图通过党的整风加以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刘少奇、彭真及其他党的干部在方式方法上尚有不同意见，毛随后停止了这种作法。但是，在1960年，越来越关心苏联演变的方向时，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紧迫了。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及提出的一些新理论，在中国领导人中引起了对苏联领导人的能力以及领导共产党集团的方法的疑虑。这些疑虑不安由于1959年赫鲁晓夫准备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加剧了。从1960年起，中国开始谴责苏联愿与帝国主义妥协。但是当这些责难没有能够使得苏联领导人回心转意时，毛开始重新审视苏联社会，试图理解是什么使苏联偏离了毛所认为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50年代初，中国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大跃进期间，中国放弃了苏联经济模式；60年代中期，毛完成了对苏联社会的分析，认为必须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党和国家需要重新建造。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试图为中国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生为了中国革命而思考和工作的毛的高峰

时期。但是促使毛发动文化革命的酝酿过程是从1956年的事件开始的。

注释:

1.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3页;1965年公开发表。
2. 详见麦克法夸尔:《在共产党中国和不发达的亚洲国家中领导人的内聚力》,引自《分裂的世界中的新国家》,第222—235页。
3. 斯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第125页到180页。
4. 《毛泽东选集》(下称《毛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北京:外文出版社,第1、2、3卷,1965年版;第4卷,1961年版)。以上是毛1949年以前的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本文引用的毛1949年以后文章的重要资料来源是著作目录注释。
5. 施拉姆:《毛泽东》(1967年修订本),《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7年修订本);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萧瑜:《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米歇尔·奥克林伯格:《1949—1968年毛泽东的政策》,引自《比较政治》,1971年4月。
6. 参见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135页至137页;周恩来:《伟大的十年》第81页。
7. 斯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第84页。
8. 参见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340页。
9. 1970年底在和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毛说他要求仅把他称作一个导师;参见斯诺:《和毛泽东会谈》,载1971年4月30日《生活》第46页至48页。
10. 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第165页。
11. 首次讲话(7月7日)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18页。(这本资料的第109页,日期错写为7月8日;确切的日期参见上文第281

—282 页）后一次讲话（7 月下旬）参见《1957 年夏季的形势》，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 4 月未注明出版者）；另见《当代背景》861 号，第 25 页。

12. 引自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和刘少奇，1939年—1969年》，载《亚洲概览》1972 年 4 月，第 278 页。
13. 同上。
14. 《邓小平的交待》（广东省上山下乡"打虎"青年战斗队重印，未注明出版日期）第 6 页。（这一资料由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复制，归入文化大革命缩微资料第 10 类，第 1 卷，第 1 部分。）
15. 参见张国焘为联合研究院出版的3卷本的《刘选》作的序言。每卷的第一部分。
16. 参见他对地质学院学生的讲话。同上，第2卷，第423页。
17. 《刘少奇1899—1967年生平大事记》，载《当代背景》834号，第23页。
18. 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第336页。
19. 参见《'狂热'的新时代》，引自《中国大陆杂志选》603号，第28页。
20. 毛刘联盟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依然是一个谜。根据资料，在遵义会议的争论中，刘是站在毛一边的（第 8 页、第 140 页），只是理由不尽相同（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3 卷，第 17 页。）根据同一资料，在 1937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刘少奇在报告中激烈地批评了前 10 年党的领导。虽然这一报告被否决了，但他这一攻击得到毛的鼓励，毛使刘得以免于贬黜（同上，第 251—261 页）。根据张国焘的回忆，1937 年 6 月刘曾写信给党的领导人，批评前 16 年的政策。虽然这封信没有提到毛的名字，但批评了他曾拥护过的政策。当毛通过调解人发现刘少奇没有与张国焘联名写信来撵走自己而拥护张国焘时，毛决定尽力与刘少奇交往，使他进入政治局，做为反对别的政治局委员的同盟者（《刘少奇选集，1945—1957》，第 6—8 页）。

这些事情在文革中没有被揭露，但有人指控刘1937年3月4日写信

给中央，诬蔑毛赞扬王明——毛的一个受过苏联训练的对手。这份资料说刘出席了1937年5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和8月的政治局会议（《刘少奇1899—1967年生平大事记》《当代背景》834号，第4—5页。

21. 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9—10页。

22. 引自《中国大陆杂志》603号，第28页。刘少奇对革命理论的贡献也是得到承认的。攻击刘少奇的作者是一个职位低的党员，而他所称赞的刘在组织和理论上的贡献被认为是反映了目前中共党的传统智慧。

23. 《打倒三反分子刘宾雁》，引自1967年5月29日《飞鸣镝》。见《中国大陆杂志选》209号，第32页。

24. 刘的一个兄弟可能知道刘的情况，他曾说："刘少奇是从苏联马列主义学院毕业的。是刘少奇把他的位置给了毛主席；第一个被选的是刘少奇"。（参见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小报：《红旗》1967年2月10日第6页，第1栏，在刘的兄弟的后一句话的第二部分的意思里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是否刘少奇组织筹划了第一次选毛泽东为党的主席（在七大？——在这以前毛泽东可能仅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或者刘在某些选举中击败了毛。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16号第6页中从另一种红卫兵资料中翻译了同一篇文章，文章提出："刘少奇是有可能赢得了第一次选举的"。《红旗》中的文章写道："本来都一致选举刘少奇的"。（译按：这里引用的红卫兵小报中的叙述，与事实不符）

25. 参见《亚洲概览》1972年4月，第279页上施拉姆的文章。

26. 《刘少奇三次夺取我国新闻界权力的反革命滔天罪行》，1967年5月11日《人大三红》，《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1号，第26页。

27. 参见施拉姆上述引文，第279—280页，刘对毛的第一次颂扬是1943年7月。

28.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20页）。

29. 施拉姆上引书第280页

30. 刘的交待包括在《刘少奇选集，1958—1967》，第351—377页。

31. 周恩来的生平（和别的中共领导人）详见科林和克拉克的《中国共产党传记词典，1921—1965年》。另可见许芥煜：《周恩来：中国的卓越人物》；汤姆斯·W·鲁滨逊：《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政治风格之比较》（圣莫尼卡，兰德公司，P—4474，1970年10月）。

32. 重建是基于遵义会议，不是一致同意：见郭华伦上引书第3卷；第16—27页。陈志让《遵义会议的决议》，载《中国季刊》1969年10月—11月，第1—38页；迪特尔·海因茨格：《论奥托·布劳恩和遵义会议》同上，1970年4—6月，第131—135页。

33.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周恩来都如此承认。林的讲话在奥克森伯格《比较政治》1971年4月，第347页中被引用；周的讲话参见《周总理接见工交、财贸、农林战线和国家直属机关代表的讲话》，1968年2月2日（未注明出版者）。

34. 赫米耳·欧利沃指出，劳德·切斯特菲尔德说过：外柔内刚这句话可能很适合周恩来。

35. 更详细的研究参见麦克法夸尔：《共产党中国二十年：一个周期》，载《中国季刊》1969年7—9月，第55—63页。

第一编

根本变化

15

第一章

社会主义“高潮”

“问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在1956年1月12日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1] 这册厚书[2] 叙述了毛号召各省的领导人加速农业合作化前后的农村形势。早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直到10月才发表），毛泽东批评那些谨慎的领导人"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3] 并为加快合作化的速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指标：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大约增长55%的计划相比较，到1956年10月，农业生产合作社[4] 的数量要增长100%。[5]

根据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实际速度，毛的指标似乎是相当保守的。毛规定在14个月内完成，但实际上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即到1955年11月底，这一指标就完成了。[6] 当毛在7月做报告时，还只有1690万户农民加入了合作

社，但是到12月27日他在序言上签字时，数字则超过了7000万户。[7]中国1.1亿农户中有60%以上的农户带着他们的土地、劳动力、牲畜和农具加入了合作社，将其交给集体经营。几乎没有发生苏联合作化期间所发生的暴力、抵抗和骚乱，[8]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农村所特有的以户为单位的农业制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扫荡了。据毛说："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9]这就是他所指的"根本变化"。毛在1个月以后说明他指的是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他宣布，只要再有3年的时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10]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了毛所做的估计的含义：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谁胜谁负的问题，即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胜利的问题已经确定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1]

16

第一节　在　农　村

为什么毛认为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呢？这可以从他关于合作化形势的讲话的国内背景中找到答案。到1955年7月，共产主义制度已在整个国家牢牢确立。土改[12]和1951——1952年的镇反运动已经有效地摧毁了旧的国民党权力机构，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它的权力延伸到了整个农村。思想改造运动和五反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在城市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建立了统治。[13]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遭受了12年国内外战争（译按：原文如此）破坏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尽管政府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不愿意公布五年计划的确切项目，但是它是在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4]在1954年的秋天，新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15]建立了这个政权的正式机构，对毛泽东的许多或者说大多数高级同僚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已经巩固

实现工业化计划的关键——因为它是进口机械产品的支付手段，是轻工业的原料，也是日益增加的城市工人的食粮。俄国和中国两个国家所提供的事实表明，集体化能够使收购粮食的工作简单得多。除此之外，它还证明被贫农控制的合作社将比个体经营的资本主义富农愿意更多地上交剩余粮食。[19]

在毛泽东作报告时，农业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生产。如果农业生产没有很快地增长，那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上交。事实上，很低的农业产量已迫使制定计划的人削减了他们原来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20] 毛用已经建立的80%的合作社的成果证明合作化能够帮助生产增长。显然苏联的经验太糟糕，不宜于引用。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和群众会把合作化推向前去没有信心，那末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将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那么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换言之，毛认为合作化是完成这个政权初步目标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正如陈伯达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够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另一只脚却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21]（译按：这是陈伯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

虽然毛泽东确信合作化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在7月份他期望他的讲话会使"根本变化"来得这样快。当他5个月后写他的前言时，他的设想仍然是保守的，他期望能在1956年完成把农业改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而初级社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叫合作社）[22] 的转变则要到1959或1960年才开始。

甚至在序言发表两星期后提出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也仅要求到1958年基本完成合作化，[23] 这已是再次把时间表提前了。结果，1956年6月，有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到这一年的12月，则有88%的农户入了社。[24]

合作化是毛个人的胜利。他不顾他的一些最高级同僚的意见和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在1955年7月31日的讲话中掀起了“高潮”。他越过中央官员，向各省的领导人呼吁，这些省的领导人再一次显示党的机构的极高的组织能力。为了保证省的领导人不受农村工作部思想保守的官员的制约，他在1955年夏派了两个久经考验的助手任这个部的副部长。他们是他的前任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25]在毛对他的同事表示他决心加速合作化的意图之前，[26]可能已经就他们的任命作出安排了。1955年10月，陈伯达向六中全会提出了政治局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

到这时，大家已明确“高潮”已出现了，虽然有几个月的时间，对高潮的范围还不清楚。其证明就是政治局做出推进毛7月份提出的目标的决定没有被全会接受。[27]毛自己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批准发表他的讲话，并向全会说明：进行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四个胜利之一：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胜利：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镇压反革命；统购统销粮食；进行合作化运动。这些运动都带有反对资产阶级的特点，给资产阶级以重大打击。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要继续进行一个很长的时间。[28]

面对这一胜利，那些在合作化问题上反对毛的人不得不承认错误。在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以如下的话作了自我批评：

几年前，我没有这种思想，在土改后除了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要用一些时间普遍地发展合作社。结果，我没有提倡和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这是错误的。[29]

19

刘1955年在他主持的会议上接受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的把现存的67万个农业合作社解散20万个的建议，

刘可能对此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也作了自我批评。[30]几乎可以肯定，促使毛通过7月的讲话介入此事，并给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个新的推动力的就是这个决定。

刘少奇用"也"这个字暗示另外一些主要领导人也因他们对于合作化冷淡的态度而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人可能包括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农业部长廖鲁言。这两个人在年初都主张谨慎地进行合作化。[31]一些高级官员也公开暗示他们犯了错误。这些人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副总理兼上海市市长陈毅。[32]这三个人和李富春在次年的"八大"上都被提升进入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受到毛的批评，但他当时似乎没有公开做自我批评。[33]他没有参加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这次会上是农业部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提出了《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34]邓子恢后来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作了自我批评，但这已为时太晚，这使他未能象别的副总理那样进入政治局。[35]他之所以能保留副总理和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领导职务，可能是由于过去与毛关系密切的缘故。[36]

第二节 在城市

毛的反对者在合作化问题上的自我批评并不是唯一的迹象。证明到1955年10月舆论已一致认为他是正确的。加速工商业的国有化是另一个迹象。在全会上已经讨论了工商业应怎样对农业合作化高潮做出反应。不久，中共中央领导着手使中国的资本家有进行大规模合作化的思想准备，以与已经在农村兴起的合作化高潮相适应。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起讨论这个问题；5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总理以及第一副总理陈云在会上讲了话，全国工商联的主席和一些知名人士也发了言。[37]11月1

20

日，陈云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一个有1000多工商业者参加的座谈会上讲了话。[38]

可能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10月29日的讲话被作为"指示"向174名工商联执行委员传达了。同一天，他们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周的会议，这是自1953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在这个全国工商联会议上，始终都出席了会议的陈云和陈毅副总理都发了言，后者可能是以中国主要的资本主义堡垒——上海市的市长的身份参加的。[39] 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告诉执行委员会说，新的合作化和生产高潮正在改变经济面貌，并且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有化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有重要的联系。如果工商业者不去加紧这个改造，他们就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他还说，在改造过程中，"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确立为生产和消费者服务的思想，虽然他这话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40] 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一位副主席总结说：这次会议已完成了促进工商业者以积极态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41] 一封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给全国工商界的公开信在的最后一天被通过了。信中号召在接受改造方面要加快步伐。[42]《人民日报》的社论论述了这一信息。[43]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召开了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11月16日—24日）[44] 虽然当时未公布举行会议。刘少奇在会议的第一天讲了话，他的讲话描述了国家在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讲话发表以后出现的不稳定状况：现在，有许多资本家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情绪也不安。在中国，6亿人民中有5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要改变两种所有制和废除两种私有制。要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这一要求引起了除工人阶级以外的全国所有人的忧虑和不安。[45]

21

虽然这些话，象该次讲话中的另外一些话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用来攻击刘少奇，但是，他只是描述了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国内状态，显然他并没有用他对这种状态的估价去提倡放慢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相反他强调当前社会主义化运动的重要性——转为公私合营将打断资本家反抗国有化的脊梁骨，并且使转变为国家所有制更易完成。因此，刘少奇提倡阶级斗争以保证在现在的紧要关头获得胜利：

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因素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它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当国有化宣布的时候，所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有关的商业都要国有化。那时，几乎可以说斗争将不存在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因此，到宣布国有化的时候，将不再强调斗争。那时，我们将不再说有严重的斗争。但是，我们把现阶段的斗争看作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把公私合营看作一场决定性的斗争，看作一场淮海战役……在我们和资本家斗争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46]

刘少奇还强调了工商业者的技能对国家的重要性，希望在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淮海战役"[47]中得到工商业者中进步人士的帮助：

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是非常能干的，他们能够比我们共产党员和我们的同志把事情办得更好。他们相当一批人是精明强干的，并且拥有技术知识。当资产阶级分子得到正确的监督和改造以后，他们管理我们的工厂会比我们共产党人管得更好。这是完全可能的。[48]……在资产阶级分子中，在他们的妻子儿女当中，有一批赞成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是极其可贵

22

的。在我们当前的斗争中，在我们目前所处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们极为有用。他们的功绩，可以同战争中参加一次大战役相媲美，他们就象战争中的英雄。……为了夺取资产阶级的堡垒，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首先是积极分子，会举行支持共产主义的起义……资本家的妻子晚上回到家里说的一席话，作用比两位姓陈的副总理〔即陈云和陈毅〕还大，必须看到她在这方面的作用。[49]

开过中央委员会会议〔指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译者注〕之后，12月初，毛泽东到上海作了一次不公开访问。陈毅市长为他安排会见了大约80位上海实业界头面人物。据其中一位回忆，毛对与会者说，他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毛首先赞扬了过去几年“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所做的巨大贡献。他接着说：“现在我从北京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他说，许多工商业者一直在请求说，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当加快进行，“他们怕民族资产阶级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会落后”。

毛说：“我认为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但我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了解。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只带了两个耳朵参加这个会，如果你们希望我讲更多的话，那是会失望的”。[50]

会上，所有发言的工商业者都赞成加速国有化的转变，一些人说，转变可能只要5年时间。据报道，毛在听取了两小时的发言之后说，他会认真考虑这个意见；但他始终感到在下决心加速改造之前，必须仔细考虑如何妥善照顾“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的利益。[51]

在这个时期，在1955年12月，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实现公私合营的预定期限是1957年。根据后来的（含有敌意的）一个记载，“表面谨慎”的陈云“赶忙”召集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下达了这个期限。显然，他是整个改造运动的负责人。然而，如果说

这个活动有些匆忙的话，那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料到的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速度造成的。因为尽管这个记载的作者暗示陈云试图推迟转变，但实际上毛本人在12月6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一次讲话里，也赞同把完成改造的期限定在1957年。[52] 同合作化的情形一样，毛的设想似乎被事实超过——确切些说，是被北京市委超过了。

23

12月间，一些工业城市举行会议，宣布将于1957年完成所有制的转变。这大概是陈云把正式的日程表传达给他们以后发生的。到了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重申："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内，将基本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3] 这家报纸指出，12月初，当工业中有30多个行业被批准按行业实行改造的时候，国有化的过程就加速了。这30多个行业包括了主要是在中国6个重要工业城市里的2000多家企业。在这6个城市里，拥有3000多家商店的十几个商业系统也被批准改造。只有一个城市，北京，领悟了这些早期成功的教益。

早在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告诫人们不要在加速改造的运动中盲目合并的文章。然而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委的干部会议在5天的讨论之后，提出一个"初步"计划，号召为在1956年底完成向公私合营的转变而奋斗。[54] 到了1月初，武汉也在考虑比陈云规定的速度更快些的可能性，并且预言也要在1956年完成转变。[55] 在北京，所有的工商业都在1月上旬改造了，紧接着，手工业在11日和12日完成了改造。但是，公众对于这种突然的改造毫无准备。起初，这大概只意味着换换招牌——仅仅是私营企业换上公私合营的招牌[56]——但在某种情况下，是存在着"盲目合并"的情况。北京市立即于15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改造胜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席了集会。[57]

一位上海工商业者后来回忆说，毛同他和他的同伴们友善地交谈刚过了几个星期，市里的领导人就通知工商业者，必须在6

天之内完成改造。[58]就在北京集会庆祝的同一天，上海工商业者开会讨论北京的改造方式，并且同意在20日提交申请改造的报告。[59]但在第二天，一位上海市委负责人在干部会议上说，市委认为改造应该在20日完成。[60]其他工业城市也受到北京所获成就的鼓舞。这样，到1月底，公私合营在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中已基本完成了。[61]

24

陈云可能不欣赏当时那种过急的做法，甚至毛泽东私下里也对北京市那种做法表示担忧。[62]陈云后来告知全国人民代表："一下子批准转为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并不意味着改造的完成，而仅仅是开始。改造中还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待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63]在北京，这些问题与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上海比较，相对来说还简单一些。[64]但北京提出了挑战，上海便不能不对此应战。对已经发生的情况，陈云在全国人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是安排于两年内分期分批按行业进行的，但在今年1月，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达到了高潮，政府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这个改变对于跟上时代的要求是必要的。可如此之快的结果，使许多部门和地区没有时间去总结引导整个行业参加公私合营的经验，所以在庆贺改造的阵阵锣鼓声中，许多地区的一些工厂、手工业品商店、杂货店和运输业相继合并。其中有一些是不该被并入的，一些可以合并，但规模太大了。[65]

规模过大不是加速公私合营改造的唯一结果。供应、生产、市场被打乱了，经过试验或考验过的管理方法一夜之间被抛弃了，产品种类下降了，商店营业时间缩短了，造成顾客的不方便。[66]

在全国工商联主席告诉他的同事，改造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必须改变的3个月后，1月30日，周总理在设法阻止进一步混乱的努力中，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说，原来的生产管

理方法，不得"轻易地"改变，好的方法必须作为"历史遗产保留下来，并传下去加以发展。"[67]2月8日，经陈云解释后，国务院决定，"私人企业自批准合营后，一般应按原来方式继续经营6个月。"[68]当时，有次序的改造过程已被打乱，但陈云至少坚持了一种可获喘息的余地。

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表明，高潮一旦开始，要控制它是不可能的，甚至毛泽东也无力去抑制下级的干部。他们如毛泽东所理解的，怕被指摘为右倾。[69]毛泽东曾在六中全会上说，他认为企图在1956年内实现80%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左倾。"[70]但最后，80%以上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于年底完成了。于是不管毛泽东怎样在私下里对在北京的那一套做法有所批评和不高兴，但在公开场合，他却必须喝采。当时对这两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应是刹车，就如邓子恢一年前在合作化问题上的那种做法，然而这对毛泽东说来，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在这年年底的生产高潮中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注释：

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序言英译文载《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7—119页，这段话在第118页。
2. 3卷本，共计178篇文章，1360页，90万字。为了普及，出版了27万字的节略本，并出版了505页的英译本，毛在六中全会上说：10月份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选出1200篇文章，他自己闭门读了11天，共读了其中的120篇。(《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 第20页；这个讲话注明的日期是9月，但这个讲话是全会的总结，全会是在10月4日至11日举行的，正确的日期大约是10月11日。
3. 官方翻译毛的讲话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收入《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94—105页，这个引语在第94页。

4. 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个阶段走向合作化。第一阶段是临时互助组，尔后是长年互助组；这一名称暗示，在互助中的农民主要是在农忙时互相帮忙。这种互助组在许多地区只是把几个世纪以来农民经常的活动方式固定化。

第二阶段是半社会主义阶段或农业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初级社是完全的集体化组织，土地、农具、劳动力安排都是集中经营管理。但是农民的报酬不仅根据劳动，而且还进行土地分红。

第三阶段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阶段，或高级农业合作社阶段（我称之为集体化），土地分红（即集体付给农民的地租，这对比较富裕的农民有利）被取消。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农业合作化的各种形式的不同之处，参见赵国春《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一书中的一览表。更详尽的论述和表格，参见肯尼思·K·沃克《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份和私有成份；1956—1962 年》第 3—19 页。

5.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95—96 页。
6. 《当代背景》373 号，第 23 页。
7.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8 页。
8. 伯恩斯坦：《苏联1929—1930年和中国1955—1956年集体化运动中领导者和群众动机之比较》，载《中国季刊》，1967 年 7—9 月，第 47 页。在苏联，危机使斯大林不得不放弃他的集体化而走向反面。在 10 年内并没有完成农业集体化（参见范索德：《如何统治俄国》第 531 页）
9.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节略英译本），第159—160页。
10. 1月2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11. 他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人民中国》1956年第4期增刊，第12页）。据 1956 年《人民手册》中译本记载，周的说明赢得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12. 土改的情况参见克鲁克：《一个中国村庄——十里店的变革》韩丁：《翻身》。这两本书中记载了他们的见闻；这两本书记载了人民共和国诞生

前，40年代后期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土改，1949年以后土改计划的实施情况参见赵国春上引书第94—146页。

13. “三反”“五反”的情况参见附录5，另可参见巴尼特：《共产党中国：初创时代1949—1955》第125—171页；陈锡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第1—71页。

14.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会议上关于“一五”计划的说明，译文见《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91页。

15. 宪法的译文见唐：《今日共产党中国》第2卷，第90—110页。

16. 《彻底揭露刘少奇在政法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政法公社》，1967年4月16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年春第70页。

17. 毛在1955年7月31日讲话中谈论了吸取苏联教训的问题。（参见《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01—103页）

18. 同上，第103页。

19. 伯恩斯坦已经证明虽然早在1954年普遍合作化之前，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但这一地区对余粮的控制是相当严的。他所引证的《人民日报》1955年6月26日的社论暗示，在管理个体农户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行政上的问题。社论说：“彻底地调查清楚全国一亿农户的粮食产量、消费和余粮的贮存是一项很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显然100万个合作社将比较容易管理。参见：《在不安和被剥夺情况下干部和农民的态度：1955年春的粮食供应危机》，引自巴尼特主编：《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文见第371页。

20. 参见沃克：《回顾合作化：1955年秋1956年春的粮食供应危机》，载《中国季刊》，第26期，第22—26页。

21. 10月4日陈伯达为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说明（《人民手册》1956，第92页）。他与毛的关系见下面第25条注释。

22. 参见注释第4条关于合作化发展阶段的简要述叙。

23.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0页。

24. 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第12页。

25. 参见《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中他们的传记第77和95条；另见《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第80和104条。关于30年代初陈正人和毛在江西苏维埃时的关系，参见郭华伦上引书，第2卷，第43条。陈伯达30年代后期在延安成为毛的政治秘书。在文化革命期间当他成为第四号人物时，他对毛的重要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可以看出，这两人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内，他给毛以巨大帮助。

26. 毛在7月35日做了关于合作化的讲话。陈伯达在7月前是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在6月前是副部长。但这二人在这一部门发挥了多大作用尚不清楚。有趣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不是农村工作部编辑的，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的。

27. 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的日程定在1958年春，而毛的原订目标是1960年。这一目标和别的目标一样，迅速地被"高潮"突破（这个决议草案参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151号，第9—23页）。

28. 引自《毛主席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以来的关于文艺的重要指示》，《文艺红旗》1967年5月30日，第5期，(《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00号，第16页。)。

29. 引自《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同伙破坏农业机械化的严重罪行》，《农业机械技术》第5期，1967年8月8日(《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18页)。

30. 在文革期间他为此作了两次自我批评；参见《刘少奇选集，1958—1967》，第360和366页。刘承认农业合作社被削减20万个，但根据毛1955年7月31日讲话(《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95页）实际数字是2万个。公布这些数字的人两次犯同一个错误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不是毛分子把数字故意扩大10倍，以夸大刘错误的严重性，就是刘的记忆误差，或者就是他故意说错希望对他的这个错误不要看得太严重。在他的两次坦白中，他认为他的错误是一个疏忽——没有批评邓子恢的建议——而不是失误。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毛主义者还是十分得意利用那个错误的数字，并登在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题为《中国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社论中，（参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68号，第6页）。

31. 沃克：《中国农业规划》第9页。

32. 张书成（音）：《中国共产党决策的方式和程序，1955—1962年：三个案例的研究》第2章。

33. 这一时期邓的态度见同上出处。关于毛对邓的批评参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第21页。

34.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6日所列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名单中没有包括邓子恢。

35. 邓子恢在'八大'上的讲话译文，见《当代背景》421号，第1—9页。他的自我批评在第3页。邓本来早应该在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上和人民代表大会上做自我批评，但他在这两次会上都只提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斗争的成功，并没有确认他自己的偏差，也许他仅仅准备在党的讨论会上做自我批评。（参见新华社1957年5月7日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86号，第7—10日；他5月讲话的不同译本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他在人大会议的讲话见《当代背景》393，第22—30页）。

36. 邓子恢30年代初在江西苏维埃时期与毛的紧密关系参见郭华伦上引书第2卷，第486—493页。肖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力关系，1930—1934》第231—233页，第242—243页。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178页；约翰·E·鲁：《处在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第259页。这些著作记载了1933年如何通过反对"罗明路线"来反对毛的支持者，而邓子恢是其中受害者之一。在鲁著作的第249页写到邓子恢是"毛的一位老朋友"。当六中全会批评邓时，毛仍承认他长期以来的工作成绩（参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第21页）。值得补充的是，虽然邓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坚持保守立场，但他依然幸免于文革之害，再次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

37. 《人民手册》，1952年，第104页。

38.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 远东), 507号, 第11页。

39. 《人民手册》, 1956 年, 第 104—106 页。

40. 陈叔通讲话出处同上, 第106—109页; 在第108页上提及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41. 同上, 第 105 页。

42. 同上, 第 109 页。

43. 《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 远东), 附录, 192号, 第7—12页。

44.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1956年9月八大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会议, 其中也提到这次会议。(参见《当代背景》417 号, 第 14 页)。

45. 引自《资本主义经济的辩护士——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光明日报》1967 年 7 月 21 日(《当代背景》836 号, 第 34 页)。这一讲话的准确日期来自《光明日报》的另一段引语, 该引语出现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刘少奇的黑语录》中《进军报》1967 年 4 月 16 日(《联合出版研究中心》41889 号, 1967 年 7 月 19 日, 第 55 页)。

46. 引自《刘少奇的反动言论》(北京: 批判刘少奇联络站"红旗公社", 北京铁道研究院"红代会"1967 年 8 月)。(《中国大陆杂志选》, 附录 25 号, 第 6 页)。

47. 1948年至1949年的淮海战役是中国内战的决定性战役。参见查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 192—199 页。多少世纪以来, 当中国被分裂为敌对的南北两方时, 淮河流域曾是征战之地。参见姬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要地》第 104—107 页。

48. 引自《在对资改造中刘少奇在人民商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天津: 天津市人民商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和河北财经学院刘少奇罪行的"东方红"调查小组, 1967 年 6 月)。(《中国大陆杂志选》, 619 号, 第 66 页)。

49. 引自《彻底摧毁刘少奇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八·八战报》1967 年 4 月 21 日, 第 4 页, 第 2 栏。一段相同的引

文，提到两个副总理，但省略"提陈的名"，参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45号，第8页。

50. 参见罗和伊文斯上引书第136页。

51. 同上。一位姓戴恩的先生1956年和他的中国妻子（她的一些亲属还在北京）返回中国访问，提到了毛、刘少奇、周恩来总理处理问题不同方法的一件轶事：毛同刘、周：他们怎样使一只猫吃辣椒。

刘少奇回答："这很容易。""叫人抓住猫，把辣椒塞到它的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不，不"毛嫌恶地挥了挥手："决不能用强力——这不民主，一切事情都要自愿。你将怎么办?"他转向周恩来。

"我将饿一饿这只猫。"总理答到："然后我在辣椒上包一块肉，一旦猫饿得耐不住了，就会全部吞下去。"

毛再一次摇了摇了头，也不能用欺骗的方法，他说："决不能愚弄人民"。两个人疑惑地看着他，看他如何办。

"这很容易"，毛回答。"把辣椒抹在猫的整个背上，开始发热时，猫就舔掉它，而且猫很乐意被允许这样做"。（参见卡尔·埃斯克伦德：《红色官员》第150—151页。埃斯克伦德的妻子听说了这段轶事，用它来说明上海的一位资本家吃了辣椒后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这则轶事很可能在工商界流传。（译按：以上这段"轶事"没有事实根据）。

52. 对陈云的行动的恶意描述，参见《看陈云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罪行》，《财贸红旗》1967年2月15日（《中国大陆杂志选》附录，175号第25页）。毛的批示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第25—26页。

5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10号，第7页。

54.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196号）第1页。

55. 北京广播，1956年6月6日，（《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198号，第12页）。

56. 参见《商业工作》中的一篇社论1956年6月19日（《中国大陆报刊概

览》1226，第16—18页）。

57. 新华社1956年6月15日讯（《世界广播概览》（第五部分：远东527号，第14—15页）。根据陈叔通1956年1月6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北京方面不是靠国家官员而是靠让资本家自己清理、估算资产的简单方法加速了改造的进程。（《当代背景》，377号，第24页）。

58. 罗和伊文斯上引书第137页。一个瑞士作家这时正在中国，他报道：1月13日毛与一群元帅到了上海督促工作。（施密特：《中国新貌》第93页）；罗伯特·罗一定听说了这次出访，但是没有提及。也许出访日期是12月13日，那一群元帅可能只是上海市市长陈毅，他也是一个元帅。

59. 《人民日报》1956年1月。

60. 同上。

61. 新华社1956年2月2日电。

62. 在3月的一次工商界人士的会议上，陈云说，错误合并的事情，某一地方的高级干部应负最后的责任。（见《打倒反对毛主席的老手陈云》，《财贸红旗》1967年2月15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附录177号，第9页）。毛在参加天安门广场庆祝集会后不到一星期，在谈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次中共的会议上，嘲弄了某些地方的党组织放弃领导权，而让资本家自己负责大量的改造工作——这显然是为了加快工作——的情况（参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第30—31页，也可参见注释57）。

63. 《当代背景》393号，第14页。

64. 根据1954年的统计，上海私营企业的产值占全国私营企业的总产值的41.8%。1955年8月，上海资本家对商业的投资占全国资本家商业投资的13.9%（新华社1956年2月2日电，《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01号，第9页）。

65. 《当代背景》393号，第10页。

66. 根据2月8日国务院决定(《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32号，第16页)。

67. 《政治报告》引自《人民中国》，1956年第4期附录，第11页。在文革期间，刘少奇曾被公开嘲弄，因为他在1956年对外贸部说，资本家、专家和对外贸易人员的管理方法是一笔"遗产"(《彻底肃清刘少奇在外贸战线的滔天罪行》，《北京公社》1967年5月27日，第1—2卷)。

68. 这个决定的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16—18页；引语见第17页。显而易见，如果彭真是加速改造的倡导者，文革中的毛主义者是不会承认的，因为彭真是他们清洗的主要受害者。这也许就是陈云的"谨慎"为什么没有被彻底"揭露"的原因。他幸免于文革之害。

69.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 第30页。

70. 同上，第23页。在这一点上，毛打了个比喻：好象妇女生娃娃，7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9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

说，再有 3 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他对他的胜利孤芳自赏道："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2]

解决社会主义化的问题看来使毛泽东如释重负。现在政权的巩固是有把握的了，他可以把精力转到将中国发展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更艰苦，更长期的任务上，这个目标紧紧地困扰着他，这是可以理解的。[3] 正如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4] 而解放生产力就必须提高生产，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及其必要性。

毛泽东将生产问题摆在首位。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突破：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5]

27 虽然毛处理这个问题时比较简单和温和，但他所写的序言是号召经济上来个突击的号角。这个突击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 1956 年的"冒进"，[6] 毛号召批评那些对加速生产的可能性认识不足的人：

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即各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7] 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

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8]

这个序言发表两天后，周恩来在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道，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做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并要求全党的工作部门都开展这个斗争。[9]正如序言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现在所担心的右倾保守主义是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而与后来在不同的条件下引起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毫无关系。

第一节　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天津同15个省委书记谈了他的关于农业发展的“11条”。在这个会议上，“11条”又被改成了“17条”。1956年1月在北京，毛在同这些官员又谈了几次以后，将“17条”扩大到“40条”——这就是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的第一个草案。当时请技术专家小组和各民主党派成员讨论这草案，参加的总共有1000多人。人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得到采纳。随后，纲要的修改草案在1月23日被政治局正式通过，这个草案递交给最高国务会议[10]的日期是1月25日。[11]

28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2]《十二年农业纲要》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这四十条包括从交通到水利等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最明确的指标是规定到12年时间结束时粮食、棉花产量的惊人增长：粮食100——140%，棉花71——185%，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土地面积。对纲要的意见要在4月1日以前收集起来，以提交中共中央第七次全

会讨论，然后作为一个提议交给国家机关和全体人民。[13]这个纲要如此雄心勃勃以致于值得突出一下它的制定者——毛和省的官员，他们的长处是管理人而不是农业经济，在合作化的高潮时候，他们对他们可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规定12年时间内，过分担心了。到1月召集技术专家来讨论时，要作很多重大的压低指标的修改。这从政治上和受官僚作风影响的角度来看，大概都是不可能的了。

早在1955年11月，大概是在关于天津工作的十七条制定之后，一些省就决定要加快完成他们的生产指标。山西、江西和山东说他们1956年就将完成他们1957年的指标。[14]其它省在12月也都跟着这样做。[15]十二年纲要影响的一个更有意义的表示是浙江省委制定的稻谷每亩产量，[16]到1962年[17]提高到800斤的决定；在计划公布时，已能证明要到1967年浙江才能达到这个产量。[18]也许浙江的热情反映了它要弥补浙江在1955年曾经是"收缩"农业合作社最多的一个省这一过失的愿望，虽然毛已经免除了省领导对保守主义的责任。[19]

29 但是，为实现十二年纲要发动的生产运动作准备的，不仅只有省领导。12月召开的农学家会议起草了一个农业研究和虫害控制的十二年计划。[20]电讯会议保证"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规定的大约7年时间内"[21]使每个县有电话网，虽然十二年纲要公布时它只要求在7至12年时间内实现。[22]很清楚，在1月的讨论中对纲要作了一些修改，但这些修改仍并不能使它成为现实。北京的第二个意图看来并没有贯彻到各省去。在一些新年宣布他们将在1956年完成1957年的指标的省里，广东号召增加400万吨粮食。[23]这就是说要在1955年的数字上增加18%以上，[24]但结果却只增加了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25]然而尽管这样头脑发热，《人民日报》仍然感到有必要在最高国务会议前夕，在一篇题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的社论中攻击一下生产计划上的保守主

义。[26]

周恩来一方面不同意当时各省制定的更加极端的计划，一方面却又在1956年1月30日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27]中要求1956年粮食增加9%，棉花增加18%。这个指标假如实现的话，那将意味着在1956年提前一年轻易地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但是周坚决拒绝认为这些目标太大的任何意见（译按：此说不确切）[28]

北京的指标对各省的影响，1956年在福建省反映出来了，据这个省的第一书记[29]说，这年福建省粮食增产指标是16%，几乎是周的数字的一倍，但当它下达到县一级时已经提高到40%。既然象周总理这样负责的领导人和象陈伯达这样接近毛的人都准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讲到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可以提前完成，[30]那么，就不应完全责备省级以下干部。的确，周把这个纲要说成是"最低"纲要。[31]因此，当一个鼓舞农民的全国竞赛运动由农民模范李顺达发动时，出现增产几乎达到46%的保证也就不值得奇怪了。[32]

第二节 "多、快、好、省"

推动农业战线的做法被工业战线所效仿。直到1955年9月26日，《人民日报》还曾发表文章对落后的基本建设计划抱悲观态度。一个月后，在评论1956年计划的准备时，《人民日报》也一直采取了一种清醒的方针。[33]但是，在12月份，当城市里采取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几步之后，情况就根本性地改变了。国家建委主任在12月25日告诉新华社说，该部门为1956年制定的最新计划比原订的指标增加了26%；这将意味着，1956年要做的工作量将是1955年的两倍。煤炭部宣布，在1956年将完成1957年计划的96%。第一机械部声称，1956年该部主

要产品诸如汽轮机和发电机，机车和车辆等的产量将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指标。[34]其它的部也作出了类似的预测。铁道部长在7月曾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半阶段，原订的铁路建设项目仅完成了40%[35]。但在12月22日，他告诉新华社，五年计划的指标将在1956年底之前完成。[36]同一天，重工业部宣称，1956年重工企业产品的产值将达到1957年的99%。[37]

在11月和12月这两个月期间，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制定1956年计划。这个计划在1956年1月的后半月中被修改。[38]计委主任李富春后来说，他的部门根据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所带来的"新形势，重新调正了一些不适当的指标"。[39]大概这是在12月到1月期间发生的事情。可是，没有采取行动来修改全部的五年计划指标，后来刘少奇批评了这个错误。[40]

象农业方面的情况一样，生产者们自告奋勇地做保证和开展竞赛运动，许多部门还决定召开先进工作者大会，以便鼓舞他们那些缺乏积极性和技术不高的同事。[41]毛制定了一新口号来鞭策他们："多、快、好、省"。[42]但是，李富春和计划工作者们似乎尽了全力对生产竞赛加以某种控制。有两个情况可以证明这点：由全国总工会动员全国工人参加的竞赛开始得缓慢；而且，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将毛的口号公布。这些计划工作者大概是导致这些迟延现象的幕后人。

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在1月13日召开了全体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2月9日，全总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不过这两个决议在当时都没有马上公布。关于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决议，直到2月29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这已是这个决议被通过的几个星期之后了。第二个决议的公布的时间甚至更长。3月10日，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为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

会议制定计划。[43]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不是由全总主席而是由李富春牵头领导。两天以后，中共中央非公开地发布了一个通知，批准全总2月9日决议。但是直到3月30日，这个通知和原来的决议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自这个决议通过之日起，已经拖延了7个星期[44]。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央已经批准了这项决议之后，到最终公布这个决议之时，又过了两个半星期。

毛的口号在1月13日全总决议中是以歪曲的形式出现的——"快、多、好、省"而不是"多、快、好、省"。而在2月9日的全总决议中，它是以正确的形式出现的。这表明：这个口号被赋予最终的形式是在这段日期之间的某个时候。尽管在1956年初人们就清楚地知道了这个口号，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它才作为一个全国的正式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布1月13日全总的决议时《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没有提到这个口号，虽然提到这个口号是比较恰当的做法。这个口号最终被官方认可是在3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中，这篇社论写道："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以后，还必须不断给他们指出方向，这样才能步调齐一，收效宏大。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总的方向。"[45]

32

看来在2月底3月初，在最高领导层中，就如何加快工业发展，以便同农业的运动协调一致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争论结束时，计划制订者们已同意开展全民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并同意发表毛泽东提出的口号。但他们接过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领导，在准备任何旨在加速工业发展的主要计划之前，发动了一个大范围的经济调查。正是这两个月的调查，成为4月底毛泽东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经济部分的基础。[46]但他私下已讲了他的最终目标：50至70年内在经济上超过美国，[47]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48]

注释

1.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8 页。
2.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3. 1957年毛告诉法国前总理："你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现状，我们多么落后，任务很艰巨"。(《蛇与龟》第 28 页)。很可能，毛是"最高官员"，1960 年他告诉埃德加·斯诺：中国还是个落后国家……在我们称我们是先进国家之前，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斯诺：《大河彼岸》第 15 页，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4.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5.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8页，毛发表了他的序言仅8天之后，就对序言中这一段话所做的过分热情的解释感到不满。(参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 年〉第 31 页)
6. 刘少奇用语1959年5月在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手册》1959 年，第 21 页。
7. 官方的译文收入《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8页，省略了关键的字眼"但是"。这一词在中文中用在转折的地方，表明下文提到的才是重要的问题或方针，即令在排列上与前面提到的是平等的，但它是被优先考虑的。在这里，"但是"意味着，真正的问题是"右倾保守主义"而不是"去做不可能的事"。
8. 同上。
9. 同上，第 129 页。
10. 根据宪法第4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时'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这是党和非党人士高级首脑参加的全国性论坛，毛利用它来提出讨论重大的新政策。
11. 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他对最高国务会议说明这个纲要时，讲述了讨论的过程(《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6 日)。在 1 月 14 日至 20 日中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可能讨论了这个纲要。(同上，1956 年 1 月 30 日)

根据毛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我对廖的说明补充一些细节。廖没有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依据毛在杭州的讲话作了修改的"11条"是先于"17条"而提出的。假设这"11条"象那"17条"一样也是党的某次正式会议的产物，廖肯定会提到。所以我认为：这"11条"是毛提出来的，是他隐居在他喜欢的杭州时，可能与陈伯达和别的一两个顾问一起商量之后拟订的。(毛关于12年发展纲要的说明，参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第150页，关于毛喜欢杭州见下面第370页的注释27)。

12.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13. 纲要的译文见《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9——126页。
14. 新华社1955年11月28日电。
15. 来源于北京广播电台的多方面消息。
16. 1斤等于半公斤或1.1磅；1亩约1/6英亩。
17. 新华社1956年1月3日电。
18. 见第6条规定（参见《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1页）
19.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97页。
20. 新华社1955年12月8日电。
21. 北京广播电台1955年12月17日电，着重号是后加的。
22. 见第31条规定（见《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5页）。
23. 新华社1956年1月18日电。
24. 1955年的统计是1090万吨。参见陈[illegible]润；《中国经济统计》第359页。
25. 根据1956年12月2日新华社电，估计是20亿斤（100万吨）。
26.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4日。
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是建立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基础上的。在1956年选举出人民代表大会和1954年通过宪法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议会和国家最高代表。非共产党的小的政党在其中占1/3的席位（参见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共历史上的统一战

线》第208—210页)。

28. 周恩来:《政治报告》,载《人民中国》,1956年第4期,附录,第12—13页。

29. 见在党的"八大"上他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日)。

30. 周:《政治报告》,第9页;陈伯达的讲话见《当代背景》377号,第36页,第42页。

31. 周:《政治报告》,第9页。

32. 新华社1956年2月5日电。

33. 《1956年的年度计划必须编好》,《人民日报》社论,1955年10月24日。

34.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197号,第3—4页。

35. 同上,176号,第22页。

36. 同上,196号,第24页。

37. 同上,第23页。

38. 参见:陈迺润和童伦森:《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第160页,注释21。

39. 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参见《当代背景》393号,第4页)。

40. 1958年5月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5页)。李富春坚持他1956年人大会议上的讲话的估计,在讲话中他承认低估了人民群众主动性并因此而制定了低指标,但是他声称,在贯彻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决没有受旧指标的限制。(《当代背景》393号,第4页)

41. 参见各种报道(《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197号,第4—5页,经济附录201号,第12—14页)。

42. 刘少奇在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说:多、快、好、省,或是越多、越快、越好、越省的口号,是毛提出来的。但是,毛在1955年秋,中共六中全会最初正式提出的仅仅是"越多、越快、越好"(《毛

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第19页）。可能"越省"是制定计划人建议加上的。

43. 新华社1956年5月10电。

44. 《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56年2月29日。

4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66号，第8页。

46. 参见陈志让编辑的《毛和中国革命》第60页有关毛这篇讲话产生情况的说明。关于这个讲话的研究参见第5章。

47.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第24页。

48. 同上，第34页。

第三章

开始解冻

33

毛相信，社会主义高潮必然要反映在一个生产的高潮中。后来生产指标的全面提高，使得人们认真制定并于最近公布的五年计划显得有些保守了。但几乎可以肯定，毛泽东是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即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委员会、部和其他经济组织，来领导即将到来的“跃进”的。情况既然这样，中国就需要所有的专业人才和熟练人才，需要所有的受过教育的人才。也需要象富农这种农村活跃分子的力量，虽然这些人以前是受到怀疑的。但随着社会主义胜利在望，这些人可视为正在中立化。这两方面的经济攻势导致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政策，这些措施很可能比斯大林在相似情况下所许可的走得更远。这可能是由于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可以说服全中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来支持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确立的目标。[1]

第一节　关于知识分子

1955年12月，各民主党派举行会议并通过决议。这些决议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高潮已带来新的形势。这种形势要求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2] 1月12日，《人民日报》开始登载一系列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两个主题：首先，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党的许多干部并不打算帮助解决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除了工作而外，不与他们联系，不信任他们，看不起他们。其次，知识分子的许多工作和生活条件需要改进，特别需要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设备。

所有这些问题部分地促成了共产党中央于1956年1月14—20日，召开了一次由1279名党的官员出席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大会。大会的主要讲话是由周恩来总理作的。他强调，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缺乏受过教育的人，并提出了中共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而准备采取的措施。[3] 周声称："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4] 他谈到，需要改正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5] 它们妨碍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使用。周估计，知识分子的总数有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为10万。这个数字包括从理工科到文科各个领域在内的知识分子。[6] 周声称，在知识分子中只有约40%的人是中共的积极支持者；在其余的人中，约有40%的人对中共的工作给予一般的支持，而在政治上不够进步；大约有10%稍多一点的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其余占很少比例的人，按照周的说法是属于反革命分

34

子。[7] 中共应帮助知识分子重新教育自己。但是：

> 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8]

党在动员知识分子时的三项任务是：更好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信任他们，“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并且能够广泛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确保他们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种“适当的待遇”应当包括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较好的服务，较高的薪水，较优越的职务和晋升机会，学位和职称的授予，鼓励发明制度的创立。[9] 简言之，周是在说，在发展经济中党需要知识分子，为了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正确对待他们。他不幻想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百分之百地支持党，但只要他们努力工作，党准备容忍他们这样做。

35

由周恩来讲这些话是合适的。第一，作为政治局五人核心组织的成员之一，他有足够的威望使党的官员们接受新的路线，这些官员们本来是可能怀疑或反对这些路线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没有象周那样高的权威。第二，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在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五个人之中，周比其他人更熟悉非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的主要联络官员，长时间住在国民党的首都重庆，在那里，“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吸引非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支持他的事业。他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同情共产主义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创立，应归功于他的工作。[10] 这样，这项新政策由周来宣布，似乎更能获得知识分子的信任。

此外，毛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讲了话，可能是为了表示他对新政策的批准。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党外的知识分子，为早日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11] 几天以后，毛告诉最高国务会议，在中国，"结束落后状况达到先进科学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是要有足够数量的才能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关于这一点他还说，必须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2]

周恩来讲话以后，接着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工资增加了；政治的、社会的和行政的任务减少了；工作条件改进了。[13] 一些原来没有工作的知识分子被找了出来，并且给他们找到了工作。[14] 知识分子甚至被鼓励申请入党。[15] 和毛关注科学相适应，一个科学发展的规划委员会建立起来，并且在当年晚些时候制定了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规划。[16]

36

第二节　在　农　村

农村中，新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解除对富农的压力，以便在生产运动中调动他们的主动性，使用他们的技术。对富农政策的变化可以通过一些文件的比较来把握。在1955年11月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合作社章程草案中，关于"社员"的第11条第3部分说：

> 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几年之内，不接受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入社。在合作社已经巩固，并且本县和本乡的劳动农民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参加了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已经依照法律改变成份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多年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才可以经过社员大会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

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他们入社[17]（着重号是我加的）

但是，在不到3个月后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即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译者）的第4条中说：

> 对于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要求入社的问题，在1956年内应当开始着手解决。解决的办法是：（1）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做为社员，并且允许他们改变成份，称为农民。（2）表现一般，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做为候补社员，暂不改变成份……[18]

几个月内排斥原地主富农的政策完全改变了。在11月份，甚至表现最好的富农也要过几年后才能入社；到1956年1月，就只有表现最差的富农不能马上入社。虽然这时的新合作社还不能说是已"巩固地建立"了。当正式的合作社章程在1956年6月的全国人大上得以通过时，后者的立场就被认可了。[19]农业部长廖鲁言解释这个变化说，过去的地主富农已经孤立了并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合作化高潮的结果。[20]

甚至农村的反革命分子也从中共中央在合作化高潮胜利后的自信感中得到益处。11月合作社章程没有提及社员身份问题。这些章程只是说不接受"被剥夺选举权"的人[21]。但在《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中有一个类似的条款，把他们与富农一样看待。真正恶劣的、不思悔改的反革命要继续受拘留，而其余的可允许按他们的罪行以不同身份入社——虽然在1955年，进行了这个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运动[22]。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和概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四项成就的讲话中，把打击

37

反革命的胜利作为第一项成就，并且预计在今后两年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反革命[23]。

吸收从前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进入合作社的政策，在农村干部和斗争性更强的农民[24]中并不受欢迎。这些人有如下讲法：

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对过去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的宽大，会让他们太轻易地带着错误被放过去了。

我们打天下，但他们想要坐天下。

我们辛辛苦苦地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即集体农庄），而他们却一步就到了高级社了。

其余的人害怕吸收这些坏分子会带来麻烦[25]。

为了消除这些担心，宣传机关首先强调社会主义"高潮"在政治形势方面带来的根本变化。这个变化破坏了过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的信念。采取宽大政策又进一步瓦解了他们的队伍。但是他们也强调了原地主富农在绝对数字上的经济重要性：他们总数为4000万或稍低于农村人口的10%。[26]很清楚，这个政权决不会让如此众多的、具有潜在力量的这一部分农民继续留在集体制外面。

第三节　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

全国新的宽松气氛的象征，是一场使衣着更漂亮更丰富多彩的运动。2月1日，青年团和妇联召集的一次会议决定，现在衣服流行的样式并不反映在新生活中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丰富多彩和幸福的需要。漂亮的衣服与资产阶级的堕落并非一回事。3月中旬举办了一个时装展览，观众非常踊跃，以至于展览不得不延期到月底才结束。[27]5月，刘少奇对广播电台的官员说："电台的广播应当与人民的思想、生活和需要息息相通。例如最近北京有许多人热衷于各式时装，你们不要对这种情况及其它类似的情况

38

毫无反应……”[28] 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作家参加了一个舞会，舞会上的姑娘们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衣裳，有些甚至穿上了开口一直到膝上一英寸的旗袍。[29] 他从中看到了新路线的结果。

注释：

1. 研究中苏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同阶级的作用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参见许华茨：《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第80—89页。
2.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516号，第15—16页，517号，第14页；518号，第26页。
3. 周讲话的题目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表在1956年7月30日《人民日报》，译文见《当代背景》376号（一些段落引自新华社的官方译文）。《当代背景》中的译文转载在《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8—144页。有几处错误应引起注意：在129页倒数最末一段漏掉了一个句子；第130页倒数第4行不是45%，而是40%；第131页第4段和第6段中应该用“教育”一词而不应是“文化”；第133页第8段中不是4个单位，而应是5个单位。
4.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9页。
5. 同上。
6. 同上，第131页。根据周恩来的意思“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虽然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来自大学生的行列，但周更清楚地说：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包括一切从大学中毕业出来的人。“高级知识分子”大概的含义是大学讲师和讲师以上的人及别的职业中与之有同等学历的人。
7. 同上，第130—131页。
8. 同上，第138页。
9. 同上，第133—135页。

10. 包华德主编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396页。

11. 《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12. 同上，1956年1月26日。（最高国务会议虽然是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之后举行，但它却先公布了。）

13. 参见西奥多上引书第105--107页。

14. 1956年上半年，各省市领导调查了知识分子失业的情况。在1956年9月5日《光明日报》报道中提到：失业或使用不当的知识分子是少数。9月1日上海成立了一个录用失业知识分子办公室，在头12天里，有6800多人前去登记。北京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办公室，到10月4日这个办公室结束工作时，有2，900多名失业知识分子前去登记，并被分配了工作。来自新华社的这后一则报道中，特别提到获得哥伦比亚文学硕士的唐毛玉（音译）已赋闲6年。

15. 这个报道见《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48号，第13页；569号，第10页；561号；第17页。在合作化运动中大量吸收农民入党之后，随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见1956年7月1日中共成立35周年之际公布的关于党员人数的各种统计，同上，575号，第13—14页。文革期间，刘少奇和组织部长安子文因为在吸收知识分子党员时没有彻底调查他们的背景而遭到批判，在那时存在着明显地抵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倾向。安子文声称这种倾向来自于那些无知的党员，这些党员希望别的党员也是无知的。（参见《三反分子刘少奇的罪恶史》（北京：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1967年5月红代会主编的《换新天》，第31页。）

16. 参见林德贝克：《科学的组织和发展》《中国季刊》1961年4—6月，第98—99页。苏联方面审查并撤销这个计划所造成的困难和这些计划本身的命运，参见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6—9页。根据科罗契科的记载，计划中的近600个科技项目里，仅有少数保留下来。

17. 参见1956年4月1日《人民中国》附录第5页。

18. 《政治文件和分析》第121页。

19. 参见第8条(《时代背景》第399期，第2—3页)。

20. 同上，第23页。

21. 参见1956年4月1日《人民中国》附录11 (3)，第5页。

22.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1页。

23. 同上，第128页。早几个月前，毛就提出镇压反革命是中共的主要成绩之一。同上，第18页。

24. 参见杨清：《我们为什么应该吸收以前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加入合作社》，《时事手册》第17期，1956年6月25日。《中国大陆杂志摘要》49号，第31—34页。

25. 同上，第32页。

26. 同上。

27. 参见新华社1956年2月2日电、新华社1956年3月10日电、新华社1956年3月31日电。一位西方记者对这一时期服装的统一非常吃惊，创造了一个新词来形容中国人，参见吉勒恩：《蓝蚁》第104—107页。

28. 《刘少奇在文艺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10日，第4期，(《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32页。)

29. 乐队演奏了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格什温的两首曲子，参见克罗夫特：《红地毯通向中国》第111页。

39

第四章

苏共二十大与中国的反应

1956年1月底，中国国内开展了国内自由化的整风运动（译按：原文如此）。出现解冻的原因，在于领导人确信它的权力已经巩固，还在于领导人对增产运动所提出的要求进行了分析。这种新气候的特别受益者包括商人、知识分子、富农、甚至反革命。不过，在经历了6年斯巴达式的严峻岁月以后，可能全中国的人都欢迎这种新的气氛。[1]但是，国家和谐和怡然自得的一池清水，却被赫鲁晓夫扔进了一块大石头——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多年以后，中国指出："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7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2]

第一节　朱德在苏联

在1956年1月27—28日（估计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苏共把苏联领导人最近作出的直接批判斯大林的决定告诉了所有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3] 这些代表当中，可能不包括中国方面派出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主要代表、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和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他们当时尚未到达莫斯科。不过，即使中国领导人当时在场，他们也不会知道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方面究竟要走多远。因为作"秘密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以后，并且可能是在2月25日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前不超过24小时内作出的。[4]

当2月15日朱德元帅向苏共二十大致贺词的时候，他已经听到了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作的、对斯大林委婉批判的政治报告。但是，他还没有听到米高扬将要在2月16日的会议上对个人迷信所作的更猛烈的批评，[5]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是10天以后的事。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1922年12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1923年1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的附录。[6] 如果这个文件在朱德讲话以前就已经散发，而他又看到这个文件的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大会的发言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然而，于2月9日由毛签署发出的中共中央向大会的祝词却提到了斯大林。[7] 这份祝词可能是根据苏共中央1月27—28日的会议所透露的情况写的。大概是为了防止对已故独裁者的批判，祝词强调了苏联现领导人是参予了斯大林的行动的："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和苏联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表明，由列宁缔造、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的和不可战胜的。"[8] 在政治上更

40

主义的理论。当时中国关注的是对斯大林的谴责。就毛个人来说，他似乎完全被这个问题所吸引，而把其它问题搁在一边。[16]没有材料表明中国在1956年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感到担忧，虽然在1960年他们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的理论和政策时，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17]

2月1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把赫鲁晓夫的报告称为历史性的文件。社论说："'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坚定的信念，将会鼓舞千千万万的和平保卫者为争取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而进行坚持不渝的斗争。"[18]当苏共二十大闭幕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对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改，调子就低得多了，但还是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

> 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爆发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就保持着"，但是决议同时指出："战争的注定的不可避免性是没有的"。因为"现在有着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拥有重要的手段来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而如果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战争，这种力量就会给侵略者以歼灭性的反击，粉碎他们的冒险计划"，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局势这种深刻的分析，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巨大的鼓舞。[19]

42 1956年，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问题上，中国并未向赫鲁晓夫提出挑战。(甚至以后也未提出当时曾提出异议)，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局对二十大关于核时代和平共处的理论问题，是一致持支持态度的。[20]这种作法与当时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相吻合。中国强调了缓和紧张状态是国际形势的关键。[21]中国后来追述说，中国曾在"内部讨论"中对"和平过渡"这一概念有过争论。在赫鲁晓

夫看来，这种争执是他提出的"和平过渡"新概念的必然结果。[22] 然而，中国人在1957年11月前，并未向俄国人正式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上的提纲》。[23]

中共没有公开辩论"和平过渡"问题，甚至没有象在斯大林问题上那样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可以理解的。自1954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密切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新德里和仰光。同年稍后一些时间，吴努和尼赫鲁总理回访了中国。3个国家彼此间正式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象一颗明星出现在这次会议上，使得会议的发起人尼赫鲁相形见绌[24]。周恩来和解的姿态，娴熟的外交技巧和个人的魅力，给原先有敌意的亚洲许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 中国与尼泊尔（1955年）、锡兰（1957年）、柬埔寨（1958年）和与中东的叙利亚、也门、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在同这些国家建交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6]

中国对亚洲中立的或不中立的国家厉行友好政策，改变了以前曾一度指责尼赫鲁、吴努和苏加诺等人为帝国主义走狗帮凶的敌视政策。[27] 如果北京发表声明，希望在新德里、仰光、雅加达的友好政府最终将被暴力推翻的话，那么，这将会严重毁坏中国新姿态的信誉。[28] 那时，中国唯一所能做的，只是反复申言自己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武装斗争的不可避免性。[29] 言外之意是中国经历的事情会在世界各地重现。后来他们说，刘少奇在1956年9月八大报告中正是这样做的。[30]

43

第三节　中国对斯大林的评价

苏共二十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人也许沉缅于斯大林问题中，以致未能关注似乎更带学术性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观

点。这是不奇怪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使中国面临着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作用加以区别的特殊问题。

自3月3日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后，中共领导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作出了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写的。[31] 刘少奇夫人曾透露，她的丈夫参与了该文章的起草，[32] 半官方中共党史的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是主要起草人。[33] 后来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34] 当然，这篇文章的理论和强调用矛盾论的方法解释斯大林错误的根源，都带有毛泽东本人的印记。在同一年里，毛泽东亲自作了一次关于矛盾问题的演讲。[35] 除了以上这些而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人因写这篇文章或反对这篇文章而受到攻击表明，中国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

用西方评论家的话说《人民日报》文章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共产主义婴儿，使之不致于和斯大林主义的洗澡水一起被泼掉"。[36] 这篇文章力图恢复斯大林的形象，指出了斯大林的功绩，认为他仍有资格被称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但文章也承认斯大林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这包括镇反扩大化、对德国进攻苏联丧失警惕、不重视农业、忽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指导，尤其是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决定。[37] 无疑中国希望他们这种平稳公正的方式，能使非斯大林化不致成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攻击的根据。后来证明这是徒劳的。该文在理论上对斯大林错误根源的分析也同样是为了提出一种思想观点，以帮助各国共产党能全面地看待斯大林问题，而这一点则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缺乏的。中国必须再次告诉他们，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存有不足之处，但"它远比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优越

得多"。[38] 对于共产党来说，包括苏联在内，不管他们是否接受中共这些分析，但文章的本身似乎是北京企图将自己作为理论指导的泉源的首次尝试，至少要与莫斯科平坐平起。[39]

不论中国领导人怎样担心这种冲击波会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对他们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提出的严重的直接问题，是毛泽东的地位和他们能从斯大林错误中所吸取的教训。为了捍卫毛泽东，这篇文章指出：早在 1943 年 6 月，中共中央就已经作出了有关领导问题的决定，这决定完全反对任何"拔高个人、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倾向。[40] 文章暗示毛泽东（文章故意不在任何段落里提毛泽东）曾领导中国共产党抵制了斯大林现在被控所犯的过失、罪行。对中共全体成员来说，这种暗示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里看到，中共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41] 4 月 5 日文章同时肯定了斯大林打击和孤立中间路线势力的错误是由其他人执行的，而且完全是在毛成为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前时期犯的。[42] 中共领导人所犯的其他严重错误。也是在毛泽东时期以前犯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王明犯的，而且据说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纠正了。[43]

这篇文章不仅认为毛泽东没有犯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还讲述了领袖的积极作用。文章说：

>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44]

在讨论吸取从苏共反"个人崇拜"中教训时，中共既得出基本

结论，又得出了具体结论。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崇拜之间的矛盾——任何与此相反的思想都是很天真幼稚的。[45] 对毛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可能存在的理论不是个新理论。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已提出过了，1952年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46] 但这些理论观点是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的理论相反的。[47] 因此，苏联在转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这些理论观点被删掉了。[48] 这些理论分歧以后一直存在着。（见第176、316页）

中国人从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得出了有关领导方法的实际教训。他们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避免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些方法曾导致斯大林脱离人民。"群众路线"的含义是：

>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49]
>
> 这意味着要一再反复这一过程。在共产党掌权以后特别需要实行群众路线，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袭击，就面临着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50]

当然，这就是斯大林所做的事，并以其无数同胞生命为代价的。对中国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采取什么实际措施，保证其党员忠实贯彻群众路线，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这篇文章说"建立一定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51] 在这以后的12个月中建立这些"制度"就成了毛泽东主要关心的事。文章接着警告在应用马列主

义时不要搞教条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命令，旨在防止只讲斗争，不讲与中间派团结的左倾错误的出现。[52]

4 月 5 日文章关于重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错误危险的警告，对于大多数老党员来说并不新鲜，他们铭记 1942——1944 年和 1950 年的整风运动经验。这些运动就是要整顿他们的工作作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官僚主义（党八股），[53] 是毛泽东在 1942——1944 年的整风运动中所作的几次演讲中所说的三个坏作风中的两个。所以，中共党员们读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很可能猜测，它是否预示着一场新的整风运动的到来。

46

第四节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的地位

要打消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的怀疑是不难理解的，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认为，斯大林最大的罪恶是以他个人独裁取代党的领导，在这一过程中，他处决或监禁千万名党的忠诚干部。[54] 但不能指责毛泽东负有这些责任。毛泽东表现出他能够团结以前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的姿态。多年后，外交部长陈毅[55] 曾赞扬毛泽东最优秀的品质是他的宽容。陈说：

> 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他（毛泽东）成了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领袖？其根本原因是他从不积怨记仇，从不算老帐。[56] 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意义，可以用以下事例来说明：当别人反对他，他被搞错了时，他决不复仇并不急于澄清情况[57] 许多人曾攻击毛泽东，他遭受过侮辱、虐待和诬陷……，他曾被诬告为机会主义者，被撤职，留党察看，被送到后方休养。没人敢与他接近。但他掌权后，同志们都消除了与他的分歧，而他却不要求别人向他道歉。[58]

这些话是陈毅在1966年8月和9月，即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说的。他可能是想制止，至少减少当时已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的清洗。即令这是他说这话的动机，但毫无疑问，他对毛泽东宽容态度的描写的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56年，中国高层领导中有周恩来、张闻天，他们在30年代曾激烈反对过毛泽东。曾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李立三、王明仍是中央委员。

47 在处理同事和反对者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坚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而可以团结的人，这使得中共的领导持续稳定了20年。建立政权后，政治局委员中唯一被清除的是高岗。他是他自己的野心的牺牲品。他企图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副手。[59] 恰恰就是由于长期以来毛泽东一直专心致力于维护中国领导人的团结，才需要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摧毁这种团结。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及其他领导人的主要"罪名"之一，是他们力图（在苏共二十大后）贬低毛泽东的地位。[60] 毛分子特别注意这一问题，说明这确是毛泽东本人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导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清除了他许多同事的因素之一。1956年，毛泽东关于音乐的讲话，对奴隶式地借鉴外国经验进行了谴责。毛泽东不用文化领域的例子，而用政治领域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坏影响。他提醒人们，当中共盲目追随外国（指俄国）时，中国革命就遭殃。这是对他的同事的一个强烈的暗示：不要模仿苏联最近的政治措施（非斯大林化）。[61]

在外表上，1956年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感到在毛的个人崇拜问题上需要做什么事，他们认为只要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辩解就行了。几个星期后在庆祝"五一"节时，毛泽东的肖像又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了。人群仍然高举红旗，呼喊着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62] 第二年，外国来访者有许多报道表明了人们对毛的崇拜并未减弱。[63] 在苏联，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摧毁并没有在中国发生明显的影响，这使得一位商业界人士评论说："个人崇拜曾使斯大林形象令人厌恶，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还要搞个人崇拜"[64] 这个评论说明，中国的知名人士并没有感到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是否要与苏联一致行动有过争论。

48　更有甚者，《人民日报》文章发表一天后，即4月6日，米高扬到达北京。毛泽东在与他会谈中，感到自己地位很稳。他批评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该文的观点，即斯大林功大于过，并坚持"对斯大林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和全面的评价。[65] 可见，米高扬到北京签订对中国新的经济援助协定，似乎未能阻止毛泽东对苏联进行批评。

第五节　"十大关系"

在中国的解冻首先是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大规模生产运动的结果。但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不得不把党群关系作为问题作更多地研究。1956 年秋匈牙利事件后，这个问题才成为毛泽东的头等大事，而将其余问题暂且搁在一边。然而，早在 4 月底 5 月初，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最初的政策。其目的是防止斯大林统治下苏联滥用权力（如秘密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的情况在中国重演。这体现在两次重要讲话中：4 月 25 日的《论十大关系》和 5 月 2 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66] 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67] 表明了他对国内团结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关心。"十大关系"中的前五个关系论述了加速工业建设问题。这表明经济发展仍是他主要兴趣所在。（本书后面将论述到这问题〈第 57 页〉）。后五个关系，如刘少奇后来所说，[68] 表明了毛泽东开始抓住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后一年半内，这个问题成

为他关注的基本点。

在政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与非党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69] 特别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70] 民主党派系指8个非共产党政党。它们的成员全部来自资产阶级，但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它们反对蒋介石的统治，并与共产党合作，于1949年组成"统一战线"。[71] 中央人民政府的6个副主席中有3个非共产党人，4个政务院副总理有两个非共产党人，虽然它们也很少有实权。[72]1954年，在通过宪法以后，改组政府时，非党人士的空头衔也取消了。国家副主席只有一名，即共产党员朱德。而副总理中没有一个是非共产党人。

展开一场关于民主党派作用问题的讨论是适时的。因为，从理论上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即将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应该即将消灭。[73] 如果资产阶级即将消灭，那么作为这一阶级的代表——民主党派也应随之消亡。然而，毛泽东却另有一种想法：

>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4]

在8月召开的"八大"上，刘少奇作了报告，从理论上阐明毛泽东多党制的论断。刘说：

>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

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75]

然而毛泽东注重实施政策甚于理论的阐明。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的成员有时也反对中共的政策，但后来出自爱国心而支持这些政策。很清楚，毛泽东很重视让这些"反对"意见继续发表出来。直到邓小平在9月的"八大"讲话中才阐述这样做的各方面理由。当时毛泽东只是说：必须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我们必须允许民主党派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它有道理，我们就要接受而不管是谁提的。这才是我们党、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对待不同意见的正确态度。[76]

50

他在结束这问题的讨论时，劝告一般同志（特别是省委书记）要抓紧、检查、改进和促进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这一段的讲话中开始实行了一项重大的新政策——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上面加着重点的引文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民主党派可以把一切批评都倾倒在共产党员头上。在这次讲话的其他有关段落中，他也作了这样的保留。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关系（第八个关系）时，他反对那些责备过去（如果必要在今后还要）处决反革命的观点。然而，他还主张一般应进行对反革命分子的劳动改造。论述是与非关系（第九个关系）时，毛泽东强调给人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的重要性，并应帮助他们纠正自己的错误。[77]

在分析到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第六个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汉族应肃清沙文主义，同时指出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但这不是主要的。毛泽东透露在近二三年在这方面曾做过检查，并提出应该再次检查。[78]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领导干部应该有所克制。这种温和的态度是新的政治气候的特征。

最后，论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第十个关系），毛泽东倡

导更多地向外国学习，学习更多的外国语。由于中国一直在大量吸取苏联东欧国家的知识，所以，毛这一倡导实际上是提倡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成果和学习西方语言。中国"一穷"（工农业不发达）"二白"（现代科学文化程度低）。但白纸没有负担，好画好写。换句话说，中国能够利用世界提供的最好的经验教训和技术成果。[79]在提出这一观点时，毛泽东表现出了中国领导人由于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具有的自信心。现在，他们不那么顾虑学习西方将会腐蚀人心，因而实行学习西方政策，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然而，毛的这一倡导，也许反映了毛泽东对苏联的信心有所减弱，这是由苏联领导人处理斯大林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不当和秘密报告所透露的情况造成的。

51

第六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星期后，毛泽东遵循"十大关系"中后五个关系的基本精神拟定了一个纲领性方案，鼓励知识分子自由发表意见。这就是他于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讲话。毛的讲话发表前，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贯彻由周恩来于1月份起草的、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待作家的新方针。中共实行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新路线政策，也许是对苏联文艺政策的新潮流的一种反应。这一印象来自在全国作家协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许多讲话，包括中共宣传部负责文化的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闭幕词。[80]会议闭幕前，刘少奇给周扬及其他同事一个关于发展文艺创作的指示。[81]刘少奇强调中国作家必须有知识有经验。刘少奇似乎对这一要求作出了比较宽容的解释，要他们到工厂农村，去获得生活的"实际"经验……时间可以或长或短。若作家、艺术家受不了那种艰苦，他们可以坐汽车去，吃睡在车里。[82]刘少奇再次肯定，中共有权在

政治领域里干预文化。同时他规定：今后的政治性批评必须有正式文件说明党组织的批评意见。党员个人的批评意见，不管他职务多高，中共文艺界党组织和作家都可以抵制。很清楚，这指示给那些大胆的作家以较大的自由余地。但刘少奇对作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所抱的幻想并不比周恩来大。周恩来两个月前就说过："现在工人、农民甚至资本家对社会主义都显示出如此巨大的热情，而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却正落在他们的后面……。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83] 更重要的是，在给作家以更多自由的幌子下，刘少奇可能打算在毛泽东干预个别文化问题时，给象周扬这样的人以更多的自信心。早些年毛就曾做过那样的事。[84]

3 月 8 日，即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现代戏剧节开始后不久，[85] 刘少奇对文化部党组就戏剧问题作了指示。他同意在百花齐放原则下给戏剧和电影的演出以较大的自由，并号召发扬中国绘画的传统：

> 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世界各国的电影都要搞进来，包括美国的。一种是进步的，一种是无害的。无害的，能帮助了解情况的，也可以进口。美国搞铁幕，但我们不搞……人们喜爱中国绘画，但一些中国画家还没有妥善安排……我们的政策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艺术已经很古老就不要它。文化的改造需要持久全面的努力，不可能一天之内建成罗马。"百花齐放"，允许共存……[86]

3 月 14 日周扬在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指示，认为需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化和苏联文化，[87] 也赞扬了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想要百花齐放，首先应当保存和光大民族遗

产”。[88]

3月初，在政治局有时间完成它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价以前，刘少奇和周扬使用“百花”这样的词眼，表明中国领导人正打算在文化领域实行自由化。在这点上，目的可能只限于恢复旧政策，因为刘少奇用了这样的术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毛泽东在1950年初规定的戏剧政策通常提“百花齐放、除旧布新”。[89]到5月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将口号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更加关心的是制订在知识界的自由化政策。这是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有关的。按周扬的说法，5月份口号的变动是根据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制定的。[90]5月13日，刘少奇在北京大学向历史系学生描述口号的演变时说了这些话：

> 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91]它作为口号是首先由陈伯达提出的。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92]

毛自己说“百家”思想是他提出来的，刘的表述表明他想贬低它的作用。[93]

据刘看来，“百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以防限于一家独鸣。”[94]确实，当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研究院的作家专家公开宣布新政策时，反对教条主义（武断主义）是一个主要的议题。由于毛泽东早时的讲话没有发表——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发表，陆定一的这种阐明，（只称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他们现在有较大自由的唯一指针。[95]陆定一的讲话也许还是很好地表达了毛的观点，虽然文化大革命时的说法与此相反。

53

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因此，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至于艺术特征问题，典型创造问题等，应该由文艺工作者自由讨论，可以容许各种不同的见解，并在自由讨论中逐渐达到一致。[100]

55

至于敏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陆定一则不那么明确。他只是警告党员不要垄断这些领域，并指出中央不会出版官方的党史。这个观点的宣布有助于纠正对现代史研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

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

> 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101]

可以肯定，这是对二十大的一个直接反应，因为甚至在开幕会上，就对斯大林主义的编史工作进行了攻击。[102]

最后，陆论及批评和学习问题。他反对过分的批评及软弱的批评。他将毛泽东的三篇与1942到1944年整风有关的重要讲话[103]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为典范。在学习方面，显然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这里陆建议阅读毛的上述三个讲话以及1945年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文件能使人们区分教条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陆指出教条主义曾给中国党造成很大的危害。

56

> 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几乎断送了我国的革命，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这个痛苦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住。[104]

从这一段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如何把自己的经验与赫鲁晓夫的指责联系起来。当中国党的领导人是一批受莫斯科训练的人，或者说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行事，并对象毛这样的反对者采取斯大林的方法的人时，中国党几乎被断送了。

中国领导人还记得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对他们的革命造成多大的危害。他们也一定认识到这种教条主义对于管理共产党国家也会有同样的危害。当30年代后期毛泽东取得党的领导权时，他就开展一个整风运动来消除斯大林主义。现在由于赫鲁晓夫的揭露——尽管他可能对这种揭露的方式感到很大遗憾——毛一定已开始考虑在管理中国时怎样能最好地清除斯大林主义。

陆定一讲话给人的印象最深的，除了它的一般温和理智的语

调外，就是反复提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这也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特征。但这篇文章中只提到整风中三大敌人的两个——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在陆定一的讲话里，除了重新攻击教条主义外，第三个敌人——宗派主义也受到谴责。

第二个月，一个中央通知指示：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员、高中级党校中的党员和高等院校毕业班学生必须学习陆定一推荐的5个文献——毛的3个整风讲话、党的历史决议和4月5日对斯大林的评价。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和国家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以保证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和建设改造。[105] 这样，到1956年中，毛泽东已制定出两项与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问题有关的重要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已开始一个学习整风文献的过程，毛泽东可能想将这些文献作为以后开展一个新整风运动的基础。

注释

1. 有关中国1956年春季的情况，参见伯特伦：《重返中国》。30年代伯特伦曾是驻中国的记者，他与毛的会晤已载入《毛选》。
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9页。这两句引语摘自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3. 伦纳德：《斯大林以后的克里姆林宫》第122页。
4.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中记载，这个决议是在会议开始后通过的；参见1970年12月14日《泰晤士报》的摘要。西方分析家对讲话最后性质的认识，参见拉什：《赫鲁晓夫的崛起》第57—58页，60页；康库斯特：《苏联的权力和政治》第277—283页；伦纳德上引书第184—187页。中国人说他们1956年批评俄国人时，事先没有与兄弟党商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

5. 米高扬的讲话的重要意义，见拉什上引书第50—55页，60—61，65—70页；康库斯特上引书第281页；哈德逊《中国和共产主义的"解冻"》；参见麦克法夸尔的《百花齐放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第298—29页，爱德华·克兰克肖在评论《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时指出：前苏联领导人没有提到米高扬的重要调解；相反赫鲁晓夫把自己描绘成鼓动苏共政治局接受他提议的秘密报告的角色。参见1970年12月14日《泰晤士报》的摘要。

6. 康库斯特上引书第282页。这份遗嘱国外知道了几十年，但在国内斯大林始终不将它公诸于众。参见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第271——272、288页、296页、302页；另参见卡尔：《苏俄史》，第4卷：《空缺时期，1923——1924年》，第258—263页、360页361页。

7. 两篇文章的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31号，第33—37页。

8. 同上，第36页。

9. 朱是2月4日抵达，邓是2月11日抵达。

10. 参见西克关于一张红卫兵墙报的报道。该墙报报道了登在1967年4月16日《读卖新闻》上关于周恩来1967年4月6日的讲话要点。但在文革有一段关于证明朱德是同意赫鲁晓夫的引文，暗示他所持的批评态度不是针对斯大林，而是赫鲁晓夫的。朱德称赫鲁晓夫是如此"过硬"，他要批判某些人的错误，即令是他已经死了。(参见《打倒朱德》，载《东方红》1967年2月7日，并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2号第23页)。朱德元帅这些议论没有日期，可能是中苏论战开始后的60年代。

11. 《打倒朱德》，载《东方红》1967年2月11日。

12. 邓抵达北京是3月3日；朱到达第比利斯是3月7日。

13. 《人民日报》1956年3月10日。

14. 乔治亚事件的概要，参见《基辛档案》，第10卷（1955——1956年），第14817页。

15. 虽然中苏双方的消息都提到离开第比利斯去参观鲁斯塔维的冶金工

厂，只有新华社说是"斯大林"冶金工厂。但是《人民日报》3月10日和13日刊登的新华社报道中没有提到参观哥里，塔斯社或莫斯科广播电台也没有提及这次参观。

16. 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例举了1956年时，毛数次告诉俄国人，他不同意二十大的结论，但在每次谈话中，他具体谈到的只是关于对斯大林的攻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

17. 1960年中国人攻击的要点见于《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该文转载在赫德逊、罗文哈尔、麦克法夸尔合著的：《中苏论战》第82—112页。哈尔彭所强调的主要是二十大以后人们对斯大林问题真挚的关切

1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37号，第27页。

19. 同上，1239号，第30页。

20. 在我所看到的文革资料中，都找不到中国领导层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21. 见哈尔彭的原稿。

22. 赫鲁晓夫报告的有关部分包括在赫德逊、罗文哈尔、麦克法夸尔合著的上引书，第42—46页。

2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5页。

24. 邀请中国是尼赫鲁的主张，参见卡欣：《亚非会议：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第2页。

25. 同上，第14—15页，第31页，第37—38页。

26. 见哈尔彭原稿第4章。

27. 参见卡欣上引书第7页。哈尔彭（原稿第4章）把中国放弃对第三世界各独立国家所持的强硬态度看成是于1951年中期开始的，它的外交政策全面转变的一部分。哈罗德·欣顿在《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一书中说中国对其亚洲邻国采取新路线是从1952年开始的。

28. 1957年11月10日中国的机密文件《关于和平过渡的提纲》中说，"然而，我们不要因为有了这个愿望（即和平过渡）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资产阶级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法则。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应放松进行革命的准备。他们必须随时准备击退反革命的进攻，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重要转折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资产阶级是肯定会这样做的），那么就要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05—106；着重号是我加的）。

而后，这个文件又强调指出："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一个国家存在这种现实可能性（即和平过渡）。（同上，第10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9. 虽然北京方面关于和平过渡的观点起草于1957年11月，但直到1963年9月才发表。（同上，第55页）。

30. 同上，第66页。刘报告的有关内容在第一编里，（参见《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66—167页）。

31. 同上，第144—151页，官方的英译本。

32. 红卫兵对她的一次讯问（参见《当代背景》848号，第16页、22页）。

33. 《跳梁小丑的黑话》、《新闻战线》1967年5月4日，第4期，第4页第1栏。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在文革期间他本人和这本书都受到指摘。

34. 埃德加·斯诺证实毛同意这篇文章和1956年12月发表的续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诺说：我能肯定，毛曾被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本人从赫鲁晓夫指摘斯大林主义的个人崇拜中吸取什么教训。毛回答说《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确切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是在1956年4月和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基础上撰写的。（斯诺《今日红色中国》第33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35.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见下面第三编。

36. 杜戈里亚：《中苏论战1956——1961》第44页。

37.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7页。

38. 同上，第146页。

39. 这一段分析主要依据扎戈里亚上引书第45—49页。

40.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8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904页，(北京官方的译文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7—122页。) 根据1960年底的版本提供的情况，这一卷于1953年第一次出版。喜欢研究毛的外国共产党人很容易确认1943年的决断是毛作出的，因为这一卷的英译本1956年由劳伦斯和威沙特在伦敦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为书名出版。(中文版第2卷，在译成英文时，由于太长被分成两卷(2、3两卷)，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12页。)

42. 毛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成为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原文如此，有误)同时，总书记由张闻天担任。虽然毛尚不是无可争议的党的最高领导，但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确定从这时起毛占据了领导地位而没有明确说他担任什么职务。(参见胡乔木上引书第39页)。《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打击中间势力的公式的影响发生在中国1927年至1936年之间(《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9—150页)。

43. 同上，第150页。

44. 同上，第147页。

45. 同上，第147—148页。

46.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重印版第84—89页。(以下该本书的引文都引自重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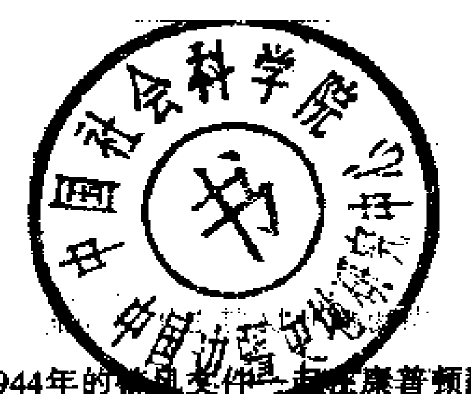
47. 同上，第389页。

48. 扎戈里亚上引书同第45页。

49.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8页。这段引文来自毛1943年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文件。

50. 同上，第149页。

51. 同上。



52. 同上，第149—50页。

53. 这两次讲话和别的大多数1942—1944年的整风文件，由康普顿翻译出版。

54. 参见伦纳德上引书第168—169页。

55. 1958年2月陈毅担任外交部长，在1958年免去上海市市长一职。（参见香港：联合研究院编《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第107页）。

56. 引自《打倒陈毅，解放外交系统》，载造反小册子《文革风云》（北京：红旗革命造反团，北京外语学院，首都红代会，1967年第4期），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35号第12页）。

57. 同上，第14页。

58. 同上，第12页。

59. 毛1959年2月对各省党的负责人的讲话中是这样暗示的。参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第276页。毛在这里提到某人和"周"，特别提到某人是最高攻击的重要目标。某人只可能是刘（少奇），他是毛唯一能排列在周恩来前面的人，周一定是正在被谈论的周恩来。（在这一卷中，通常只提到文革中的幸免者，如周、林彪和康生的名字；牺牲者都用某、某某、某某某，大概因为编辑者不愿意公开毛在任何时候说这些人好话这一事实。）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事件的决议，有如下的段落："他甚至企图煽动在军队中工作的党员支持他反对党中央的阴谋，并为此而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自认为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并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因此党中央和政府都应当按照他的计划改组，他自己在现时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刘周二人都是来自白区的人；刘负责过国统区和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周曾在国民党战时司令部当过首席联络官员。

60. 例如：周扬被攻击就是因为他要剧作家节制他们对毛的颂扬。参见

《周扬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罪行》，载1967年5月6日《进军报》[illegible]

61. 毛对音乐工作者的讲话转载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北京：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联络部1967年7月）第6—9页。

62. 参见1956年6月2日有关庆祝活动的报告和图片。

63. 参见埃斯克兰德上引书第29页，记载他在一位老人的家里，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肖像下喝酒。也可参见卡梅伦：《中国在微笑》，第50—51页，他记叙了1957年5月1日对毛的"谄媚"；在第219页记载了他碰到一位傣族人的情形。当新建的发电厂送来电时，这位傣族人说："光明来自毛主席"。这种比喻并不是仅仅出现在中国的傣族人中，在苏联诺贝尔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早在20年代沙皇把电输送到一个村子时，报纸用"伊里奇的小马灯"来加以描绘，但是农民睁大眼睛谈论"沙皇的火"（参见H·T·威利茨翻译的《遭遇》，1963年5月版，第30页）。

64. 引自《刘少奇在人民商场对资改造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罪行》，《中国大陆杂志选》617号第61页）。这一评论没有注明日期，但听起来象是在"二十大"以后得出的；此外，这一评论是同刘少奇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对"二十大"所作的评论一并引用的。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引了另一个资本家的话："新华书店的广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这是个人崇拜。"（同上）

6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

66. 官方没有出版毛的讲话。官方第一次提到它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中，刘少奇陈述了什么是十大关系，并概述了其重要性（参见《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6页）。依据毛发表讲话时所做记录写成的文本，在文革期间可在西方国家得到。这篇文章收入一本没有书名的毛的讲话集（没有出版者，没有日期，但似乎是真实的。此后成了毛的无题选集）。

这篇文章第一个译文见陈译毛选，第65—85页，该文选的集子中

的其他文章一并译出登在《当代背景》892号第21页至34页中。据说这个重要讲话于1966年12月由北京经济学院一再翻印；显然，其来源是中共1965年12月发给地方党委的文件。

在这个集子里把讲话日期仅注明为1956年8月。在1967年5月30日《文艺红旗》第5期中登载的《毛主席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提到确切日期是8月25日。(《中国大陆杂志选》4000号，第16页)

67.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6页)。不清楚这次会议与4月25日至28日邓小平在八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的省市党委书记是什么关系。如果同一个会议叫两个不同的名称，那是很不寻常的。但是，由于毛作了这次讲话的会议被说成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可能有些省委书记参加，特别考虑到会上要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系中的第五个)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两个会议都在4月25日举行这一事实也不会使这一假设无效：毛可能上午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而书记会在下午开幕。

68. 刘对八大二次会议说：剩下来的议题(第6—10个关系)主要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点后来作了详尽阐述。(《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6页)。1957年4月，陶铸告诉广东干部：毛第一次提出内部矛盾问题是在1956年4月。(参见1957年5月4日《南方日报》)。

69. 这五个关系是：(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陈译毛选第66—67页)。

70. 同上第77页。

71. 参见范·斯莱克上引书第190—210页。

72. 同上，第210页。

73. 当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时，他说：这意

味着一切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参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64—565页）。

74. 陈译毛选第77页，毛用了"所有的"一词，就暗示他期望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能长期共存。

75.《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88页。

76. 陈译毛选第28页。

77. 同上第78—82页。

78. 同上第76—77页。陈用了"Pan—Hanism"一词，翻译为大汉族主义。一般译作"大汉族沙文主义"（"Greathan Chauvinism"）。

79. 同上，第82—85页。

80. 关于作协会议的详述和苏联文学发展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参见福克玛《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的影响（1956—1960）》第59—67页、70—81页。

81. 1967年5月10日《红色宣传兵》刊出的《刘少奇文艺方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论调》一文中摘录了大段刘的指示。（《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27—28页）

82. 同上，第27页。

83. 同上，第28页。

84.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研究和1955年揭发胡风等文艺斗争中，毛显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见1967年5月24日新华社电；另见戚本禹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的讲话。关于这一斗争的详述，参见西奥多·陈上引书第38—42页、81—83页、85—90页；梅乐·戈德曼著《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91—93页、115—119页、129—157页。

85. 戏剧节从3月1日持续到4月5日（参见福克玛上引书，第67—70页）。

86. 1967年5月10日《红色宣传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28—30页）。刘少奇的指示可能在全国戏曲调演会上引起反响（参见

福克玛上引书第70页)。关于刘少奇3月5日和8日指示的部分中文本，参见《刘少奇文艺黑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一百例》，1967年5月上旬《毛泽东主义战报》第3—6页。33—35条、38条、40—41条、45条、54条、61—62条、69—71条73—74条、76—77条。33条、35条、41条是3月5日的指示，其余是3月8日的指示。3月8日指示的大段摘要见《彻底清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根子刘少奇》一文中，1967年4月5日《文艺风雷》第3—4页。

87.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根除八一厂的文艺黑线》，见1967年5月10日《电影革命》第4页。这一资料标明这一评论是3月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没有写明日期。该座谈会的精确日期见下一个脚注引用的资料，我认为，在1956年3月只召开过一次这样的座谈会。

88. 在这里周扬是要指的戏剧问题。参见《看刘少奇、彭真、周扬如何反对京剧改革》，1967年5月24日《红色批判者》第4页，第4栏。

89. 关于这一口号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参见李芝(音)《比喻在共产党中国的运用》1958年12月5日第5期第32—37页。李小姐说毛提出这一口号是在1951年，但没有指出日期。文革中由上海戏剧学院"革命灯塔"编辑的《毛主席论文艺》第94页，提出这一口号出自1952年9月26日《天津日报》。

90. 周扬说这是1956年8月1日在作协文学研究室的谈话。参见《周扬疯狂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证据》，1967年5月6日《进军报》第3页，第1栏。

91. 春秋时期习惯上是指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战国是指公元前403年至前221年，参见赖肖尔和费尔班克：《东亚：伟大的传统》第54页。在孔子学说成为官方教条之前，出现了哲学的繁荣(同上，第69—84页)。

92. 1967年5月10日《红色宣传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

31页）。刘和其他官员被指派向经过挑选的少数人说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

93. 刘的这个言论集的编辑说，刘发表这个讲话时有不正当的动机。另一个毛主义者的编辑显然摘录了同样的段落，其目的是使对刘的控告罪加一等。

在196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的《彻底清除文艺黑线的后台老板》一文中，这一段话仅仅是说："允许百家争鸣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毛主席是在这个基础上总结提高的"。关于刘"诋毁"毛的可能动机将在第二编进行研究。关于毛对百家争鸣起源的论述，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8页。

94. 1967年5月10日《红卫宣传兵》。刘侧重于这一方针的百家争鸣，大概这与对历史的研究有更多的关系。同年晚些时候周扬在《文学》杂志编辑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的就是想冲破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管理方法。1967年5月6日《进军报》第3页，第1版。

95. 陆定一的讲话经过修改发表在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官方的译文转载在《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1—163页。

96. 他说的科学家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家。

97.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3—154页。

98. 关于文革中攻击这四个因素，参见附录1。

99.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6页。毛讲话的题目是《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更关注党内的宗派主义。（参见康普顿上引书，第22—28页）。

100.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和分析》第157页。在5月14日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大致勾划了他打算在当日晚些时候公开讲话的要点。他说：关于主题方面的限制必须取消。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主题都是可以的。在文艺界…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原则"为工农兵服务"其他如描写"工农兵"原则必

须破除。《彻底粉碎反革命文艺黑线》，1967年4月《漫山红遍》第1期，(《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33号，第5页)。除了用了"破除"这一强硬措词外，关于主题问题的这种提法与陆定一公开讲的没有什么不同。

101.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8页。

102. 参见伦纳德上引书，第127—130页。

103. 这三篇讲话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

104.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60页。

105. 参见195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强晓初的文章，《发扬党的整风学习的经验》。

57

第五章

毛泽东同计划制定者的对立

1956 年 4 月下旬起，经济一直是毛泽东主要关心的问题。十大关系的前五个关系涉及经济问题不是偶然的。而且，讲话前讨论的情况表明毛曾打算只涉及经济。据毛说，中央政治局用了两个月时间听取了 4 个中央部门关于经济、金融问题的工作汇报。在政治局几次讨论之后，这些汇报被总结为十大关系。[1] 但除总的思想外，很难相信关于财经的汇报能够产生十大关系讲话的后半部分。很大的可能是，后五个关系是毛泽东根据苏共二十大考虑应采取何种步骤，并与他的同事讨论后形成的，它是加在讲话中的，在工业方面相当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讲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论十大关系》读来不象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那样连贯。后者也涉及全国事务，但它是另外 10 个月思考的产物。

毛的十大关系讲话中有关经济的章节表明，

他，还可能有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满意经济计划者所推行的一些重要政策，这些不满后面隐藏着对工业发展速度的不耐烦。计划者没有因工农业在社会主义化方面取得胜利而提高五年计划指标，这使毛、刘恼火。毛在讲话中试图找到加快工业发展的道路。这个讲话证明，4月下旬生产运动明显地还在开展。但毛仍然认为可以对李富春等计划制定者施加压力。

58 很可能由于毛的不满，5月12日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的制定。这个委员会完全是模仿苏联的一个同样组织（国家经济委员会）建立的。后者是一年前建立、用以削弱苏联长期计划者权力的一个组织。[2]如果中国国家经委的组建完全是为了计划的原因，那它在苏联同样组织成立之后不久就建立是很自然的事。但在1955年5月，中国可能认为并不需要两个计划组织。一年后，由于长期计划者的灵活性不够，毛可能认为苏联将计划者分成两部分是有好处的。很可能毛希望在两方面绕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这样的长期计划中树立高指标；国家经委则为达到这些指标制定高的年度指标。这样，就可避免在五年计划中制定中等指标。

如果这是毛的意见，那么第一个被选作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的就不是一个适当的人。薄一波和刘少奇有很久的关系[3]刘提拔他，可能是因为薄一波是能受他影响并赞成其加速经济发展的少数高级经济官员之一。随后一个时期，在不同的政治气候里，薄的确认为宣传全面的经济发展对自己是有利的。[4]但在1956年，薄一直被认为是领导人中比较谨慎的，因为他的长期经济工作经验使人们这样认为。[5]1956年他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揭露了由于经济发展过快引起的基本建设问题，批判了冒险主义。[6]这时，计划者看来是团结一致的，虽然他们没有能抵制毛泽东的所有要求，但他们确实成功地控制了工业形势。

把十大关系讲话中前半部分（关于经济问题）的准备与十二

与农业发展纲要的准备相对照是有必要的。后者是毛和各省的官员设计出来的，专家只是在决策的后期才参加的。至于十大关系，则是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在与中央各经济部门（虽然省的官员也提过意见）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建议。[7] 它远没有十二 59 年纲要具体，它只涉及到原则问题而没有详细阐明确切的指标。这些不同表明毛泽东知道自己对于工业的知识远比农业少，[8] 也可能是他认为他必须在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框子里活动，这种认识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最后被丢弃。

第一节 困难中的生产竞赛

毛泽东为何对工业的指示比对农业的指示要一般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制定于生产竞赛开始之时，还没有碰钉子。就是这个纲要的出现唤起了过分的热情，而这些过分的热情又导致了后来的困难。毛向工业发指示的时候生产竞赛已开展了4个月，此时问题已很明显了，因而要制定一个有着具体和过于乐观的高指标的工业纲领是不可能的。这些问题在经济部门给政治局的汇报中可能已经提到，其中许多问题也在报刊披露过。

早在3月13日《人民日报》关于工业管理的紧急任务的社论中，已经谈到生产部门之间失去平衡、原材料和半成品供应脱节、计划有失误、生产质量差、原材料积压太多等。社论要求企业管理者正确引导群众的生产热情，用"保持生产稳定持久的发展"来取代一阵风的作法。[9] 3天后报纸批评了负责轻工业的官员和管理者，因为他们只追求增加产量而忽视质量和种类。[10] 3月18日报纸社论要求工业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工作，不要简单地提出形式主义的提高生产口号。"[11]

农业形势看来更为严重，因为十二年纲要提出了一个额外的

刺激。前已提到，纲要草案关于农业的意见必须在4月1日以前收齐，以便能在党的七中全会上讨论。收集的意见是纲要起了一支肾上腺注射剂的作用。4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误解十二年纲要只要"一挥手就可在二、三年内完成"而造成的铺张、浪费，以及滥用人力的现象。[12] 通知指出，当农民处在热情中时，可能还不在意俱乐部、办公室和新房子的建造，以及为文化娱乐目的购买大量贵重设备所造成的铺张。但当秋后算帐发现收入因上述投资没有增加甚至下降时，他们将会很不满意，其生产热情就要被挫伤。通知还直率地批评在文化和福利方面花费了过多的劳力财力，同时还批评忽视副业和制定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关于这个联合指示，4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阐述道，近几个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是，一定要防止并且反对滥用和歪曲这个口号，防止和反对把它变成强迫命令的工具，变成某些个人主义者出风头的手段。[13] 提出反对保守主义的口号已被歪曲，这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那些要在生产中铺张浪费的官员——如那些忽视质量和品种的官员——被指责为保守主义本身！[14] 显然由于他们还没有为这种不能令人心服的谴责所吓倒，所以得提出一种新的批评来影响他们。

尽管在农村有这些困难，毛还是不打算使十二年纲要搁置起来。在4月底5月初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刘少奇称这个纲要是"伟大的"，[15] 甚至保守的邓子恢也不得不加以赞许[16]。[illegible]在经济部门给政治局作工作汇报时，毛一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可能毛因为这些问题限制了发展而感到恼火，因而他在4月份在财经问题上与陈云发生了矛盾。这也许发生在十大关系发表前的一次政治局讨论会上。据说毛和陈云在财政部的职能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负有监督经济部门责任的陈不接受毛批评财政部只注意控制行政管理费用而忽视经济投资的问题。陈

说："只强调小事忽视大事是错误的，但只注重大事不注意小事也是不对的。大小事都应注意"。[17] 这个引文含义并不完全清楚，但似乎表明争论是关于经济竞赛中需要紧缩金融的问题。陈云争辩说，不考虑具体的财政后果而只宣布经济指标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后来首先对急躁冒进发起公开攻击的是财政部长李先念，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攻击直到7月中旬才发生。4月下旬，在汇报和讨论的基础上，毛一直感到可以提出十大关系并向4月25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设如何加速工业发展。该讲话经济部分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投资政策。在李富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作长篇说明后10个月，毛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不同意他的论断：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和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投资比例。毛赞成对轻工业和沿海工业多投资，因为它们得益更快。他也要求将资金从国防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在这点上李富春可能是欢迎他的干预的。为刺激工人多生产，毛赞成提高工资。[18]

第二节　重工业和轻工业

在解释五年计划的讲话中，李富春说将工业投资的88.8%分配给重工业、11.2%给消费品工业，部分是由于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而轻工业则有着很大的潜力。他坚持轻工业的发展应更多地依靠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增长而不是依靠投资，原材料不足是轻工业能力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好收成能提供超出现有设备所使用的原材料，就可以考虑更大地发展轻工业。[19] 值得注意的是，李富春的报告也许是与他的苏联经济顾问商量的结果，这是马林科夫被解职几个月之后的事，而马的错误之一就是在损害重工业的情况下强调轻工业。[20]

62

对这一问题毛以和解的语气说道：

> 重工业是重点，它的发展应放在优先地位，对此我们都同意。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的错误。我们没有重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他们在损害轻工业和农业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重工业的重要性。[21]

他说，日常必需品不丰富，但也不是供应短缺。但他继续说比以往更多地注意轻工业和农业并增加对它们的投资是必要的，这并不等于可以削弱重工业的关键地位。他争论道，事实上，如果真正想发展重工业，就应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给重工业带来的资金要比直接投在重工业所产生的更快更多，“因为日常必需品产量越多，资金积累就越多”。[22]毛没有涉及李富春提出的轻工业依靠农业收成的程度要大于依靠投资的程度，和轻工业还有潜力没有发挥的问题。他可能设想合作化的完成定能保证更好的收成，而1955年的好收成无疑也使他受到了鼓舞。

没有迹象表明毛的更多地投资于轻工业和农业的号召在会上引起了争论。这个观点也是对正统的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的第一个重要的抨击，而到那时中国计划者们还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模式。

这样，这观点至少引起了混乱，虽然过去18个月毛泽东才放弃苏联的模式。总之，在1956年夏季，显然毛的主张至少部分地得到了贯彻。因为6月18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上宣布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将从8：1变为7：1。[23]

李向全国人大表示自己对五年计划的变动不很满意。在报告了计划的当前执行情况之后，他转而谈到自己对三个问题的看法。[24]

他先谈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问题。首先，他承认毛的论点，即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必要的，轻工业的确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对此他甚至找出例子来论述。但他又回到他前一年关于原材料重要作用的观点，举出统计数字说明过去好的收成曾怎样决定轻工业的增长率。[25] 在这样论证五年计划的原比例是合理的以后，他说，随着合作化的完成，轻工业就可在农业生产加快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发展。然后又从个人看法转到官方的看法，他宣布当年和下一年要改变投资比例，"假如轻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同时增长的话"。[26] 但他没有放弃增加农业投资的必要性。

李的让步看来并没有足够地说服他的受苏联模式影响较深的下属，使其很容易地接受增加轻工业投资的决定。3 周后《人民日报》在解释这个新方针时，提出了在计划者头脑中出现的疑问。它写道：

既然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我国目前，轻工业产值仍是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更多地增加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使它迅速占优势，反而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由 8：1 改变为 7：1 呢？为什么说它是必要的和符合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利益的呢？[27]

社论用毛的话回答说：改善人民生活是必要的，对轻工业的投资将为重工业更快更多地积累资金。

第三节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64

毛讲的第二个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是与第一个关系有联系的。李富春 1955 年在他的关于五年计划的讲话中认为，过去工业的地理分布很不合理，国家工业总产值 70%来自沿海省份。他宣称，按照原料、燃料的产地和消费地区的状况，根据加强国防和落后地区的需要，使工业分布到全国是必要的。[28]

在这个问题上，毛再次采取和解态度。尽管没有发生根本性错误，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对沿海工业没有给予足够注意”[29]，虽然毛并没有要回到加强沿海工业的政策上去，但他的确要求把新建重工业的10%建在沿海地区。他认为，沿海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会帮助内地工业发展得更快，正象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会帮助重工业发展得更快一样。这也和他前面讲的关系有联系，因为大部分沿海工厂都属轻工业，而计划为内地修建的大工厂主要是重工业厂子。毛强调利用沿海积累的技术和经验的必要——即利用工商业中产阶级，他们的企业刚被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30]

李富春在6月18日人大的讲话中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工业地区是他谈到他个人的意见时论及的第二个题目，——要尖锐得多。他首先纠正了毛的地理概念，并且对毛的统计数字也作了修正。毛认为“沿海”包含10个省，2个直辖市，而李认为包含7个省，3个直辖市。[31] 毛说国家的重工业70%分布在沿海。李没有直接反驳这个数字，但指出80%的钢铁工业分布在沿海。这不是仅仅出于呕气的推托之辞。李的意思是，沿海地区比毛指出的要小，但占有的主要重工业却比毛提到的要多。[32] 必须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项主要的重工业工程是处于内地的武汉和包头两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

李富春接着指出，毛所要的东西已经包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中了。他逐字逐句地援引一五计划的条文表明，下述一点已经作为一项“具体任务”在一五计划中确定下来了，即在建立新的工业地带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现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潜在的生产能力。”他还援引了一个要合理利用东北、上海等现有工业基地的特别指示。[33]

65

李然后转而谈到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建设问题。关于生产，他首先指出内地生产增长的速度相对要快些，因为内地开始的基础

比较低。他承认，沿海工业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他仍然把那儿最近几年的低速度发展归咎于 1953–1954 年的歉收，这种歉收特别影响到沿海轻工业的发展；他也把这种低速度发展归咎于随着朝鲜战争的停战，军事加工和制造订货的缩减；归咎于五年计划实行以前沿海工业的盲目发展。将来，与新的轻工业企业在内地建设的同时，沿海工业将会被"充分利用"。[34]

关于建设，李强调改建沿海工业的可能性，在这个项目下，他把几处扩建的例子也包括进去了。他完全不承认新建的必要性，更不用谈毛要求的新建重工业了。似乎改建（李的主张）和新建（毛的主张，他不提改建）代表了两种极端的态度，而扩建（毛曾谈到扩建，但认为是次于新建）是双方的妥协点[35]。

李富春似乎想设法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人民日报》7 月 8 日的一篇社论尖锐地批评了计划人员，但它的尖锐的言辞大概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毛不得不承认实质性问题。在列举统计材料表明上海的工厂没有很好利用（这点李富春已承认了）之后，报纸指出，毛已经拒绝了李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条文中的摘录来证明计划人员是正确的说法：

> 所以发生上述缺点正如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客观的原因很多，而且还有主观的原因，那就是对于沿海工业重视不够，过去订计划的时候对于如何发展沿海的工业没有提出积极的措施，或者有些措施也不全面。[36]

66

事实上，李已经承认了某些"主观"的错误，但不是象社论里暗示那样承认的。他曾说：

> "…过去，由于没有足够认识充分合理地利用沿海旧有

的工业基础，由于有好多顾虑，与内地建设的协调搞得不够，甚至没有更多的规划和利用。”[37]（着重点是我们的）

李富春的立场是，搞计划的人对待沿海工业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虽然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些。他不承认原来的五年计划有任何错误。对此，他特别摘引原文来加以维护。当他提到计划时，他用“规划”而不用“计划”。使用“计划”这个词表明他的意思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计划，而不是特指“五年计划”。

但是，如果计划人员还没有避免受到不曾为沿海工业的发展作充分准备的指责，他们似乎已成功地坚持了反对在沿海地区进行新的建设的意见。社论的题目——《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社论所陈述的下述观点中，可以看出它的宗旨，这就是在草拟发挥这些潜力的计划中，基本的原则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生产基础”（着重点是我加的）。社论继续说：

如果某些企业只要稍加扩建或增添部分设备，就能增加大量产品或增加迫切需要的品种，那末，在力求供销平衡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进行扩建。[38]

换句话说，甚至扩建都得在绝对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被允许，而新建显然是不予考虑的。

第四节　工　　资

毛的第一、第二两种关系中强调的重点是轻工业和沿海地区（轻工业主要分布在那里）。这样做是为了使消费者得利。他的第四个题目[39]——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毛赞成增加工业工人的工资：

最近我们和各省的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谈了不少。他们谈到工人，并说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每个劳动日生产的产品价值也增加了，因此工资也应随着调整。不注意这一点是不恰当的。[40]

67

谈到农民的生活标准，毛对集体资金积累过多提出警告。此外，国家来自农业的积累应当通过税收政策而不是通过消费品价格来完成，—— 这就是说，他赞成直接税，而不赞成间接税。消费品应以薄利卖给农民。[41]

在李富春6月18日人大讲话对这一点的回答中（这是他三个个人意见中的第三个），这位计划工作的领导人似乎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计划委员会不受节俭过度的指责。他指出提留的积累比例比苏联低，工资和福利设施一直在增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比率一直在合理地调整。说过这些之后，他列举了一些做得还不够的例子。[42]

但是，显然在毛还没有作报告以前，提工资这件事已经决定了，虽然他的干预可能使增加工资的幅度有所扩大。[43]在人大会议上，劳动部长马文瑞宣布平均增长14.5%。[44]除了增加工资外，北京还鼓励地方当局和工厂经理们要更加关心工人的福利，特别要集中精力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45]6月28日，在波兰波兹南发生了骚动，工人们抗议他们贫穷的经济状况，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件事一定使毛确信他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46]7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方面附和波兰官方的分析，谴责这场骚动，说它起源于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另一方面还从中吸取了教训，即官员们必须经常密切注意群众的困难。

第五节　给地方以更多的权力

毛的第五个经济题目是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大力支持扩大地方自主权:

>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门向省市政府的各厅局发布命令，虽然中央和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不同有关地方商量好，从来不冒下命令……省、市、地、县、区、乡应当有它们自己的积极性和适当的独立性，中央不应当把它们束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47]

68

他对中央的这种用公文进行指挥的官僚主义的抨击，在他讲话的后半部分即讨论矛盾时加强了。在这一部分，他要求把党和政府现有机构砍掉2／3。[48]这个分权的要求后来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响应。刘少奇强调了它的重要性。[49]周恩来透露，在毛讲话后，5月至8月之间，国务院已就这个问题召开过几次全国会议了。[50]但是显然，这种实行分权的企图直到1957年下半年才开始实行。

第六节　经济发展和国防

毛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只在一个问题上同计划人员是一致的。他建议缩减防务开支以便增加经济发展的资金份额。为了安抚军队，他说只有用这种方法，中国才能得到核武器: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51]

毛的论点可能（因为他没有详细说明）是原子武器计划只能建立在更加发达的经济——技术和科学——的基础之上。

这一段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它透露，到那时，毛已决定中国应当有核武器——和中国不得不自己制造这种武器。[52]中国直到1958年5月，才由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第一次公开承认想要获得原子武器。这件事由当时的空军司令在当月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证实。[53]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中苏论争，中国人揭露说，他们曾同苏联人在1957年10月15日签订一个协议。他们说，这项协议包括莫斯科的一项承诺即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54]

69 很可能，制造核武器的决定是经过相当的讨论才决定下来的。据别人引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话说："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如果将来战争打起来了，我们提供部队，苏联提供原子弹"。[55]没有注明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但由于它谈到"将来的战争"似乎作这样的推断是合理的，即它必定是在朝鲜的敌对行动——在那里，彭德怀曾指挥中国军队——停止后，或许是彭于1953年末或1954年初回到中国以后某个时候说的。[56]同样，这一点似乎也是确定的，即彭发表这个意见只能在中国作出核武器决定之前，或许就在关于这一问题进行辩论的过程中。

可能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彭德怀回到中国，引起了一场中国应当怎样为将来的任何冲突作最好的准备的广泛的讨论。人民解放军曾参加过朝鲜战争，事实上就是这同一支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它在组织上非常机动、灵活，士气高昂。但是它缺乏现代军队所必须具有的一些专门性武器和集中指挥机构。[57]在最初的给人深

刻印象的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遭到来自联合国军优势火力所造成的重大损失。[58]从1951年年中，苏联开始供应志愿军大炮和飞机。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现代化就始于那时。[59]朝鲜战争后，彭继续推行军队现代化，但是如果他的意见是中国应有一支现代化军队但依靠苏联的核盾牌的话，那么很清楚到毛作十大关系报告时，这个意见已被毛拒绝了。

很有可能的是，毛选择中国走核武器道路，不是因为不信任苏联，而是因为他感到，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核武器是必备的先决条件。更直接地，他可能认为，对于保卫中国来说，核武器比种类繁多的现代化常规武器更便宜。[60]当然，在1956年春天，北京有一场关于军事预算份额大小的讨论，这反过来又跟战争可能性的估计有密切关系。1956年初的几个月这估计有了急剧的变化。

1955年夏天，中国领导人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外来的威胁很大，应该增加军事支出。据推测，对他们的考虑有重大影响的包括：1954年11月美国和福摩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缔结的防务条约；艾森豪威尔总统1955年3月所透露的美国军队可以用战术核武器对福摩萨海峡（台湾海峡）施加压力的谈话，和对金门马祖防务的加强。但是这种形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以前的军事活动和宣传的反应（这种活动和宣传使国民党从大陈岛撤退了）。但是，其真正的结果却是，在1955年年中，中国感到*他们*的军事地位已经恶化而需要加强。[61]

70

在1955年7月的人大会议上，财政部长李先念宣布1955年财政预算中防务支出大幅度增长[62]，其理由是帝国主义者包围中国、占领福摩萨（台湾），并以新的世界战争的魔鬼来威胁中国。[63]3位地位非常高的军队发言人在人大会议上强烈支持对国际形势的这一认识，国防部长彭德怀7月16日声称：

我国人民和政府，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和保障世界和平，曾经作了而且在继续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美国侵略集团还在千方百计地阻挠着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计划威胁着我们。战争叫嚣者们正在以原子武器威胁着全人类，企图借此来达到他们奴役全世界的目的。

……我们决不能牺牲我国的领土和主权来换取和平。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坚决地迅速地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从各方面加强我国的国防。[64]

刘伯承元帅[65]也对世界局势作了类似的阴暗的描述。在7月21日的讲话中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尤应提高警惕，在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必须增强保卫社会主义的国防力量，以保卫我国独立和世界和平。[66]（着重点是我加的）

无论彭德怀还是刘伯承都没有提到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然而，在人大会议进行期间，从7月18日到7月23日，一次四强（美、苏、英、法）最高级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开创了东西方关系缓和的新"日内瓦精神"。[67]叶剑英元帅7月27日在人大会议的讲话中没有提到这次最高级会议，但是他承认国际局势"是向和平方面发展着"。[68]然后他就着手抵销这种勉强的承认的效果。他历数了美国的一长串侵略事实和目标之后，得出结论说：

71

为着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解放我国领土台湾，一并准备应付侵略者突然袭击，（中国人民）必须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继续加强中国人民解放

军。[69]

周恩来总理7月30日的讲话对日内瓦会议的态度比叶元帅较少保留，说它已经"获得积极的成功"和已经导致国际紧张局势"一定程度的缓和"。[70]但是，甚至他也表示了担心，唯恐中国——因为它处于军事基地和军事同盟的包围之中——会遭受意外攻击。他的结论是：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必须增强我国必要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证我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并且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有所帮助。[71]

象周恩来、李先念这样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正受到严重威胁有了一致的看法，对国防预算分配又有了增加，人们认为军事领导人总会满意的。但是，很明显，这些人并不满意。叶剑英元帅批评"有些人"时说："他们认为现在只需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不需要注重国防建设"。[72]按照叶元帅的意见，这些人不明白，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获得足够数量的最现代化的装备对于对付武装精良的帝国主义者是多么重要。[73]当刘伯承元帅把工业化和防务放在同样地位的时候，他显然是同意叶的观点的。他说："有了国家的工业化，才会有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有了国防现代化，才能保卫国家的工业化"。[74]彭德怀元帅援引国家宪法来支持他加强防务的要求：

我国的武装力量目前不但担负着巨大的保卫国家的任务，而且要求不断[75]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了担负起全国人民赋予的为宪法所规定的这种神圣任务，我们必须迅速建

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76]（着重点是我加的）

彭德怀用"不断"一词，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刚刚宣布增加军费支出以后，为什么军队方面的发言人感到还有必要同时强调这项支出的重要性。李先念的预算分配只是一年的预算分配，如果人民解放军要"不断"地加强，五年计划就必须作出适当的规定。对李富春1955年在人大会议上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讲话的研究表明，他对军费开支远不如军队希望的那样关心。为了证明五年计划的高速度是正确的，他说：

我们在国内面对着国民经济的落后状态，在国外还有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77]

这一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虽然李富春接受有一个敌对的外部环境，但他不象其他发言者那样，用这个事实去证明增加军费是正确的，因为那样的话，当然意味着从五年计划的投资项目中转移资金。的确，他没有论及防务支出，虽然后来透露，连同行政费共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支出的32%。[78]在他讲话的结尾，李富春赞扬人民解放军保卫了祖国，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79]甚至稍往后，当他对破坏捣乱和战争威胁的危险发出警告的时候，他也仅仅要求提高警惕，并没有用这种危险来证明把本来计划用于经济建设的钱再额外拨出来增加军费是正确的。[80]很可能，李富春就是叶剑英元帅所批评的"有些人"中的主要目标。

必须假定，李富春在他的高级同事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

持，否则他不可能提出那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最初的几个月内，有一点越来越明显了，即不管毛和周恩来先前的观点如何，他们肯定是支持他的。到周恩来在1956年1月30日向全国政协会议作政治报告的时候，中国和美国已经在日内瓦举行了一系列大使级会谈。直到当时，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并没有使他大幅度地改变他对美国的看法：侵略集团不能阻止国际局势的缓和，但是他们仍然企图这样做。美国人坚持他们的"实力地位"政策，正在走向扩军备战；美国的"战争冒险"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私下，毛对美国的和平诚意要乐观得多。除了其它事情以外，他列举的例子是最近它缩减了武装力量的规模。[81]大约正是这种由中国领导人私下作出的比较乐观的评价可以解释虽然周的分析类似于6个月前的一次，为什么这一次的提法会不大相同。

73

> 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国防，壮大我们的力量，在这里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82]（着重点是我加的）

1955年7月30日周纯粹是从防务的意义上讲的，而现在，他谈到防务是以国家自我加强这样一种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的，强调的重点是经济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毛3个月后在他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采取的路线。

毛讲话两个月之后，周在1956年的人大会上对世界形势作了一番较乐观的描述，甚至当他谈到美国"继续用威胁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时候，他也没有用这一点来为增加防务支出辩护，而仅仅相当温和地说：

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如果美国有些人竟然认为它还可以在远东发动一次突然事变，那末，可以断言决不会替它带来任何好处。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战胜从任何方面来的武装干涉。"[83]（着重点是我加的）

周关于中国已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的信念的重要性，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作了强调。他在同一天向人代会议指出，上年预算分配给国防的经费只用了90.36%。虽然这个事实使这位将军支持在1956年的预算中缩减5.2%国防支出。[84]但是意味深长的是，他是军队在会议上发言的高级人员中唯一公开支持这一削减的人。这同上次人代会是一个明显的对比。上次会议3位元帅发言支持大量的军费支出。[85]

74

很明显，到1956年年中，或许到毛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国防费用的削减已经定下来了。[86]根据国际形势，特别是认识到需要挤出更多的资金使经济增长更快一些，毛和周决定防务可以放到稍微次要一些的地位。国防部长彭德怀不同意这样做，我们将在关于中共八大的分析中谈到这一点。

第七节　毛　游　泳

对毛来说，1956年头5个月是一个紧张的政治活动时期。他寻求从紧张的体力活动中得到休憩。在1956年5月和6月，他不顾同事的劝阻，[87]3次畅游扬子江。[88]那时他已62岁，他用一首诗来赞美自己的技艺：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第二首诗透露，在5月，毛对经济增长仍然信心十足，特别是在他想到将在第二年完成的横跨扬子江的第一座大桥和扬子江流域的洪水被控制住的前景时，更是如此：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89]

注释：

1. 陈译毛选，第66页。
2. 康库斯特上引书，第258页。
3. 30年代薄一波在刘少奇领导下在华北工作。对他们直到这一时期为止的关系所作的怀有敌意的描述，参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集

团的大老板——刘少奇》《刘少奇、安子文和薄一波叛徒集团的内幕》，选自《彻底埋葬刘少奇叛徒集团》（天津：天津市工人、农民、学生、干部代表大会批判刘、邓、陶联络站 1967 年 4 月 17 日），第 11–21 页。

4. 这是在1960年。参见《打倒三反分子和大叛徒、工交战线的坏头头薄一波》，1967 年 2 月 15 日《东方红》(《当代背景》878 号，第 7 页)。
5. 薄1949–1953年任财政部长，1954–1956年任国家建委主任，从1956年直到文革任国家经委主任。
6. 《当代背景》407号，第5–6页。
7. 陈译毛选，第66页。各省负责人商议工资问题，参见同页。
8. 毛在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参见《彭德怀案件》第25页）和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的讲话中都承认这一点（参见《毛主席文选》第 72 页）。
9. 《企业干部的紧急任务》，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66号，第7–10 页。
10. 3月1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改进质量、增加品种》。
11. 译文参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59号，第3–5页。
12. 这一指示翻译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68号，第3–7页，这段引文在第 3 页上。
1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73号，第8页。
14. 见1956年3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3月3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对那些没有把先进工作者运动变为群众运动的干部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74 号，第 7–9 页）。
15. 《中国报刊概览》1284号，第13页。刘少奇提到“多、快、好、省”；的口号时表示赞许，但他把好放在快之前，这似乎是为了强调质量的重要，但是我发现没有别的象这样修改的例子，即使是那些明显地反对 1956 年“冒进”的人也不曾这样修改过。但我对这一顺序的变化作不出任何结论性的解释。我想这不会是中国报纸的一个印刷错误。

16. 《人民日报》，1956年5月8日。

17. 引文参见《彻底清算陈云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北京公社，1967年3月14日。我非常感谢查尔斯·纽豪斯尔先生允许我用他为一本文献集准备的这篇译文。

18. 陈译毛选，第65–76页。

19. 1955年7月5日和6日，李富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转载在《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91页。轻、重工业比例问题在第59页提到。

20. 参见康库斯特上引书第249–256页；伦纳德上引书第79–92页。

21. 陈译毛选送，第67页。

22. 同上，第68页。从康库斯特和伦纳德，所著书中的叙述来看，马林科夫并没有用这一论点为他1953年到1954年的消费品政策辩护。也许他认为，如果重工业也象当时苏联那样得到发展，那末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满足对消费品的需要。但是有趣的是，在经历了国内战争的破坏之后，列宁以同样的理由开始实行旨在恢复苏联经济的新经济政策。为了保卫新经济政策，反驳那些认为新经济政策会破坏大工业的论调。列宁说：没有更丰富的消费品和原料的供应，大工业将不能复兴；要得到这些消费品和原料，只能通过交换过程，而鼓励发展小工业就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列宁接着说："为了慎重和有步骤地恢复大工业，我们需要恢复小工业。"列宁当时所处的情况是不同的，但也许是毛或者更可能是陈伯达注意到了苏联领导人曾对批评者反戈一击，他们断言：如果你们要认真对待工业，你们就必须采取先发展消费品的方针。说到底，两方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发展消费品生产，就是为了发展重工业。（列宁强调"小"的消费品工业，是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也和重工业一样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卡尔《苏俄历史》第2卷，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第297–299页。）

23. 《当代背景》393号，第6页。

24. 同上，第5页。《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

38. 《人民日报》1956年7月8日发表了一篇有关工业布局的社论，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轻重工业投资比例的社论（见前文63页），这表明在7月初高级首脑会议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及其它问题。另一个证实这一假定的事情是，7月6日（人民日报7月7日），新华社宣布了八大召开的日期，而且7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论述与毛的"十大关系"讲话相关连的另一个问题——工资改革（关系四）。
39. 我下面涉及的是毛的十大关系中的第三大关系——国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40. 这一段我是从最初收集的毛的讲话中翻译过来的(《毛泽东：未名文集》，第22页)。
41. 同上，第23页。
42. 《当代背景》393号，第9–12页。
43. 新华社在1956年4月14日宣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全国会议已经提出要增加工资（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12号，第17–18页）。《人民日报》1956年7月7日的一篇社论说，国务院"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已经公布了工资改革的原则(《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31号，第4页)。这可能是一个暗示，计划工作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44. 如果将1956年新就业的工人也包括在内的话，实际增长是13%，毛的讲话收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附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5号，第21–28页。
45. 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26日社论。
46. 关于波兹南暴乱，见津纳：《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第126–142页。
47. 陈译毛选第75–76页。(我在翻译中做了一点改动)。
48. 同上，第77页。
4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90页。
50. 同上，第235页。

51. 陈译毛选，第71页。

52. 奥德丽·多尼森根据多种迹象得出结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是在1956年上半年做出的，也许是在毛讲话之后，但肯定是在6月公布预算之前。我非常感谢多尼森小姐允许我在此用她尚未发表的论文。

53. 见哈尔波林:《中国与炸弹》，第72页。

54. 中国人的态度引自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第105页。

55. 引自《彭德怀案件》，第175页。

56. 彭德怀参加了1954年1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列宁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我在前一年从未发现任何有关彭在中国首都出现的记录，特别是，他既没有出席1953年10月1日的庆祝活动，也没有在同年11月份，一个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露面，因此，他似乎是在1953年12月或次年1月的某一时刻回到北京的。

57. 见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24页和120页。

58. 见乔菲:《党和军队：中国军官中的职业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第12页。

59. 见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120-121页。

60. 赫鲁晓夫发展了同样的观点。关于对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讲话的详述，参见科尔克维兹:《苏联军队和共产党》，第150—153页。

    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讲话中宣称，他渴望更多地依靠核武器，从而削减常规武器，使资源转向经济发展。

61. 见哈尔波林上引书，第4章关于中国为什么在1954年发动了“解放台湾”运动的分析，而该运动与当时对外政策总的缓和姿态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62. 关于一份显示国防预算升降的图表，见哈尔波林和波金斯合著:《共产党中国与军备控制》，第37页。

63. 《人民手册》1956年，第163页。

64. 《当代背景》337号，第6页。

65. 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直到1955年下半年才实行，这是按照苏联模

式进行改造的一部分。但全国人大代表都知道象刘伯承这样的人会得到高的职位。

66. 《当代背景》347号，第26页。

67. 见麦金托什:《苏联外交方针的战略和策略》，第107—111页。

68. 《当代背景》第347号，第29页。

69. 同上，第30页。

70. 《人民手册》1956年，第186页。

71. 同上，第187页。

72. 《当代背景》347号，第30页。

73. 同上。

74. 同上，第27页。

75. 《人民手册》1956年，第176页。

76. 《当代背景》337号，第3页。彭德怀好象已准备接受这种意见，即从实行征兵和削减"庞大的和平时期的常备军队"（同上）中节省一些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同上，第4页）。但他明确地把他提出的征兵议案看作是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身现代化的基本蓝图（同上，第3页）。刘伯承和叶剑英都极力支持这个征兵议案，这似乎意味着他们都支持这一议案必将导致的武装力量的削减，从这一点和上面引用的彭的这些话来看，我怀疑彭对确保军队现代化和军费预算不受侵占的关心比他军队中的同僚更少。关于一个相反的观点，见谢兰莉（音）:《核时代共产党中国之战略》，第36—43页。

77.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7页。

78. 周恩来在八大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公开地透露了这一点（《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26页）。毛也提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花在"军政"上的费用比例约有32%（《毛泽东：未名文集》，第22页）。在陈译毛选，第72页，"军政"被译为"防卫"；但这个词组还被中国人用作"军队和行政"的意思，而且毛的数字和周的观点一致。由此看来，似乎后一种翻译是正确的。（在《当

代背景》892号，第25页，"军政"被译为"军队和政府"。)

7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7页。

80. 同上，第89—90页。

81. 在1955年，艾森豪威尔当局命令削减军队10万人；我推测，这正是毛在1月20日关于知识分子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33页)。关于周恩来的评论见《人民中国》增刊，第4期，1956年，第8页。

82. 同上。

83.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附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5号，1956年7月5日，第5页。

84. 同上，第14页。

85. 元帅比（总政治部的）这位将军高出两个军阶，正如早已指出的那样，虽然直到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才开始授衔，但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职位已是众所周知了。

86. 在毛的十大关系讲话的原文中，(见《毛泽东：未名文集》，第22页)。他号召将军队和行政开支削减到预算的30%，鉴于上述费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占32%，毛的要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也许原文有误，应该是20%，因为周恩来5个月以后在八大上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到这个数字的百分比是20%(《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26页。

87. 见《邓小平反动言论集》，"他们多么恶毒！"（北京：批判刘、邓、陶联络站，北京铁路局红旗公社，红卫兵团，1967年4月）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8号，第1页，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每个人都有主观主义，毛主席也有，甚至当所有的人都不同意他去游泳时（在长江)，他还是非去不可。"也许应顺便说一下，毛的这次游泳没有，也未打算使之具有什么政治意义，这不同于10年后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进行那次游泳。毛1966年的游泳显然是有意证明他健康状况良好，能够亲自处理国家事务，而在1956年则不需要作任何这样的表示。

88. 1957年5月17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描述毛游泳的报道（或许是第一次游泳的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58 年，第 6–9 页）。这个报道说，毛第一次从武昌到汉口游了 20 多公里，用了 2 个小时，在 6 月初，毛又从汉阳到武昌游了 12 多公里，这两次游泳都是在江中心，顺流而下。1956 年，毛视察他的家乡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时，在湘江也游了泳，这是香港报道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84 号，第 13 页）。毛在青年时代对体育锻炼就很感兴趣，见斯克榛姆（第 152—160 页；毛在冬天也游泳，见《红军照耀下的中国》第 145 页。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467–470 页）中，有毛和这位苏联前领导人在游泳池边谈话的记载。

89. 这首写于1956年5月的诗是由陈志让和米徽尔·布劳克翻译的，见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 346 页。毛的第二次、第三次游泳穿过长江大桥的桥墩（《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48 号，第 8 页）。

75

第六章

解冻在扩展

第一节　解放报纸

与此同时，在北京，党的领导人作报告、发指示支持毛发动的自由化运动。这些活动，都象毛的两次讲话那样，许多是秘密进行的。

也许，加强百花齐放政策的最重要措施是企图解放新闻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反映了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所带来的不再迷信苏联的倾向。当年夏天胡乔木——宣传部副部长，草拟 1956 年 4 月 5 日对斯大林评价文章的主要负责人——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新闻界领导人会议。会上，他批评塔斯社说："塔斯社的新闻是简单化、沉闷和呆板的，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反映。"[1] 但是由刘少奇在 5 月 28 日和 6 月 19 日向新华社发出的指示说明了这一政策的更加正确的根据。[2] 主要目

的是帮助促成一种普遍的、更加轻松的政治气氛。刘认为，通过使报纸少一些官方性，鼓励不带偏向的报导政策和学习西方新闻的专业技巧，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3]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4]刘明确指出他没有把这件事本身看成一个重大问题，因而他的这个提议没有什么结果。真正的困难是如何从那样一种情势下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势下，新闻工作者由于是国家的雇员而感到拘束[5]不仅因为他们感到只报道官方路线是一种职责，而且，刘似乎已经感到，因为在等级系统中，他们的地位低下，因此，在向上级官员提问和报道他们的工作时感到拘谨。[6]如果新闻工作者脱离了官员的等级系统，刘似乎感到，他们就可以得到较高的薪水，甚至比毛的工资还要高。如果让他们署名和鼓励他们出名，他们就可能有独立性和责任感，就能说出真话。[7]

76

说真话是刘对新华社官员的指示中最关键之点：[8]

> 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只有一面：一味骂美国坏，只说我们好等。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比如说，美国政府首脑人物骂了我们，这样一项新闻，我看可以登……周恩来总理骂了美国，有的国家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9]

这种对客观性的关心显然是为什么刘提倡研究非共产主义的新闻的一个理由：

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和真实的报导，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10]

刘责备新华社不能使它的报道象资本主义新闻通讯社那样引起读者的兴趣，[11] 他提倡研究他们的方法，反对"机械地照搬苏联塔斯社的经验"。[12] 早些时候，一个新华社代表团到苏联去向塔斯社学习。[13] 由于刘少奇的指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于 1957 年初往英国和法国向路透社和法新社探索堂奥去了。[14]

按吴冷西在文革中的说法，刘的指示给新华社的干部"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而他自己感到这些指示走得太远了。[15] 虽然吴冷西这些批评是旨在毁灭刘少奇政治声誉的压力下作出的，但如果这些话不是吴冷西所指的意思的话，就可能是真的。吴的意思是刘的修正主义使他吃惊。更大的可能似乎是混乱是由于要完全改变新闻实践引起的。现有证据还不能得出刘少奇提倡的新闻政策反对毛当时准备的政策。我们知道，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出版不利中国共产党人的材料——迟到 1957 年 2 月，毛和刘还是一致的，因为他准备重印"美国之音"的广播和蒋介石的讲话。[16] 有充分证据证明新华社按照毛和刘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可能就是那张小心翼翼创办起来的报纸——《参考消息》。这张报纸主要依赖非共产党的消息来源，但是被严格限制在受信任的官员中阅读。[17] 关于另一个主要问题——西方新闻技术研究——刘少奇不过是具体运用毛在他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向一切外国学习的总意见而已。当 1956 年 8 月 24 日，毛建议音乐工作者在发展当代民族音乐时，不但要学习中国传统音乐，而且要学习西方音乐的时候，毛也是在具体运用总的意见。[18] 此外，甚至吴冷西，尽管是被迫给刘少奇抹黑时也承

77

认，在他的指示中，刘首先说，新闻社的工作必须在人民利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来进行。[19]

《人民日报》根据这些指示立即采取行动。从7月1日起，尽管纸张缺少，报纸从四版扩大到八版，并且向读者解释说，这是为了发表生活中更多重要的新事物。

> 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或者是直接有关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20]

报纸新面貌的另一个方面是用较大的版面供自由讨论和一种好的文风。[21] 其他报纸也都仿效。[22] 这种版面的改变，或者刘的原指示都不象文化大革命中硬说的那样，是"怂恿妖魔鬼怪出洞"[23]——即鼓励反共分子攻击党——而它很可能是，从这时起答应给报纸的额外权力引出一个意外的结果，即允许它们于1957年初夏更自由地登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批评——虽然这些批评是直接受到毛的论人民内部矛盾讲话鼓励的。

78

第二节 加强法制

在苏联和东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削弱警察权力，加强法制的行动。大赦、平反，并且撤掉一些犯错误的警察头目[24]。在匈牙利叛乱期间，秘密警察甚至被私刑处死。[25]

在中国，1956年1月期间，由于对整个政治形势估计的全面改变，官方路线对反革命的态度有了急骤改变。首先的一个迹象就是《十二年农业规划》的公布。其中第五条规定，除了最坏

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余都允许加入合作社。几天以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说："新"的规则适合"新"的农村形势。但是，他继续有些矛盾地说，这也符合于"我们长期实践"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26] 董强调了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并强调对社会主义高潮后的反革命分子应继续保持警惕，而不能失之于放松和过分宽大。[27] 然而，他的确说过：即使犯了严重的罪行，只要真诚坦白和悔改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他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反革命分子的区别，这样就可以使反革命分子明白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罪恶行径，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宽大[28]。与解冻相符的是1956年2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向它的下属部门发布的、关于重新全面审查1955年对反革命分子逮捕、起诉案件的命令。[29]。可能就在决定重新审查案件时，刘少奇强调了避免错捕人和按宪法办事的重要性：

> 要保证不错捕人，不错判人，必须提出这样的口号……动员每一个人努力实现这个要求……必须为基本不作错误决定而战斗。[30]
>
> 这是因为，在宪法公布以后，我们必须根据宪法条款处理事务。当案件是依据合法程序处理的时候，即使我们错捕了人和错判，这样的错误也是合法的。[31]

从这两段话中还不能概括刘的讲话的全部内容，但似乎他用

79

来说服检察院官员的论据之一，是坚持合法方式的重要性，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无论用什么论据，中国领导人可能在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以前，或某种程度上在他们能够领会这个报告之前，就明显地倾向于注意合法性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政策性的决定。[32]

因此，中国人1956年开始的加强法制不太可能是共产主义

世界对秘密报告的一种反应。自从1953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建立一种类似于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创立的那样一种法制。[33]这个体制在1955年“几乎”被镇压反革命运动所冲垮。[34]

1955年底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足以恢复一个建立全面法制的运动。当然，秘密报告可能使中国人在执行中受到了鼓励。

1956年3月初的第三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集的[35]。意味深长的是，董必武没有在会上发言。而他所处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位，又是与法律事务直接有关的老资格政治局成员，这些都表明他应该是一位发言者。或许，正象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所说的那样，他表现出对于新的方针没有足够的热情，或者他已深深地卷入了旧方针的实施以致对正确的新的东西缺乏了解。总而言之，主要的指示是由彭真和陈毅作的。彭真当时在政治局的地位高于董必武。[36]所以选他们出来发言，也可能因为他们是最大量资本家的集中地——北京和上海的市长，而这些城市资本家则是法律官员揭露其反革命罪行和铲除腐化的主要目标。在会上发言的唯一的高级法律官员不是召集单位即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官员，而是检察长。[37]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检察院的职责包括审查警察局对逮捕的申请和起诉，并监督政府部门包括警察的行动的合法性。[38]

彭真3月6日在司法会议上发了言，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已经反复阐述过的当前政治形势作了分析。毛已宣称政治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毫无疑义的。刘少奇则在早些时候也作了同样的论断，彭真用阶级斗争的术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

80

今年和过去比较，阶级斗争不是更加激烈、尖锐了，而是正在缓和。地主、富农奉公守法，资本家已经接受改造，甚至反革命分子也比去年老实了……[39]总的说来，情况已

经变化了。富农已被剥夺了武装，一半以上的资本家已进入公私合营企业。[40] 企业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表明，我们已经打败了资产阶级……。去年，资产阶级要和我们较量，我们挫败了他们，孤立了反革命分子。其结果是高潮和资产阶级寻求改造，并（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让我重申，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再是事实了。这意味着甚至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坚决地反对我们，而是放弃他们的反抗，或争取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说（阶级斗争）正在尖锐起来吗!? [41]

彭真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缓和了阶级斗争，可能是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个呼应。赫鲁晓夫曾驳斥关于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42]。但是，彭真坚持这一点不能归因于读了这个秘密报告的所变的震动。很清楚，彭真可能还有他的同事，感到司法界的全体成员深深地卷入了前一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去了，因此很难使他们确信几乎是一夜之间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他发言的另一部分，他描述了对新路线的潜在的对抗：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改变和消灭了……如果农民要求监管反革命，[43] 资本家都在揭发他们的亲属，你能说这行不通？[44] 如果今年你还要反对对严重罪犯从轻处理，如果你今年还要严上加严，那么你的唯物主义到哪儿去了[45]？形势已经改变了，群众要求一个改变，如果你还要贯彻老一套，那么你的唯物主义到那里去了！……反革命分子不敢活动了，……他们正在投降；[46] 这些证明他们正在崩溃并且不敢反对革命了。[47]

81 在某种程度上，彭真迫使这些法律官员接受新路线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在里面。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就会对彭真在北京强迫资本家进入公私合营企业的成绩有所怀疑："资产阶级已经把他们的财物交给了国家，并且大多数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接受改造，——你真能说这个是假的吗？"[48] 但是，彭真试图在这个讲话里表达的基本意图是和毛泽东的（新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生产）序言是一致的。这个序言说："现在群众的要求不再在这个方面（指阶级斗争）[49]，而是一心集中于积肥、挖井、抓生产。"[50]

这一段特别证明了这样的论点：即尽管中国的解冻始于社会主义胜利的1955年底和1956年初，而东欧各事件则促进了自由化。法律领域的新路线是彻底改变政治气氛所必需的，而不是在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才突然感到法制的重要性。彭真是用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语言来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 在恢复经济的时期（1949——1952）结束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公开反抗的敌人大多数被控制了起来，遗留下来的大多数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不加强法制，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51]

4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首次对二十大作出了个人的反应。一个英国知名律师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听到一个新的刑法不久将要完成，对这他很感兴趣。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每个公民都了解的全面法律准则。[52] 有另外一些公开的迹象表明，政府打算建立一种成熟的法律体制。[53] 但在幕后，中国领袖们似乎还感到保证顺利实施这个法律制度的决定性步骤是说服与之有关的官员认识采取新的态度的必要性，特别是鼓励尊重检察院。检察院能成功地执行其职责对新方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用两位西方学者的话说，它是"法

律的当然卫士"。[54]

82 5月30日，刘少奇对一个向他汇报的高级检察官谈到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性时说：

> 必须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权利。人们对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权利不敢说什么，害怕被当作右倾。最高法院和高级的检察长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现在必须强调质量，根据法律处理事情。必须强调正确处理案件。检察官必须警惕地反对和纠正错误。必须做好工作……现在着重于监察是必要的。……发现'缺点'，并对一些问题更多地进行考虑是必要的。目的是更加准确地打击敌人。检察机关必须更多地致力于防止错误和作出错误决定。[55]

一个月以后，在一个类似的场合，刘鼓励汇报的检察官员敢于对政府的其他机关提出不同意见，并指示应该怎么做：

> 一个检察官必须保证在提出控诉中不犯错误。他的职责就是了解每一件事是否处理正确。〔……〕从现在起，检察院的方针就是监督法律工作，提高质量，掌握重点和经得起检查。在你们的工作中必须有一个重点。你们应当研究问题，特别是紧紧抓住那些可能和容易发生错误的方面……你们可以告诉各个省和市作好准备让民主人士和外国人视察你们的工作。这样的视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党委应极端重视这些问题。知道还有相当多的错误，他们会注意检察工作。必须使每个干部懂得不能犯任何错误。这是检察院的职责和任务……保持一般的监督是有用的。如果省的人民委员会犯错误，省委当然能纠正它，而有时候，也可以依靠检察院来纠正它。[56]

同时，在6月5日一个公安部负责人的会议上，[57]彭真也试图对官员们说了同样的意见，这些官员是最不欢迎这种限制他们权力的前景的，特别因为过去他们一贯把检察院作为在法律事务中的一个非常低级的伙伴：[58]"在这个时候，所谓健全的法制的关键因素就是一个健康的检察机构。"[59]但是，象刘少奇在2月所做的那样，彭真似乎感到说服执法官员尊重检察院的最好方法，是使他们确信这样做是保护他们自己的一种方法：

83

>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公安机关没有经过检察部门的允许就逮捕了人，那么，即使逮捕是应该的，也是不合法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的允许就被逮捕了，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是一个特务，逮捕他仍然是非法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公安部门在取得检察机构的允许以后逮捕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逮捕错了，也是合法的。[60]

象刘少奇、彭真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坚持遵守法律方式的重要性，在6月底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做法律工作的高级干部在讲话中承认他们的部门有越权的行为就不足为怪了。[61]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知道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坚持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是必要和正确的。[62]但是这标志着，在2月份由检察院单独对肃反运动所作的检查工作，从7月份始由主要的法律部门——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承担了。[63]这意味着调查组所发现的问题将会受到更加慎重的对待。

第三节 对缓和的反应

毛的关于新方针的建议和在幕后进行的改善民主政治气氛的步骤，原认为的主要得益者，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应都很迟缓。1956年6月，[64]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公布后，中央统战部召集民主党派领导人开了3天会议，民主党派也举行了他们自己的会议，[65]讨论在新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应起的作用。[66]在统战部的会上，一致认为互相监督应当加强，并且为促进经济发展，对于政府的工作应当有更多的检查。[67]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他是中国民盟的代主席、交通部长——在会上说，长期共存的方针代表了政治民主，百花齐放代表了思想民主。[68]但是他和其他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可能已经知道，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共产党的官员们将会对给他们以更大的尊重表示不满。9个月以后，章伯钧不得不告诉他民盟的同事说，他从一个高级干部处得到消息说长期共存的方针很难付诸实行。他建议集中于百花齐放，以便创造长期共存的适当条件。[69]

84

但是，在1956年夏天，似乎百花齐放的方针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事实上，文学上的轰动是由一名叫王蒙的青年作家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70]引起的，这篇小说批评党的中层干部的犬儒哲学、道德败坏和官僚主义。但是，从总体上说，知识分子并没有急于使自己开花和争鸣，而是小心翼翼地去适应这个新方针。少数几个敢大胆说话的人通常是知名作家。气氛比较轻松，文学活动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渐渐增加了。出版了新杂志，在会上也说出了独立的观点。文学权威们试图重现30年代繁荣的文学气氛，使那些年代著名作家再度写作。[71]但是，这种空气仅延续了一年。[72]因为作家胡风和他的朋友由于向党要求更大的自由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知识分子在他们确信有真正永久的解冻前，不

得不更多地竖起耳朵来听。[73]

起初，对新路线最有意义的反应来自省的党组织，显然它们是奉上面的命令作出这种反应的。到9月中旬第八次党代会前夕，有了关于一个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的报道，据说领导干部正在检查自己的骄傲自满的情绪。[74]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早期的报道中，没有谈到宗派主义的错误——歧视非党群众的错误。显然，这些民主人士对待他们的新作用小心翼翼是有道理的。

由于这些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近7年之久的人表现出那样多的顾虑。因此毫不奇怪，国民党对大陆的解冻没有多少印象。只是在对台广播里得到了解释这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75]更重要的是，当时北京政府对它在大陆的控制充满信心，于是正式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在1月的政治协商会上，周恩来反复提出政府一年来要求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并且提出有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76]6月28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说：

>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77]

显然，结束内战完成统一国家是这个新的自由路线的另一个重要的动机。但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反应。

注释：

1. 《跳梁小丑的黑话》，载《新闻战线》，第4期，1967年5月13日，第4页。

2. 这些指示的日期在新华社类文稿中可以找到，见《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红旗》，第2期，1968年8月25日)，该文收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53号，第17—31页，注脚是(12)，(13)，(16) — (19)，(22)，(23)；并且在"刘少奇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中也可以找到，见《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10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31—33页)。

3. 关于刘的指示的来源，除了上一个注脚的两处外，还包括《刘少奇三次夺取我国新闻界权力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载《人大三红》，1967年5月11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201号，第28页；《刘少奇黑线在文艺界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复辟反革命修正主义的100条罪行》，载《毛泽东主义战报》，1967年5月(上旬)，第3—6页；《吴冷西的交待》，载《红色新华》，第43期，1968年5月由帕里斯·张博士翻译和注释，编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年冬季号第68——71页。

4. 《红旗》，第2期，1968年8月25日，第11页。这是刘少奇在他5月28日指示中的用语。当他在6月19日的指示中重提这个议题时，他用了"官办"和"民办"两个术语。(见《毛泽东主义战报》，(见上引文；该引文在这一原始资料中没有注明日期，但其部分引文转载在《红旗》中，注有日期)。毛泽东在1957年4月也提过同样激进的建议，当时他提出每个省都应有一份非党报纸发行，以便同党报竞争，见前文第217页。

5. 《毛泽东主义战报》，第64期；《红旗》，见上引文。

6. 这是我对第二个引文的看法，该引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205号，第32页。

7. 同上，第32页，第一、第二和最后的引文；第33页，第一条引文。

的最高国务会议建议，准备将这份报纸从2000份扩大到300，000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86、95页。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第二次提到这个问题，但1957年3月2日（这一日期不准，因为最高国务会议是在3月1日结束的）。当本文作者1972年秋访问中国时，《参考消息》已发行600万份（见麦克法夸尔：《对中国出版界的一次访问》，载《中国季刊》1973年1—3月，第148页）。对该报详细的说明见汉瑞G·斯克瓦兹：《参考消息》：中国官员是怎样了解外部世界的?；载《中国季刊》，1966年7—9月，第54—83页；尤其是57页（推测该报首次发行的时间是1956年）和78页（对该报刊登非共产党国家的消息的范围与公开报纸刊登的范围作了比较，即公开报纸也登些外国消息，但登得较少，而参考消息登的多）。

18.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6–9页。
19.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年冬季号，第69页。
20.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28号，第3页。
21. 同上，第3—4页。
22. 《刘少奇三次夺取我国新闻界权力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载《人大三红》，1967年5月11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1号，第28–29页）。
23. 同上，第28页。
24. 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195–196页，202–204页。
25. 见拉斯基：《匈牙利革命》，第192–193页。
26.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附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1部分，1956年2月7日，第42页。
27. 同上，第37–43页。
28. 同上，第41–42页。
29. 见张鼎丞最高检察长在1957年全国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代背景》466号，第4页）。

30. 引自《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辑》(《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第38页)。据说，刘2月份在一位检察院的官员作工作报告的会上讲了话。此处的删节是小册子的编辑做的。

31. 同上，第41页。

32. 人们将会记得，这个秘密报告是在2月25日发表的。没让外国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见2月24日会议主席的通知，该通知说，秘密会议将由"具有协商权和决定权"的代表们参加或"决定和协商"。伦纳德则认为，在西方出版的这个秘密报告的译文可能是为外国共产党准备的、经过审查的译本。这就暗示了，没有外国代表听到赫鲁晓夫的报告。由于审查译文的准备工作花费了一点时间，似乎有理由推测，中国人直到3月初才知道秘密报告的内容，3月3日，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可能带回了报告的副本。

33. 柯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程序，1949——1963》，第11页。

34. 同上，第12页。

35. 关于这次会，新华社4月7日的报道，仅仅说已在最近举行《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72号，第3–4页)。彭真3月6日的讲话，是我能找到的与这次会有关的唯一确切的日期。彭讲话的日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出来的。

36. 我未能找到任何陈毅讲话的引语。

3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72号，第4页。

38. 柯汉上引书，第11页。最高检察长的讲话也无从得到。

39. "也许，甚至反革命分子自己也知道了他们在1955年将扮演的角色，仿佛有某种信号，他们开始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加紧活动，从而导致1955年打击他们的群众运动。一年以后，好象又通过某种暗示，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开始在运动中坦白，以得到党的宽大处理"(乔治·金伯哥和阿得·斯坦克：《共产党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权势蒸蒸日上的机构；1954–1957》，载《中国季刊》，1968年4–6月，第126页)。

40. 如果考察一下彭真在一月份胜利地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则对于加入了

公私合营的资本家人数的估计是很谨慎的。但也许这个估计是实在的，因为紧接着在2月分，陈云提出要停止这种改造。（见前文，第25页）。

41. 引自"彭真反革命黑话选辑"，载《摧旧战报，1967年5月25日，第2页。

42. 见美国新闻处出版的秘密讲话原文第13页，伦敦，1956年6月5日。

43. "农民要求把反革命抓了"，这是一句不太明确的话，但彭真可能是指最近关于吸收反革命分子进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见前文第36–37页）。司法部门的官员可能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步骤，因为它将使民众逐渐丧失对反革命的警惕，使农业生产合作社放弃必要的监督。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还有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不喜欢这个政策。

44. 在这里，彭真显然认为，工商业内部的相互揭发证明敌人已被击败，为什么宽大政策就行不通呢？

45. 当然，彭真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46. 谈到这一点时，这本彭真言论集的编者加了这样一句话："显然，在反革命开始投案后，仍有反革命在活动"。

47. 《彭真反革命黑话选辑》，载《摧旧战报》，1967年5月27日，第3页。

48. 《彭真罪行录》，载《满江红》，1967年5月31日，第2页。

49. 这是《满江红》编者添加的字句。

50. 同上。

51. 《彭真在无产阶级专政领域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续），载《政法红旗》，1967年10月7日，第8页，第50条（也见第42和57条）。

52. 新华社4月26日消息。（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57号，第18–19页））。这个律师是艾尔温·琼斯，（王室律师、国会议员），他后来在1964年成为工党政府的首席检查官。这时他同另一位英国律师以及二名法国律师正在访问中国。

53. 例如，全国各地律师事务所的建立，到8月初已达295个（见英国广播

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85号,第13页))。也见于司法部长史良5月25日给国务院的报告(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65,第12页)。

54. 金斯伯格和斯坦克(《中国季刊》1968年4–6月)第101页。

55.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辑》(《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3号,第36页、37页、39页)。

56. 同上,第38页.(还有一条引语,摘自刘少奇7月7日的讲话,第40页)。

57. 会议的日期是由邓小平在公安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见《邓小平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载《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23日)。据说邓是在一次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而彭是在全国省局级公安干部会议上讲话。我认为,为了官们的方便这两次会议可能是同时召开的。

58. 金斯伯格和斯坦克,见上引文。

59. 《彭真在无产阶级专政领域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载《政法红旗》,1967年10月17日、第8页,第51条。

60. 同上,第52条。

61. 见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讲话,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附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56年6月28日),第3号,第17–24页,特别是19–20页。

62. 毛已在他的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一点(陈译毛选,第79页)。

63. 见最高检察长在1957年全国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代背景》466号,第4页。

64. 斯莱克:《敌与友:中共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242页。

65.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76号,第4–5页。

66. 同上,577号,第8页;579号,第10–11页。

67. 同上,576号,第4页。

68. 同上,第5页。

69.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披露。在第276页引用和评述了章伯钧的谈话。

70.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这篇小说，在戈德曼所著《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179-180页、182-183页、185页，以及福克玛：《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的影响》第99-103页中作了评述。

71. 周扬有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抨击，他说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曾发表关于文艺的著名的讲演）看成是新文学艺术的开始是不对的。鉴于鲁迅，这位在毛和毛主义者看来是20世纪中国文学顶峰的人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已去世6年，很难说周杨的话就是如后来认为的那样是反毛的。见许广平：《不允许周杨攻击和诽谤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中国大陆杂志选》544号，第10页)。

72. 见戈德曼上引书，第7章。

73. 关于对毛和陆定一5月讲话反应的描述，见同上，第165-182页；福克玛上引书，第90-108页。

74.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97号，第8页。

75. 例如，有一次，一篇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高级成员所写的文章，被播送给台湾他以前的国民党同僚（见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97号，第12页。

76.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附录：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56年2月7日），第1号，第21—22页。

77. 同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56年7月5日），第5号，第13页。

第七章

86

第一次"跃进"的结束

第一节　对冒进的批评

1956年6月初，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还来不及注意到人们对他的自由化倾向的小心翼翼的反应。使他担心的一定是经济形势。当时形势非常严峻，以致在北戴河的高级干部会上决定把生产的速度减慢。[1]1956年6月15日，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财政部长李先念概括了经济问题。在农村，合作社企图用二至三年的时间超速完成十二年农业纲要，因而投资过多；在工业上，不顾质量和节约地追求数量和速度，结果是忽视安全，造成工业事故的猛增。重工业部所属8种主要产品，有5个在1956年初在质量上下降了。[2]

问题是原先就知道的，但现在形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即使把那些忽视质量和节

约急于求成的官员们说成是急躁、冒进，也不能制止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很清楚，谴责他们歪曲反对保守主义的口号也无济于事。这种批评的方法使人们继续坚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口号。周恩来在1月提出这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的一个中心议题。[3]然而，口号有时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已成为全部生产的口号。谴责忽视质量和节约就是歪曲那个口号，因而不可能说服那些正在数量和速度方面创记录的官员们。因此，如果要将政府要求刹车的意图贯彻下去，就必须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这个口号在李先念的讲话中提了出来："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

87 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4]第二天，《人民日报》用社论的形式加以评述时，它要它的读者不忽略李先念讲话的重要性："今年的预算报告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报告的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着重号是我加的）。[5]这个报纸继续说，这个新口号是在前6个月贯彻计划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反复强调由李先念提出的问题。在那段时期内在报纸各专栏里一直反复讨论这些问题。

4天以后《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的社论。[6]社论解释道：急躁冒进问题是特别严重的，因为它存在于高级干部之中。这些干部在十二年农业纲要公布后，为了避免被谴责为右倾保守主义而驱使他们的下属这样做。批判保守主义、公布规划，加上使用了"多、快、好、省"口号，导致了许多干部思想的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着重号是我加的）[7]。社论的意图很清楚，即在继续批判保守主

义的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将是更为重要的任务。

> 总的方针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8]

这个重要的社论是由《人民日报》的主编邓拓起草的，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胡乔木修改的，最后由刘少奇审查并通过。刘少奇命令把这篇社论送给毛泽东批准[9]。毛在草稿上写了“不看了”三字。18个月以后，在突然批评财政部官员的时候，毛说出了他的原因：“为什么我要读那些说我的东西呢？”社论似乎是平稳的，但事实上它的真正目标是反对盲目冒进。毛透露说，社论发表以后他非常愤怒，以致抵制了财政部的文件。毛还批评财政部没有给政治局以适当的机会去讨论它的建议。[10] 但是他并没有说他在1956年6月就对刘少奇不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一小事件的叙述肯定含有这个意义。[11] 可能一般的惯例是，当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预示重要方针改变的时候，刘少奇的任务就是保证社论的起草者没有曲解最高领导层内部已经一致的东西。在毛的眼中，真正的“元凶”一定是那些迫使最高领导进行刹车的人。似乎很清楚，刘少奇不在他们中间。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他，是没有事实证据的。一位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负责人要刘少奇解释的许多问题中，没有这一点；[12] 刘少奇本人被迫作的3份交待中也没有这一点。[13] 或许阻止1956年跃进的争论说明刘的态度的最重要表白，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谴责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他的用语说明他不可能也是其中之一。[14]

88

第二节 计划制定者的胜利

我们甚至有更好的理由来开脱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承认："1956 年的反冒进我是有责任的，我做过一个自我批评。"[15] 周的承认是不奇怪的。作为总理，他总的负责全国的经济部门。在 1956 年的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的助手，即那些部门的官员都表示反对冒进。由于他们的职务，他们对冒进的影响是看得最清楚的。他们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第一副总理和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的陈云；[16] 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7]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18] 副总理兼国务院负责农业口的主任邓子恢；[19]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20] 国务院负责运输和交通的主任王首道。[21] 如果这些人全部，或大多数反对盲目冒进（有证据证明他们都是反对冒进的），那么毛泽东即使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很难拒绝他们的意见。而且，毛本身对于经济事务需要现实主义并不是不敏感的，也很清楚地知道生产所遇到的严重困难。有意思的是，毛似乎对 1 月份运动发动后出现的不现实的计划和指标，采取了事后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在 1956 年 1 月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被流传了出来：

89

> 各部门计划指标也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倾冒险，虽然目前这还不是主要倾向，但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头脑不那么清醒，不敢于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难听。凡是经过调查研究，办不到的，要敢于说办不到，敢于停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22]

没有理由怀疑毛在那时说过这样的话，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周恩来起初准备支持十二年纲要。在有效发动生产运动的著名《序言》中，毛还警告人们不要“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23] 事实上，6月20日的社论，据说是使毛生气的那篇正是引了这段话，谴责冒进的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话。[24]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讲话中，毛一定花了许多时间讲周恩来在同一会议上讲的那些问题。但是，在文革期间那个讲话唯一透露出来的部分，不是针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不是党员），而是针对可能犯了急躁毛病的党内同志。[25] 这段话颇有使毛从1956年上半年的经济冒进中解脱出来的味道，而冒进都是
90 他的政策的直接后果，虽然他也曾反对过冒进。

毛泽东象他的同事一样，已经从过去几年的经验中认识到，生产竞赛带有很大的冒进性质。他也许准备把那种冒进限制在一次继续的生产竞赛的框框中，这就是4月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节约办社的指示。但是，他反对的是对跃进本身的刹车。如果因为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复杂性的相对无知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也许特别烦恼过。他的“十大关系”讲话，是根据许多经济部门的一系列汇报作出的。这些汇报必然揭露了许多工业上的问题。这个讲话不应只被看作关于资源分配的纲领性文件，也应被视为一个要在苏联式计划的背景内找到保持工业跃进方法的努力。但是在6个星期内，他不得不接受了周恩来和制定计划者们反对冒进的要求。

第三节　十二年农业纲要的放弃

使毛泽东最终不能坚决反对对生产运动刹车的，是农村中的发展情况。对这种发展的意义，他是能容易地意识到的。6月20

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中央七中全会（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召开）曾讨论过这一指示，更不用批准它了。因为这个规划曾是1956年“跃进”的核心部分。因此，它被放弃，以及对冒进的批判，就象征着这次跃进本身被放弃了。[35]毛的以较快步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注释

1. 毛6月10日回到北京（《人民日报》1956年6月11日）。毛曾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一次讲话中透露，1956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确定反对“盲目冒进”，并反映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我推断这是一次高级别的会议，可能有毛参加，不然它不会在政策方面产生如此深远和直接的影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9页。）
2. 《当代背景》392号，第11—12页。
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9页。
4.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当代背景》392号，第12页）。“冒进”字面的含意是：“盲目前进”。
5. 同上，社论（《当代背景》392号，第20页）。
6.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倾向》，《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21号，第11—14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将标题翻译为“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进主义”。我将标题译得更长些，以指出社论的主要意图是抑制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做为一种“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比急躁倾向具有更严重更长期的危险（急躁不是“主义”而是“倾向”）。
7. 同上，第13页。
8. 同上。
9. 《吴冷西的交待》，《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第72页。
1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8页、151—152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第72页。（前一个资料，第152页，毛说他写的

是“不看了”；后一个资料，吴冷西说写的是“不看了”。这番谈论有些令人迷惑，但在出现毛自己的说明以前，帕里斯·张博士已推测出正确的含义（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上述引文，第 82 页）。《吴冷西的交待》的译者在《中国大陆杂志选》662 号，第 5 页中，也正确地译出了“Not read”（不看了）。

11.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第72页。显然，直到1958年1月，毛在南宁会议上提起来，吴才知道这篇社论是怎么写的。他揭发刘的唯一理由是这篇社论是由刘批准的。
12.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载《红旗》，1967年第5期。(《北京周报》，1967 年 4 月 7 日，第 15 页)。
13. 刘的三次交待见《刘少奇选集，1958—1967》，第357—377页。他在“交待”中详细答复了戚本禹的指责，参见该书第 365—368 页。
14.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4—427页。
15. “56年反冒进，我负有责任，我是检讨了的”，这段话是从周恩来1967年 4 月 6 日讲话中引证的，我非常感谢西克先生送给我载有这番话的一份墙报原文的副本。不幸的是，当西克先生通过海底电缆将这一墙报从北京拍送到他的报纸《读卖新闻》后，这段话被歪曲，以致于该报 1967 年 4 月 14 日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暗示周恩来对冒进本身承担责任而不是对反对冒进承担责任。
16. 关于陈云和毛对财政上的局限性发生意见冲突，见前文，第60—61页。
17. 他在1956年1月未能提高五年计划的指标一事，表明了他的态度。
18. 他在全国人大会上公开抨击冒险主义。
19. 这使人想起邓子恢没有出席制定十二年纲要的最高国务会议。
20. 见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代背景》407号，第5—6页。在文化大革命中，薄被指控参与了反冒进；见《反革命分子薄一波犯下的滔天罪行》，载《井冈山》，1967 年 1 月 1 日，第 14 页。
21. 见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出处同上，第39页。

22. 《当代背景》891号，第118页。

2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8页。

2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21号，第11页。

25. 当然，在报纸上简要提到了毛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了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问题；见前文第 35 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其原文发表在《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28—34 页。

2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21号，第12页。另一个例子是试图扫除文盲。"十二年纲要"提出，在 5—7 年之内完成，但有些省可在 4—5 年内，有的县可在 3 年内，县以下甚至可在更短时期内完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干部们利用农民休息时间，甚至在农忙季节，办扫盲班，其结果是，农民在课堂上打瞌睡。《人民日报》指出："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值得赞扬的，但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同上)

27. 红机兵：《中国赫鲁晓夫阻挠农具改革运动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载《农业机械技术》，1968 年第 3 期(《中国大陆杂志选》624 号，第 9 页)。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说出是谁下达这一命令，只是提"以中国赫鲁晓夫（指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指出下达这一命令的精确日期，但似乎是夏末秋初的某个时候。

    犁是按开垦过西伯利亚处女地的苏式犁制做的。十二年农业年发展纲要提议，在 3—5 年内，要生产并推广使用 600 万张犁。在 1956 年前半年生产了 140 万张犁，但只分配出去 10%，并且仅有 5%被实际应用。问题是，拉犁的牲口没有足够的力气拉着这种犁穿过潮湿的土地（见罗·赫夫海兹：《共产党中国的农村管理》，载《中国季刊》，1962 年 7—9 月，第 148 页）。

28. 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第63页。1956年中农村问题的官方报告，见邓子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代背景》393 号，第 25—27 页)。

29. 沃克上引书，第63—65页。

30. 同上，第61—63页。沃克指出，猪的存栏数下降，也是由于饲料缺乏、收购价低以及杀猪税高所致。

31. 同上，第63页。

32. 《战胜灾荒的最重要办法》，《人民日报》社论，1956年9月14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84号，第5—6页）。

33. 沃克，第65页。

3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82号，第12—26页。

35. 甚至1月份向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这个纲要的农业部长廖言，也显得丧失信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2页。

92 附录1：陆定一对毛泽东百花齐放方针的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对百花方针的解释被攻击为对党的政策进而对毛的5月2日讲话[1]的"擅自修正"。弄清这个指责是否公正很重要。如果指责是对的，那将表明那时政治局以外很高级的官员准备反抗毛的程度。它也可以用来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对1966年以前的大多数历史研究的总的否定，即认为毛的思想总是前后一致的，而违反毛的指示的偏差则是他的反对者的修正主义行为的结果。

遗憾的是，由于手头没有毛5月2日讲话，直接的对比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根据毛1957年2月27日发表了同一思想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但是，这在原则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最后版本是在修改之后才发表的，并且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于最初讲话时的政治环境，也与毛和陆定一发表他们的百花讲话时的政治环境相差很大。如果在这些情况下，陆的讲话没有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根本不同的观点，那么，就完全可以假设：陆的讲话也会同毛的百花讲话一致。

对陆的论述的攻击声称，陆定一认为双百方针的四条根据，概括起来就是：矛盾消失了，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结束了。让我们考察一下他这四条根据。

陆首先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以后几年内，国家就变为"一个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2] 毛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社会主义在 3 年内将基本上建立起来。[3] 在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进一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 1956 年基本上建立了（着重号是我加的）[4]。陆的说法和毛的说法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陆在他们共同假设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了正统结论。通过研究苏联人怎样写他们在 1936 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就可以看出陆定一没讲任何非正统的话。苏联人写道："社会主义已经胜利了……人口中的阶级结构改变了。所有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着重号是我加的）[5]

93

陆的第二条根据是，"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6] 他指的是周恩来 1 月份关于这个问题的长篇讲话。周的有关的话就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 6 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着重号是我加的）次年，毛说：

> "我们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7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8]

毛的话也许可以被认为不太明确，但这 3 个人基本上对知识

分子政治状况表示了十分乐观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在毛面前，陆的话和并没超出周讲的那些，然而，周的讲话根本没受到批判。

陆的第三个论点是：

> 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仍然必须继续坚持斗争，不能松懈。[9]

毛论述反革命问题时，用了相似的话语：

>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放松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10]

94

最后，陆说，"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11] 几乎在毛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第一句，当然是实质性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12] 毛接着继续讨论仍然存在于社会中的矛盾。但当时这是他讲话的主题，并且这是针对百花讲话后发生匈牙利事件时讲的。

总之，如果象文革所攻击的那样，陆暗示（因他的确没有明确地讲）阶级斗争结束了，那么陆也不比毛自己走得更远。而且如果陆的话可以被解释为，他认为这种方针的目的"只是使文学艺术繁荣，使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3] 那么陆可以在毛的讲话

中引一段类似的论述来为他自己辩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4]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陆定一的讲话视为对毛的观点的完全歪曲的说法，根本没有说服力。[15] 甚至，假使陆曾准备做一个同毛的政策的基本主张相对应的解释，那么毛也一定会有机会在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或别处纠正这种歪曲。[16] 可能的是，在最初讲话时，陆也许会按自己的理解在讲话中作一些发挥，但这也一定会在发表前被删去或修改。例如，据说他讲到："必须有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世世代代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要世世代代传下去。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17]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没有这一段。也许，最接近这一段的是：

> 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有自由的……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18]

95

早些时候，他说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它甚至在阶级消灭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所有这些都是正统的毛主义的思想。从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那段未被发表的段落的第一句，仅仅是表达唯心主义可能长时间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他的"唯心主义万岁"甚至在1956年的宽松气氛中也会被看作是过分的。但是，陆的讲话中那一整段话是这样的：

必须有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要世世代代传下去。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因为）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斗争来发展——这不但在过去和现在是对的，在将来也必然是这样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中发展的……同错误思想斗争就象种牛痘——一个人在种了牛痘后就有了更强的抵抗疾病的力量。温室里的植物是不会强壮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

从上下文来看，陆的"唯心主义万岁"是相当无害的。这段话与他以前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表达了前面所说的同一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因为"后面的每一句话，都来自毛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19] 甚至"资产阶级思想万岁！"也可能是直接引用毛的话。证据就是：1956 年下半年，毛说过，"所有政党万岁"。这样来看，如果他想要资产阶级政党万岁，那么他也会赞成他们的思想万岁的。[20]

总之，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据来看，陆定一并没有歪曲毛 1956 年 5 月的思想。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么注意陆的讲话中后来被修改的一个方面是重要的。刘少奇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主要目的是同教条主义作斗争。这同毛在讨论是与非关系（4 月 25 日《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第九个关系）的论述是一致的。在这一段里，毛只反对教条主义。它也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论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性。陆定一的话是："但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教条主义倾向"。[21]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估计在后来几年里，随着毛对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日益增长的担忧而逐渐被修改

96

了。

注释:

1. 见《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载《人民日报》，1967年8月29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9号，第1—8页)。
2.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4页。
3.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4.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4页。
5.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501页；这段陈述是根据斯大林在1936年11月25日苏维埃的第八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国家宪法草案的报告。见斯大林：《列宁主义》第561—590页，特别参见第563—567页。联系陆谈话的上下文，可以看出来，陆预见到对八大政治决议将会产生争议（见前文，第119—121页）。但陆并没有象毛那样，提出该决议是错误的；陆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而且，陆在讲话中只谈到社会主义建立后，还要消除剥削阶级的问题；而毛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本矛盾。(《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25页)。
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4页。
7. 同上，第130页。
8. 同上，第286页。
9. 同上，第155页。
10. 同上，第283页。
11. 同上，第155页。
12. 同上，第275页。
1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9号，第2页。
14.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8页。
15. 文章攻击陆提出的四点理由，其唯一目的就是对他的讲话加以断章取义。其它很多简短的引语，显然来自别的时期的讲话。5月26日讲话

尽管说得很具体，但指责它是毫无根据的。例如，说他只谈到合作，根本没有提批判斗争或思想改造，(《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9号，第6页)，实际上，他用了整整的一段谈到批判和学习。早些时候他还说："在某组织机构中，反对胡风和胡适的反动思想的运动没有进行得很彻底；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还未完成。在所有存在上述情况的单位，我们必须将运动进行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因为只有将这一运动进行到底，我们才能为将来做好必须要做的许多事情创造有利的条件。"(《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5页)。上述这段话使得那些对陆的指控——说他攻击对胡适、胡风的批判——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9号，第7页)。在同一批判文章中，还指责他曾用鲁迅的"阿Q"来做比喻，去批判胡风、胡适。实际上，他用这个比喻（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9页)，只是强调在广大群众中有必要开展建设性的批评，而且，毛在一个月前，在论述十大关系时正好运用了同一比喻，他要说明的也正好是同一个道理！（陈译毛选第80—81页)。

诚然，正如有人说的，他对于发动一场运动来反对学术性的《红楼梦》研究进行过批评，但是，不言而喻，他没有彻底否定这个运动。他仅仅批评在斗争中写的部分（不是大多数）文章，而且语气过于苛刻。(《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5页)。

16. 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谈到了他的百花方针的讲话和一篇只标有"xxx"作者的文章。从上下文来看，该文作者必定是陆定一。在本书附录中讨论的这篇文章也必定是他的文章。毛对陆的文章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相反地，他指出了他的讲话同那篇文章的相同点。因此我得出结论，在毛看来这两篇文章即使有什么不同，那也是无足轻重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33页)。
1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9号，第6页。
18.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53—154页。
19. 同上，第288页、289页。

20. 见周庆文（音）：《风雨十年》第163页。周在1957年曾在香港要求避难，他原是中国民盟的高级官员。

21. 同上，第160页。

第八章

毛泽东的地位

尽管前几个月经济遭受挫折，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在一种胜利的喜悦气氛中召开了。自从中共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在过去的11年中，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夺取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过去1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给中国带来了和平和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大体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没有造成象苏联那样严重的后果——并且把私人工商业改造成国营或公私合营的性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刮目相看。近年来，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国外交在亚洲赢得了新的朋友。毛泽东在1949年曾经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1956年，人们都明显地认识到中国的确是站起来了。

不过，中共八大的代表们还不能高枕无忧，他

们面临着一系列实质性的方针问题。其中包括，根据苏共二十大精神，以及从那时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开展反对个人崇拜斗争所带来的毛泽东的地位问题；[1]由毛提出的政治自由化的方针问题；在刚刚放弃1956年的跃进之后，对于经济发展的指导路线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决定在年初就已做出来了，但对代表大会来说，认可这些决定，并且指出今后的发展道路仍然是重要的。后来的结果表明，尽管决定早已做出，但代表大会的情况说明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的基本方面仍然存在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这些迹象在代表大会之后就出现了。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新的政治局，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提升和降职。

100

第一节　删去"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公开场合扮演了一个配角，他仅致了一个很短的开幕词，而把主要的政治报告留给刘少奇去做。但这并不能实际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斯大林在1952年也曾让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要的报告；那时或那时以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表明斯大林的地位下降。如果人们用苏联的这个先例作为指南，最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正在把刘少奇作为他的继承人推到前台。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的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而这曾写在1945年的党章中。[2]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删节成为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则作了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事实表明，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虽然不是象人们所指责的那

样——但是，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时，却捍卫了毛泽东的地位。

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时，彭德怀承认：1956年，当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是我建议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的；我一提出这个建议，刘少奇就赞成说，"删去它可能更好一些。"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3]

彭德怀的交待澄清的第一点是，删去毛泽东思想是由一个并没有参与起草新党章和刘少奇的报告中有关"国家的政治生活"那一重要部分的人提议的，这两个文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强烈反对。刘的报告中有关"国家的政治生活"部分是由彭真起草的；[4]（译按：原文如此）而新党章则据说是由刘少奇指定的一个班子起草的，成员有邓小平、安子文（那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后来作部长）和刘澜涛（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代表大会之后，任书记处候补书记）。[5]

101

彭德怀的交待还证实，删去"毛泽东思想"是在很晚的阶段才决定下来的。[6]而且有另外一个论据表明，主要的报告是在非常仓促、最后一分钟的情况下定下来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后来宣称：

> "八大"的报告有缺点，但这不是他（刘少奇）个人的问题。"八大"的决议似乎也有错误……主席看过这个文件吗？……每件事情都是在匆忙中做出的，刘少奇也好象是匆忙地看过它。不管怎样，这个文件已经公布很长时间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没有说什么。[7]

刘少奇夫人认为文件是在仓促中制定的说法已经被周恩来总理所确认，他曾经说，代表大会关于刘少奇政治报告的决议在广

为传播之前没有给毛看过。[8]刘少奇在一份交待中说，虽然毛泽东反对决议中的某些句子，但已"没有时间去修改了"。[9]

为代表大会做准备的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断断续续地于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举行，这进一步证明代表大会前夕缺乏一定的组织性，尽管从1955年3月就开始为大会做准备了。[10]在代表大会的前几个星期，几位最高领导可能由于自然灾害和农业问题分散了注意力，9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

不过，即便决议是在最后一分钟的仓促情况下制定出来，彭德怀和刘少奇如果没有同事们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删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的。实际上，似乎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这样做。陈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种删节被认为是刘少奇所犯下的100多条罪状中的一条。但这个报告是经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而且我出席了那次会议。[11]

毛泽东有力地证实了陈毅的说法，在一次讨论指控刘少奇报告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看了这个报告，这是代表大会通过的；不能仅仅由这两个人（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12]

似乎有理由认为，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这样一个非常正式和重要的改动，大概是在陈毅提到的那次会议上，经过毛泽东和政治局同意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么毛泽东和陈毅的陈述就意味着，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能因为在"八大"上作了令人讨厌的报告而被指责为想要降低毛泽东的威信。[13]如果有人试图根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进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来估价刘、邓等人对毛泽东地位的态度，则需要寻找其它的论据。

102

第二节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态度

首要的论据是彭德怀的交待，这个交待证实刘少奇希望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下降。显然，当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做这个交待时，他很可能是在压力下不得不指控当时受批判的同事们。但是有意思的是彭仅仅点了刘少奇的名却没有提邓小平，虽然这两个人在这时在这个问题上都受到了攻击。这就清楚地表明，在那次关键的会上，在促成同意删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刘少奇扮演了一个积极和重要的角色，而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刘少奇这时的行为与他年初时想要削弱毛泽东地位的尝试是一致的。这还与“八大”会议上，刘少奇所做的一个有双重意义的讲话中的一些评论相吻合，虽然该讲话中大多数的话还是赞美毛的。

刘少奇在一段关键性的话中，向自党的“七大”以来入党的党员们——占党员总数的90%——阐明，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怎样以正确路线取代了错误路线。每一个“八大”代表都知道，正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政治局的领导地位。[14]刘的大部分听众无疑都已经读过胡乔木在其中共简史小册子中关于遵义会议重要意义的评价：“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15]

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刘少奇没有象这本小册子那样热情洋溢地重复他在“七大”时对毛泽东进行的赞颂，[16]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提到自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就足

103

够了。[17]代表们会把这看作是慎重地重新肯定了中央的正式立场。在中共中央决议中写道，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这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变化”。[18]但刘少奇都未能善始善终。当回答应如何解释党从错误路线转到正确路线时，他驳回了那种简单地认为党只是更有经验了的说法，他那时说：“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这段话显然对毛泽东的作用的重要性打了折扣，[20]而且的确可以被认为是违反了上述中央决议。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他曾在“七大”提出的“毛泽东道路”[21]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说法；因而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因于毛泽东。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大部分赞扬之词，是在他谈到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时提到的：“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22]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刘少奇曾着重强调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而没有提到他对集体领导的尊重。[23]这种强调重点的变化，可以归因于要把毛泽东同斯大林区别开来，而且根据刘少奇对遵义会议的评论，敏感的毛泽东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暗示：他（译按：指毛）愿意与

同事们商量是与他的正确思想一样重要的。[24]

由于毛泽东曾在1955年越过他的同事们直接去证明他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毛肯定不会欣赏这样的暗示。

第三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捍卫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作用所持的矛盾态度，在把他的评论和邓小平的评论进行对比时显得愈加突出。邓小平在他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中没有试图去说明为什么要删去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这是个太敏感的问题，不宜公开讨论。但他正视了个人崇拜问题并尽力去为毛泽东开脱。他用了两种方式。首先，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曾做过的那样，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采取措施，以保证集体领导。他全文引证了中共中央1948年9月制定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们无疑全都知道这个决定(就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引证1943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那样）是由毛泽东本人亲自起草的。[25] 邓小平肯定地告诉大会代表，在中国没有个人崇拜问题，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预防这一点的正是毛泽东。[26]

邓小平把毛泽东同斯大林加以区别的第二个方式，是宣称"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27] 这段话显然是为对毛泽东的颂扬做辩护（对领袖的爱护），并且把它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的神化）区分开来。[28] 邓小平继续透露，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不久，正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中共中央曾做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29]

邓小平并不满足于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可能指责作这样有

力的捍卫。

他还多次在讲话中正面提到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部分，邓小平简要地回顾了中共"七大"以来的历史，他谈到："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30]打败了国民党。相比之下，刘少奇在他的简要的回顾中，仅指出："在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31]等等。邓小平在他的报告行将结束的一段中，说得更明确："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3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从新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33]这种提法与大约同一时间由刘少奇和彭真给宣传部门发出的一个党内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指示要求宣传部门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只提毛泽东著作。[34]但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里却没有如此地继续重申毛泽东著作的重要性，在毛泽东著作中当然包含着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个遗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们注意到了。

105

第四节 毛泽东的引退计划

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本人对于任何一个把他看成或可能变换成另一个斯大林的暗示都是很敏感的。但如果认为他本人只关心他个人的威信，那将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引起了毛泽东对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深思索。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几个月内，毛泽东已经开始为中国指出新的方向。这也促使毛泽东考虑最高领导人的作用以及接班人问题。他自己的陈述表明，他决定退出众人注目的中心，以便让他的资历很深的

同事们不依靠他，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主要政治形象。

毛泽东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分成"一线"和"二线"（见附录3）。毛泽东将退居第二线，分散职责和职权，这样就能使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增加他们自己的经验及威信——这是为了保证在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地位将由一些有自信心、经常做出决策并负起责任的人所接替，而不是象斯大林的接班人那样出现麻烦。进而，刘少奇将接替毛泽东的官方职责。这样，随着党的高层领导之间，不公开的、[35]非正式的和实际上是不合宪法的分工而来的，是正式的、公开的权力移交。

106

几乎可以肯定，1959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已退居第二线了，大约在那时，刘少奇接替他成为国家主席。但是，有迹象表明，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前，毛泽东就做出决定，逐渐地将权力移交给刘少奇和其他同事。

我们知道，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就准备向党外广大群众暗示他这一决定，他在一个论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把自己比作一个著名的剧中的主角，但他说，他现在太老了，不能再很好地演主角了；他暗示他可能很快就要退到配角地位"。[36]这意味着，在早些时候，他已在党内同他的高级同事们谈了这一想法。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某些方面也证实这个决定是在大会之前就做出了。

一个重大的迹象是，在1956年的新党章中，规定了一个党中央名誉主席的职位，（译按："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看起来这个职位是为毛泽东设置的，如果毛泽东一旦移交了实权和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的话。在1956年，毛泽东可能已经设想了一个5年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他将放弃他的权力和职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推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是在1959年4月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并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退到第二线。

合乎逻辑的第二步将是在预期的1961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由党中央主席改任党中央名誉主席。但结果，第九次代表大会直到1969年才举行，而毛泽东在1969年之前很久，就对他当初退居第二线的决定极为后悔。

改革的另一个迹象是在1956年的党章中，规定要设立了一个其性质与原来不同的书记处。原来的书记处一直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其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这样的成员表明，迄今为止，书记处既制定方针政策（可能主要是这个工作），又负责行政和组织工作。这一结论，从明确公布的说法中得到了证实，即以前书记处的职责将由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承担[37]，而政治局常委会则由原来的书记处成员再加上邓小平组成，邓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当选总书记职务。新的书记处虽然很有权力，但仅有一个人——邓小平进入制定政策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07

据邓小平说，改组书记处是必要的，因为"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机构已经不够适应需要了"。[38]这是容易理解的，中共的党员总数已从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的120万人增长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时的1070万人。[39]但毛泽东本人后来把新的书记处的组成同党的最高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联系起来。这表明，毛泽东也认为他所建议的新的书记处[40]是逐步使他本人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不那么重要的计划的一部分；书记处有助于加强党的组织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独立于党的主席之外的机构。与之形成对照，斯大林曾经迫使党的机构变成他个人意志的附属品。

毛泽东在第八次代表大会时的意向的第三个迹象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事实，即刘少奇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这个迹象表明，毛泽东在把他的接班人推到前台。

但即使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这三个方面都被证明是毛泽东开始有计划地、逐渐地从最高领导地位上退下来的信号，我们也仍不

能确定，毛泽东本人会热心于把他的思想从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中删去。显然，正如我们所看的，他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这个建议也适合他的计划，少抛头露面，但他本人没有提出这个建议。特别是由于他正准备交出实权，他可能对删去对其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体系的颂词怀有个人的不满。毛的这一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的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

第五节　毛泽东的地位问题在代表中引起混乱

从文化大革命中的论战来看，显然毛主义者认为在第八次代表会上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了打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看法是对的。的确，在代表大会以后，毛的位置没有变动，他的声望也没有失去光泽。但从党章中删去有关他的思想的提法，刘少奇对他的双重态度，甚至毛泽东本人希望逐渐隐退的良好意图，这些事情混合在一起，扰乱了大会代表们对毛泽东地位的理解。如果他们当时希望根据对个人崇拜的抨击，由中央提供一个对毛泽东应采取的明确态度，那他们是失望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肯定使他们不安。

108

代表大会期间，曾就关于删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私下对代表们做出过解释。人们引用刘少奇说过的话：

> 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七大”上确立的；现在，即使我们不谈它（大概指毛泽东思想），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41]

中共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安子文说了类似的话：在 1945 年，

必须尽力建立毛泽东的威望，但是现在"毛主席威信很高，没有必要再去树立他的威信了"。[42] 这样的解释——可能是反映了政治局同意的路线——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们是否能使阅历丰富的代表们信服，是大有疑问的。从发言者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开幕词所采取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出现了混乱。

除了这三个报告人自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在大会上发言的所有党员都在他们各自讲话的开头表示赞成中央的这三个主要报告。从形式上看，可能没有必要去表示对毛泽东的开幕词的赞同，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党中央报告，不过，还是有 35 位代表在他们的发言中表示赞成毛泽东那简短的开幕词，与此同时，有 53 位代表在发言时没有这样做。[43] 即便在发言中提及毛泽东纯粹是一种形式，但也能明显地反映出对主席的态度。那 53 位代表中的一位高级干部，由于在会上的发言中没有提到毛泽东，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特别的攻击。[44] 根据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曾提到毛泽东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中央工作的人，有半数以上仍然幸存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中。[45] 相反，那些没有提到毛泽东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时保住了他们的位置。[46]

当焦距进一步缩小时，这里的相互关系甚至更为有趣。文化大革命前，由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47] 除了 3 个主要的报告人之外，有 12 个人曾在代表大会上发过言。他们当中有 2 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去世，剩下的 10 人中，有 4 人——陈云、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发言中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讲话；这 4 人全都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虽然仅有 1 人——李先念仍保留在政治局内。6 个在发言中没有提到毛泽东的讲话的人中，有 1 人（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遭到清洗，有 3 人（李井泉、乌兰夫和薄一

109

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清洗，其余2个"老资格"的人物（朱德、董必武）则做为政治局成员幸存下来。

这些并不意味着，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人仅仅因为这些党的领导人。在10年前怠慢了毛泽东，就想在1966年除掉他们。[48] 如果一个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那是由他多年以来在许多问题上的行为和态度所决定的，当然在对斯大林的抨击开始以后他的行为也是政治收支平衡表上的一项。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可能就象一张石蕊试纸，使他的同事们显出真实的颜色。在成功地领导了革命21年之后，毛泽东可能非常失望，因为对他本人持肯定态度的人被证明并不是那么多。

注释：

1. 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的论述，参见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194—209页。
2. 在1945年党章的总纲第2条中，毛泽东思想被描述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关于党员的部分第2条第1款，把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为党员正式职责之一。关于1945年党章和1956年党章的相互比较，参见《当代背景》417号，第32—76页。
3. 《彭德怀案件》第445页。
4. 参见《档案材料汇编》(《工农兵》增刊1967年9月）其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杂志概览》补遗27号，第35页。
5. 见《刘少奇在党的建设方面制定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事记》载《资料专辑》(《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46号，第13页)。这些人还对关于党章的报告负有责任。
6. 彭德怀对这一时间的暗示是含糊的。他的措词"开八大时"可以理解为"在八大开幕式上"，表明这个决定在第一次会议前夕就作出了。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无论如何，决定不象是以后才做出的。

7. 见小册子《对扒手王光美的三次审判》(《当代背景》848号，第17页)。

一个曾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参加翻译主要文件的俄国人告诉我，对刘少奇的报告曾有多种修改本，大会秘书处收到最后一个修改本是在这个报告发表前仅一两天。结果，在大会召开前的72小时内，这位负责翻译的俄国人完全没有休息。关于刘的报告的决议到达译者手中时，大会大约进行了一半；有一些修改本发得晚一些，但是与政治报告相比，时间还不算太仓促。

8. 见西克的报告，载《读卖新闻》1967年4月14日。这个报告是依据一份墙报写的。该墙报引用了周恩来谈及第八次代表大会1958年会议的报告和决议的话。

在我看来，这个墙报的可信度有两个大的疑点；说明对周的话有引述错误，实际上周是指1956年的会议。当周在1967年4月讲这话的时候，1956年的报告因删去"毛泽东思想"而正在不断地受到指责，而且这些指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改变过。周把他谈到的这个报告和决议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就我所知，对1958年的报告和决议一直没有使用这样的词语加以指责。到1958年，把"毛泽东思想"从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删去已不再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了。第二个疑点是，关于1958年政治报告的决议非常短：在1959年的《人民手册》第17页上，仅占7行半的篇幅。因此，即使时间很仓促，也不可能没有一点时间去征求毛的意见。在1958年的决议中，没有任何毛主席可能反对的东西。另一方面，1956年的决议比1958年的决议长得多——占了1957年《人民手册》的3页多——并且是一份更加重要的文件。我们将会看到里面有一些我们确知的内容，毛是反对的。因此，我们假定周恩来谈的是1956年决议，那么在他的讲话中就有一点不够明确的地方需要加以解释。周在讲话时把政治报告和决议都看成是反对毛的思想的，但他没有具体提到，只有决议在事前没有给主席看。周的原话是："没有给主席看就在会上宣布了。"无论怎样，周用了"宣布"即公

布，发布，这个词暗示不是发表一次讲话，而是分发一份报告。还有其它有力的证据表明，在大会之前毛至少看过政治报告。参见前文第101页。

9. 《刘少奇选集，1958—1967》，第367页。

10. 关于预备会的详情，见《当代背景》411号，第1—2页。

11. 这段引文出现在大量攻击陈毅的小报中，本书的这段引文来自小册子《文革风云》1967年第4期(《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35号，第14页)。由于陈毅在八大前还不是政治局成员，所以他提到的那次批准这个报告的会议，可能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或是代表大会前的中央七中全会的三次会议中的一次。尽管如此，陈毅也肯定会说这个报告是由中央批准的。

12. 《毛泽东思想万岁》(《当代背景》891号，第46页)。显然，刘少奇是毛的提到的"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从毛这一讲话的前一部分以及毛的支持者的插话看可能指邓小平。(同上，第44—46页)。然而，毛的这句话也完全可能不是指邓而是指彭真，因为彭起草了刘的报告中的政治部分。

13. 这一点可能还适用于准备这个报告的人。

14. 形式上，毛重新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并且接替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译按：原文如此，有误。当时毛泽东没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23—24页，和《周恩来传》（科林和克拉克合著）。

15.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第39页。

16. 见刘少奇：《论党》，第8—10页。

1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98页。

18. 指的是1945年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193页。

19. 《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第1辑，第98页。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对我谈到，刘的这段话在合作化问题上还为他自己辩护。迈克尔还暗

示，第一句话还有意为现在身居要职的"叛徒们"辩护。见下文，第358页，注释33，41，有关"叛徒"问题的叙述。

20. 这段话的含义没有逃过毛的注意；在文革中对这段话多次进行批判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见有关刘的小册子：《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辑》(《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第18页）及《刘少奇反革命讲话》(北京：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红旗公社'，北京铁路局，红卫兵团，1967年4月，译文在《中国大陆杂志概览》补遗25号，第2—3页)。
21. 《论党》第9页。
2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04—105页。
23. 《论党》，第8—10页。
24. 宋任穷在八大上做了有关集体领导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由于将"家长式个人领导"和集体领导加以比较而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可以想象这是对毛的一种隐讳的攻击，但是这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宋仅仅是负责下级常委的工作。他的讲话译文登在《时代背景》419号，第10—15页。对他这一段话的批判包含在6页历数宋任穷罪行的标题为："坚决打倒东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任穷"的文章中(没注明日期，是由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罢宋团"发表的）第1页。

    宋在八大分组会上做会议主持人，会上对从党章上删除"毛泽东思想"一词正式达成了协议。见《红旗通讯》批判他的文章，1968年5月26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01号，第10页)。
25. 见《毛泽东选集》1961年，第267—268页。注脚引用了邓在八大报告中关于明确赞成这一决定所做的说明。兄弟党代表可能不了解1948年党中央决议的作者是谁，因为那时毛的著作的有关选集还没有发行。
2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92—194页。
27. 同上，第200页。
28. 非常有趣的是，苏联的理论家L.F依廖晓夫在苏共二十二次党代会上采

用了相同的手法维护他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他自己并没有搞个人崇拜。他的话是这样讲的："将我们领袖的权威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法国苏联问题专家，米歇尔·塔特在引用这句话时评论说："此话的意思是，凡是能提高赫鲁晓夫威望和权威的赞扬或别的什么，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坏事。"（见塔特：《克林姆林宫的权力》第203页）。邓小平的话，在文革中被用来批判他，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但若对它理解错误，就会使人相信批判是对的。例如，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8号，第1页，邓的这段文章被译为："热爱领袖的表现，其本质是热爱党的利益、阶级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神化。"这段译文暗示了邓在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他们对毛的热爱最好的表达方式是热爱党，而不是直接赞扬主席，关于对邓的其他指责，见附录2，第149页。

2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00-201页。
30. 同上，第17页。
31. 同上，第15页。
32. 同上，第227页，重点号是我加的。
33. 同上，第216页。
34. 见《彭真的反革命集团同刘邓之间的黑线关系》，载《新北大》，1967年6月10日，第4页，合订本2。
35. "Unpublicized"其含意为："不当众公开宣布的"；但"二线"部署许多党的干部肯定是知道的。
36. 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21-222页；罗的报道在穆福深著的《百花凋零》一书中得到证实，第166页。
3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22页。通过比较1945年和1956年中国共产党党章，可以看出，正式的职权范围是相同的，即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38. 同上。
39. 见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层》，第110页。

40.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0页。

41. 此条引文可见于多种文革资料中，例如《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北京：北京第4医院，井冈山战斗队，1967年5月，第13页)

42. 《资料专集》(《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246号第14页)。

43. 有23位代表，主要是级别低些的，没有表示赞同任何人，也许他们的讲话没有全文报导。

44. 见批判宋任穷的文章，《坚决打倒东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任穷》第1页。

45. 虽然并不一定具有同等资历。

46. 我没有把在省里工作的中央委员计算在内，理由是毛及文革小组对北京以外发生的事情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在中央，一位受到重视的干部，如果值得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地去帮助他，使他幸免于难。如原石油部长余秋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若把在各省工作的中央委员都计算在内，这种相互关系就不十分鲜明了，但仍然是明显的。在八大会上提到毛泽东的讲话的所有中央委员的40.9%，在九大再次出现，而没有提到的只有31.2%再次出现。

47. 或者在1956年9月，或者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以后。

48. 在附录4中，对如何提到毛的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10

第九章

关于自由化的争论

第一节 对毛讲话的反映

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政策建议明显地不受欢迎，这可能增加了他地位不稳固的因素。这种不受欢迎的程度，在分析他向大会作的简短的开幕词所得到的反映上能感觉得到。会议的主题是团结起来向前进:“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这里没有提阶级斗争。

毛的讲话是会上唯一一个官方报刊标明了鼓掌的热烈程度的讲话——，苏联新闻机构喜欢刊登这种鼓掌的热烈程度。中国人可能想表明：尽管反对个人崇拜，他们的领导人仍然得到了他们的尊敬。但这个鼓掌的热烈程度也清楚地表明[2]毛的讲话的

不同部分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欢迎。

有四类鼓掌，我随意给它们订了一个计分法

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4分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3分
热烈鼓掌	2分
鼓掌	1分

用鼓掌计分法把毛的讲话初步分类如下：

论题	字数所占篇幅的百分比	分数	占总分的百分比
套话	11.1	22	34.3
国际问题	45.7	33	51.5
国内问题	42.9	9	14.06

换句话说，毛的讲话中国际和国内论题所占篇幅大略相等，根据鼓掌的情况来看，国际部分要受欢迎得多，——这确实是中共在全国胜利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111 对毛讲话中国内部分所作的分类，也有意思地说明了问题。

论题	字数所占篇幅的百分比（国内部分）	分数	占总分的百分比（国内部分）
八大的任务	6.7	2	22.2
1945年以来的成就	19.2	6	66.6
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11	0	0
与非党人士一起工作	29.7	0	0
要反对"三害"	33	1	11.1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从这个分类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和常人一样，宁愿听成绩而不愿听错误。

但是，当人们考虑毛提出的重大政策建议时，得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结论。这些政策建议包含在最后两项中。这里的反"三

害"和与非党人士一起工作有密切联系。宗派主义特别表现为歧视外面的人，尤其是非党人士；但主观主义（盲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官僚主义（不考虑可行性就下命令）也都与非党人士问题有关。很清楚，一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党员往往是自以为是、不易接受非党人士的意见的，因而也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换言之，毛对国内事务所作评论的后两部分实际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即毛自年初以来所推行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方面。参照苏共二十大精神，中共要首先争取在全国生产运动中得到非党知识分子的合作，然后争取在"互相监督"中与他们联系。但是，尽管他把论述国内事务的篇幅有62.7%是放在统一战线上，统一战线的内容所得到的鼓掌只占他讲话中国内部分的11.1%，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党员对统一战线政策缺乏热情、缺乏更紧迫地彻底执行政策的热情了。[3]

112　对毛讲话国际部分的研究提供不了很多看法。总的来说，鼓掌与这些字数所占的篇幅相一致，虽然代表们对毛的反帝的评论（字数篇幅8.7%，分数15%）比对他关于世界形势有利于和平的论述（文字12.5%，分数3%。）更为热情。鉴于他后来对苏共和其他外国党的谴责，他在这部分中用了一多半的文字强调友好、支持的重要性以及俄国和其它国家共产党的榜样作用，特别是在称赞苏联上，这是很有意思的。关于二十大，他是这样说的："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4] 在这样一个公开和讲究仪式的场合，毛没对二十大某些方面的不明智表示怀疑是不奇怪的，但它使得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和其他人在相似的场合说了相似的话更是不可信的。[5]

第二节　对中共的监督问题

必须记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谴责了对斯大林的神化，而且也暴露了由斯大林下令的大量的逮捕、放逐和处决，这样就提出了共产党与其统治下的人民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1956年10月—11月匈牙利事件后对中国说来变得更加尖锐了，虽然甚至在中共八大以前，波兰波兹南6月28—29日的暴乱已经表明了东欧对斯大林主义的普遍敌视。[6]

虽然在中国似乎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但毛后来承认（在他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有过闹事：

> 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群众缺乏教育。[7]

113　毛提到的罢工至少有一部分很可能发生在八大以前，即使不是这样，到这时中共也肯定意识到需要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或者（用中共的话来说）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8]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命令党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学习整风文件。7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高级军官同样学习这五个文件。[9] 9月初，山东省开始贯彻中央委员会

的指示。[10]

虽然这些措施以及刘少奇、彭真这年夏天的活动表明，在高级领导层中间对于改进政治气氛没有明显的分歧，所有的人都承认中共干部已犯过而且还会犯错误，对这些错误应当纠正，但是，对于错误的原因的看法明显不同，这种不同的看法对应该采取的补救措施有重要影响。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讲话使与会代表看到了两种分歧的观点。这两个人的分歧主要是对"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中哪个最严重的判定上。

刘强调夺取政权后干部面临的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主观主义的危险。在讨论了 1949 年以前党在克服错误方面取得的成绩之后，他指出这个历史经验表明：

> 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着重点是我加的）

刘也指出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列主义的锻炼，容易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11]

114

邓小平则不是强调党的新的任务，而是强调党的新的地位和由此而来的官僚主义危险。

>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7年，

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了这种考验……。但是，7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12]（着重点是我加的）

在中共的分析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害"如此密切相连，以致人们可能设想这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但是事实上，重点不同导致了政策规定上的特别重要的不同。

刘强调主观主义，认为反对它的办法是进行"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13]这主要意味着更加紧张的理论学习。他也强调实地调查研究对于纠正党的干部的"骄傲自满"的重要性[14]。这个错误很明显是官僚主义的反映，但刘在叙述党员的错误时从没提到这个词。

然而，邓对改变局势的办法却不同，这与他选择官僚主义而不是主观主义为"三害"中最危险的一害是一致的。

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15]（着重点是我加的）

刘和邓的政策建议的关键性区别在于批评应当来自何处？刘强调党组织和党员自己学习和改正缺点的重要性。对于他来说，

115

胜利的保证是重新强调集体领导和扩大党内民主生活。[16] 邓则是从另一方面强调监督特别是党外监督的必要性。

而且，这些差异不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刘还把党的干部的骄傲自满与某些政府官员的骄傲自满进行比较。就后者来说，刘把官僚主义作为其主要错误并详细论述了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怎样加强对政府机关的监督。然而，刘没提到党的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提出对他们的监督。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邓特别指出不论是政府还是党的干部都需要监督。

刘在讨论毛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首次阐明的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需要“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政策时，着重表示了上述不同。乍看起来，似乎只要在讨论这个政策时持赞成态度，就意味着接受党外人士监督共产党的原则。但是对刘来说，似乎并不是这样。他是在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而不是在党的领导部分中讨论这个政策的。他在说了共产党员是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之后，立即接着指出这些民主人士在国家机关中占据着重要职位。然后他又进而讨论了改进这些机关的各种办法。很清楚，刘赞同的不是对以党员身份而是对以国家官员身份出现的党员的监督。或者以另外的方式说，刘准备看到民主人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周政府中恰好是中共党员的官员的错误[17]。的确，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刘和彭真制订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八个常设委员会（在地方上均有分会）的计划。这些常设委员会将组成监督政府工作的全国最高监督系统[18]。但刘一点也没表示赞同民主人士批评党的专职干部的愿望[19]。而正是这样的愿望，促使毛在9个月后发动了整风运动。

116 刘少奇的观点反映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这个决议——很可能是彭真起草的（译按：原文如此），因为刘的报告中关于国家政治生活部分是他负责的（译按：原文如此）——强调

对国家机关监督的重要性，包括"更积极地鼓励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中的下级人员批评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方法（着重点是我加的）。[20]但是，在承认党员也可能滑向官僚主义的同时，(和刘不同）决议只说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21]（着重点是我加的)。很清楚，在党的体系中，不象在国家体系中，官员有权保持主动性。毛和邓使中共干部受非党人士批评和监督的努力没有实现。

第三节　加强群众路线

毛在政治决议中关于监督问题上所受的挫折由于在新党章中加强"群众路线"作用而部分地得到了补偿。毫无疑问，对1945年党章所作的这个特别显著的阐述是出于对党的官僚主义忧虑的结果。邓小平在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中指出：

> 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22]

邓也明确加强"群众路线"与对中共实行党外监督问题有着密切联系。

>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23]

什么是群众路线？按照邓的说法，它有两个方面，即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在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时给他们指导的责任——
117 人们可以称之为"无私服务"方面；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人们可以称之为"领导方法"方面[24]。邓引用毛 1943 年起草的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25]，把这种方法解释为将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自己的意见[26]。

邓说明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无私服务"是无效的：

> 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因此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27]。

邓在他的讲话中用了很大篇幅讲群众路线。他指出七大以后新党员大量涌入和 1945 年以来多年的斗争使得群众路线具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以此论证他的长篇解释是必要的[28]。第一个理由无可争辩，但第二个理由看来是掩饰对新党章中群众路线的"无私服务"和"领导方法"两个方面强调重点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出以毛、邓为一方和以刘少奇为另一方的不同观点。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新党章的讲话中，也以大量篇幅论述了群众路线，但他更着重于"无私服务"方面。他指出，为了彻底贯彻群众路线，某些"群众观点"必须灌输到每个党员的脑子里[29]。这些观点有四个：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完全负责；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向群众学习。只有第四条与群众路线的

领导方法方面有关。[30]

在刘少奇为之做过起草报告的 1945 年的党章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不是这样提的。在论述与人民关系的总纲中，——这里面没有出现“群众路线”这个词[31]——绝大部分是讲“无私服务”方面的。领导方法只是简短而间接地提到，而且只是在提到教育群众是和向他们学习一样重要时提到的：“每一个党员必须下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要不断地用革命精神教育他们以唤起和提高他们的觉悟。”[32]

118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强调[33]——已大大扩大了的）1956 年党章中详细论述“群众路线”的段落。它开始是讨论“领导方法”，只是后来以怀念 1945 年党章的措词讲到“无私服务”的重要性。而且“领导方法”被说成是中共胜利的关键。

> 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在分析和研究之后系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宣传推广，化为群众的意见。[34]

是什么促使 1945 年和 1956 年的党章对群众路线有不同的观点呢？为什么毛 1943 年提出的，刘 1945 年报告中认真论述了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方面没有写进 1945 年的党章？回答似乎是对先进政党作用的看法的根本不同。对刘来说，重点是党员应当无私地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这种纯洁的献身是它能正确地代表人民行动的最好保证。对毛来说，光有献身是不够的，特别是当党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要求不断地向正确思想的源泉——人民群众学习。认为这是正确行为的最可靠的保证。刘的态度有点精英统治论的味道，毛则有点民粹主义的味道。（译按：原文如此）

这些对立的态度说明了两人在对中共监督问题上的不同看

法，刘明显地感到一个无私的党的精华应该置于外部监督之上，党员可能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能够通过象学习马列主义这样的党内措施很好地改正；对于毛来说，监督却是深入群众的另一种方法。

119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党章中如此强调地重申毛的群众路线的观点？[35]他的地位本来应当使他象刘少奇一样成为先进政党的捍卫者。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关于八大选举新的领导的一章中谈到。

第四节　毛对政治决议不满意

文革期间，刘少奇在一份交待材料中透露毛对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中的某些句子不满意，但"没时间来修改，因而被这样通过了……"。[36]刘谈到的句子在下面这段中（不满的句子打了着重号）

> 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
> 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7]

刘没具体说出毛反对的是那些句子，但不可能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看法。毛在八大自己的讲话中就说，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中，中共“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38] 在1957年10月第三次全会的讲话中，毛又重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述。但他指出，“基本”不等于“完全”。政权问题已经解决，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但这些问题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他否认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样说是符合苏联的正统的。[39] 斯大林在

120 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剥削阶级消灭和阶级结构的变化。[40]

>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在缩小，也在消失。[41]

问题是斯大林主义者的正统不是毛主义者的正统。不到6个月前，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人重申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始终存在。[42] 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缺点仍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毛所批评的政治决议的那段话中，作了相反的论述：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译按：原文如此）。

毛的不满不是由于爱好教条地吹毛求疵引起的。两个提法的不同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政治决议明确指出中共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发展经济，政治结构不需要作进一步的改正。这反过来暗示中共不需要整风，毛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那篇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指出：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43]（着重点是我加的）

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44]——为毛要求中共进行整风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到八大时已有迹象表明毛已在考虑用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形式来防止中共走斯大林的道路，在一种相反的理论竟然写进象政治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时他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45]

121

可以想象政治决议中这段令人讨厌的段落是理论幼稚的产物。毛毕竟在10个月前在他的序言中就把生产问题放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他在八大开幕词中重申了它，甚至在他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6]（着重点是我加的）

但是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基本矛盾已改变了，只是说它的性质已从对抗性变为非对抗性。虽然在八大时，毛还没有详细阐述他的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为毛主义的基本观点提供了清楚的准则。

周恩来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报告中因为八大政治决议中

的那段令人讨厌的段落责备刘和陈伯达。假如王光美的话是可信的，即刘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决议，那么他所负的责任纯粹是形式上的，虽然他无疑会欢迎上层建筑不要进一步改革的理论提法。假如陈伯达实际上对此负有责任，那它有助于说明毛在决议公布之前不坚持审查决议。但是，一个在理论上和个人关系上这样接近毛的人怎能犯这样的错误呢？确实不是出于恶意，因为显然在其后多年陈还得到了毛对他的信任。人们只能设想，受过莫斯科培养的陈在这个重要场合感到有责任来描绘中国正在沿着苏联革命的道路走下去。

不管谁对此负有责任，很清楚，在这两个重要方面——即不强调对党的官员的监督和毛关于国内基本矛盾观点的变化，政治决议似乎打算阻止毛关于中共整风的任何要求。在党的主席能够在这个问题贯彻其意图之前就必须有一个匈牙利的暴动来促成事情的转化。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7页。
2. 我是根据《人民手册》的原文得出这一结论的。
3. 我没有把在党代会上对非党人士的欢迎掌声——毛在其讲话结束时极力寻求的——看作就是对统一战线的鼓掌。很显然，热烈的掌声大抵上只不过是礼节的一部分。要想从掌声中分辨出有多少成分是为非党人士的，有多少成分是为毛入座的，这是很困难的。但是，毛用这样的欢迎而不是用鼓舞人心的号召要求大会代表努力奋斗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一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他的讲话倒数第三段同他在七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53页）比较起来，象是更自然，更具有影响的演说。
4. 《人民手册》1957年，第9页。
5. 刘在1956年—1957年，曾在一些场合说中国应向苏联学习，为此他在

文革期间受到一系列的批判。参见《过去17年中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见《联合研究出版中心》932号，第16页、第25页）。然而，毛在他的八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页）不过，在私下里，毛看起来对苏联更多的是批评。有一个例子是毛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苏联经济策略的批评。另一个例子是，毛在1957年3月对教育部的批评，当时他说："这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如果是苏联的教育部，那么就把你们的机构废除"。(《高等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学批判》1967年，第2期，第11页）然而，毛即使这样说，也没有要完全拒绝苏联经验的意思，他只是指责不要盲目地照搬。1957年1月，匈牙利事件后，毛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中对各省的干部说："还是要学习苏联。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可学。要有选择地学，先进的，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错误的东西也要批判地学"。(《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84页)。

6. 见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09页；津纳主编：《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第126—142页。
7. 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91页。
8. 同上，第148页。
9. 见《解放军报》讨论这一决定的社论，1956年7月24日。
10. 见新华社从西南发回的报道(《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382号，第38页)。
1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00—101页。
12. 同上，第173页。

31. 实际上，"群众路线"这一短语在1945年的党章中没有出现过。

32. 《当代背景》417号，第35页。1956年的译文在第37页上。

3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76页。

34. 《当代背景》417号，第37页。

35. 见前文，第141页。由于一些西方观察家们已经认为刘和邓是同一类型的人，所以这一问题特别重要。如：见路易斯：《领袖、委员和官僚：文革的最后阶段中的中国政体》；何炳棣和邹谠著：《中国在危机中》第1卷，第2册，第465页。此书中他把1956年说成是"延安政治委员们没有分歧的一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36. 《刘少奇选集，1958—1967》，第367页。据认为，刘做的这一评论，意思是说，毛主席直到政治决议快要在会上通过时才看到决议的原文；那么的确，毛若在通过决议的前24小时看到了，他就能对不满意的段落进行改动。如果这一假定成立，那么对政治决议的审查过迟是由于毛还是由于毛所信任的陈伯达工作效率不高所致？

37. 《中国共产党第八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15—117页。

38. 同上，第7页。

39.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22—126页。

40. 斯大林：《列宁主义》（译按：原文如此）第564—567页。

41. 同上，第567页。

42. 见前文，第44—45页，及《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8页；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22—126页。生产关系是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一些人控制了生产资料，并雇用其他人去进行生产时，这种生产关系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见亨特（Hunt)：《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37—38页）。

4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0—281页。

44. 同上，第276页。

45. 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含蓄地否定了政治决议中的分析，而他在三中全会上讲话则更加明确地否定了这个分析。明确

的否定确实是始于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言，它可能在公开发表前作了修改)。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反右运动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强调阶级矛盾以前，毛就否定了这个理论公式。参见他 1957 年 4 月在华东局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 第 107 页。对毛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他本可以取得胜利，可是他却认为，公开修改决议将会连最微小的效果都得不到 (参阅前引书第 124 页)。

4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2页。

122

第十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节　发展速度问题

毛泽东在八大遭受的第二个挫折是在经济政策领域里，“跃进”式的发展被坚决拒绝了。这是周恩来和他的内阁成员在夏季成功地反对冒进的必然结果。周恩来在会上作的关于二五计划的报告，在速度问题上的唯一妥协是作了不冷不热的承诺，即“速度”应是“积极的”。周的报告充满了温和的，真正谨慎的精神，这是吸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教训的结果。按照周的说法，一共吸取了四个方面的主要教训：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能，而由年度计

划加以调整"。[1]（着重点是我加的）

周指出，1955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由于前两年农业欠收而缩减过多，因而导致钢材、木材、水泥的过剩。由于没有储备规划，钢材、水泥的剩余被出口，这就导致1956年这些材料的短缺。1956年的建设规模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定得过大"，而且急于求成，搞得各个经济部门很紧张。[2]今后必须一方面警惕急躁冒进，[3]另方面警惕裹足不前。[4]急躁冒进放在裹足不前之前当然不是偶然的，周概括他的观点说：

123

> 我们应当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5]（着重号是我加的）

周在论述从经验中得来的第二个教训时，再次批评了冒进：重要的是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有些部门和地方想要"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从而犯了错误[6]这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他旧事重提地强调了被搁置在一边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有害后果：

>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3年、5年甚至1年、2年内做完。[7]

周以1956年上半年的一个例子来批评另一倾向——过分强调某些重要工作，以致于损害了其它工作。他引证这年初对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高指标为例，指标一再修改，但仍然太高。结

果导致其它工程钢铁缺少。[8]

第三，周强调增加后备力量，健全储备制度的重要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样保持必要的储备对于补救平衡是必不可少的。[9]

最后，周认为虽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发展，但正确的财政计划也是重要的，在这里他似乎是给毛和陈云年初的争论作裁判。虽然他企图调和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但他明显是倒向陈云一边的。

>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做“财政框框”盲目反对”[10]（重点号是我加的）

124

周恩来有计划制定者们支持他。副总理李富春同样稳重，他说计划制定者的基本职责是“多了解些情况，看法要客观和全面，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掌握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全面完成我们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的工作。”[11]（着重点是我加的）

新任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发表关于投资和消费两者关系的个人意见时[12]，支持他的同事，他建议发展速度应低于1956年的速度。[13]

很清楚，毛泽东这时必须承认这个形势，在他唯一的涉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开幕词中，他讲要“一步步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

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14]。刘少奇政治报告中经济部分也反映了取得胜利的计划制定者们的观点。但他对周恩来的观点作了意义重大的修改，这表明刘少奇同毛泽东一样，不满意计划制定者们提出的速度。

对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周恩来除了转弯抹角地说了那一次以外，只谈到一次。在透露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主要指标时，他指出，它们的提出是建立在以下考虑的基础上的，"一方面，除了个别的地区以外，农业将会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按照《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广泛地采取各种增产的措施和推广各种增产的经验。同时，灌溉面积和耕地面积将会有所扩大，化学肥料的供应将会有所增加，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将会有所进步，这些，都将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5]

总之，周认为纲要是一个列入了各种旨在成功地提高产量的125 技术手段的文件，然而他接着警告，难于避免的自然灾害和垦荒的艰难，以及低水平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又使我们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要求有更高的速度。"[16]

但刘少奇仍然认为十二年纲要是一个直接明确产量目标的文件。[17] 他指出："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 1962 年，要求生产粮食 5000 亿斤左右……"[18]

换句话说，刘少奇认为计划指标应被视为完成十二年纲要规定产量的努力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虽然纲要可能已被搁置，但他，可能还有毛泽东，或许还有别的领导人并不愿意抛弃它。

此外，周恩来和刘少奇在提法上的分歧也反映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程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划的表述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人都认为已取得"巨大的"成功。[19] 但刘少奇与周恩来不

同，没有立即强调挫折。周说："我们的成功是巨大的，但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些不足和缺点，我们必须坚决改正。"[20] 刘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胜利，甚到我们的敌人都不能否认它……"。[21] 周的提法强调需要避免由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过于自满，言外之意是：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谨慎从事。刘少奇的提法不那么小心翼翼，暗示同志们不要成为怀疑论者。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提出的，并写在草案中的是：计划必须"是积极的和稳妥可靠的[22]，它规划的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23]。另一方面，刘少奇把发展的速度说成是"积极和稳妥可靠的"，但他在前面的一个段落里则将计划规定的发展速度说成是"巨大的和迅速的。[24] 在刘少奇的提法与计划制定者不同的后面，看来还存在着他对规划的发展速度太慢的批评，以及他暗示所喜欢看到那一种增长（巨大的和迅速的）。周的看法是，计划既要合理，又要有雄心。

126

周和刘在对十二年发展纲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评价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描述上的每一个分歧，如果孤立地看，可能仅仅只有细微的差别，但综合起来看，并联系人们对 1956 年冒进直到 1958 年大跃进的争论，它很可能意味着刘正在表露他对计划制定者们在 1956 年夏天放慢发展速度的不满[25]。换句话说，刘少奇似乎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虽然他和毛泽东一样，在这个阶段不得不接受了周恩来和计划制定者们的联合建议[26]。（译按：此处事实有误，原文如此）

第二节　各省关于 1956 年冒进的报告

周恩来和计划制定者们如果没有大量的证据使毛泽东和刘少奇确信他们是对的，就不能结束 1956 年的冒进，计划制定者们

的根据是各省党委书记们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些报告详述了经济冒进的影响。

受1956年整个生产高潮、特别是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举出来的。他指出，制定计划时，有层层盲目地提高粮食增产指标的情况。当时在省里粮食增产户指标定为16%，到了区乡普遍提高到40%左右。[27] 谭启龙代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指出，由于他们省在1953年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1956年省里领导要求农业超高和超快地增长，因而导致了非常大的浪费和损失。增长产量的运动使基层干部依靠命令主义。[28] 依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说法，他所在省的一些干部感到，合作化以后"社员的小辫子抓在我们手里，今后的事情好办了"他们不想去和群众一起商量事情，生怕卷入各类矛盾观点的旋涡中。"百姓百条心"是他们的习惯用语[29]。

127

江渭清举了急躁冒进的例子。生产计划订得过高，耕作制度改革要求过急，推广双轮双铧犁，扫除文盲等项工作，不从群众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领导机关把太多的责任压到合作社身上，使得干部们只能求助于命令主义。在一个村里，这些做法已引起了一起自杀事件，这样一来引起了全省对方法的讨论，结果是抛弃了乱戴帽子和滥扣工分的做法[30]。

在湖南，干部的合作化热情也急剧地高涨起来，按周小舟第一书记的说法，一些干部认为，既然合作社是一种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那么，"一切都要公有化"才行，甚至如织草鞋和捕虾等零星的家庭副业经营都统一归集体经营，社员的时间被非常严格地控制和完全由集体支配，以至他们中有一些人抱怨，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31]

在河北，第一书记林铁在报告中说，领导被生产高潮所鼓舞，企图很快地实现谷物自给自足，计划把粮食产量比过去提高

36.9%，这导致了掘井太快，而后，一些井被证明是废品；不恰当的密植在玉米生产中已产生不良后果；另外还在不适当的地区种植了种种高产作物。[32]

陕西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高指标的制定，使干部们忽视社员的健康和休息，一些干部甚至要社员"把月亮当电灯，把黑夜当白天"。按第一书记张德生的说法，合作化战役胜利以后，干部中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过高估计农民的热情，他们认为"只要想得到，便能做得到"。[33]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山东谭启龙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指出过分热情的危险性时，也感到必须在他同级面前预告几分带

128 玫瑰色的产量。直到9月29日，他还在预告，1956年谷物生产要增长11%、棉花生产要增长19%，而后来的情况证明，真正增长率只有8.8%和3%。[34]

其他省的书记们已经有了教训。陕西张德生说："我们认为：越是胜利就越需要谦虚谨慎，就越需要发扬民主，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越高，就越需要十分爱护和正确地发扬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张还批评了轻视农民经验的干部。[35]河北的林铁感到，应从省内那种过份热情的生产高潮中总结四个教训，人们不能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过高估计客观情况，当然人们也不应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冒进的计划如同右倾保守主义一样，同样影响农民增产的热情。上级的计划必须同下级结合，并允许下级留有迴旋的余地。技术改造应是逐步前进，不能一步求成，先进的经验必须在推广前与当地的经验相结合[36]。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1956年"冒进"不良后果的讨论可能是最全面的了。这些批评中有一些已被引证过。周的建议有：凡是不适合集体管理的全部回到个体经营；对社员自留土地要适当放宽一些；要改善劳动管理，使每个都有机动的余地；合理使用劳动力，避免工作负担增加太大；对妇女和体弱的

社员尤其要注意照顾；指标要因地因时制宜，充分考虑农村自然条件和习惯的差异。[37]

第一书记们注意到的1956年生产热潮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过分注重了粮食或经济作物的种植。周小舟把它称之为"简单化的倾向"已经严重影响了一部分农民的收入。在湖南，粮食紧张两年后，农民因食品而产生的忧虑使这种倾向增长了。周举了一个合作社的例子，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苎麻生产，但那里劳力和肥料都被集中于粮食生产上，导致苎麻减产了20%。周说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并强调了其重要性。他指出，在湖南山区，农民 129 收入的40%—50%是靠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取得的，在省内别的地方，这种比例也高达30%。[38]

在福建，按第一书记叶飞的说法，劳动、土地、肥料和资金都集中到增加粮食生产上去了，为完成粮食增产指标，限制了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一些地区甚至宣传这样的口号"种什么吃什么，种粮吃粮，烧砖吃砖"，批评想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思想"。结果果树、茶树砍掉去种地瓜，把砖窑平掉种粮食，福建的"建莲"莲田被改为稻田。因为忽视了山区情况，某些特产的产量还没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农村副业减产的情况在1956年上半年特别突出。生猪产量比1955年同期下降了20%，砖瓦减产了27%，鸡、鸭、蛋产量也下降了。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一些地方达到这样的程度，(在福建，粮食收入占全部农业收入的48%，经济作物占28%。副业生产占24%)，合作社农民没有零花钱，买黄烟都要向合作社借钱。因而引起副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影响了城市人民生活。叶飞引用了一些农民的牢骚，"去年是有钱买不到粮，今年是有粮没有钱买。"[39]

在四川，合作化引起了生猪以及中药原料等地方特产产量下降。但在讨论副业生产倒退时，李井泉还责备了商业政策。不合

理的价格，商业管理按照行政区划进行，对小贩活动的限制，打乱了商品过去的自然流通路线。[40]

但山东党的领导人谭启龙则为他的省没能集中力量抓粮食生产而优虑。他指出，山东每年每人消费180公斤粮食是低于全国水平的。他强调，增产粮食是山东党组织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41]。

130

第三节 各省对中央的经济要求

由各省党的书记们提供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证据支持了计划制订者们反对冒进的做法，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些书记们都完全同意中央经济当局的行动。他们的讲话中，很多都是要求关心他们省的建设问题的，看来书记们都已很清楚地知道，随着周恩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这是地方公开地向国家要资源来满足地方要求的适宜时机。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需要更多的钱修水库。谭启龙在论述了增加单位产量以解决山东粮食问题以后（1955年山东粮食亩产量为241斤），接着就强调水库和肥料的重要性。他说，省里能够发动群众去改进水利，但在同时，我们"希望中央水利部门对治理以上几条主要河流有关省与省间的统盘规划以及在技术、投资等问题上给我们以支援"。[42] 杨尚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提出相同的要求，请求中央拨款修建水库。[43] 当林铁在总结河北的海河问题时说："我们迫切希望、也深信会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44] 黑龙江省有特别的理由强调水库问题，因为年初松花江泛滥的灾害刚刚过去。由于第一书记欧阳钦集中谈了党的领导问题，另一个书记强晓初代表该省提出，他的省在灾后，已拟定了一个建设11个大小水库的计划，其中4个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他总结说：

为了作好根治松花江的工作，我们建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区、共同研究，全面规划，并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此项工作。[45]

中央要求山东省大量生产棉花，油料作物和烟叶，这引起了山东粮食生产的不景气，谭启龙为自己省说话：

我们认为，目前不宜过多过猛地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而应积极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着手……，因此，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规定种植计划时，不要限制过死，使我们能够根据国家需要与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46]

131

一些书记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海南区委第一书记张云在代表大会上说，每个人都同意开发岛上资源的必要性。他继续说：

不过问题还在于开发的时间，也就是大规模开发，迟些好，还是早些好。根据我们的看法，是早些开发的好。因为，很多特种经济作物，都是多年生的植物……因此，我们要求中央把大规模开发海南岛农业资源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47]

杨尚奎以感情和实际需要为理由，呼吁帮助江西。他指出，占全省2／3面积的老根据地和占全省1700万人口一半以上的老根据地人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横遭蹂躏，他们经常感到劳动力不足。他指出全省人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下降了1／4，单被屠杀的就达100万人。因而，江西鳏人、寡妇、孤儿和孤老在人口中的比例很高。总的说来，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低，在老根据地的首府瑞金，一年的实际收人仅有42元。烈、军属和鳏寡孤

独以前"依靠国家的救济维持生活，在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以后，应该主要从发展生产方面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是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五保户太多，社员背不起来。因此这类地方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然需要国家给予必要的救济补助"。杨承认，国家对江西已给予了特殊的照顾，但他提出，江西某些负担虽然减轻了，但另外一些负担又加重了。自 1951 年以来，江西的公粮负担每年都超过全国的平均负担率，"总的说来，老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是重了一些，以致引起了某些群众的不满，并影响了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48]

杨尚奎联合别的更边远和更闭塞省份的共产党负责人，如四川的李井泉[49]，福建的叶飞一起，要求中央重新考虑价格政策，要求对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民降低物价，以及提高对他们产品的收购价。

132

叶飞在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更关心福建能获得一些已列入规划的工业发展项目。他指出，1949 年以前，福建现代工业还不到全部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1%，全省甚至没有一个象样的工厂，日产 12 吨半的福州造纸厂就算是唯一的现代工业了。1949 年以后，虽然发展了一些小型的榨油、制糖、锯木和食品加工业，现代工业的比重已经发展到 11.32%，但福建相当多的木材、煤、铁、水和渔业等资源相对来说还没有开发出来。由于本地工业基础薄弱，地方发展工业的能力受到了限制，需要国家大力的支援。一些年来，中央有关各部已关心这些问题，但仍嫌不够，基本建设计划和财政预算上控制得太严太死，强调消极限制而没有给予积极的指导。他举了南平造纸厂的例子，由于对设计文件反复的审核，建厂规模经历了 8 次重大的改变，厂址已经迁移了 3 次，前后为时 6 年，直到 1955 年第 4 季度才正式施工。现在如果古田水利发电站第一期工程（现在还不能满足福州和南平地区用电的需要）不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工，那么计划

中的福建工业计划也将不能实现。“为此，我们要求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对福建应采取支持落后地区的办法给予帮助，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在福建办几个大型轻工业，完成古田第一期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工程，以便逐步地改变福建的经济落后面貌”。[50]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与叶飞不同，他主要从自己的力量出发而不是从弱势出发要求发展工业。虽然他也指出：“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北京不仅应该是政治中心和文化科学的中心，同时，也应该建设成为一个有相当的近代工 133 业的城市”。就象美国南部城市的市长想要吸引北部的工业家那样，刘列举了北京的优势。他指出，在首都有中国科学院，有中央各部的许多研究和设计机构，一些新的科技研究部门的建立将使更多的专家进入北京。除此之外，在各类高等院校中还有约10万名在学生和教师，充分发挥首都科学技术力量，必定会大大地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技术的水平和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我们认为，北京可以着重建设一部分精密机器和仪器工业”。刘仁指出，这些工厂可以在研究部门的帮助下，迅速掌握新技术和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革，而后者也能从理论联系实际中得到好处。刘还说，北京在附近的资源方面、在工业基础、交通运输方面，在气候、地质等自然条件方面，也都有比较适宜的条件。如果刘在发言之初不曾详细说明首都面临的困难问题，刘的论据可能会更有力些。北京自1949年以来，人口比原来增长了90%，另外政府部门无法下决心去决定工厂厂址和进行有关项目的互相协调。但他企图反驳建立更多的工厂会增加首都服务业紧张的意见。他说，如果想控制北京的人口，那就必须靠有计划地布局，而不是靠限制工业人口的增长。[51]

读了这些省委书记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们对中央当局无力很快地满足地方的要求，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甚至也不是一些严重缺乏自然资源，使得布

局问题格外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但在象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这些问题会因行政系统的规模大和办事低效率而更为复杂。

正是由于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才在当年早些时候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分权的要求。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迫切要求分权[52]。周恩来透露，已提出了一个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现正在传阅，征求意见。[53]但直到大跃进大大地削弱了计划制订者的权力，各省书记们放手大干时，分权的问题才真正地实行了。

134

第四节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问题

可能是为挽救毛泽东的面子，当年早些时候计划制订者们赢得的一个胜利在代表大会上被冲淡了。这就是沿海和内地工业发展的问题。李富春在他向代表的报告中谈及国家计委的错误时，仅承认："对沿海工业的充分、合理的利用注意得不够，"[54]这也仅仅是年初他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上承认的。刘少奇没有多谈这个问题，仅宣布"现在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协调上"，[55]周恩来也强调需要合理使用沿海工业，并在这个讲话中给合理性作了限定：

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56]

周的提法很清楚，他不是特别主张在沿海城市新建项目。实际上，从他提出必须考虑的诸因素来看，他是指沿海地区（例如已有许多工业企业的上海）不是新建企业最理想的地方。不过，他也没有排除在这里新建企业的可能性。

侵略的阴谋，但他没因此做出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防的结论，仅仅说必须保持警惕，联合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62] 陈毅在另外的场合论及中美过去7年的关系时指出，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坚决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但他并没有继续说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国防。[63]

其他在会上发言的元帅中（除去国防部长彭德怀）仅有国家136 副主席朱德支持陈毅的分析。美国正暴露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并正日益走向孤立。

> 这些情况就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当然，我们不能丧失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性，但是，只要我们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继续加强团结，并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而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那么，目前已经出现的国际形势的缓和，就有可能转变为持久的和平。[64]

那些曾在1955年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支持过彭德怀的元帅没有（他们在党的八大后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彭德怀在大会上几乎是在荒野中独自呼吁，他以人们熟悉的帝国主义可能背信弃义等为理由，要求大力加强国防：

> 为着保证实现我军战略防御的方针，抵抗帝国主义可能的突然袭击，几年来我军在国防前线和纵深战略要点进行了现代的国防工程建筑。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天不肯放弃侵略计划，我们的国防工程就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我们坚信，这种国防工程与掌握现代武器的人民军队相结合，任何敌人对我国发动的侵略，都不可能达到他们幻想的目的。[65]

彭在党减少国防开支的决议面前，不能提出要求更多的经费。但很清楚，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用游击作战而使用阵地和现代武器来保卫国家，那么在有把握可以抵抗美国人侵以前，更多的投资是必要的。毫不奇怪，彭德怀对国防支出和国家建设的关系的看法与计划制定者们的看法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国防是有赖于建设的。彭德怀则说："我国人民需要一个持久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应付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需要恰当地统一起来。因而我们既要抓紧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又要在军队的建设中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尽量节约，反对在军事建设上的浪费"。[66] 在彭的讲话里，他把军队的现代化放在经济发展之前，而不是依赖它。

彭的讲话几乎是孤掌难鸣，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他所作的分析类似于陈毅，可能陈的讲话和刘报告中的国际问题部分都是由周恩来的外交部起草的。[67] 关于台湾问题，刘和陈都谴责美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重申中国愿意在外长级进行和平谈判。[68] 陈和刘在这里都没说美国在台湾驻军是对大陆安全的威胁。但刘在由彭真起草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段落中谈到了台湾问题，在这一段话里，刘的确把美国驻兵台湾说成是对中国最严重的威胁。就在这个论断之前，刘还谈到了人民解放军，而他的语气与彭德怀相似而与陈毅不同：

137

> 进一步说，为了保卫我们国家，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国防，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警惕地保卫我们的边疆和沿海，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69]

刘少奇讲话的用词看来是经过谨慎选择的，暗示他同情彭德怀对削减防务经费的不满，以及对和平共处的怀疑[70]而又不偏离党的正式路线。把刘加强防务的要求和美军驻台是严重威胁的说法并列在一起，代表们很容易看出其因果联系。但刘少奇自己没提到这种联系。重要的是，虽然刘少奇在谈到要加强防务问题时与彭德怀的观点类似，但他没提"现代武器"，即尖端常规武器的问题。实际上，两个月以后，他推进了毛泽东关于核武器相对重要的路线。同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增设第三机械工业部，人们认为这是建立了一个负责核计划的政府部门。[71] 刘少奇怀疑常规武器的重要性：

> 我们现在已有了相当的国防工业，但它们是否有用是可以怀疑的，我们已经制造了许多飞机和大炮，花了许多经费，作了大量努力，但如将来它们丝毫无用，那我们今天是否在犯错误？[72]

刘被说成是表现了对核武器的盲目信任，但既然引不出任何刘的话来支持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假设，他可能只是重复毛泽东在他《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支持核武器的论述。总而言之，刘少奇在防御政策上是同意正式的毛泽东路线的，看起来他对彭德怀表示同情，大概是出于对彭要求从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欣赏。

138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72页。
2. 同上，第272—273页。
3. 这个词译成："impatience and rashness"（"急躁和草率"），同上，第274页；我用的是前面所选择的译法（见本书第101页）。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第274—275页。据后来透露，甚至十二年纲要文件本身也给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据195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1441号，第25页）说，农业发展纲要图解印了170万册，其中积压了120万册，严重地浪费了纸张，影响了其他书籍的出版。社论的标题是《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
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75页；参阅本书第90页。
9. 同上，第276—277页。
10. 同上，第278—279页。
11. 同上，第296页。
12. 《人民手册》1957年，第75页，第1栏。
13. 薄提出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应不低于或略高于20%。这与1955年的20.5%是一致的，但小于1954年的21.6%和1956年的22.8%。谈到实行这一数字的必然结果时，他主张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投资的主要来源）的比重，应略高于30%（1954年是32.4%，1955年是31.9%，1956年是31.5%），国家预算用于基本建设的比重，应略高于40%（这个数字虽比前几年有相当的增长，但大大的低于1956年的46.7%）。（薄一波的讲话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5—62页。）薄要削减基本建设投资的提议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参阅《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工交战线的恶霸薄一波》，《东方红》，1967年2月15日（《当代背景》878号，第6页）；参阅《两条路线斗争史》，《农业机械技术》，1968年第9期（《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33号，第5页）
14. 《人民手册》1957年，第9页。
1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辑，第298—299页。

16. 同上，第299页。

17. 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提出了1967年的产量指标，而不是产品指标，但这两者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参阅本书第28—29页。

1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64页。

19. 《人民手册》1957年，第14页，第1栏；第37页，第1栏。

2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64页。

21. 同上，第40页。

22. 《人民手册》1957年，第40页，第1栏；第59页，第1栏。

23. 同上，第41页，第1栏；第59页，第1栏；第63页，第2栏。

24. 同上，第15页，第1栏。

25. 本书第88页提到的周恩来对1956年反冒进问题的自我批评，可能是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大跃进已经发动时作的；参阅本书结语部分，本书第二卷《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8—1962》也将谈到这个问题。

26. 在195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刘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明年我们将不得不减慢下来。如此高速度的发展将会导致许多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史》关于中国的农机战线部分；《农业机械技术》1968年第9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33号，第5页）。

27.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日。

28. 同上，1956年9月29日。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1956年9月30日。

32. 同上，1956年9月20日。

33. 同上，1956年9月21日；张德生所描述的情绪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情绪的相似之处，在本书第二卷将更为明显。

34. 《人民日报》，1956年9月29日。

35. 同上，1956年9月21日。

36. 同上，1956年9月20日。

37. 同上，1956年9月30日。从这个讲话来看，周小舟在1959年成为大跃进的 4 个主要批评者之一，这似乎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本书第二卷将谈到这个问题。

38. 《人民日报》，1956年9月30日。

39. 同上，1956年10月1日。

40. 同上，1956年9月19日。

41. 同上，1956年9月29日。

42. 同上。

43. 同上，1956年9月30日。

44. 同上，1956年9月20日。

45.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期，第171页。

46. 《人民日报》，1956年9月29日。

47. 《人民日报》，1956年9月30日。

48. 同上。

49. 同上，1956年9月19日。

50. 同上，1956年10月1日。

51. 同上，1956年9月21日。

5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会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77—78页。

53. 同上，第310—312页。

54. 《人民手册》，1957年，第110页，第1栏。

5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51页。

56. 《人民手册》，1957年，第42页，第2栏。

57. 同上，第60页，第1栏。

58. 对有关的一些经济因素的讨论，参阅豪著：《中国城市的就业与经济增长，1949—1957》，第 148—149 页。

5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86—287页。西方国

家所找到的毛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的文本中，有毛号召把国防和行政费用逐步从32%减少到30%的内容（《当代背景》892号，第25页）；象本书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是印刷上的错误。

6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32页。
61. 同上，第2辑，第329页。
62. 同上，第340页。
63. 同上，第346页。
64. 同上，第12页。
65. 同上，第30页。
66. 同上，第31页。
67.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对我说，刘的报告中有关国际事务的部分，也有可能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
6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93—94页；第2辑，第345—347页。
69. 同上，第1辑，第84页。刘和彭德怀在文中使用"加强"这样的字眼，而计划决议则用"增强"。这是否有什么重要的区别还不清楚，但通常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
70. 可以想象，刘可能不喜欢和平共处政策带给周恩来的相当突出的声望。随着中国对外友好政策模式的不断形成，周恩来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所享有的声望，远远超过了他在中国孤立时所具有的声望。(同样，刘强调要分散政府的权力——这是完全有理的，因为毛也极力主张——刘这样做可能还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削弱周的政府机构，以加强党的机构的地位)。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访问中国，他为我们提供了周享有更大的声誉的一个有趣的例证。他在访华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每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有其伟大的人物，印度有圣雄甘地，苏联有列宁，中国有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第602号，第15页) 一个西方作家于1957年上半年访问中国，花了点精力了解中国

的情况。在谈到中国受人爱戴的英雄时，他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人"。(见卡梅伦所著《中国在微笑》，第 50 页)。

71. 有关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概况，参阅《人民手册》1957年，第 308 页。关于由这个新部承担这一任务的情况（这个部于 1958 年 2 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制造部)，参阅多尼索恩著:《中国经济体制》，第 128 页。

72. 参阅《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0页。这份资料没有提及第三机械工业制造部，只谈到成立了一个"国防管理机构"。

第十一章

139 新的中央领导人

八大会议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人。自从七大以来，党员从120万增至八大的1070万，因此，新的中央委员会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规模大这一点毫不奇怪了。它由97名正式中央委员（七大是44名）和73名候补中央委员（七大是33名）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了第一次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

1945年政治局的确切组成从未披露过，自从那时以来又有新的成员被选入。然而到八大召开时，当时的13名成员还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八大后政治局扩大到17名正式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1]

新的政治局反映了某些主要政治现实，即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在1955年任命的10名元帅中，有3名在七大时已经是政治局成员，[2]4名在八大后召开的新

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被增补进中央政治局，[3]这意味着4个野战军的所有指挥员现在都成了党的最高机构的正式成员。[4]2名老资格的负责经济计划的官员在七大时已是政治局的成员，[5]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又有3名进入了政治局，2名是正式委员，1名是候补委员。[6]

这样的党的机构并没有大量增加其政治局成员，仅仅增加了一名候补委员。[7]这也许是由于七大政治局已经基本上包含了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的党的官员中的大部分，虽然他们还兼有其它职务。不管怎样，八大后的政治局看起来是想在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之间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见附录6）在这个平衡之下，人们从它的每个成员的位置高低上可以发现这是当时政治趋势的一种反映。

140

第一节 邓小平的提升

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从上届政治局的最后一名上升到这届政治局的第六名。他还在新设立的6人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这时开始这个常委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但是邓小平的提升，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也许是他的头衔从秘书长变为总书记。

在毛泽东提升起来以前，总书记一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最高职位。当毛泽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战胜了他的对手时，他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总书记的职位。这个位置由张闻天担任，[8]毛泽东不得不满足于代替周恩来而成为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译按：原文如能，有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成为军委主席）。[9]据一份材料说，张闻天的位置是在1937年的晚些时候，共产国际因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之后被撤销的。共产国际宣布张闻天不

应该再继续担任总书记。[10] 据说毛泽东也就利用此机会废除了总书记这个职位。现在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的是书记处，而不是总书记。[11]

不管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下面这两件事情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在遵义，那时被认为是党内最重要职位的"总书记"被毛泽东的一个潜在的对手担任了；而在随后几年的某个时候，这个位置消失了。即使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席，但是那时，在组织上就再也没有任何组织上的位置能够支配他了。

到八大时，毛泽东从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对全党的领导比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时强大了不知多少。但是，如果恢复了总书记职位，并把它交给一个象刘少奇那样老资格的人来担任，这里显然仍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任职者可能成为和党的主席一样重要的人物。虽然，这时毛泽东是认为有必要建立起他的同僚的独立地位，但在他这时或以后的行为中，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他希望树立一个对手。他似已看出在他逐渐隐退时，刘少奇会继他之后走上高位的。

这样，由于毛对总书记职位的不愉快回忆，可以肯定处在这个重新设置的位置上的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就必然要比继承人低，而继承人是不可能向毛泽东挑战的。问题于是提出来了——为什么在 1954 年选邓小平为秘书长，[12] 并在二年之后升上总书记的位置？最自然的候选人本来应是彭真。(原文如此) 彭当时已是政治局成员之一，并且在党的组织工作中颇有经验，[13] 关于彭真的问题下面将要较充分地讨论，这里我只集中论述毛为什么会对邓怀有好感。

邓小平于 1904 年出生于四川，——这个省产生的第七届和第八届中央委员人数在全国仅次于湖南（这个省是毛和刘少奇出生的省）——邓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一个较大小组的成员之一。从这个组里面——它包括周恩来、李富春

和陈毅——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参加了这个组织。他负责出版团的刊物工作。他的工作效率很高，结果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在法国的6年期间（1920—1925）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在莫斯科呆了几个月。在返回中国后，于1930年最终进入毛的江西根据地以前，他在祖国各地为党工作。邓参加了1934年—1935年的长征，并在30年代末期担任了刘伯承部队的政治委员，在整个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国内战争期间，他一直和刘伯承在一起。他参加了对于战胜国民党具有重要意义的淮海战役。刘的第二野战军最终接管了中国的西南，邓成为西南局党的第一书记，这个局以他的家乡为基地。在1952年年中，邓调到北京出任副总理。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了四名副总理，直至1954年根据新宪法重新调整政府，邓小平是这段期间内唯一被增补者[14]。1953年9月邓代替薄一波而担任了财政部长，但9个月之后，即在被任命为秘书长不久后他离开了这一职位。正是以秘书长的身份，他才得以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会议上作关于清除高岗和饶漱石出党的报告。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和林彪）被选入政治局。[15]

邓的能力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他性格果断精干。有一次，一个钦佩他的省级领导干部说他“真聪明”，解决大的问题往往只用几个字。[16]这个特点在文化革命中被陈伯达攻击为没有恰当的调

142·

查就武断决定。[17]一个美国人伊万斯·卡尔逊在延安时期曾会见过邓，他把邓描绘为“矮胖结实，思维敏捷。一天下午，我们就整个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在一起交谈，他的消息灵通使我感到吃惊。”[18]甚至陈伯达也不得不承认邓给人的印象确实是知识渊博。[19]有趣的是，在邓当了总书记之后，那些在西方观察家中已经传播的关于邓小平的看法10年之后大部分被陈伯达所证实。英国剧场指挥米夏伊尔·克拉福特在1956年11月会见了邓小平，他得出了和卡尔逊相似的看法。克拉福特说邓是一个精干、

坚定、能言善辩的人，他的个子即使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说也是矮的，人们估计他是60岁，但他看起来要年轻20岁。[20]

克拉福特报道说："据说，他好争论……，西方观察家认为，他的影响现在已经超过了周恩来。"[21]在文化革命期间，陈伯达指责"邓小平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想让总理听他的。和邓小平讨论问题真和登天一样难。"[22]

显然，邓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是在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中有许多强有力的人，值得考虑的是，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在50年代中期如此突然和如此绝对地超过他的同时代人。

邓在30年代中期曾和毛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是那时少数与毛观点一致的人之一——他们是哪些人，研究那个时期的作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可以有理由认为是毛的亲密者之一。与毛思想一致的人是毛的兄弟毛泽覃，古柏（这二人在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林彪，谭震林，陈正人，邓子恢和邓小平。[23]1933年，当毛的战略思想被他的反对者在与"罗明路线"作斗争的幌子下批判时，邓小平和毛泽覃一起，也遭到批判。[24]邓小平和毛的兄弟关系非常密切，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尽办法把他俩说成毫无关系。[25]但是周恩来证实了他们的密切联系，并且证明了邓小平在这个时期的卓越功绩。[26]

143

我们已经看到，当毛的亲信之一邓子恢在合作化问题上与他意见相悖时，毛转过来求助于另外二人——另一个江西同事陈正人和在延安时期跟随了他的陈伯达。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谭震林被提拔主管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在1959年对毛的批评被击退后，他的国防部长职位被毛的另一个密友林彪代替了。而当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它的主要受惠者是林彪、陈伯达和毛的妻子江青。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说毛永远不会和他所最信任的合作者闹翻。从1955年的邓子恢到1971年的林彪，许多这样的人，包括

邓小平，都被打倒在一边。但是毛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于他愿意既往不咎，并能和各种各样的人一道工作，包括从前的敌人。上面的事实证明，他象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喜欢让经过长期考验的同事来担任特别重要的责任。

因此，下面这种假设看起来是合乎情理的，即那时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这一具有很大潜在力量的职位与邓小平和毛泽东过去的老交情很有关系。这个假设可以解释其它许多事情——为什么邓小平在八大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比别人的评价高得多？为什么邓与刘不同，在群众路线问题上采取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邓的批评主要是个人方面的，即对他个人忠诚的反叛，[27] 而对刘少奇的批评却是一个同僚犯错误；为什么邓小平被官方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当权派(刘是第一号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攻击不仅比刘少奇少得多，而且甚至比他级别低的人还少得多？[28]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中第一个被平反的。

如果毛确实对邓的提升有责任，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毛是否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保留了余地。[29] 新闻界出版的党的重要会议的图片似乎是为了强调甚至夸大了邓的位置。[30]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从 1954 年邓任秘书长到八大召开时为止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全国有 15 个省委的高层领导作了明显的变动。可以作为对照的是从 1956 年八大召开后到 50 年代末期的三年零三个月中只有 5 个省委有变动，而在 60 年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随后 6 年中有 13 个省委发生了变动。[31]……[32]……[33] 第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显然是彭真和安子文准备的，据说他们是偏袒刘少奇的追随者的。[34]

144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大上邓小平谴责了在刘少奇和他的同事主持下吸收党员的工作。刘没有批评吸收政策，而强调了“绝大多数党员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这个事实，即使是

在1949年后的条件下被吸收入党的党员也同样如此。[35]他仅仅承认大多数新党员还没有获得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36]邓承认大多数党员是在完备的手续下被接收的，也承认在群众革命斗争吸收的党员的质量是有保证的。然而他批评了吸收方法，认为在"许多场合"造成了错误。[37]他继续指出：

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38]

邓还批评了党的机构一度没有看到从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的重要性。[39]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披露出，毛在1950年6月即已指示吸收更多的产业工人入党，而刘少奇和安子文却有违毛的

145 这个目标。[40]……[41]

第二节　彭真遭受挫折

彭真是在八大后作为书记处中邓小平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出现的，显然，这是拥有极大权力的职位。不过他本来可以有理由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也许邓小平一旦在1954年被任命为秘书长，彭就失去了出任总书记职位的希望。但是他还可能被提名为副总书记，据说是刘少奇（这点可以理解的）和邓（这点不那么可靠）认为他应被授予那个头衔。[42]……[43]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彭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55年的秋天，他从政治局的第11号位上（紧靠于二个新成员林彪和邓小平之上）升到第七位，（仅在五个大人物之下——毛、刘、周、朱德和陈云，康生是第六）。在1956年初的一个短时间内，他被排在康生之上，居第六位。[44]在八大主席团名单上——这个名单与上届政治局人选一样，——他仍然是在第七位上，但

是在八大的政治局中他下降到第十位，以前比他地位低的邓小平和林彪上升到了他之上，党的二个老资格人物刘伯承、董必武恢复了在他之上的地位。为什么显然完全有希望进人政治局常委会的彭降了下来？他为什么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讲话？[45]（他肯定不是负责这次代表大会的，因为他既不是秘书处成员，也不是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46]可以想象他是由于与林彪的持续10年之久的争执而遭受此挫折的。[47]据说，彭和安子文在八大上试图以林彪不活跃为理由而把他排除出中央的领导。[48]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毛和邓想通过在书记处总书记和他的主要承办人之间建立一个地位上的明显的差距，来巩固邓新取得的位置。

146　　再进一步的可能是毛生气了，因为彭当时就非常希望毛早些退居二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引证彭在1956年8月举行的北京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总有一天老演员应该退出舞台。[49]这非常可能是影射毛的；但是鉴于几个月以后，毛也使用了同样的比喻，彭也许仅仅是要他的官员做好毛隐退的思想准备。有人引用了彭真在八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的一次讲话："主席的话不是绝对的最后结论……。"[50]然而在这里，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1956年的气氛不是1966年的气氛，1966年时，主席的每一个字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彭的评论可能是毛批准的一个运动的一部分，即想使中共逐渐减少对他的创始人物的依赖。

刘和彭二人在一起工作，密切配合已有20年了，在文化大革命的争论中也总是彭而不是邓小平被人说成是刘的集团中的主要追随者的头目。一则评论说："刘少奇和彭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每次他出国前，总要通过电话和彭谈话，或派人找彭来商议，或者他自己亲自乘车去彭的家中。"[51]而邓小平却是一个与毛有关系的人。他的任命，将导致重要的政治后果。……

第三节　彭德怀、康生和张闻天的降级

其他前政治局成员的地位遭受了比彭真更严重的打击。在那个时候，国防部长彭德怀蒙受的打击是一件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林彪元帅提升得比他高得多，这证实了1954年9月在政府任命副总理的名单中林彪的地位比彭德怀高的印象：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是毛）认为公开建立这个印象是重要的，尽管林彪看起来并不活跃，但是他的地位比彭德怀高。

147

彭德怀担任政治局委员可能有11年了，也许是21年。[52]他遭受的曲折更多。3名政治局新成员都高居于他之上。其中两名是元帅——罗荣桓和陈毅，他们象林彪一样，都曾经是他的部下。第三名是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考虑到1955——1956年关于国防费用的争论，这一任命的意义显然是更大的。这些变动的直接结果是破坏了彭德怀作为国家军队中第二号人物（仅在朱德之后）的地位，并且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比国防更重要。

彭德怀遭受的挫折不仅是因为他与毛、周和李富春关于国防费用的意见不一致，而且由于是他建议从党章上删掉"毛泽东思想。"——虽然毛对此很难有明确的表示。公开的、更正当的理由也许是彭在指挥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53]。彭德怀似乎确信他和毛的关系是他从朝鲜返回后变坏的。据说，他在1953年之后的某个时候曾说：

> 我老了，失去了主席的喜爱，我对主席再不重要了。年轻的人已经上来，我不能挡住他们的路。我已经推翻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已经实现了我毕生的愿望。我可以解甲归田了。如果我不受喜欢，那就随便吧。[54]

"年轻的"，彭也许指的是林彪，1954年年底到1955年年初，林彪在政府和党组织内提升很快。同样，林的提升部分地也许是由于毛不满意彭的结果。特别是正象后来所指控的那样，彭曾在1953年与高岗有所接触。[55] 彭与毛另一个意见分歧之点是，彭强调在现代化武器方面中国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56] 不管这种种原因怎样，很清楚的是，彭德怀这颗星是从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始殒落的……[57]

148

尽管受到挫折，彭德怀仍设法以党在国防方面的首席发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毕竟不只是国防部长，而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58] 但是受过更严厉的降职处分的康生和张闻天则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这两件事肯定是相关的[59]。康生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原因不详。自共产党执政以来，他显然扮演的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不过导致他降职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在共产党阵营中普遍掀起的对秘密警察的反感。[60]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以毛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忠诚者的面目出现，这一事实说明，他和陈伯达一样，能同主席有长期的私人关系。如果的确如此，在八大上毛使康生不致受到更大的屈辱的说法就不是不着边际的了。毛与康生之间究竟有什么紧密关系是难以弄清的。可能性之一，正是作为中央社会部（党的保卫部门首脑的康生，在40年代初整风运动期间向毛提供了借以鉴别干部忠实程度的材料。在同"留学生"（康生的同学）中象王明那样的对手的斗争里，康生作为一个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对毛也许极其有用。至于张闻天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明显的直接原因。不过尽管张闻天曾一度（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61] 对毛有用，却也一直是毛的对手，而且大概从未取得主席的充分信任。实际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夸大了张闻天的实际权力和影响。他虽然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却未获准向代表大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当1958年初周恩来放弃外长职务时，继任的是陈

毅，而不是张闻天。有可能张闻天在政治局被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承认他在遵义帮助毛的历史性作用。也许张闻天会觉得他应当受到更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外交部被陈毅超过后。若确是如此，那么在1959年批评大跃进的时候，他和彭德怀一样，可能也部分地是由于个人的"怨恨"（译按：原文如此）。[62]

注释：

1. 有关这两个政治局组成的具体情况，参阅本书附录6，第165页。
2. 朱德、彭德怀、林彪。
3. 罗荣桓、陈毅、刘伯承、贺龙。
4. 他们是贺龙（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第二野战军）、陈毅（第三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
5. 周恩来、陈云。
6. 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被任命为副总理的）。
7. 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8. 见郭华伦著书第3卷第23—26页；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载《中国季刊》1969年10—12月号，第20页。
9. 见郭华伦著书，引文同前。
10. 见郭华伦所著书第3卷，第326—328页。
11. 同上，第340页。
12. 不清楚的是，邓的这个职务是从别人手中接管过来，还是到此时才重新设立的。有份材料提出这个职务从20年代起就有，但到40年代就没有了；参阅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有关邓的传记，第823页。
13. 据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第715、716页，彭真在40年代初和1949至1952年两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文革期间的一份材料说，彭真在1950年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再次?）；参阅《刘少奇制定和推行反革命

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事记》资料专集，1968年11月，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4号第12页。

14. 周恩来很可能是根据毛的提议而提名邓小平为副总理的，本节将谈到毛此举的原因。同样的原因可能也适用于1954年任命林彪为副总理并排在彭德怀的前面。参阅本章第3节。

15. 上述这些传记式的材料来源于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第2卷。如果邓把他的提升归因于毛的话，那么对他来说走运的是，1954年他在通往总书记职务的路上采取了最重要的步骤；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有点处于守势，如果邓不是已经有效地工作了两年多的话，毛也许不能使他所提名的人成为总书记。

16. 《彻底揭露、批判和清除刘、邓、彭、薄及其黑走狗在辽宁工交战线散布的流毒》，《辽联战报》1967年7月21日，第1页。唱赞歌的官员是黄火青，他先后任天津和辽宁的第一书记。

17.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5页。

18. 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252页。邓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可能是在留法6年期间里培养起来的。

19. 《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第5页。

20. 见克罗夫特所著书，第251页。

21. 同上，第250页。

22. 《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第5页。这个评述还有一个稍为不同的译文，这个译文使周总理看上去对邓甚至更有帮助。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揪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推行者陶铸》，《革命工人报》1967年1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67号，第2页)。

23. 参阅郭华伦所著书第2卷第435、489—496、497—502、502—504、504—508页；罗所著书，第249、258—259页；萧所著书，第240、242、245—246页；陈所著书：《毛和中国革命》，第178页。

24. 参阅郭华伦所著书第2卷第493—497页；罗所著书，第258—259页。

25. 参阅《揭开邓小平反革命活动的盖子》，《新北大》1967年4月18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32号，第6页〕；《邓小平反革命罪恶史》第一册，《人大三红》1967年8月10日，第4页，第2栏。

26. 参阅《周总理谈为什么必须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红战报》1967年11月29日〔联合出版中心（华盛顿）档案，第44574号，第28页〕。

27. 参阅毛1966年10月24日讲话时对邓的评价（《当代背景》892号，第38页）。

28. 我是根据我所收集的各种材料作出这个评价的。

29. 刘在40年代初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内幕仍然是不清楚的。其中的一种可能是，这是他在一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所得到的报酬。他允诺要把毛树立成为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理论家（一如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做的那样）。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在这之前，刘还不是毛的热心的追随者。（参阅斯图尔特·R·施拉姆所著：《毛泽东与刘少奇 1939—1969》，载《亚洲评论》1972年4月号，第278—281页）

据周恩来说，毛主席直到1964—1965年才最后决定不让刘当接班人（《周总理对刘少奇的批判》，《文革通讯》1967年10月9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60号，第9—10页）。但是，鉴于毛、刘两人之间的某些根本分歧（例如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以及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反对毛（最近的是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毛主席可能早在1956年就想重新安排接班人。这看起来确是林彪地位上升的背景：林1954年9月当上排在第二位的副总理，1955年3月进入政治局（译按：原文如此，有误。林彪是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1956年9月在政治局中仅次于政治局常委，1958年5月任政治局常委——当时普遍认为他有病，很少在公众中露面。邓小平的提升也可以借此加以说明，特别是如果林彪的健康状况太差，难以指望他作

可靠接班人的话。

30. 参阅本书作者写的《论照片》，《中国季刊》1971年4—6月号。

31. 这里所作的比较是根据戴维斯所著《大陆中国的地方党员，1956—1966》第67页的附录。

32. 1954—1955年饶漱石和高岗一起被清洗。在他被贬黜以前，他与刘少奇有多次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参阅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第408—411页中有关他的传记。

33. 安子文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叛徒"集团中的一员。1936年他们为了能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而签署了自首书。他们这样做是根据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的命令，因为刘希望由此能给华北局补充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刘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批准。参阅《打倒大叛徒集团的老板刘少奇》，《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出版）1967年3月8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82号，第25—38页)。从1946年起，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参阅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第4页。

34. 参阅《彭真反革命集团与刘邓的黑关系》，《新北大》1967年6月10日，第4页，第3栏。

3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95页。

36. 同上，第101页。

37. 同上，第215页。

38. 同上。

39. 同上。

40. 《刘少奇制订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事记》，《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46号，第12页。

41. 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央领导召集一次会议，讨论那些在30年代为了从敌人的监狱中释放出来而公开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的身份问题（参阅前注第33)。虽然这些人与刘少奇有关，而且其中包括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但邓小平没有什么特别

的理由要为这些人开脱。(参阅前引书，第 14 页)。参阅《逮捕大叛徒王鹤寿》,《新钢院》1967 年 5 月 6 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188 号，第 20 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论战中，把党的组织工作中的阴谋活动主要归罪于刘少奇和安子文。而邓作为当时党的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却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攻击，这也许表明，邓在管理党务方面的作法，不那么令毛反感。

据引文说，1957年刘少奇与毛的一个未注明日期的指示唱反调，指示安子文让那些自首分子重新入党。毛的指示是，除了那些表现极坏者，其他所有的自首分子都可以宽大处理，但不得重新入党。这些引文表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与安子文这样的人无关，因为他们已经回到党内许多年。但是，毛的指示可能是在 40 年代或者甚至 30 年代作出的，因而事情的真相难以进一步澄清。(参阅《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 34 页)

42. 参阅《彭真反革命集团与刘邓的关系》,《新北大》1967年6月10日，第 4 页，第 2 栏；参阅有关彭真的档案材料，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概览》(补遗) 27 号，第 37 页。

43. 《新北大》，引文同前，刘少奇在1966年说，彭真常常被邀请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参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中国大陆杂志选》653 号，第 15 页)。另一份材料说，在某些时候，彭真"被派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但在什么时候，和担任何种职务则没有公开说明；参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刘邓陶联络站"，东方红公社，中国科技大学，红代会 1967 年 6 月 10 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39 号，第 18 页)。

44. 这是一段很特殊的情节。就回忆所及，在高岗倒台以前，政治局委员的排列顺序是：毛、刘、周、朱德、陈云、高岗、康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彭真。把高岗清除出政治局以后，在这个名单的后面增加了林彪和邓小平。到 1955 年秋，彭真移到第 7 位，排在

林伯渠的前面。没有明显的理由作出这一变动。1956年2月28日，彭真第一次排在康生之前，这个顺序在2月29日和3月2日再次出现。

3月13日晚上11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波兰驻华使馆，对波兰领导人贝鲁特的逝世表示哀悼。他们这么晚才来，表明他们是刚刚才听到消息，并立即赶来的。次日早上，《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午夜访问时，又把彭真排在康生之后。然而一天以后，《人民日报》不仅把彭真、而且把彭德怀排在康生之前。在随后的6周里，康生继续受到这种怠慢，在各种场合里都排在彭真、彭德怀、董必武、甚至在张闻天之后。这种排列最后一次出现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新华社5月8日发表的一条报道中，康生又排在前列，居第6位，仅次于陈云。直到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康生仍保持这个位置。

我们能从上述情况中看到什么呢？首先很有趣的一点是，当康生仅排在彭真之后时（即2月28日至3月2日），邓小平正在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康生在3月14日《人民日报》上短暂地恢复原来的位置，这是邓回国后政治局委员的第一次顺序排列。恢复一直被公认的政治局委员的排列顺序，可能是根据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邓小平的命令。由于贝鲁特的逝世突如其来，政治局委员又是在深夜召集起来的，因此政治局委员的排列顺序是临时决定的，邓和彭真之间没有多少协商的机会。

假若事情真是如此，那么在政治局委员排列名单于3月15日见报之前，彭真可能向邓作了简短的汇报。然而，在这个名单中也把彭德怀、以及随后又把其他政治局委员排在康生之前，这就意味深长地改变了这些地位。起初给人们的印象是，彭真（并且只有他一人）被提到康生之前，观察家们可能会认为，彭真因为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表现积极而得到了报偿。但是，当其他领导人也排到康生之前时，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彭真因其功劳而被提升，而是康生由于其错误而被降低了地位。

在5月1日以后恢复原来的排列顺序，这可能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在4

月底进行讨论以后的结果。可能做出了决定，降级要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45. 没有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的原政治局委员还有康生、张闻天（其地位下降甚于彭真），林彪（他没有发言的原因似乎可以用长期患病来解释）。

46. 参阅前注第44。

47. 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1945到1946年期间，彭真在东北与林彪发生冲突，并被调离东北，而且1954年彭真为此向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提交了一份检讨。（参阅《大叛徒、大党阀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档案》，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概览》27号，第36页）彭真离开东北可能与他批评苏联当时在满州的行为也有关系（参阅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第555页有关林枫的传记）。

48. 《彭真反革命集团与刘邓之间的黑关系》，《新北大》1967年6月10日，第4页，第3栏。

49. 《彭真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北京日报》，1967年6月10日，第8页，第2栏。

50. 同上，第3栏，据说彭真在1956年曾宣称："从今以后我不会盲目相信任何人，不管是谁；我要独立思考"（同上，第2栏）。

51. 《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第38页。在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中，还提到彭真与刘少奇的关系的地方，不胜枚举。

52. 参阅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书中有关彭的传记。

53. 参阅：《彭德怀案件》，第195—197页。彭似乎不理睬毛关于1951年5月第5次战役的战略部署。毛的儿子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死去的。

54. 同上，第198页。

55. 同上，第199页。

56. 同上，第217页。

57. 本书第2卷将谈到这个问题。

58. 《彭德怀案件》，第197页。

邓还从报告里找出3条引文，说明他是怎样赞许苏共对个人崇拜的攻击的。事实上，正如下面的对比表明的那样，他的言论并没有超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评价，而大家知道，后者是经毛认可的。

邓："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3]

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4]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5]

150

邓："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7]

这些引自邓小平报告中被认为是指摘性的话，其原来的上下文和摘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相应引文的上下文一样，显然是想表明，在中国有个人崇拜，但是发生在下层领导

人之中，正是毛本人一贯同它作斗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在交待中用了上述引文，但他既不想分析自己的“罪责”，也不坦白其动机。他只简单地承认曾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些话，就好象他知道别人指责他的是什么，于是便罗列成段引文来使交待能过关。[8] 注意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谈到邓的报告所说的话，是有意思的。他只是说，报告反映了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反对态度（这是实在话，但算不上是谴责），并不打算实指邓的个人责任。[9]

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不仅列举邓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来攻击他，还贬低他肯定毛的那些话。一份“批判”材料绝口不提邓提倡学习毛的著作，却只说他“基本不提‘毛泽东思想’”[10] 同一材料表现出，为了给邓的报告抹黑，歪曲是多么地必不可缺少。它说，邓“有四次极为勉强地提到毛主席，但却三次宣扬和赞美刘少奇”。[11] 事实上，邓 7 次提到毛（包括提到他的著作），而且是象上面所说那样，以肯定的、有时是高度颂扬的字眼提到的。另一方面，邓提到刘时却不是同人们所说的那种颂扬的话。

邓第一次提到刘是这样讲的：“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12] 这次提到刘少奇，是要说明邓的报告的主题与刘涉及的范围有何不同。在稍后，邓说：“关于〔新党章的〕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13] 实际上这又是在避免重复。邓提到刘少奇，只有一次可算作是对他的颂扬。话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都作了精辟的解释。”[14] 尽管这段文字同时赞颂了毛和刘，但要说这头半句是“极为勉强”地讲出来的，后半句才有“宣扬和赞美”的意图，这要有怎样的敏锐力才分辨得出来啊！

151

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企图证明，邓的报告是反毛的，所遇到的困难还可以由其公然改写报告的一段来说明。据说邓的报告的开头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从1945年起，只是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从1953年起，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工作和任务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示。"[15]（着重号是我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这样的："从我们党在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11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国人民，在不过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3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16]

注释：

1. 《邓小平自白书》，第5—6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92页，邓的自白书中的全部引文都与报告原文有细小的区别，但这没有改变引文的意思。我所使用的是1956年报告中有关章节的正式译文。
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8、149页。
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00页。
5. 《共产党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5页。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01页。
7. 《共产党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8页。

8. 邓所提到的这些段落，也包括在那本批判他的报告的小册子《何其毒也》之中(《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208 号，第 1 页)。参阅《邓小平是苏修的同路人》，《反修战报》1967 年 7 月 8 日，第 3 页，第 1 栏。在后一份材料中，引自邓的报告的引文，被认为是邓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而且把隔开的两段合为一段引文。可以想象，后一份材料并没有搞错，邓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就在高级领导人的会议上把报告预讲了一次。
9. 参阅《周总理谈为什么必须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红战报》196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出版中心（华盛顿）档案，第 44574 号，第 30 页）。
10. 《何其毒也》、《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208号，第7页。
11. 同上。
1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71页。
13. 同上，第175页。
14. 同上，第176页。
15. 《中林东方红》("中南林学院东方红")，1967年7月1日，第4页，第3栏。
16. 《人民手册》1957年，第26页。

152

附录 3　中国领导层的"一线"、"二线"

中国最高领导层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毛透露出来的。"依我看来，有件事 17 年来一直没有妥善解决。起初，为了国家安全并且鉴于苏联在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上的教训，我们提出了第一线和第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其他同志在第一线。"[1] 在另一次讲话里，毛详述了设立一、二线的第二个原因："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有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想到走

线，毛在第二线。毛把常委分成一、二线同设立书记处联系起来谈，并不意味着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尽管如此，这意味着两者是有联系的。的确，一个有较大权力的书记处的设立，会使党更好地自立。

还有证据表明，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毛就着手准备退居二线，这就是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里关于名誉主席的规定。唯一能担任这一职务的，只能是毛。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退到这个位置上，定会既使继承人得以接过中国共产党主席那令人敬畏的职务，又不致正式地彻底剥夺毛在领导层里的最高位置。

翌年初，毛对众多的与会者明白地暗示了他的打算。毛这次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是在1957年2月27日讲的，据一位听过讲话录音的中国工商业者说[8]，毛"把自己比作一个相当著名的戏剧里的主角，但是他说他现在年事已高，不能胜任这个主角了；他暗示，他也许会很快卸任，去做一个配角"。[9]

154

就在这个月，在彭真主持下起草了国家宪法的修改草案，它包括这样一个规定：任何人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不得超过一届。[10] 这个修改案从来没通过，甚至也未公布过。1958年2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正式透露他要从国家主席职位上退下来的打算时，曾指出放弃这次修改案的原因：党希望为在紧急情况下使毛有可能重新出任该职留有余地。"六十条"指出："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

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1]

似乎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狂热的"大跃进"[12]的头一年，就毛即将去职展开过广泛的讨论，毛却明确坚持自己的打算。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同意在1959年毛的任期届满时，不再提名由毛担任国家主席。提出的理由是使他得以集中精力通盘考虑政策和理论问题，对他的健康状况只字未提。[13]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他在略先于这次人大会议举行的党的七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我认为，正是在这时或在此前后，毛正式退居二线。

155 毛本人提供了一条证据。文化大革命中，他说："邓小平从不找我商量。从1959年起，他没找我商量过一件事。"[14]这个抱怨并未提出邓（不这样做）的借口，但可能是由于他认为毛从此不再要人和他商量，因为他已退居二线了。

文化大革命中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日期：

> 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利用毛主席退居二线的机会，一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
> "成为国家主席以后，刘少奇经常说，他非常忙，他的责任很重，他被责成掌管国家的全部事务。王光美甚至对她的孩子们说："爸爸很忙，没时间休息。毛主席现在已经不管国家的具体事务了，把这些事全交给你们的父亲了。你们不要打搅他。"[15]

这清楚地证明，毛是1959年4月退居二线的。为了强调刘

的地位上升，中宣部发出指示，从这年起，每年国庆节，报纸上应当并排刊登同样大小的毛、刘画像。[16]

可能毛这时也打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按照1956年修改的党章规定，应于1961年召开）上，从党的主席退任名誉主席。结果，第九次代表大会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才举行。但有一个重要的证据表明，毛的地位的进一步变化的确在60年代初曾发生过。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说："1963年，一线和二线的问题提了出来，主席退到二线。这是一项组织措施，可是，邓以为现在他有了全部权力。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然而，刘、邓二人利用毛主席休养之机，在下层推行错误路线。"[17]（着重号是我加的）这是否就是计划中的毛的隐退即他任名誉主席的开始？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上面提到邓误解了隐退的含义，这句话是否是说，原来的意图是把毛之后的最高领导权一分为二，由刘担任国家主席，由邓在党这一方面居于更强有力的地位？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的第三卷里予以更为充分地讨论。

156

不过可以认为在1962年初刘在七千人大会的表现之后，毛就对刘作为接班人不那么热情了。有一些克里姆林宫式的证据表明，1962年秋中共十中全会以后，不管增加邓的权力原来的计划如何，结果却大相径庭。

注释：

1. 参阅1966年10月25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思想万岁》(《当代背景》891号，第75页)。
2. 引自1966年10月24日在"报告会"上的讲话（同上，第71页）。
3. 参阅康库斯特所著《苏联的权力和政治》，第10章和伦纳德所著《斯大林以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94页。中国领导人在马林科夫的倒台中起过某种作用，这不是不可能的。彭德怀曾受到谴责，说他在1954年9月讨好赫鲁晓夫。此外，据说："由于彭德怀与赫鲁的勾结，苏联

原来打算派马林科夫率代表团来华（庆祝国庆5周年），后来却派出了赫鲁晓夫为首的代表团"（《彭德怀案件》，第199—200页）。

4. 《毛泽东思想万岁》（《当代背景》891号，第71页）。

5. 如同在中国内战时期一样，在朝鲜战争期间（即多派别时期），可能作出了一些应急安排，以防中国领导层发生分裂。毛在提到"国家安全"时所指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参阅本书第152页）。

6.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0页。我写出这句话的汉语拼音，因为《当代背景》891号第75页上关于这句话的译文是不准确的。第二句的中文原文是："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的……"。

7.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次以后，他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8. 这篇讲话在1957年6月发表前已作了修改。参阅本书第5部分。

9. 罗与伊文斯所著书，第221—222页。穆福深（音）所著书第166页的注释1，证实了罗的报告。

10. 参阅《三反分子彭真档案材料（1957—1958）》，《东方红报》1967年8月8日，第2页，第2栏。虽然发表这个材料是为了显示彭真的反毛行为，但人们不能完全按其字面意义去接受它。彭真曾全面负责政法事务，不管宪法修改部分是不是他提议的，他都有可能被指派负责宪法修改工作。（刘少奇在1966年列举了彭的职责，但从彭的活动来看，他在1956年就承担这些职责。参阅《刘少奇反动言论》，《中国大陆杂志概览》（补遗）·25号，第33—34页）。

11. 英译文见《当代背景》892号，第13页。

12. 要求全国干部群众象讨论六十条那样，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毛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

    这表明早先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实行。（参阅《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88页）。

13. 同上，第487—488页。

14. 引自他在1966年10月24日的讲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当代背

录》891号，第71页)。

15. 《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的反革命一生》(北京，北京第四人民医院井冈山战斗兵团翻印，1967年5月)，《当代背景》834号，第18页。

16. 参阅《新闻战线的重大政治斗争——前中宣部是怎样为"刘家王朝"吹喇叭的》，《新闻战线》1967年6月30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3号，第32页)。

17.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6页)。这段引文有一个更简短的说法载于《革命工人报》1967年1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67号，第2页)。

18. 参阅我著《论照片》，《中国季刊》1971年4—5月号，第300—301页。

157

附录4 提到毛泽东讲话的情况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该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只在其讲话开头提到毛的讲话者，列入"+毛"一栏；未提及者，列入"—毛"一栏。字母"C"和"P"表示这些委员截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在中央任职，还是在各省任职，或者由于政治或健康原因离职。

"1"表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表示非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表示文化大革命前已被清洗的中央委员；"4"表示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出前去世的中央委员，在八大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后不久召开的八次中央全会上选入政治局的委员，姓名用大字标出(此处暂以△代替——译者)。

158 浏览一下这两列名单，就会看出第八章所作结论有一些问题。例如，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提出的证据和说法表明，柯庆施自1957年整风运动的艰难之时直至逝世，一直是毛的积极支持者。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没有提到毛，这是否意味着毛还没有把他完全争取过来？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解释？董必武至少

从30年代中期起就和毛一直配合，为什么他在讲话开头也不提毛？对于蔡畅，也可以提出类似问题。她是李富春（他支持毛）的夫人，也是毛的密友之一、革命烈士蔡和森的妹妹。

尽管有这些疑问，数字肯定还是有意义的。在提到毛的12位中央官员中，7名（占58.3%）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里复出；在没有提到毛的18位中央官员里，也有7名保留下来，但只占38.8%。合计，22名中央和各省官员提到毛，9名留任（占40.9%）；32名中央和各省官员未提到毛，10名留任，只占31.2%。结论必然是，未在八大上表态赞同毛的讲话，这一失策很可能被主席，当然还有某些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看作是很要紧的一次怠慢，因为它正好发生在对毛的地位问题十分敏感的时期。

+毛		−毛	
张德生	P^4	张仲良	P^2
△陈　毅	C^1	章　蕴	C^2
△陈　云	C^1	陈漫远	C^2
江　华	P^2	贾拓夫	C^3
蒋南翔	C^2	周小舟	P^3
江渭清	P^2	周　扬	C^2
钱　瑛	P^2	△朱　德	C^1
△李富春	C^1	谢觉哉	C^1
△李先念	C^1	谢富治	C^1
李立三	P^2	黄　敬	C^4
李维汉	C^3	黄火青	P^2
林　铁	P^2	△柯庆施	P^4
欧阳钦	P^2	奎　璧	P^2
赛福鼎	P^1	赖若愚	C^4
谭　政	C^3	△李井泉	P^2

+毛

姓名	类别	注
陶　铸	C^2	〔注1〕
陶鲁茄	P^2	
滕代远	C^1	
邓颖超 （周恩来夫人）	C^1	
曾　山	C^1	
王恩茂	P^1	
王鹤寿	P^2	
王任重	C^2	〔注1〕
吴玉章	C^4	

-毛

姓名	类别	注
李雪峰	C^1	〔注1〕
林　枫	C^2	
△林伯渠	C^4	
刘　仁	C^2	
刘澜涛	P^2	
罗瑞卿	C^3	〔注2〕
△彭德怀	C^3	
△薄一波	C^2	
宋任穷	P^2	
谭启龙	P^1	
邓子恢	C^1	
蔡　畅 （李富春夫人）	C^1	
曾希圣	P^2	
△董必武	C^1	
△乌兰夫	P^2	
王首道	P^1	
吴芝圃	P^1	
吴　德	C^1	〔注1〕
姚依林	C^2	
叶季壮	C^4	
叶　飞	P^2	

〔注1〕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调入中央工作。

〔注2〕　对罗瑞卿的清洗，发生在文化革命前夕还是在其开始，还值得商榷。在同一篇讲话里，毛既提到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1月之前（大约是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算起），又说它开始于5、6月间（即在他的1966年10月25日讲话前5个月，大约是从1966

年6月4日《人民日报》透露彭真下台时算起)。(见CB891，76页)

注释:

1. 我十分感谢唐纳德·克莱因在准备本附录方面所给予我的帮助。

160

附录5 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刘少奇报告的攻击

文化大革命中加给刘少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最严重的罪名，大概就是他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并为国内资本家"涂脂抹粉"。其实，这些指控是站不住脚的。下面的话是红卫兵小报经常引用的:

>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1]
>
>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2]
>
>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3]

把上述引文同毛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里的若干段落对照一下。下面是从毛的讲话中引出的："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

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

这两段文字里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刘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毛说还没有解决。这（译按：还没解决的说法）也许代表了毛在 1956 年 9 月的看法，但不能肯定这一点。在 1956 年毛的讲话里，没有任何话表明他当时即是这样认为的。事实完全相反。1955 年 12 月，毛断言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保证”。一个月之后，周恩来也确认这仍然是他的观点。若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毛已改变了看法，他的开幕词是向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感到喜悦的干部们发出警告的一个适当时机：即使是现在，最后的胜利属谁的问题仍未解决。

161

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直到 1957 年 6 月才发表，这时的政治形势已有了急剧的变化。如上所述，一般说来，拿这篇讲话同 1956 年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所作的报告相比较，原则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 1957 年初夏的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发生以后，刘少奇也会同意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最重要的是，应当始终记住，毛本人也承认他曾赞同过刘的报告。如果说亲自修改报告中涉及主席本人地位的部分对他来说是为难的话，他要提出不能过分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势，则是轻而易举的。

刘说，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除个别地区外）作为阶级已被消灭；毛说，这些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要说两种提法有重大的区别是不值得认真争论的，因为，毛也说这些阶级本身是“已被推翻了的”。

从刘的报告里，可以引出一些话证明他对国内政局并不满意；而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也能引出另一些话说明他对国内政局感到乐观。

例如，刘少奇在讲了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话之后，又以谨慎的措辞补充说："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5] 在这段话之前，他还强调过阶级斗争会继续

162 下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指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6] 刘也预见到在工商业国有化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会长期继续下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7] 刘还告诫大会代表，不能以为同反革命的斗争结束了："……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实是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8]

对毛来说，即使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之后，也是有理由对国内形势抱乐观态度的。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第一部分，开始时就强调已经取得的胜利："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我国的6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9]（着重号是我加的）就在毛发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警告之前的一段话里，还肯定了阶级斗争形势的好转："在我

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10]

文化大革命中，刘为其1956年报告分辩时，引用了一段话，想证明他的确提到了阶级斗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和'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11]

163

在刘辩护性的引文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引文有一部分不准确，而最主要的是，他竟漏掉了会给他以强有力的证明的一段话。正确的原文如下："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1950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1952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12]（着重号是我加的）除了词句上一些不大重要的改变外，交待里这段引文最主要的错误是把1950年反对资产阶级投机倒把活动的运动同1951年8月开始的、在党政干部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3]明显等同起来。刘在原来的报告并未把"三反"运动列为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这是正确的。

在交待中漏掉了用着重号标出的文字，这却是很要紧的，因为就在那段辩护的引文之后，刘在交待中承认，他在报告中宣称"我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14]显然，这样的

说法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论述的否定。如果要谴责刘少奇的话，就必须删去报告中对国内主要阶级矛盾的分析，而且也确是这样做了。但是，刘为什么要在原先的报告里说这样相互矛盾的话呢？答案是，他没有讲过矛盾解决了的话。我在刘的八大报告里始终未找到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的话。[15] 相反，他指出，这种矛盾至少将存在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6] 依照国家的赎买政策，这种改造至少在 12 年内不会完成。

164 刘在 1967 年的交待里为什么出现上述错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记错了。虽然在 11 年之后对此未必能留下多少印象（估计未向他提供报告的文本），但要说刘竟忘记了"三反"运动[17] 的性质，似乎是难以置信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刘竟会忘记 1956 年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

如果刘对这份交待确实能完全负责的话，可以假设，他故意地误引自己的话，间接地嘲弄那些强加于他的罪名[18]。另一种可能是，他只得在一份由红卫兵授意写成的交待上签名，这些人年纪太轻，不可能记得"三反"运动不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或许是，刘写出的引文本来都是准确的，却被散发交待的人改掉了。

有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在能指控刘在 1956 年曾作出基本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的论断之前，严重的曲解是必要的。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5页。
2. 同上，第37页。
3. 同上，第82页，用这些引文反对刘的例子，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62 号，第 3 页；（补遗）173 号，第 4、5 页；（补遗）180 号，第 12 页。
4.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8页，用这些话

来反对刘的例子，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3号，第4、5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37页。

6. 同上，第30页。

7. 同上，第72页。

8. 同上，第83页。

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75页。

10. 同上，第288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常用来攻击刘的是他在1956年7月13日同外宾的一段讲话："在中国，大规模的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难以搞破坏，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参阅《刘少奇对人民商杨的资产阶级实行投降主义的改造路线的罪行》(《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19号，第69页)。

11. 这份交代翻印在《保定红卫兵》1967年8月5日，第3页上。

1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32—33页。

13. 参阅巴尼特著：《共产党中国》，第132页；参阅罗斯托等著：《共产党中国的前景》，第78—80页。

14. 《保定红卫兵》，引文同上。

15. 在关于刘的报告的决议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15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这个论断的重要意义已在前面作过分析（参阅本书第119—121页）；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刘的报告中并没有这个论断。

1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33—36页。

17. 刘这份交代的英译文（见《刘少奇选集，1958—1967》和《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年春季版第77页），引错了刘的话，显得更荒唐，这些译文用"——"代替了"……"，从而表明正是刘说了"三反"、"五反"运动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18. 刘写这份交待，是为了回答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

义》一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责难。戚本禹文章的英译文见《北京周报》1967第15期，第5—15页。有趣的是，戚本禹没有伪造引语加罪于刘。他指控刘的这个问题（从上下文所引刘的自白中的几段话已作了回答）不过是："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同上，第15页）

附录6 政治局

八大以前		主要任职机关〔1〕
1. 毛泽东	中共中央主席	
2. 刘少奇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P
3. 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G
4. 朱　德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A
5. 陈　云		G
6. 康　生		P
7. 彭　真		P
8. 董必武		G/P
9. 林伯渠		G
10. 张闻天		G
11. 彭德怀		A
12. 林　彪		A
13. 邓小平	秘书长	P

八大以后			主要任职机关[1]	文化革命后[2]
1. 毛泽东	中共中央主席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PSC
2. 刘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		P	O
3. 周恩来			G	PSC
4. 朱　德			A	P
5. 陈　云			G	CC
6. 邓小平	总书记		P	O
7. 林　彪			A	PSC
8. 林伯渠			G	—
9. 董必武			G/P	P
10. 彭　真			P	O
11. 罗荣桓			A	—
12. 陈　毅			A	CC
13. 李富春			G	CC
14. 彭德怀			A	φ
15. 刘伯承			A	P
16. 贺　龙			A	O
17. 李先念			G	P
1. 乌兰夫	候补委员		P	O
2. 张闻天			G	φ
3. 陆定一			P	O
4. 陈伯达			P	PSC
5. 康　生			P	PSC
6. 薄一波			G	O

〔1〕A 代表解放军；G 代表政府；P 代表党。许多政治局委员有不少兼职；大多数元帅不再担任实际工作。这张表仅作为权力结构组成部分的粗略指南，政治局委员们或在这些部门任职，或可估计他们关心这些部门。

请注意：在这一时期，所有的副总理都是政治局成员，唯有邓子恢是个例外，估计他是因为合作化问题上的保守主义受到了处分。

〔2〕PSC代表政治局常委会；P代表政治局；CC代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表示文化大革命前已逝世；φ表示文化大革命前被清洗；O表示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

第三编

整风运动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的影响

第一节　东欧的危机

怎样改造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和波兹南暴乱后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被及时地提了出来，因为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就是为了别的原因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也是可能和需要的。的确，1957年整风前的形势与1942年—1944年[1]整风前的形势明显地相似。广义的说，两者都是处在统一战线时期，即中共在寻求非共产党力量的支持。在1942年是为了反对日本人和国民党，在1956年是为了发展国家。为了得到这种支持，整顿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必要的，[2]简言之，教育他们更好地对待非党人士。在这一点上，中国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八大表明，在方式上他们存在着分歧。是仅限于

党内的积极思想教育，还是邀请党外人士对党的干部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呢？东欧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个决定更为关键，从而也加剧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1956年，当波兰和匈牙利在非斯大林化的影响下，开始大胆说话时，中国人是同情他们要求从苏联控制下获得自由的。他们在20年代和30年受到共产国际干涉的经历使他们确信苏共在处理外国革命的事务中是无能的。他们获得政权后与斯大林相处的经验也有助于理解东欧各国政府的怨恨。[3]

在八大时，毛把苏联的米高扬和波兰的爱德华·奥哈布这些兄弟代表团放在一起来会见，并清楚地表明他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要求。的确，毛故意怠慢米高扬，以致苏联代表团当天就飞离中国，而不是按惯例等到代表大会结束。[4] 毛在与奥哈布谈话中，也表示同情哥穆尔卡，这位波兰领导人在1949年被开除出党，1956年8月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骚乱中恢复了党籍。[5]

170

10月19日早晨波兰共产党在华沙召开全会。哥穆尔卡和别的被清洗掉的领导人被吸收参加会议。波兰的主要斯大林主义者和哥穆尔卡的长期对手希拉里·明克这时已被解除了职务。同时宣布苏联任命的元帅罗科蒙夫斯基将不再被选入政治局。[6] 这些事件惊动了苏联领导人，10月19日派出由赫鲁晓夫率领的强大的代表团到达华沙，企图对想使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的新的自由主义领导人先发制人。代表团的干预失败，于20日清早离开波兰。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演说，21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里他当选为第一书记。在波兰和平的“十月革命”后不久，10月23日，匈牙利暴乱开始，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要求苏联军队撤走和举行自由选举。当示威的领导者试图要求广播他们的要求时，发生了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外的流血事件。[7]

当第一批匈牙利人死去时，刘少奇肯定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就波兰事件交换意见。[8]10月23日，毛与苏驻华大使交换意见，大概主要又是谈波兰事件。[9]中国领导人希望阻止苏联采取轻率的行为对付波兰，特别是防止苏联的武装干涉，如果苏联曾这样考虑过的话。[10]苏联领导人起草苏联政府10月30日声明中关于巩固苏联与别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诸原则时，一定与刘少奇商量过。[11]中国在11月1日就发表一个政府声明表示他们赞成苏联的声明，这个速度暗示他们事先是知道苏联人要说些什么的。[12]

171 中国人支持波兰，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共产党都有权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是执政党，就有权管理自己的国家。但是虽然他们赞成独立，中国人却不准备同意破坏共产主义体系或者是分裂阵营的团结。当在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纳吉宣布他的政府希望离开华沙条约组织表明正是这样时，中国人就放弃了他们谨慎支持匈牙利人的态度，而支持苏联人侵镇压反抗了。[13]

匈牙利反抗和它的被苏军镇压，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人混乱，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退党。[14]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讲话，支持苏联第二次入侵，认为这是保卫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方法。但他激烈地批评对形势处理的不当，这种处理方式使人侵成为必要。[15]更重要的是，他把波兰、匈牙利事件归罪于斯大林主义的恶劣影响，说"个人崇拜的根源是官僚机构、领导方法中的所谓个人决断及无视劳动群众作用和愿望。[16]

11月10日—15日八届中央委员会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当前形势和中国对于苏伊士运河、波兰、匈牙利的政策的报告，大概刘讲了最近他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他强调在苏联领导下，加强阵营团结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17]不能肯定是否在这时中国领导人有了更深卷人东欧事件的意图。[18]但在全会期间，毛告诉大部分中国领

导人，[19] 他日益关心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所做所为，毛说：

>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20]（着重点是我加的）

172

这时毛未必曾向苏联领导人表示他不同意和平过渡理论。中国人后来说他们曾“在与苏共同志内部讨论”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讨论的日期。鉴于中国人用“同志”和“领导同志”两称呼的细微区别，人们应该假定他们还没有直接把这个问题向苏共政治局成员提出过。[21] 中国人后来也声称他们没有对苏共二十大错误作公开批评，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在利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困难，需要团结。他们也希望苏联领导人会看到自己道路的错误。但中国人解释说，刘少奇在八大讲话中讨论中国革命教训就是表明，“和平过渡”的理论是错误的，行不通的。[22] 事实上，仔细阅读刘少奇讲话的有关段落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并不是象他们后来所说的那样有决然的态度。[23] 当然，即使刘谈论中共夺取政权道路是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理论的谨慎指责，这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在与苏共“领导同志”的私下讨论中没有提出这件事。

但是在二中全会后的几周里，中国领导人一定感到他们最紧迫的责任不是批评苏共已经犯的错误，而是使错误的后果不再进一步恶化。因此，在 12 月 29 日，他们发表了反驳铁托普拉讲话的文章，题目是《再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4] 在 1 月

初，周恩来中断了他对亚洲的访问，出访苏联、波兰、匈牙利，这成为中国“维护苏共威信所做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25]

第二节　中国反驳铁托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论点，即斯大林功大于过。但这时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处理。自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9个月以来，一种认为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的观点，在铁托的促进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应该重新评价斯大林所处的社会制度。中国人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反驳这种论断的方法就是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共产主义国家里可能存在着矛盾，可能会因为某个领袖，如斯大林这样的人，忽视这些矛盾或是处理不当，而使之激化。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国家里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处理不当能够使之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文章中说：

173

> 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不良好的事件。[26]

中国人坚持认为，缺点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制度的“某些环节”。[27]

文章总结了苏联的经验为其它共产党提供的基本教训。这些教训的第二条是，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28]即使中国人还没有对苏联领导人提出他们不相

信“和平过渡”的理论，但在这篇文章最终是一个明确的公开表示。

在文章中提出了另外三个重要问题，这些都与中国下一年政策的发展有关。第一，在文章的开头讨论矛盾时，中国人清楚地提出了“非对抗性”矛盾可能产生于“人民内部”。[29] 他们认为这些矛盾中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这是重申，以苏联为一边和波兰、匈牙利及别的共产党国家为另一边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中第一次断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和人民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30] 这个概念后来成为1957年整风的基础，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反驳。[31]

文章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它没有告诫人们只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不同于前一篇文章的。在铁托和别的一些人对苏联体制提出疑问以后，中国人指出相反的危险，即修正主义的危险，文章说：

> 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32]。(着重点是我加的)

174

但是虽然中国人现在对修正主义的危险有了警惕，他们仍然认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33] 的确，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教条主义仍然被认为是比修正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虽然后来企图把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

第三方面，文章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后

来几年尖锐抨击苏联共产党的根据。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纯说明性的段落之后，他们直率地说"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接着说：

> 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34]

第三节　邓小平解释中国的立场

1957年元月某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解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35] 他必须为这篇文章作辩护，以反对那种认为文章不批评苏联的主张。邓说："我们对苏联基本上是满意的"[36]。况且，已经有了很多对于苏联的批评了，似乎并不需要中国人来增加更多的批评了。共产主义阵营需要一个领导者，只有苏联才有充任这个角色的巨大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37] 关于斯大林，邓只简单重复了中国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的公开批评——斯大林在国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这种阶级斗争本来应该是被消灭的。[38]

尽管事实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抨击铁托的，但是邓依然认为南斯拉夫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标准的[39]。他甚至对铁托的观点比《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更能容忍，只要铁托的观点不被用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40]

175

有趣的是，邓小平似乎并不认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世界共运会有巨大的影响，他告诫清华的听众：

不要绝对地相信和夸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作用，你们不能指望每个人心悦诚服，不要指望这篇文章一发表，它的影响就遍及整个国际社会。[41]

第四节　周恩来的东欧之行

即使邓小平正确地怀疑了中国声明的影响力，但是1957年元月周恩来访问东欧则具有历史性意义。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纯欧洲的事务中扮演重要的外交角色。俄国人可能对必须邀请中国介入欧洲的事务感到不快，但是因为他们的威信低落，不得不依靠中国人的威信来支持他们的立场。

周中断了他对亚洲国家的访问，去访问两个发生问题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他的目的大概是用他灵活的外交手腕和个人魅力来贯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主张。但是他的成功是很有限的。元月11日周到达华沙机场，他说到苏联时，仍将它看成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者[42]，但是在最后他与西伦凯维茨总理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没有提到领导问题[43]。公报甚至没有提到苏联干涉匈牙利，就更不用说支持这次干涉了。公报仅仅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在那里的干涉，支持新的卡达尔政府[44]。公报并没有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那样暗示，帝国主义干涉是暴乱的原因。

周乐意在中国人认为是关键的问题上妥协，这部分是由于中国相信新任的波兰领导人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人肯定对他说正式对苏联领导人表示服从，在当前波兰的气候下并不可取。但是更重要是，中波联合公报表明，毛并不认为来自修正主义的危险已经大到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的程度。

176

周对波兰的访问持续了大半个星期，但对匈牙利只做了一个仓促短暂的访问，头天到达，次日离开，这表明他的主要任务是

调解波苏之间的矛盾，在匈牙利他只是表示支持卡达尔的政权，这通过短暂的停留就可以完成。非常可能中国人对波兰新领导人的支持超过对匈牙利新领导人的支持，仅仅因为波兰人更会处理他们国内的事务和他们与苏联的关系；就会使中国人这样做。卡达尔毕竟是完全依靠苏军支持的，而这种政权中国人是不喜欢的。[45]

周以与苏共的会谈结束他弥合关系的访问。在会谈中，他再一次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46]。在他访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表明，俄国人感谢他在东欧的调解，但是俄国人并不准备接受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提出的对集团内分歧的理论解释。这篇文章主张毛的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能包括共产党国家之间及各党之间的矛盾。公报的提法是完全不同的。

>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即使在过去这些关系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那么在当前他们也正在改进和消除。[47]

这就进一步表明，苏联不喜欢毛在二十大后提出的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注释：

1. 对1942年—1944年整风运动的分析，参阅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1942—1944》的序言。
2. 整风的中文全称是"整顿作风"，通常省略为"整风"。
3. 参阅1962年9月毛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英译文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1969冬季号，第88—89页；参阅他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华盛顿）档案

50792 号(《毛主席文选》, 第二部分, 第 48 页)

4. 扎戈里亚所著书第55—56页描述了这个遭遇事件, 他的材料来自刘易斯。刘易斯和她的丈夫,《纽约时报》的西德基·哥鲁森, 他们当时是驻华沙记者。

中国报刊没有报道米高扬离开中国的消息, 这一疏漏是颇具意味的。米高扬在 9 月 17 日的大会上讲了话, 但是没有出席中共在 9 月 21 日为兄弟党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他大概就是在这期间离开的。但塔斯社的报道则说他在 9 月 24 日回到莫斯科(《世界广播概要》(第一部分: 苏联) 764 号, 1965 年 9 月, 第 27 页)。因为与米高扬一道走的还有与他一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副团长、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来自乌兹别克的穆希金诺夫, 所以米高扬可能在回国途中到位于苏联中亚的几个共和国参观。看来同米高扬一起离开中国的不仅有穆希金诺夫, 而且还有代表团中所有从苏联来的成员, 因为在 9 月 21 日招待会上代表苏联方面致词的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在苏联代表团的 6 名成员中, 仅排在第 5 位。

米高扬必定对他在中国所受的待遇感到特别生气, 因为他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 曾称毛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并且对中国寻找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表示赞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 1 辑, 第 14、15 页)。

周恩来显然在10月1日再次向仍在北京的苏共代表团成员提出斯大林问题 (参阅《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第 64 页)。

5. 参阅扎戈里亚所著书, 关于哥穆尔卡复职公报, 参阅津纳所著书第187页。

6. 同上, 第196页; 伦纳德所著书, 第222页。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 但于 1919 年参加苏俄红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苏联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战后他是驻波兰苏军的司令, 1949 年正式转入波兰军队。他成为波兰国防部长、总司令、副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参阅 S·V·尤特其著:《俄罗斯凡人简传》, 第 461 页)。

7. 关于苏波会谈公报、哥穆尔卡的讲话以及全会的决议，参阅津纳所著书，第196—257页。苏联代表团包括"自由分子"米高扬和"斯大林分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参阅伦纳德所著书第223页；关于10月23日事件的文件记录，参阅拉托基所著书，第47—57页。

8. 中国方面在1963年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披露，1956年10月刘曾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参阅《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在10月份头3个星期里，刘几乎每天都在北京露面。10月22日清晨，刘在北京机场送走了印度国会代表团（《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当天晚上，他没有出席毛为欢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举行的招待会（同上）。直到11月6日为止，报界也没有报道他参加北京任何集会的消息。看来很可能的是，在送别印度国会代表团后，刘乘飞机赴莫斯科。

   如周在10月1日所做的那样，刘也乘机提出斯大林问题，批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没有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随着东欧的局势出现危机，刘以一种("我们不是告诉过你们吧")姿态强调了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正确方针。(刘和周对苏联领导人谈话的简短引语，参阅《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

9. 同上。这份材料只是引述了毛对苏共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批评，但是召见苏联大使似乎不可能仅仅为了让他再听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当时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中国的立场都是十分清楚的。由于北京与布达佩斯之间的时差，毛极不可能谈到匈牙利的局势。布达佩斯的示威游行是从下午3点开始的，直到下午10点30分才发生暴乱，这时北京时间已是10月24日（参阅拉斯基：《匈牙利革命》，第48、53页）。

10. 参阅扎戈里亚所著书，第56—57页。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中国方面说："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大国沙

实际上在苏联领导人"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9页）的时候，他们一直坚持这种主张。关于中国对匈牙利叛乱的报道和评论，参阅《关于匈牙利的报道：让中国公众了解的匈牙利革命》。

然而，象A·M·哈尔彭指出的那样，10月30日苏联发表的声明(中国11月1日的声明称它是"正确的"）说，如果匈牙利要求的话，苏联政府同意把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还说，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谈判驻扎苏军的问题（哈尔彭所著书，第5章)。如果中国在11月1日的声明中认为这是"正当的"，那么很可能只是在纳吉宣布中立以后，中国才最后改变看法。雅克·莱韦斯克博士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新华社在发表11月1日中国的声明3小时以后，对此作出了一个更正：在暗示不赞成苏联对1948年—1949年的南斯拉夫问题、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处理的文句后，删去"匈牙利"3字。莱韦斯克指出，这个突然的改动，必定是由于收到了纳吉政府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的情报引起的，这些情报是所有驻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在纳吉政府作出公开声明以前送来的（参阅雅克·莱韦斯克著：《中苏冲突与东欧》第45—47页；我感谢斯图尔特·施拉姆使我注意到（莱韦斯克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国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纳吉的声明是对更多的苏军开进匈牙利的反应。更多苏军开进匈牙利的行动是与苏联的声明不相符的，这个行动表明，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在10月30日晚到31日早晨这段时间作出的（拉德万伊所著文章，见《中国季刊》1970年7—9月号，第123页)。对中国声明所作的更正也表明，不管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对情况多么了解，北京的新闻机构起初是怀着祝愿的心情来看待匈牙利局势的。(参阅《跳梁小丑的黑话》，《新闻战线》1967年5月13日，第4页，第2栏。)

14. 参阅伦纳德所著书，第228页。本书作者于1957年4月为伦敦《每日电讯报》采访英国共产党的一次特别会议时，亲眼看到了英共所受到的影响。这次会议透露，在近34000名党员中，已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党

员退党。

15. 这个报告载人津纳所著书，第516—541页。直到11月16日这个报告才发表。

16. 同上，第515页。

17. 二中全会公报载人《人民手册》1957年，第147—148页。

18. 铁托的讲话直到全会结束后才发表。

19. 据全会公报说，除了170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149人外，还有147名中央和地方党的官员出席了会议。

20. 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纪念列宁诞辰的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英译文见《北京周报》第 17 期，1970 年 4 月 24 日，第 5—15 页。引文见第 6 页。

2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65页。在文章的这一段，中国提到了一个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日期，但不属于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他们提到，195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文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这个文件的英译文出处同上，第 105—108 页。

22. 同上。

23. 刘叙述了中共关于怎样实行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政策，然而国民党却仍然要求发动内战。刘在一开头就指出了这些事件给人们的教训："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着重号是我加的)。

据近年来北京出版的《汉英时事用语词汇》第53页，"常常"可以译作"always"或"often"。有意思的是，官方的翻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1 辑，第 17 页）选择了"often"。这表明，刘承认反动派可能有时不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即不会迫使共产党诉诸武力。实际上，甚至后来在中共中央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里，中国也没有完全排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只是在 60 年代的论战中，中国才完全否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实际上，刘的报告的这部分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去理解。它听起来常常使人觉得中共对国民党实行和平政策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刘在抗战胜利后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参阅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北京周报》1967年4月7日，第15页）这种指控有什么道理的话，那么刘可能借此机会来解释和平政策为什么失败。他指出，例如有些地方是可以和平解放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18页）。

针对戚的指责，刘在为自己辩护时说，他作出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是与中央当时的立场一致的，（参阅他的第3份交代，英译文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年春季版，第76—77页）。刘夫人声称，她丈夫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但不能仅仅归咎于他。（《当代背景》848号，第12页）。这可能是真的，但不排除最初是刘劝说中共采取这项政策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例如在内战后期，传到北京的一些消息说，刘支持斯大林的方针，即中共对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延长美国对国民党的毫无作用的援助，以消耗美国的实力。周恩来明显地主张相反的立场，认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时机已经成熟（参阅菲茨杰拉德著：《中国的革命》，第102—105页）。

这些消息如果是真的话，也并不表明刘仍然赞成走和平道路，当时（1948年7月）这条道路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但它们却表明，刘对于最后打倒国民党已十分迫切这一点，不以为然，这种看法符合以前的一种想法，即与其武力夺取，不如采取几乎是十拿九稳的缓慢的和平接管的方式。

24. 英译文收入《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57—272页。

2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9页。

2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62。

27. 同上。

28. 同上，第260页。其他的基本教训是：共产党的存在、工业国有化、农业合作化、发展计划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29. 同上，第258页。

30. 同上，早在1941年，刘少奇就承认在共产党内，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可能会有矛盾（参阅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93—95页）。

31. 参阅赫鲁晓夫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丹尼尔·施沃尔的谈话摘录，载麦克法夸尔著：《百花齐放……》，第306页；参阅本书结语部分。

32.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65页。

33. 同上。

34. 同上，第257页。

35. 许多红卫兵小报都登载了这篇讲话，其日期也各不相同，包括1月2日、12日和27日。

36. 《邓小平反动言论记录》，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8号，第25页。

37. 同上。

38. 《邓小平是苏修的同路人》，《反修战报》1967年7月8日，第2页，第3栏。

39. 《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话记录》，《进军报》，1967年6月14日，第3页，第2栏。邓的评价无疑是根据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伍修权的电文而作出的。伍是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官员，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人选中央委员会（参阅《伍修权叛党叛国的不可抵赖的罪证》，《红卫战报》1967年4月13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07号，第6页）。可能同样是根据这些报告，称刘少奇在1956年6月17日对一个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大概他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向南斯拉夫学习。（参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2号，第1页）；（参阅《刘少奇关于文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10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32页）；（参阅《刘少奇执行投降主

义路线的罪行》，《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19号，第74页）。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一些观点在中国领导人中间不普遍存在。

40. 《邓小平在文艺领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23日第4页，第2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邓为了攻击毛，在这篇讲话中说中国有个人崇拜。用来证实这一指控的引语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犯这个错误（即个人崇拜）是不错的。实际上，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看来很明显，邓谈的是中国的其他错误，而不是个人崇拜，很可能他接着举了一些错误的例子，但删掉了。〔《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8号，第6页〕在自白书中引用这些话以证明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但正如他引用的这个文件中的其他话一样，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只不过是在重复他知道别人正用来反对他的那些话（参阅《邓小平检讨书》，第6页；参阅本书第150页）。

4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8号，第6页。

4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51号，第31页。

4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54号，第30—33页。公报只是说："两个代表团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把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第32页）。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谈到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不是社会主义集团的领导，因为他们考虑到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间的不满情绪（《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69—271页。但邓小平在清华的讲话清楚表明，他们仍然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集团中的领导。

44. 同上，第32页。

45. 中匈公报确实提到苏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领导（《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55号，第29号）。

4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

4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56号，第38页。如果公报是中国起草的话，他们大概会用“对抗性矛盾”代替“基本矛盾”，用“非对抗性矛盾”代替“错误和缺点”。

177

第十三章

整风运动的决定

第一节　整风原定安排在1958年

周恩来结束东欧之行后，又继续访问亚洲。同时在中国由于波匈事件，党的领导不仅限于表明思想上的声明，而且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八大之后，各地省委指示县级以上干部学习八大文件，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1]有一个省选择主观主义为主要敌人，[2]另一个省根据整风原则提倡自我检查和自我教育[3]，还有一个省甚至开展了自己的整风运动。[4]即使北京继续提倡反对三个敌人，但是这种不同方式的做法表明，中央还没有发出全面整风的指示。[5]

同时，北京方面重提党要向非党人士学习[6]。1956年11月，毛在公开发表的纪念孙中山90周年诞辰的颂词中，间接地鼓励这种作法。在

这颂扬中，他提出共产党是不应对孙中山的错误太严厉。[7]推而广之，毛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可以应用于对待一切非共产党的政治家、官员和学者，他们许多人是受孙中山思想的抚育的。

11月15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号召全体干部要用整风的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这是他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8]但是，在11月中旬至1月中旬期间某时，中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开展整风运动。1月16日半月刊的《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披露："党中央最近决定从1958年起全党将开展一个改进工作作风的整风"。[9]这个决定以前没有召开全会，人们应该得出结论：该决定可能是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出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要点。[10]

178

作出这个整风决定可能是因为党日益关心党与群众的关系，怕东欧式的危机在中国重演。[11]中国领导人采取这些步骤表示他们想要使党的领导更温和些。12月，刘少奇在党的组织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说：随着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越来越少，专政的机构在量上要减少，在质上要改进。[12]1月，他宣布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他赞成小民主，而且打算同意搞点大民主，即为了反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可以开大规模的斗争会。[13]同时，毛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也极力主张，不要怕罢工和骚乱。[14]

邓小平1月在清华的报告中也承认在近几年，专政在一些地方有些过分，虽然他很快地补充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上的。现在不放宽一点是一个错误。[15]但是他也反对大民主，大民主的结果是在整个社会上涣散纪律和影响生产，在党内破坏民主集中制，使一个领导集团被另一个领导集团所推翻。[16]邓坚决地支持毛的"百花"方针，认为显然文学艺术已从这方针中受益许多。他继续说："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口号是使唯心主义自由说话，其目的是为了宣传唯物主义，因为真理越辨越

明。[17]

第二节 抵制百花齐放方针

尽管中央总书记提倡百花齐放的方针，但是在宣传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制无疑反映了一部分共产党员较为普遍的担心。在最近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他们相对于非党人士的优越地位已经被削弱。这种担心在对待毛八大讲话的态度中已显示出来。现在，随着匈牙利暴乱的发生，中国人已经开始攻击动摇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警告要反对修正主义[18]这些显然鼓励了一群军队的宣传干部，不满意百花齐放的方针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陈其通为首的一些官员，元月 7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抱怨说：对公式化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这已被一些反对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人所利用。[19]而且，人们热心于恢复旧的文学，而不愿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学。

179

文章引起了人们巨大兴趣，受到多方面的评论，很多评论是支持作者的。[20]这种对于强硬观点的同情明显地扩展到上层宣传机构中去了，因为《人民日报》两个月内没有发表任何有份量的反驳这种攻击毛政策的文章。[21]结果，毛不得不自己亲自卷人这场斗争，以暗示他的不愉快。

仅在陈其通的文章发表 5 天之后，元月 12 日，毛就写信给《诗刊》的编辑们，这一刊物的第一期，很快将出版，它将发表所有毛能回忆起的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这些东西（即他的诗—作者注）我历来不愿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

参考。[22]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表明，虽然《诗刊》的编辑找毛索诗已有多日，但是在这之前，毛并不打算费心去答复他们，很可能是陈其通等人攻击百花齐放的政策，促使了毛采取行动。毛的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表示喜欢新诗，承认他担心他的诗可能起鼓励相反趋向的作用，然而他又批准他的旧体诗出版，而没有说出克服了这种担心的原因。结论似乎必然是：毛希望表明他虽然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依然赞同百花齐放的政策，特别是对老作家。今后那些希望恢复传统文学的人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事实，毛本人是使用旧形式的，而这种传统文学是陈其通等人所特别担心的。[23]

尽管毛介入了古典形式问题，但是教条主义者的反攻还在继续，他们集中火力攻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指控这位青年作家谴责整个共产主义制度。上百个批评家肯定是被当时苏联发起的对弗拉基米尔·杜丁采夫的批判所鼓励，杜丁采夫在《不仅是面包》中描写理想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官僚们之间类似的斗争。[24]

第三节　周恩来的报告和整风的提前

周恩来访问了锡兰，从而完成了他的亚洲之行，并返回中国。他于2月6日到达云南的昆明。5天前人大秘书长彭真率领人大代表团，在对东欧进行了一个长期访问后回到北京。周恩来在3月5日向政协报告了他的访问，但是彭真直到3月31日的人大常委会召开，才有机会提出他的报告。[25] 这个报告的推迟的重要性很快显现出来。

2月7日，周在昆明接见了人民解放军战士，[26] 但是他12日才到达北京。在这中间不见踪影。他和代表团可能在昆明休

息，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很可能在浙江省的杭州，向毛泽东，可能还有别的领导人汇报。[27]

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周向毛汇报，他所汇报的内容都出现在他的政协讲话中。他对他访问的三个国家得出同样结论：共产党的领导纠正错误是有利的。当他谈到苏联时说：通过接触苏联的领导人和各方面人士，我们认识到，他们批评他们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是有利于苏联社会各方面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的。[28] 在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做出同样结论后，他谈到帝国主义利用共产党错误的问题：

181

>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都喜欢社会主义国家遇到困难和犯错误，他们徒劳的利用我们的困难和错误，以分裂我们。但这一切都是完全没有用的。通过不断克服困难和改正错误，我们的事业将不是被削弱，而是肯定将变得更强大，更繁荣。[29]（着重点是我加的）

周虽然是要解除人们的疑虑，他们害怕整风和揭露错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从而导致可怕的后果。这些忧虑可能由《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论点而产生。在那篇文章中，中国人接受了匈牙利官方的分析：国际帝国主义在暴乱中起了"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30] 周在对他同僚的私下报告中，可能劝他们丢弃这种宽慰的说明。因为只要他认为国内原因是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他就会确信，帝国主义不能乘别的国家纠正错误之机达到类似的目的了。[31]

从 1956 年 11 月到 1957 年 2 月 1 日，彭真和他的人大代表团在东欧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之外都是阵营中保守领导者当政的国家。他们坚决地支持

苏联在匈牙利的立场。彭与周不一样，彭没有听到波兰人高度批判性的意见（波兰人的观点比持不同见解的南斯拉夫的观点对中国更有份量）。彭也没有亲自访问匈牙利。所以，彭真对东欧教训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只有一个国家是彭、周都访问过的，这就是苏联。但是彭对这次访问的评论与周的评论有所不同。彭真并没有提到苏联纠正错误问题。

他似乎也没有发现其他兄弟国家在纠正错误，他反而强调这些国家的巨大成功。[32] 当彭讲述在罗马尼亚偶然遇到匈牙利少数民族时，他顺便提到了帝国主义在暴乱中起的作用：

182

> 在匈牙利事件爆发之后，匈牙利族人民集会，谴责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坚决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立场和指示。[33]

在总结他的访问的收获时，彭真说，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所以，他们代之以利用各共产主义国家内和各国家之间的分歧意见和分裂，他补充说：

> 匈牙利事件和他们（帝国主义）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行为，是这种犯罪行为的铁证，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犯罪行为清楚地告诉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根本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国内的团结，根本问题是提高我们的警惕和消除一切反革命分子**[34]（着重号是我加的）

彭真警告有帝国主义利用内部分歧的危险。如果听取了他的意见，就可能妨碍整风运动的开展，因为整风必不可免地要公开一些黑暗面。但是毛仍然决定提前一年开展整风运动。[35] 直到毛关于整风运动的基调性讲话后很久并且新的整风时间表公开发表后，彭真才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以下是相关事件大概的时间表（括号表示推测的事件）：

2月1日　彭真从东欧返回北京。

2月6日　周恩来到达昆明。

2月9—11日　（周恩来在杭州向毛和其他领导人汇报）

2月9—26日　（大概在杭州开会，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时候，决定提前整风）

2月12日　周恩来返回北京。

2月12—26日　（毛准备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2月27日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2月27日—3月1日　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和讨论毛的讲话。

183

3月5日　周恩来向政协报告他的东欧之行，强调共产党纠正错误的重要性，同一天，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文章纪念延安整风15周年，披露一个新的运动"即将开展"。[36]

3月6—13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和即将来临的整风运动。

3月12日　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最广泛鸣放给予个人支持。

3月31日　彭真在他回国两个月后，报告了他的东欧之行。

注释：

1. 参阅《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606、608、610、613、615、号中的报道。
2. 河北；《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608号。
3. 黑龙江；《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606号。
4. 河南；《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615号。
5. 参阅195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例子。
6. 同上，1956年10月16日社论。同样，非党人士也被鼓励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0月中旬为他们成立了一所社会主义学院。（《世界广播概

要》第 5 部分：远东，606 号。〕

7. 《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613号。这篇文章被认为十分重要，已载入《毛泽东思想万岁》(参阅《当代背景》891 号，第 22 页)。

8. 《人民手册》1957年，第147—148页。

9. 引自麦克法夸尔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今日世界》1957 年 8 月号；第 340 页。

10.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57页。据周庆文(音)说，1956 年冬，毛邀请一批高级干部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开会(是否 12 月 8 日的全国工商联会议)，他在会上说："在过去几年里，群众、干部搞运动很紧张，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也应当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政府和党的工作的意见。我想我们大家都能从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得到好处"(周著：风雨《十年》，第 162 页)。

11. 在1959年同来访的匈牙利总理秘密会谈时，毛强调1956—1957年间，东欧和中国在发展中建立的密切联系(参阅拉德万伊所著文章，《中国季刊》，1970 年 7—9 月号，第 127 页)。

12.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中国大陆杂志选》652号，第20页；《彻底揭露刘少奇在政法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载于《政法公社。1967 年 8 月 3 日，刘还主张许多工作可以由非党人士去做；参阅《毛泽东思想照妖镜下的两个赫鲁晓夫》，载于《斗批改》，1967 年 5 月 15 日(《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 号第 21 页)。

13.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1—32页。

14. 毛在他的两次讲话中一再提到这个问题，表明他的听众对这个问题感到多么大的忧虑〔参阅《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74、75、76、79、87 页〕。毛说，共产党不害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却害怕学生和农民，这是很奇怪的。当毛谈到有一个县 3 万人起来闹事，打倒一个乡政府，并赦免地主时，他的听众可能并不觉得是一种耻辱；当毛说到，那使中共的错误导致几个省发生暴乱、首都的大街上出现风

指出，批判王蒙与批判杜丁采夫是同时发生的。

25. 既然周在亚洲和西欧进行的是正式国事访问，他也应该对人大常委会做个正式报告，无疑，对他来说，在政协会议上做报告是很适宜的，因为这次政协会议是他回国后召开的第一个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但是，作为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为什么彭不也应这样做吗？或者说，为什么人大常委会就不能先听彭的报告呢？

26. 《人民日报》1957年2月8日。

27. 2月8日，星期五晚上，毛和其他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西藏青年代表团（见 1957 年 2 月《人民日报》）。他（以及邓小平）可能是在星期六早晨离开首都去迎接周的。星期六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但是此后他也可能和他的同事们在一起。

如果在这个时候确实召开了一个高级会议，有许多理由说地点可能是杭州。4 月 25 日，周恩来在杭州对一些苏联客人说，1957 年他曾来过此地两次（见 1957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引文见本书“百花齐放运动……”，第 31 页）。但是，1957 年周到杭州的公开记录只有一次，那是在 3 月 21 日，当时他前去欢迎捷克总理西罗基访问那座城市。另外一项没有宣布，很可能是他在昆明时不见露面之后。

确认杭州为会址的第2个原因是：毛历来喜欢去这个风景区并在那里办公，据在文革中得知，“解放以来的 17 年中，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众多的重要文件也在那里起草（《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30 号，第 1 页；这些情况是在揭露浙江省委领导人在杭州毛的住处安窃听器一事才得知道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 页。例如，据称毛 1957 年 4 月初就正在杭州。（《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45 号，第 2—4 页）

28. 《当代背景》439号，第4页。

29. 同上，第7页。

30.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57页。

31. 值得注意的是，周在政协的讲话中有一段是详述他个人对匈牙利问题

的看法，但在涉及到暴乱时没有提到帝国主义者的颠覆，仅仅提到了“反革命分子进行的武装暴乱”(《当代背景》439号，第5页)。只是在后来谈到集团内部的关系时，周才提到“帝国主义者在匈牙利策划了反革命暴乱”(同上，第5、8页)。法国总理富尔于1957年5月访问中国并会见了毛和周。他发现毛和周都“避免谈论匈牙利事件”(富尔，第16页)。

32.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日。

33. 同上。

34. 同上。

35. 甚至在1956年12月，毛就已经提出帝国主义干涉只起了次要作用。在12月8日与商界人士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他说:“匈牙利事件证明，在那个国家里隐藏着很多的反革命分子，几个月以前他们就已在布达佩斯建立了反革命的司令部，他们还与国外有着阴谋联系”(《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6页)。1月，在对党内干部讲话时，(在这种场合他大概是更加坦率的)，他尖锐地批评了前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格罗·艾尔诺执行了过分严厉的政策(同上，第74页)。

36. “将要进行”，同上，1957年3月5日。在周回国和做了报告之后，整风运动提前开始了。陆定一的文章对于确定作出提前决定的时间是很关键的，陆的文章从引证毛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做的两个报告开始，这两个报告分别做于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5—68页)；由于中国人通常都很讲究按确切日期进行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到了1957年2月8日，就没有必要写一篇重要的周年纪念文章，因为到下一次开展整风运动还有一年的时间。这一看法与下面的事实是相符的，即毛与周在2月9日前不可能见面。作出决定的最晚日期可能是3月4日，当时陆的文章正在付印；但是人们不妨假定决定定是在2月27日毛就内部矛盾发表他那篇定调子的讲话之前作出的。

第十四章

毛分析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节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1800名党内外负责人士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取了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酝酿了几乎整整1年。[1]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促使中共中央委员会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论述了毛关于在共产党国家中存在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他的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讲话中，也已开始设法解决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继续分析并断言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是共产党国家内所存在的矛盾之一。这时，在周恩来的报告之后，毛泽东

详细地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在中国特定的情况下，如何发现这些矛盾，并且提出了消除这些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人民"解释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2] 尽管如果一个人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敌视社会主义建设，就可能被划入人民的敌人行列，但是对被列入"人民"之内的人，并不明确要求他们拥护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只要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工作，毛似乎就准备容忍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人。

在人民中，劳动人民（即工农）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而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对抗性一面，也有非对抗性一面。如果处理得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基本上是对抗的矛盾，能够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3] 处理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与处理敌我矛盾必须有所不同。甚至对工人罢工或学生罢课，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应当细致地处理这些问题，并把它当作清除该单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个机会。[4]

185

换句话说，毛认为在共产党国家内，政府或人民不用诉诸暴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争论。"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5] 就象在匈牙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尽管在讲话公布前作了种种限制，但这显然是一种更加人道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共产主义将防止实行斯大林主义，使所有争论都可以通过讨论和说服加以解决，并使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这最后一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构成整个讲话基础的设想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人民）是可以一起工作的。这篇讲话的实质部分，是以一曲对国家团结所作的激动人心的赞歌开始的：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 6 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6]

这种团结能保证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以正确的精神开展：

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6 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7]

186

毛总结他的理论说，社会主义制度，意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尽管这个制度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还很不完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矛盾。同样地，上层建筑，即国家制度，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应归因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激烈的阶级斗争

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某些阶级斗争还会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人们对她的习惯，还需要时间。[8]毛结束其理论时说：

>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为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9]（着重号是我加的）

这里，再一次地体现了毛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一文的主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家的经济。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这个任务得以顺利进行。当毛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他来说，向自然界开战显然要比阶级斗争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当时，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的看法。[10]

第二节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对非党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说有一个人听了毛的讲话后，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11]一位已经准备好了要逃离这个国家的商人罗伯特·罗汉，也对自己不留在中国产生了怀疑：“我当时感到茫然。毛讲话以后，似乎一切都有了可能。因为若干年来，我第一次有了希望。”[12]然而，由于后来删去了对错误的承认并增加了对过分自由的言论的警告，人们就不可能再体会这篇讲话原来的意图了。在3月12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对将近500名有关部门的

187

党内外干部就整风运动所作的第二篇基调讲话，在表面上相当接近上述讲话的原意，它的确能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象罗伯特·罗汉那样的人不知所措的反应。[13]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非党听众相信他真诚的意图。因此，他坦率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严重错误。[14] 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目的，是要说服在宣传和文教部门工作的基本上是共产党员的官员们同意让人们更自由地发表意见。因此他必须使这些官员相信，这样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大有裨益。[15] 特别是他必须使这些官员对在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中鼓励批评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后果放心。为了马上解决这个必然是党员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他重申了仅在一个星期前周恩来所使用过的论点。所不同的是，周是用东欧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而毛用的是国内的例子："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16]

正象一年前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毛详细地阐述了非党人士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改善同这些人关系的必要性。他的这些话是值得详细引用的，因为它们是从 1956 年 1 月以来毛就一直设法灌输到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党员干部头脑中的那种思想的实质，1956 年下半年东欧局势的发展证明了他这一思想的重要性。还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段话比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同一问题的论述更长更前后一致，这或许是因为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发表前作了修改：[17]

188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

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8]

毛接着在引人注目的一段里，鼓励非党人士通过批评来帮助党：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19]。(着重点是我加的)

毛显然预见到了批评者可能犹豫和中共党员对批评的敌视。鉴于这种情况，如果此时他提出一些标准来引导批评者和使干部放心，那将会是有益的。然而，他却是只设法鼓励批评者：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

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20]

他不仅完全没有给批评提出任何标准，而且在讲话的八个部分中最长的一部分里，继续提出，在提意见时，方针应该是“放”，而不是“收”。[21] 根据毛的解释，放的意思是：

> 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22]

189

毛在这段所说的和他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所概括的观点，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语气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对党的批评者更为宽容和更加鼓励。毫无疑问，这种语气上的不同，部分是由于在发表对矛盾问题的讲话前需要加以修改。但是，毛在主要对党的宣传干部即正统观念的维护者的讲话中关心的可能是确定批评的正当性，即令有过分强调的危险。

事实上，毛确实把他讲话的一部分专门用于要求批评者不要片面性，不要只看到坏的方面。然后，他论述了在这点上使批评者犹豫的合理性：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象就是不让人讲话。”[23]（着重号是我加的）

毛承认“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24]但要求批评者尽量用全面的方法。然而，最终，为了促进批评，他显然准备容忍片面性。正象他所说的那样：“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25]

第三节　关于整风运动形式的不同意见

党整风的必要性，已为中国所有主要领导人所承认。但有些人由于怕匈牙利事件后政治气氛太反复无常，因此显然反对提前时间表。毛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并要求提前，但不同意见仍然存在。这些意见主要涉及到整风运动将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似乎毛的一些同僚也反对他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为整风所提出的方法。

190

毛的打算，是使整风运动面向所有人，而不是只局限于党内。他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曾说，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26]他还说在整风中要求“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党的干部却对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想法表示不满。宣传部长陆定一3月5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纪念第一次整风运动15周年的文章（大概是为第二天开始的宣传会议提出指导方针）中，没有提到非党人士参加整风。陆定一在对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作了很长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整风运动是“党内的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适合于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

说的一个伟大贡献。"(着重号是我加的)[27]

陆定一强调了这一意思，他把整风方法的创造者说成是党而不是毛，这就表明党对这个运动的接受是有限的:"我们的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并且从这里开始，逐步地发展了一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方法。"(着重点是我加的)[28]这后一段话含意是明确的，首先党自我整顿，然后逐步形成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两个时期的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1957年毛把党的整风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同一过程中的一部分毛要非党人士参加，尽管他允许他们自行选择是否参加，但陆定一对非党人士与整风运动的关系漫不经心，他只为对研究整风运动有兴趣的人[29]列举了一些适当文件。甚至在他的总结中，也没有向毛这种新式整风运动的想法让步:

191

> 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以达到端正全党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目的。[30](着重点是我加的)

陆定一对党内整风的偏爱，由于他更多地强调了刘少奇在八大的论点(与邓小平的论点相比较)而显得更加突出。象刘一样，陆强调了研究(这显然不要党外人的帮助)纠正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同时也首先把党不熟悉社会主义建设新任务作为犯错误的一个理由。在更为详细地论述邓小平关于权力腐蚀作用的观点之前，他相当简捷地论述了需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而，甚至在这里陆也与邓不同，他强调对这些任务没有经验；而只是在他的论述快要结束时，才谈到邓的主要观点，即执政导致官僚主义。[31]

陆定一对各种论点相对的强调表明，毛和他的主要盟友，周恩来和邓小平，正在对政治局同事们施加很大的压力，以便确保

整风运动按照他们设想的形式进行。尽管陆不能置毛主义的观点于不顾，但是在最高层，反对毛的决心很大，这足以使他不退让。[32]象陆这样的人是会特别受到刘少奇这时的行为的鼓励的。

第四节　刘少奇不同意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

如果党员们怀疑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运动是否明智的话，那么他们对关于矛盾问题讲话的语气一定会更感到恼火了。事实上，他们的忧愁很可能与毛的非党听众的欢快成正比；后者自信心和主动性的增长必定意味着前者的权力和特权相应的减少。在这一点上，毛的一些最亲密的伙伴关心的程度，由刘少奇所采取的行动表示出来了。刘明显地抵制，或者令人看起来他似乎抵制了毛发表关于矛盾问题讲话的最高国务会议。《人民日报》3月3日发表的会议照片上，刘少奇引人注目地不在毛的右边。

192

刘这种态度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毛在发表共产党政权产生以来他或其他人关于政治问题所作的最重要讲话时，刘却不打算在这个场合出现在他的旁边。没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读者不会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刘不同意毛所说的意见（见附录7）。

而且，更老练的干部也会注意到，另外与各政治局成员朱德、林彪、林伯渠、罗荣桓和彭德怀不在台上适当的位置上；这些缺席者中只有林彪确实是因为病了（见附录7）。

关于政治局的分歧还有一些线索。这个主要政策在公布前显然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这方面，它完全不同于1955年秋季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政策和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政策，而更象1955年夏季毛个人发动的合作化政策。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陆定一在他的文章中没象毛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33]那样，明确宣布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发动整风运动，而只是有些解释性地写道，形势"迫使我们"开展整风。[34]

确实，到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象刘少奇和彭真这样的人已经同意到什么程度还不十分清楚。大概毛已经使刘勉强在原则上同意提前开展整风运动。[35] 但是，刘的态度和陆定一的文章表明，毛还没有使刘接受整风的形式或者开始的确切日期。对于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和相对地位较低的宣传干部在3月和4月初继续反对整风，似乎没有别的什么解释了。

第五节　反对整风

继续反对毛的主张的一个迹象，是党的宣传人员没有明确压制双百方针的反对者，比如陈其通等人。对于这个问题，毛本人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比在1月份更为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说：

193

>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36]

尽管毛坚定地重申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目的，但是党的主要宣传机构《人民日报》仍然没有立即支持毛。只是在毛关于矛盾问题讲话后，这家报纸才在3月1日发表了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陈辽的文章，批评了陈其通等人采取的路线。只是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有力地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含蓄地批评了陈其通及其同伙后，《人民日报》才于3月18日刊登了以文化部长茅盾名义写的文章，严厉抨击了他们。但是，这还

不能看作是对这伙人的最后处理，因为茅盾虽有部长的头衔和作家的声望，但他不是中共党员。[37]

中央报纸对不同意毛政策的低级官员没有施加官方压力，是情况严重的征兆。它表现为毛在2月27日和3月12日的两篇重要讲话中的观点和方针得不到宣传。《人民日报》到4月13日才就此问题发表社论。如果已经知道中央将发出指示，在两个星期后，即于4月27日[38]开始整风的话，这就是一次可见的宣传失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历来都是高效率的。因此只能推测，如果到3月12日毛已获得同事们同意在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的话，由于最高层仍存在着的争论阻止了对整风何时开始的问题作出决定。即令如此，毛对《人民日报》迟迟不讨论他的主张而大发雷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4月某个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就在这个月的前10天，毛严厉地痛斥了党报：

>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39]

194

1968年9月，当这连珠炮式的谴责公诸于世的时候，从当时情况看，这谴责最初是抨击邓拓这位1957年上半年的《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如果要把责任归于邓这样一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官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在3月前或3月里还没有最后决定发动整风运动的日期。级别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样一位官员居然无视中央的方针，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40]结论必定是这样，至少邓不认为要急于对发动日期还没有确定的整风写社论；可能性

更大的是，邓用整风的日期还没确定和对整风的形式有不同意见做为他自己辩护的理由。鉴于邓拓后来在北京市党的机关里有较高的地位和他这时一定已是市委成员，那么他受到北京市委观点的强烈影响不是不可能的。北京市委的观点很可能是那时首都党的干部们普遍知道的。[41]

党的官方机构不就毛的讲话发表社论，想必就会影响到下级官员们的行动。4月13日的《人民日报》，在首次就矛盾问题发表社论的同时，第一次报道了省里对毛的讲话的反应。这篇报道表明，3月7日辽宁省委已向全省高级干部传达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也许，其它省的党组织至少也已向高级干部传达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但是由于《人民日报》没有报道，因此我们只能设想其它省采取的行动相对来说是非正式的。似乎到了3月的最后10天，才有省级组织采取行动，据《人民日报》报道，在此期间、云南省的党组织开始组织传达毛的讲话。[42]3月25日，北京市委就毛的讲话召开了为期8天的宣传工作会议；[43]第二天，彭真出生的那个省山西也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44]

195

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很可能是对毛本人的一个命令的反应。3月的后半个月和4月的第一个星期，毛和大多数政治局常委都不在北京。毛4月3日在杭州。[45]也没有报道说，从3月12日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到4月8日他设宴招待来访的波兰总理这段时间里，他在首都。如果毛这期间的大多数时间在杭州，那么3月21日周恩来在杭州的出现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显然，周是毛推行1956—1957年的“自由”方针的主要支持者，[46]他到杭州很可能是与毛磋商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对毛的讲话作出反应的问题，[47]然后他带着毛的意见返回了北京。因此，周从杭州返回北京不久，北京党就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这决非巧合。

鉴于彭真对整风运动持不同意见，因此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

似乎是一个转折点。但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彭已经最后放弃自己的意见。3月31日，在北京党的会议期间，彭发表了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东欧之行的报告，对允许国内不团结和不一致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更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这次会议有1400多名党内外人士参加，并由于北京第一书记的出席而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彭本人没有在他自己市的党的会议上讲话，新华社在对这个会议的长篇报道中也没有提到他的各字。与这有关的，最重要的是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第8点。毛在直截了当地要求省一级的党委必须管思想问题之后，接着又指出：

> 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象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48]（着重号是我加的）

196

周从杭州返回以后，彭显然认为，他的市委召开宣传会议是稳妥的，但他并没有退到服从毛关于第一书记责任的教导的地步。[49]

第六节　刘少奇巡视各省

对3月份和4月初的空隙最可能的解释是毛不得不同意把发动整风运动的日期推迟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摸清楚了省级干部的想法，使他们作好思想准备之后。[50]这就促使了象邓拓那样对整风很勉强的干部放慢他们的步伐。刘自己行程2400英里，巡视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51]3月5日，他到达河南许昌。[52]并在3月的某一天在省会郑州作了一次

讲话。[53]3 月 24 日，他在湖南省会长沙市的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54]4 月 6 日，他在广东，因为这天他在广州迎接了波兰总理，4 月 10 日他又就矛盾问题向当地干部讲了话。[55]12 日，他正在返回首都的途中，因为那天他到了他在湖北省汉口的故居，当天又乘火车离去。[56]4 月 15 日刘在北京迎接苏联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元帅。为了应酬与这次访问有关的各种礼仪，刘一直呆在那里，直到 4 月 18 日，伏罗希洛夫该日前往东北开始访问中国的第一段旅程。后来，这个月中又有几天刘在上海。很可能是从 4 月 22 日起，因为那天他在上海迎接了伏罗希洛夫，直到 4 月 27 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57] 第二天，他可能在当时河北的省会保定向干部讲了话。[58] 这好像就已经结束了刘整风前的巡视，因为 4 月 28 日那天晚上，他返回北京参加了一个宴会。[59]

令人遗憾的是，刘巡视 6 省的讲话现在只有只言片语可供引用。唯一的一段很长的摘录[60]是摘自他在上海的讲话，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他在河南的一段讲话，实际上是他在上海讲话的重复，这表明刘可能有一篇标准讲话在各省时就各地特殊情况稍作改变。[61]

197 尽管与刘巡视有关的材料很少，但是现有的材料足以断定，他此行也许还有其他领导人巡视其它地方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解释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这是 4 月 27 日上海讲话那段摘录的主题，它很值得与同一天制定的整风指示相比较（见 210 页）。第二个目的，是在所巡视的地方讨论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刘在 3 月讨论的实际问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和彭真以及其他人对开门整风的前途担心。

在郑州和许昌，刘试图说服教师和学生把当第一代受过教育的农民看成是光荣的。缺乏教育设备将使他们中许多人不能继续

学习，刘引用他自己为例来减轻他们的失望，以证明不继续受教育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就没有出路。[62] 这个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4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就以此为内容。上海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1957 年，中学入学增长率急剧下降，大学入学数绝对下降。从 1953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大学入学数低于高中毕业数这样的情况。[63] 一位西方记者从北京报道，毛在关于矛盾讲话中提到的学生罢课，[64] 就是由于对工作前途不满而引起的。[65] 毛 1957 年 3 月亲自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加强大中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些学校，政治课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66] 正如毛在最高国务会议指出的那样，他的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不能发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同僚害怕那样会引起更严重的学生骚动和工厂工人的罢工。[67]

罢工是刘在巡视中论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尽管刘表面上轻松的态度与毛的态度很协调，却掩盖了幕后的激烈争论，但是刘关于工会和党的干部为了保持工人的信任应该参加罢工的建议，[68] 表明了他的忧虑。刘向工会和党的干部作的这个非正统的建议，突出说明了他对党掌握工人的能力遭到削弱很关心。1956 年宽松的政治环境已经逐渐损害了工厂的纪律。上海和其它地方的报导，引用青年工人在舞会上已用尽了精力而致使他们的产量下降为例，说明了道德的沦丧。政治教育的放松导致工人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69] 如果鼓励人们发泄他们的不满，那么要维持纪律，是多么地困难呀，[70] 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1956 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已经影响到了食物供应。再加上 1956 年投资大规模的增加，超过 1955 年投资的 60%，这就必然造成工人人数增加量比原计划多 3 倍。还有由于 1956 年普遍增加工资和银行向农村、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加倍的贷款，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压力。结果，1956 年底和 1957 年初，消费品严重缺乏。这些最后

198

199 迫使政府拿出了大概10%的库存，削减了布匹和城市粮食定量，并号召政府机关、部队和学校减少15%—25%的取暖与炊事用煤。[71]

许多官员同刘少奇一样，对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进行整风感到担忧；刘在广州时，广州召开了1600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导明显地使人感到了人们的担忧：

人民内部矛盾一定不能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在这一点上，会议中有激烈的争论。许多干部思想混乱，不能严格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认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整风"的方法比仅仅说服教育更有效。有的人则进一步提倡用"说服与压服两种方法"，即除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之外，再加上一点"压力"。[72]（着重点是我加的）大多数干部反对运用整风的方法或压服，因为他们认为领导的官僚主义常常会引起紧张的内部矛盾；甚至当群众的要求过分时，整风和压制只能使形势暂时缓和，而从长远来看是会使非对抗性矛盾进一步恶化，并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73]显然毛主义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但是这篇新闻报导却表明毛的路线在广东的党员干部中是多么地不受欢迎。[74]

但是，毛与刘的分歧并不仅仅源于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对整风危险性的看法不同。从刘3月至5月的讲话来看，他认为匈牙利式的起义这个妖怪可以用经济手段来驱除，而毛却坚持要用政治措施。在这几个月里，刘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与分配有关。[75]从现在能得到的刘对这个问题最长的讨论中，他谈到了工农之间，工人和干部之间，以及新老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造成的破坏作用，谈到了工资等级的评级制度，不能按个人的专长工作（即工作分配）和不能进一步登上教育的阶梯（即教育机会的分配）所引起的不满。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分配更多的物品和特权给领导干部。[76]真正使群众感兴趣的是工资、住房、食物

和交通工具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就意味着能够大胆地谈论这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建议搞一点"平均主义"，[77] 换句话说，就是更合理地分配经济资源。毫无疑问，毛不会否认这些存在的问题，或者反对一点点的平均主义。[78] 但是对他来说，光是经济平均主义还不够，要消除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以及造成更大的政治平等，还需要开门整风。而另一方面，刘却把党群"关系"（不是矛盾）说成是"政治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79]

这两个人之间的根本区别似乎是，刘把中国的问题主要地归结为是国家经济落后的反映，而在匈牙利事件后，毛更坚信根本问题是党和人民的关系。刘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与商品的关系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毛尽管完全认识到了经济的重要性，但更为关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80]

注释:

1. 关于这个讲话有一个问题：没有见过公开发表的原文。当讲话公开发表时已经作了修订（见 1957 年 6 月 9 日《人民日报》；正式译本的复制件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75—294 页）。讲话录音只在全国极小的范围内播放（见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 218—212 页）。其次是待遇更低一点人听过关于这个录音的记录的传达，而且是经过了删节的（同上，第 223 页）。听过录音的罗认为，即使是这个删改过的稿子也比最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本坦率得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上述两个文本中的引文都只是一些摘录，它们是西德基·哥鲁森在华沙得到的，并于 1957 年 6 月 13 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我一直认为，毛讲话中有关理论的那一节，即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在各个文本中没有多大的变化，因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必要对其进行删改修订时，类似的思想早已出现在 1957 年 4 月的《人民

日报》社论之中。

讲话的其他11节是：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2.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75—276页。
3. 同上，第276页。
4. 同上，第278、291—292页。
5. 同上，第279页。甚至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本中，毛仍倾向于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匈牙利暴乱的主要原因的看法，而不赞成有人关于外部颠覆是主要原因的看法。文中有一处他认为国外努力、甚至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他写道："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第277页）在讲话的另一处，他认为反革命分子起了较大的作用，但他同时又清楚地指出，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才是决定性的，因为正是这一矛盾为反革命提供了机会。毛说："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第279页）苏联扶持的匈牙利新领导认为，在引发事件的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扮演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角色"。中共在《再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赞同这一观点。而毛的上述分析却从原来赞同的立场上倒退了（同上，第257页）。《再论……》引用匈牙利文件中的话来指责帝国主义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很可能，在周恩来出访之前，中国人并不想自己提出这样的看法。

在《纽约时报》记者于1957年6月13日在华沙得到的讲话文本中，

丝毫未提到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据说毛在回答关于匈牙利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匈牙利党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采用压制而不是说服的办法。它的这一弱点在10月悲剧中显露出来，当时在大约几天的时间里，党几乎消失了。依靠苏联的力量是必要的，不这样的话，分裂瓦解很可能从党内发展到全国。当然，由于形势的发展使苏联不得不进行干涉，这是另人遗憾的。"但是，据一位曾听过毛讲话原始录音的中国难民的记忆，毛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匈牙利共产党长期领导不得力，使帝国主义者得以歪曲形势，并利用人民合理的不满，以图推翻社会主义的政权。"（见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20页）

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75页。
7. 同上，第278页。
8. 同上，第280—281页。
9. 同上，第281页。
10. 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同上，第286页）。
11. 引自麦克法夸尔：《百花……》，第19页。
12. 见罗和伊文斯上引书，第222页。罗大约在1957年4月中旬曾听过毛讲话录音的全文。
13. 这个讲话一直到1965年4月，即8年之后，才公开发表。参见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因此，就再没有必要对鼓励大胆说话作谨慎的限制；但在1957年6月矛盾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前曾不得不将这种限制补充过去，以证明在当年下半年发动反右运动是有道理的。毛决定在1965年发表他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来正是为了鼓励在次年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直言不讳的批判而给予合法支持。但为了使其与《正处》讲话一致，似乎也确实对某些内容作了一些改变。见下文附录7。
14. 罗伯特·罗相信毛泽东是真诚的（罗和伊文斯上引书，第222页）。
15. 毛的听众包括380名党的干部和大约100名非党人士（见毛：《在中国共

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9页）。

16. 同上，第14页。
17. 参见前注10。
18. 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5—16页。
19. 同上，第16页。
20. 同上，第20—21页。
21. 同上，第21页。
22. 同上，第22页。
23. 同上，第18页。
24. 同上。
25. 同上，第19页。
26. 同上，第12—13页。
27. 见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纪念整风运动15周年》。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为强调党内整风的性质，刘少奇自始至终称毛"同志"而未称"主席"。当然，他用"同志"这个称谓并没有什么错误，可是，鉴于毛有意把党内整风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联系起来，用"主席"的头衔提醒读者毛既是党的主席又是国家（属于全体人民）的主席恐怕是更恰当的。
31. 同上。
32. 更有可能的是，毛之所以决定在宣传工作会议即将结束时到会讲话，恰恰是为了抵销陆定一文章的影响。
33. 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2—13页。
34. 参见1月《中国青年》的文章，该文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已就整风问题作出决定。（见上文，第177—178页）。
35. 毛的断言似乎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同意在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认为只有最后得到刘的赞同，毛才会这样讲，似乎比较符合情理。但是，很有可能的是，毛的这段话是在许多年之后，在出版前才加进去的，

加上这段话是为了证明他发动整风运动最终得到了全党的批准。

36. 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5—26页。陆定一在其关于整风的文章中也肯定了百花齐放的方针。

37. 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间接地表达了保护百花齐放方针的态度。一位负责文艺界的高级宣传官员林默涵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保留地对王蒙的一篇引起争议的短篇小说表示了赞同。见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191页。

38. 罗伯特·罗说，他在4月曾与上海市党的高级干部一起听过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录音（见罗和伊文斯上引书，第218页）。

39. 引自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将新闻战线的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1968年9月1、2、3日，发自新华社（《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53号，第23页）。很显然，毛泽东通过会见各小组的代表，力图使他们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3月6日，他出席了有9个省市的宣传、文化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同上，第131页）；3月7日，他与7个省市教育部门的领导人谈话（《毛主席教育语录》，北京电气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编印，第13—14页）；3月10日他又在一个专门为记者和出版工作者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53号，第30页）。在经过这一系列活动之后，毛的观点却未在新闻界引起重视，这一定使毛感到特别恼怒。

40. 有人认为，虽然已经决定了发动整风的日期，但是邓拓由于受到"后台老板们"的支持（文革中的说法），却敢于置之不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在注释39引用的文章就一定会指出这些后台老板是谁，并且也不会提出这位毛主义者的指责完全是针对邓拓的。在文革中，负责宣传的官员如陆定一、胡乔木也都受到了攻击，泛泛地指责他们没有宣传毛1957年发表的两篇讲话。但就我所见，并没有人提出过，还是他们命令邓拓不要在人民日报上讨论毛的观点意见。

41. 再者，根据上一条注释所讲的原因，彭真似乎也不大可能利用他在书

记处的重要地位命令邓拓不要发表关于毛讲话的社论。如果他曾这样做的话，在他已被公开批判和受到清洗2年半之后，注释39引用过的那篇文章就完全没有理由不提出这一点。

42. 《人民日报》先前对毛的讲话甚至连起码的响应都没有，这当然进一步地证明了邓拓的态度。

43. 这个会直到4月18日新华社作了报导才为人所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1号，第1—4页）。

44. 同时召开这样的会似乎不大可能是纯粹的巧合，特别是因为其他的省都没有在3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在中国，中央与省之间的联系很重要。1930年至1940年期间，彭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显然一直对他家乡所在的省有着浓厚的兴趣。

45.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45号，第2—4页。

46. 除了周的许多次讲话——这表明是他的职责所在，引人注目的是，当《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决定尖锐地批评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时候，他的这些意义是对着毛和周而非毛和刘的，虽然刘对党务负有更大的责任。大概储是有意把周的名字与毛联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周更可能以同情的态度听取批评者的意见。

47. 周在杭州已为人所知，因为捷克总理到达这座城市时他曾去迎接（见195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但是，从外交礼节上看，周没有必要专程前往杭州去招待他的捷克同行。在捷克总理访问杭州时毛未露面，但不能因此就断定毛不在这座城市里。毛已在北京招待了威廉·西罗基，从而做了作为国家首脑他需要做的事，如果毛希望给予他特别待遇的话，他可以再次出面招待他，但是，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与一个月后接待波兰总理时不同，毛在北京有意给了捷总理以规格略低的接待。

48. 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8页。

49.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人民日报》关于山西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导没有提到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会议，但是在彭真退却之后（见上文第206

页）；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的长文，特别突出了省委第一书记的作用（见 1957 年 4 月 25 日《人民日报》）。

50. 3月，邓小平和朱德视察了西安。见1957年4月30日《陕西日报》。4月24 日周恩来在杭州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的报告（见麦克法夸尔：《百花……》第 31 页）。

51. 《当代背景》834号，第16页。"文革期间对刘的一次批判中，说他曾模仿战国时的政治家苏秦周游各地。苏秦正是通过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捞取了"政治资本"。但是，究竟是刘自己将他的下访与苏的周游作了比较，还是这一比较仅是诋毁者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从指责本身难以看清。见《刘自传补遗》，1967 年 5 月 13 日《井冈山》（联合出版研究中心（华励顿）档案 41858 号，第 186 页）。

52. 《中国大陆杂志概览》599号，第28页。

53. 《联合研究院院刊》，1967年7月21日，第6期，第86页。

54.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2页。另外一个资料指出5月刘少奇在湖南，但这恐怕是搞错了。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1页。

55. 1957年4月23日《南方日报》。

56. 1957年6月12日《长江日报》。

57. 刘在这一场合讲话的部分内容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 4 集，第 63—71 页。

58. 见《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3号，第36页。

59. 《当代背景》834号，第16页。据说，刘对各省的访问从3月一直持续到 5 月，这是不准确的。在对上海市干部讲话时，刘提到他已去了 5 个省（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四集，第 63 页）。鉴于他在 3 月 5 日已到达河南，很可能 2 月底时他正在河北造访（2 月中旬时在北京没有关于他的报导）。但是考虑到北京与河北邻近，这不应成为刘没参加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理由（见附录 8）。

60.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第63—

71 页。很明显，这一文本虽然较长，但它仅是摘录，因为文中仅有第一节，没有后面的章节。

61. 关于刘在河南讲话的引文见《当代背景》834号，第16页；中文的版本见 1967 年 4 月 16 日《教育革命》第 2 页：《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教育路线 50 例》；上海的版本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 4 集，第 65—66 页。

62. 见《联合研究院院刊》，1967年7月21日，第6期，第85、86页；《中国大陆杂志概览》599 号，第 28—30 页；1967 年 5 月上旬《毛泽东主义战报》第 4 页：《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100 例》。

63. 豪：《中国城市的就业与经济增长，1949—1957》，第124页。

64.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91页。

65. 见麦克法夸尔《百花……》，第22页中引用的路透社记者大卫・切普的报导。

66. 毛给周的信见《毛主席教育语录》第16—17页。事实上，在1957年初毛曾对其他听众提过同样的建议：见《毛主席教育语录》第 16 页另外两条语录。中小学和大学的政治教育情况见《教育革命》编辑部文章：《17 年教育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1967 年 5 月 6 日《教育革命》。

67. 1969年：《毛泽东思想万岁》第94、100页。

68. 联合出版研究中心（华盛顿）档案41889号，第58页。

69. 见例如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经济补遗，第 12—13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441 号，第 33—36 页。

70. 刘和彭真等人的态度可能已反映在195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工人闹事的社论里。这个社论首先强调的是敌特的挑拨，其次才提到群众中被特务利用的不满情绪。

71. 见休斯和鲁德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第52—56页；沃克：《中国农业计划》第 678 页。

80. 根据"文本"的材料，在匈牙利事件后不久，刘就开始强调分配问题的重要性。见196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三会一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1月毛在省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有粮就有一切"，并且特别指出，掌握了充足的粮食就会减轻罢工问题的严重性（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78页）。

200

第十五章

发动整风运动

第一节 《人民日报》归队

在广东对毛方针的抵制引起了当地知识分子的关注。据报导，在广州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方针的人都认为，如果要很好地执行这个方针，“首先必须消除为数不少的干部对这个方针的怀疑，其次，必须正确理解这个方针。”[1] 令人寻味的是，“百花齐放”方针已实行了一年，广东的知识分子还要求“正确理解”这个方针，但感到忧虑的不仅是他们。用著名的社会学家、非党人士费孝通的话来说，全国的知识分子都畏惧政治“早春”，费的意思是，这将意味天气逐渐转暖，但随时会突然发生霜冻，摧残过早开放的鲜花。[2] 知识分子显然特别注意到《人民日报》没有对毛最近的观点表示赞同。该报4月初的两篇社论更增加了他们的疑虑，

社论论及了毛的两个讲话中提的问题，而毛曾在这些问题上为党作过辩护。[3]

毛在杭州谴责了《人民日报》，问它是谁家的报纸，主张必须对它进行改组。他召开了许多会，但会议的情况未作过报导。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这是毛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讲的话，毛召集这个会可能是认为上海市委是可以信赖的少数党委之一，他的坦率发言说明了这一点。毛承认在百花齐放的问题上他是孤立的，估计陈其通等人代表了90%的中共党员的意见，还说："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他的地位软弱，毛还是再次坚持他的"自由"方针，即使遭受几个月的辱骂，党必须"放"。毛有201 点自我辩护地说："我不是鼓励群众造成混乱；我不是开促乱会议。"——这一定是心怀不满的党员如此形容最高国务会议。能听到反对意见很重要（这在俄国不可能），因此民主党派必须存在下去。认为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合时宜和它与政治思想相抵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正如八大所断定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时期已经结束，党必须填平与非党人士之间的鸿沟。[4]

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可能是在杭州讨论的，因为4月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记者与周扬谈话的文章，这位负责文化界的高级宣传官员攻击了陈其通等人。这个被人憎恨的周扬对毛主义事业的忠诚是引人注目的，[5]但并不牢固；比他的讲话更主要的是，这个讲话是登载在一个非党的上海报纸上，而不是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6]似乎可以肯定，需要毛的亲自干涉才能转变党报的态度。4月10日，毛重新在北京露面后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了陈其通和其他反对"百花齐放"方针的人，也对自己未能较早批评他们作了自我批评。[7]文章公开说有的人害怕鸣放会使文化界陷入混乱，把这种误解归咎于那些不同意这个方针的同志，因此他们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

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8] 在文章的结尾，《人民日报》指斥陈其通等人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并说他们的批评只能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思想混乱。接着又说：“应该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之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9]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关于周扬谈话的文章。

要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困难的，毛从杭州返回后，谴责了《人民日报》编辑，这促使邓拓行动起来。因此，这家报纸不仅202 为“百花齐放”方针辩护，并且为时已晚地开始宣传毛关于矛盾问题的主要论点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它们的五篇社论中的第一篇。[10]

第一篇社论很有意思，因为它主要针对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在 5 月和 6 月初的事件以前，毛也许认为这是制度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事件迫使他修改了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社论断言：“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11] 毛在这年较早的两个讲话中，还把主观主义排在按通常顺序排列的“三害”之首。而现在，在中央的宣传中，官僚主义第一次上升为主要的危害。社论明显地反映了邓小平在八大上阐述的毛泽东的思想。社论也象邓一样认为 1949 年以来党员的缺点是由于中共执政的结果。刘强调的主观主义和党员面临新任务的提法已明显地被置于一旁。社论和邓一样，提倡群众向官僚主义斗争，认真监督领导者；同时，提出必须对群众进行不断的思想教育，因为他们常常难于掌握整个国家的情况。

第二节 彭真的不同意见

《人民日报》4 月 13 日的社论反映了毛的意见，其最重要的

措施是宣布思想教育是党委第一书记的责任。社论按照毛的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写道：

> 为了加强对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这一工作抓起来，经常了解群众中的思想情况，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推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人都这样作，而不要把这一工作仅仅委托给党委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教育部门。[12]（着重点是我加的）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已经就范，因为他正在主持4月6日

203 开幕的省的宣传工作会议。陶可能是按刘的建议行事的，刘至少在广州呆到4月6日，但陶愿意遵从毛指示的情况直到后来才被公开。确实，查一下4月13—22日《人民日报》的出版方针，可看出编辑部决定不提及党委第一书记的这类行动。有证据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想要避免暴露这样一个情况，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的彭真至今仍持保留意见。这可能是想保护彭，或是保住毛的面子，或更仅仅是不愿公开党内最高层之间的分歧。同时，这家报纸显然是向彭真呼吁——“要推动领导人”——结束他的抵抗。

……[13]……。[14]彭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北方人，[15]通过艰辛的经历而锻炼了组织才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他在中国北方国民党或是军阀统治的城市发动过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使他坐了大约6年监狱。1937年，他到延安，这时他已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并在党的系统中，迅速上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40年代初，他是毛进行第一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而成为中央党校的校长。[16]西方记者根舍·斯坦因当时曾会晤过他，彭的广博知识和充沛精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形容彭是一

个"高大壮实的42岁的人。在延安的那些人中，很难说清他主要的个性特征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斯坦因正确地意识到彭是党的"最重要的未来负责人"[17]之一，但是，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知识水平。……[18]彭认为他能作理论工作，但必须有人应付日常工作。[19]但是，他津津乐道的话无意中证实了他的同事们的看法：

> 个人不要读太多的书，只要读通一本就行了。我以前在监狱时，找到一本费尔巴哈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到现在，这本书仍是我的理论依据。[20]

204　彭当时意志坚强、作风踏实。一个与彭长期共事搞组织工作的人认为他"有很强的能力，他的工作作风很好。他站得高看得远。"[21]他管理着一个"独立王国"。10年后，毛抱怨彭管辖的北京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22]在1957年这可能就是事实。55岁的彭已经管理这个城市达8年之久。在这个首都要做违反他的意志的事显然是不容易的。例如，4月14日《人民日报》召开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一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已停滞不前。[23]但是，比提出这种观点本身更耐人寻味的是，座谈会不是在出版《人民日报》的北京，而是在天津举行的。座谈会的详情没有马上发表，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这家报纸不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可能是由于彭真的反对的缘故。

可以回想到，彭真没有正式出席3月15日—4月1日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但是，因为《人民日报》上未报导这次会议，所以他的挑战不为人所知。4月14日，该报刊登了一篇在彭的家乡山西召开的，显然是不那么重要的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导。会议3月26日就已开始，但报导没有提到第一书记参加会议的情况。[24]同一天《人民日报》的另一篇报导披露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正在学习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观点。这些机关的成员

(也是北京市党组织的成员）就能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领导与彭真不积极态度加以比较。

4月16日，《人民日报》对彭真作了一个更大的暗示，要他归顺。该报说4月10日关于鸣放的社论和周扬的谈话（转载在4月11日的报纸上）已经极大地加深了首都知识分子对毛关于矛盾问题讲话的理解。那些了解北京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情况的读者理当奇怪，这次会议为何没有因加深当地知识分子的理解而得到公开的表扬。第二天，这家报纸关于矛盾问题的第二篇主要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论及了彭真在东欧之行报告中205不赞成毛方针的主要观点：

> 批评是否有利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害怕批评会使内部矛盾尖锐起来复杂起来，会使党和政府或领导方面处于被动地位。[25]

报纸承认这种害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敦促这些领导在处于被动地位之后要争取更大的主动，如果矛盾不能解决，领导将处于更被动更困难的境地。社论再次对彭真和与他类似的人呼吁：党组织、国家机关和区县的领导者，今天首先需要鼓励和帮助群众充分地使用批评武器。[26]

《人民日报》4月18日的报导宣称，北京工厂的数千名干部热烈拥护毛讲话中的观点。如果首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支持毛，显然第一书记落在群众后面了，这就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他也落后于中国其它大城市的第一书记。上海的第一书记柯庆施已召开了一系列的关于矛盾问题的讨论会；天津的第一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为期9天的宣传工作会议。[27]但是，《人民日报》再次庇护彭真，它在报导这两个情况以及广东的宣传工作会议时，或是阻挠报导，或是不提第一书记的作用。例如，不刊载新华社4月

17日讯，该讯报导了柯庆施在上海的作用。[28]新华社4月18日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该讯不仅报导了当地第一书记的作用，还报导了康生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29]《人民日报》4月19日关于广东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导表明，这并不是记者的疏忽，这篇报导未提到第一书记陶铸的作用和刘少奇的讲话。新华社4月19日讯提到这两个人，但《人民日报》未刊登这条电讯。[30]

然而，到4月19日，彭真已被人规劝让步。在前一天，他的市报《北京日报》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该市的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导。[31]报导表明彭未在会议上起到应起的作用，所以透露这一情况大概是因为第一书记已决定让步。彭真的决定一定是在4月15日刘少奇和邓小平返回北京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之后作出的。[32]在此后几天的欢迎仪式间隙时，最高领导者有可能会面，并决定在最近开展整风运动——虽然此时他们可能还未商定发动整风运动的日期。刘的报告可能对彭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刘认为在他视察的5个省可以冒险发动整风运动的话，彭几乎就不能继续坚持到底。根据4月最后一周所发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领导者们重新在北京汇集时，毛仍然未能在发动运动的日期上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但毛使他们认可，有必要宣传他的观点。4月20日，就是伏罗希洛夫离京到外地访问后的第一天（这使首都的市长得以从照应贵宾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彭真主持召开第三次北京宣传工作会议——规模比第一次会议大一倍[33]——并在会上作了主要报告。

彭不得不取消以前说的话，欢迎党外人士参加整风，他降低了内乱的危险，他强调允许人民鸣放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显然仍不接受毛泽东的分析，坚持认为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党内。[34]

彭的让步极为重要，这马上在《人民日报》上反映出来。该报刚在4月19日登载了关于北京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导

206

(这篇报导发表在前一天的《北京日报》)4月21日，《人民日报》再次随《北京日报》之后刊登了新华社4月18日电，该电报导了天津的宣传工作会议和第一书记的活动情况——《北京日报》在前一天刊载了这一电讯。在另一个版面，《人民日报》发表了它4月14日在天津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几个发言。然后，4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通栏大字标题下，刊登了彭真在北京市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5]和4月16—19日上海会议的情况，第一次向读者公开了第一书记的领导作用。

207 如果这个大标题还未引起敏感的读者对彭真的退却的重要性足够注意的话，那么，第二天关于矛盾问题的主要社论一定能达到了这个目的。社论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第一次引用了随定一3月5日文章中的观点：一个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而且，社论用威胁的口吻向顽固不化的党的官员暗示，由于彭的让步，中央感到力量强大，足以对地位低的人采取强硬态度：

> 领导工作人员看不到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的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了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捆上了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36]。(重点是我加的)

社论在前面重复了要党委第一书记加强领导的号召，接着批评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党报的消极态度。

> 现在有许多党组织已经这样作了，但是也还有不少党组织的动作还很迟缓，劲头不足。党报的报刊(从本报起)在

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现在也还有不少报刊没有重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党内除了有一些同志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有怀疑以外，有更多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今天的国内生活中，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37]。(重点是我加的)

要说《人民日报》的编辑不知道处理矛盾的"重大的意义"，这完全令人难以置信。这段自我批评的话证实，编辑曾对这个方针抱"怀疑"态度，因为社论没有对这种落后行为作任何解释。

第三节　迅速发动整风运动

在彭真退却以后，毛迅速行动发动整风运动。在《人民日报》说要开展整风运动后的4天，起草了一个整风运动的指示，208 并于3天以后的4月30日发表，5月1日整风运动开始。即令全国从上到下的成千上万干部听了毛在4月讲话的报告或录音，公众对整风运动的思想准备时间也是不长的。确有证据表明，领导者们4月中旬开会时通过的计划规定的思想准备工作要长得多。

很清楚，《人民日报》4月23日社论发表的同时，发布了一个给党的书记们的秘密指示，也许是因为毛对前面两个主要社论的反应不满意[38]。上海和江西的报导表明，这个指示是以"检查贯彻执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情况"为题，也许于4月22日或23日下发[39]。

从各省的反应判断，这个指示可能象《人民日报》4月23日社论一样带有威胁的口吻。山东省委在23日下午两点匆忙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40] 同一天，江西省委发出一个通知，题为"继续深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41] 四川

尽管行动较早，4月19日就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到4月24日，省委也感到压力，发出了一个“通知”，停止正常的理论学习一个月，以便学习毛的讲话[42]。4月25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召开了一个党委书记的电话会议，并计划5月3日召开宣传工作会议[43]。其他省也开始发表报导，公布他们此时已做了什么，这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追随毛的方针路线[44]。

毛想对拖后腿的省的书记们施加压力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清楚的是，如果中央打算在4月30日发布整风运动的指示，为什么它要在4月22日或23日下发一个指示。至少，它可以给各省的领导打招呼，整风运动的指示即将发布，这样，就能使他们避免更大的混乱。例如，江西省委于4月27日下发了一个详细的通知，提出了处理矛盾问题的方法，这使它自己陷于窘境，不到10天，它不得不宣布：它正在根据中央的整风运动的指示考虑一个新的计划，在它有时间组织全省的整风运动之前，干部仍以省的通知为办事依据[45]。广东的党委在4月27日也发出一个关于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但是，3个多星期以后，也不得不发布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新指示。[46]

209

毛在4月下旬突然决定要立即开展整风运动，很主要的理由可能是知识界的意图仍是不确定的。4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文章，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早春”之感，是因为领导干部只是在口头上喊“百花齐放”的口号。因此，知识分子就说这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不得不猜测，鸣放的号召是否真有诚意，要不就是一种领导发现错误思想的手段。[47] 这篇文章显然触怒了毛，人们是能知道其原委的[48]。与费孝通关于“早春”之感的文章不同，翦文写于毛的矛盾问题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之后，而翦竟对鸣放方针的诚意表示怀疑。这些怀疑清楚地表现出对毛的诚意，或者至少对他贯彻政策的能力表示不信任。[49]

4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报导，报导非党知识分子对毛的矛盾问题讲话的含意的争论。邓初民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对"放"应该有限制——毛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特别反对这种限制——并建议"放"应该遵守四个标准[50]。邓初民显然没有听过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他的讲话表明，如果宣传当局没有宣传毛的讲话精神，知识分子就会采取自我限制的方针。毛察觉到这种情绪，他担心他讲话的影响会消失，因此他感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4月中旬，毛可能仅在不久将要开展整风运动和开展全国性的学习活动使人民做好整风的思想准备这两点上获得了同事们的同意，因而4月22—23日能够发出指示。毛决定立即发动整风运动的决心可能是在这以后下的，这时，刘少奇和彭真正在外地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如果指示的日期——4月27日——有什么含意的话，那就是表明它是当刘少奇和彭真不在北京时通过的(和起草的)[51]，虽然它到4月30日才发生这一事实表明毛感到有必要在发布前让他们过目。即使这样，他们也只得面对既成事实。国家机关党委早在4月28日就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显然他们这时还没有看到中央的整风运动的指示，但这并没有拦住他们不进行这运动[52]。当刘和彭返回北京时，毛可能已经着手要在4月30日秘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了[53]。虽然这第十二次会议是宣布整风运动的会议，但对它从未作过任何官方报导，这表明党的一些高级官员对这种方式严重不满，因为这会使党的干部遭到整风运动的冲击。

210

第四节　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刘少奇的上海讲话

把整风运动的指示与刘少奇对上海党的干部的讲话作一对照，就可看出，在整风运动前夕，毛没有通知他的高级同事。刘

讲话是在4月27日，与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日，如果较早就已取得一致的意见，应该在基本的观点上是一致的。而刘在最关键的问题，即党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各种有害作风的重点上与这个指示相左。

指示指出，社会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了，为了新的任务，党和工人阶级必须改造自己，但是，许多干部并不了解这一点。同时，因为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干部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办法对待群众"[54]。这个对执政地位腐化影响的强调显然就是反映了邓小平在八大的分析。因此，毫不奇怪指示继续指出最近几年"三害"有了新的滋长，并将它们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顺序排列，并以此作为发动新的整风运动的理由。[55]

211

在这之前，毛和邓都一直把主观主义排在首位，在1942年整风运动批判三害时，它就处于首位。[56]但是他们讲话的重点——邓在八大，毛在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所有讲话中——都认为执政地位（官僚主义的来源）比思想落后（主观主义的来源）更危险。《人民日报》4月13日的社论已开始强调官僚主义。

相反，刘仍继续声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主观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在八大上，他仅承认党的干部一直没有为迎接革命后的新任务作思想上的准备。从他的上海讲话可看出，当整风运动开始时，他仍坚持这个立场，因为他在什么是中国的重要矛盾的长篇讲话中，把"三害"排列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57]他首先讲思想上的错误，篇幅比讲官僚主义长得多，他对官僚主义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又转回到思想问题。[58]并且，当说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时（进行整风的主义要理由），只是把它作为诸矛盾中的一个。[59]

刘不把官僚主义作为最主要的有害作风，证明他继续不同意

毛对整风运动的目的的看法。而且，刘强调思想上的矛盾属于党内矛盾，认为要用党内方法来解决，关于这一点，陆定一3月的文章也提到过。[60] 他的讲话也表明他甚至对整风运动即将开始一无所知。由于我们只能看到他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所以不能妄下断言，但是，他讲话开头时未提到整风运动。如果他已知道整风运动的指示就在那天通过，并于3天后发布，那么，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失误。[61] 而相反，周恩来4月24日在杭州与干部谈话时却谈到了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62] 确实，从刘讲话较长的第一部分分析，他的讲话是按照未公布的4月22—23日的指示精神的。他宣传了毛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观点，向党的干部说明为什么现在要用更温和的态度对待人民。然而，整风运动的指示已超出这种观点，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指示侧重说明整风运动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证党的干部能更温和地对待人民。

212

这个讲话和整风运动的指示内容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这二者要采取"和风细雨"方针的侧重点不一样。指示提出整风运动应该是：

> 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63]

这显然是毛的意图，再次向党员保证，一定不采用过去对待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斗争运动。刘少奇也提倡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但是，他讲的是党员对待人民的态度应该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提倡少斗争；我们提倡和风细雨和强调小民主，因为它们（即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64]

以上的讲话再次说明，刘和毛在必须改善中共统治中国的方法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刘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上海讲话，虽然是冗长乏味的重复，似乎忠实地反映了毛的观点。[65] 有分歧的问题在于，哪一个有害作风——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是中共犯错误的原因；整风运动的形式——党内整风还是开门整风；发动的时间——早些还是迟些。

第五节　《人民日报》再次改变立场

213　由于整风运动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分析，所以它提出毛关于矛盾的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就不足为怪了。并且，指示把这些讲话称之为毛代表中央作的报告，而原先宣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并未这样说过（毛在会上作了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66]。指示要求党委各级学习这些讲话和其他有关文件，并要按此精神改进工作，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也许是为了笼络刘少奇，它提出，为克服知识分子干部的主观主义，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要求他们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但这个学习计划在以后才制定出来。毛显然不把这事放在首位。

向党员承诺不开斗争大会以后，指示说，那些被批评的人不应为自己的一切辩护，拒绝任何批评。但他又进一步提出保证，在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处分。

指示规定了其他四个要点。第一，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毛坚持开门整风）。第二，强调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联系群众（指示说，关于这个问题不久将作专门指示）。第三，强调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领导整风运动，并指出党委要组织领导小组。最后，指示规定："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67] 要注意，这个指示将整风运动放

在正常工作之前。

4月30日，新华社公布了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68] 同天，党报没有发表任何解释性的社论，这可能不值得注意，但是，5月2日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69] 与整风指示有严重分歧。它表明毛的某些同僚继续不赞同毛，甚至很愤怒，也表明《人民日报》已再次改变立场。

214 分歧首先是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理由。指示将社会关系的改变和执政党的地位作为理由；社论虽然提到指示中所说的某些有害作风来源于党的执政地位，但仅指出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是其理由。并且，在说到这些有害作风时——例如不能分辨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社论继续强调主观主义因素的作用，个别干部不了解情况或没有知识——这是它与4月13日的社论的显著不同之处。[70] 刘坚持这种分析（因为社论反映了他的观点），表明他最为忧虑的是毛和邓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矛盾来源的分析。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本根源，并官僚主义导致人民与党危险的疏远，那么，就可以要求不仅改善党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改变党的地位。毛在1957年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刘的忧虑也许是对的，9年以后，在文化革命中，毛的矛头指向了执政党的地位。

指示与社论的第二个重大的分歧是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方针。社论说：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的内部的团结和国际团结、关于工农联盟、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理论，都是我们今天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指针。[71]

社论断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以此为上述论述辩护。[72] 社论在后面提到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但未专门把它作为整风运动的指导方针。所有这些都是对毛的公开怠慢，也许反映了他的某些同僚对他采取整风的方式的愤慨。对于那些曾听过毛关于矛盾问题讲话原文的千万个中国人来说，这种怠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毛在讲话中曾断言：

215

> 这些问题在马列主义来说都是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知道这些问题。列宁提到过，但未作详细论述，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外因干涉，要只讲内部矛盾是困难的。至于斯大林，只能批判地对待他的观点。[73]

社论要剥夺毛在分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独创性的崇高地位的企图更进了一步。它认为整风运动的指示是执行党的八大的决议。[74] 就决议谈过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来说，社论是对的，但决议形成于匈牙利事件之前，而这个事件是促成开展整风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社论的作者不得不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5] 一文作为整风的根据，如果社论在这里也给毛的讲话以应有的地位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不适当的了。而它却较长地引用了毛写于 1949 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说明主席注重要用温和态度对待人民，然后继续写道："毛泽东同志今年 2 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同这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76] 这样说是对的（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的话），但这样提出毛一贯如此的结果，却是再次贬低了毛的讲话的独创性和重要性。然而指示规定毛的两个讲话是整风的指导方针，并宣布它们表明整风运动已有效地开展起来了。[77]

社论这样分析的动机也许不完全是为了报复。刘和他的支持

妙地指出，他们并不都是那么坏。社论还引用毛1949年提出要温和地对待人民的语录说明，从那时起，党就是这样做的。因而并没提出与此相反的意见。社论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是什么导致内部矛盾的分析加强了人们这个印象。社论认为首先是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再教育不够，其次才是党的干部的错误——并且是指经济建设上的错误，而不是联系人民方面的错误。[80] 甚至在论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时，社论作了一些修正，以缓和对党员的攻击。指示说"一部分"立场不坚定分子甚至沾染上了国民党作风；[81] 社论只把这种分子算作"少数"，并用含义较广的词"一部分"来形容有一般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的干部。[82]

217　5月2日的社论表明，《人民日报》在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大约3周后，又转回到了它从前的不赞成毛泽东的立场。在5月和6月初的鸣放时期，它仍坚持这一立场。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报纸是怎样控制的呢？

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只能做一番假设。我的假设如下，《人民日报》编辑首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胡乔木是这个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83] 胡又要对部长陆定一负责，陆是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按理说，陆应该对邓小平负责，邓作为总书记是总管中央各部的。但有证据表明，在共产党执政前后，刘少奇一直掌握着宣传和新闻的大权，宣传部官员通常直接向他报告。[84] 我想，毛一般不会干涉这个指挥体系的，但是，当4月初刘不在北京时，毛进行了干涉。4月中旬刘从外地巡视各省归来时，他与毛达成一个协议，同意发布中共中央4月22—23日的指示，并继续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毛的观点。由于整风运动的迅速发动，毛违反了这个协定。毛这样急于从事可能是了解到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支持他。如果是这样，刘就不能阻止整风运动的发动。但是，刘能保证《人民日报》对待运动的态度，

虽然是完全正确的，却能反映他的怀疑，事实证明，他就是这样做的。正是由于毛对只能断断续续地控制《人民日报》而感到愤怒，使得他在4月初提出了那个过激的建议，建议每省应有一个非党的报纸与省的党报竞争。[85]

注释:

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18号，第40页。
2. 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此前不久费到了全国许多地方，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这篇文章。
3. 4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讨论了毛在《正处》中谈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已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在了工人的后面。《人民日报》象毛一样，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4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引用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所说的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话，在此，该报再次选用毛言谈中那些有利于党的话，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不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而且，毛的原意被歪曲了，社论中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非党人士，但毛却没有把他们单划出来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曾这样说过:"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8页)当时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人五分之四都是党内的高级宣传和文化干部(同上，第29页，注释1，如同已指出的，出席会议的有380多各党内干部和100多名党外人士。参加会议的确切人数各种资料说法不同，4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超过800人——但是，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党与非党参加者的比例)。
4. 毛对华东局的讲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00—109页。他承认自己缺少群众基础的话见第105页。他关于"闹事促进会"的讲话见第103页。

1957年7月，毛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在此之前3月下旬的时候，他曾在上海作过另一次讲话（同上，第109页）。看起来不大可能把这另一次讲话与上文提到毛对华东局的讲话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混淆起来，除非得到新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毛在3个星期中对上海的同志讲了两次话，这充分表明了他与后者的紧密联系。

后来，毛曾指责宣传部门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宣传不力（我推测，这主要是针对胡乔木的）。毛宣称只要得到10%的支持他就很高兴了——但这是发生在事情已结束之后（同上，第150—151页）。

5. 对周扬的反感与惧怕，从1957年5月知识分子提的许多批评意见中可以看到。见麦克法夸尔："《百花……》第175、177—178页。周扬是唯一表示公开支持毛的中宣部高级官员，他有点出乎意外的行为也许是因为毛支持他在幕后同丁玲和其他党内作家作斗争。1957年1月，毛曾建议把公开批判作为最好的办法来对付丁玲等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76页）。
6. 我们将会看到，周扬采访记的发表并不是这一时期上海走在北京前面的最后一个例子。显然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高级党的官员对陈其通一伙人的首次攻击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这并不是上海和《文汇报》最后一次为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文汇报》在1965年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
7. 见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 同上。
9. 同上。在这篇社论的前面部分作者无力地提到《人民日报》登了陈辽和茅盾写的批评文章和报社写的关于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论的内容摘要（直到4月4日才付印）等，试图以此说明，虽然《人民日报》严重地落后了，但一直还是站在正确路线上的。
10. 这些社论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4月17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4月22日）、"全

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23日）、“从各民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月26日）。

11. 我在这里用的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31号，第12页上的社论的译文。

12. 同上，第5页。

13. 1968年2月10日《工人造反报》文章：《批判陈丕显的5次假检讨》。陈丕显被描述为只懂得欺压人民的人物。

14. 1966年彭真被打倒后，刘少奇告诉一群非党人士说，这位前市长的主要错误是严重的“宗派情绪”（《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第39页）。考虑到刘的听众的成份，人们必然得出结论：除了别的以外，刘显然是在说彭不喜欢非党人士。

15. 《反党篡军分子贺龙的滔天罪行》之一，载1967年1月28日《体育战线》。

16. 见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中彭的传记。

17.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9页。

18. 1968年5月15日《文汇报》文章：《打倒国民党大党阀彭真》。

19.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滔天罪行……》《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39号，第16页）。相关的引文是：“说我没有能力做理论工作，这不是事实。但是中央的许多工作总得有人去做。

20. 同上，第3页。

21. 这是安子文的看法（主张）。1957年起安任中央组织部长。见1967年5月20日《追穷寇》上的文章：《打倒大叛徒安子文！砸烂旧中组部的独立王国!》。

22. 1967年10月17日《政法红旗》第5页。

23. 参见麦克法夸尔：《百花……》第26—27页。

24. 为什么在这时发表关于上海会议的报告，原因并不清楚。

2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6号，第9—10页。

26. 同上，第3页。

27. 上海、天津同北京一样，都具有与省政府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城市。

2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6号，第9—10页。

2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21—22页。毛派康生去天津，是让那里的党组织就范吗？天津离北京很近，大概对首都的各种趋向很敏感。

30. 这一新华通讯社电讯可以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18号，第39—40页中找到。有趣的是，《广州日报》的读者直到4月23日才看到广东会议的第一次完整报道。

31. 这个时候《北京日报》的出版方针也是有趣的。4月14日，它象其它省的报纸一样，也转载了《人民日报》关于矛盾讲话的第一篇社论（4月13日发表）。同时，《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北京党组织如何安排传达毛对万人大会讲话的报道。这个报道也许要暗示读者，北京党组织已经预料到《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4月18日的《北京日报》可能给人以同样的印象。它同时发表了北京第一次宣传会议的报道与《人民日报》第2篇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社论（4月17日发表）。4月20日，北京市第2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新华社关于上海和天津会议（表明那两个城市的第一书记的作用）的报道，还发表了中央机关关于学习毛的讲话的一篇文章。

32. 邓小平4月14日回到北京，陪同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接见几个代表团；在此之前，有一个多月没有报道说他在首都。14日下午刘少奇在这个场合没有露面，可能他是当天晚上回来的，甚至可能是在15日上午回来的，因为伏罗希洛夫下午3点才到达北京。

33. 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超过1400人（《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1号，第1页）；第二次会议的参加者是2800人（《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17号，第5页）。

34.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北京：新人大公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967年5月）第14—15页。

35. 不清楚彭真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在4月21日的报纸上报道。难道发表他的讲话还要经过毛的批准吗？文化大革命的一份材料批判彭说过的话："有些人说，'15年间，文艺界被教条主义统治着；既没有产生好的作品也没有出现优秀作家'。15年就是毛主席发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15年。在这一期间果真既没有产生好的作品又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家吗？没有。将来会有吗？你们可以讨论。但我既不想作任何预言，也不想作任何评论。"(《中国大陆杂志选》639号，第1页)
3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18号，第4页。
37. 同上，第2页。
38. 《人民日报》的报道指出，江苏、浙江和河北对4月13日社论作出了反应（参见《人民日报》4月22日〈关于江苏的报道〉和4月25日对这些省的报道）；江西和四川对4月17日社论作出了反应（参看4月23日〈关于江西的报道〉和4月25日的报道）。
39. 参看1957年4月24日山东报纸《大众日报》所载省委书记夏征农的报告的第4点；再参看4月28日《江西日报》所刊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报告（后面这个报告据说被转载于4月29日的《人民日报》）杨说，中央已发出了关于学习和贯彻毛的论矛盾的讲话的指示。这个指示可能是指整风指示的第2部分（参见《人民手册》1958年，第29页）。
40. 《大众日报》1957年4月24日。
41. 《江西日报》1957年4月27日。这个通知的题目显然是模仿了中央指示的题目。
42.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43. 《安徽日报》1957年4月28日。
44. 内蒙古和新疆明显地只是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两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已在最近结束的会议上讨论了矛盾问题（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江西和山东的省委领导人也关切地证明了他们已经卓有成效地按中央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了。江西的通知的题目中使用“继续”这个词便是一个标志。在山东，省委书记夏征农竭力告诉他的听众，省委领导已经在考虑如何推进对毛的报告的学习、宣传和贯彻的问题，这个会议正是为了把省委常委的决定通知给干部而召开的。事实是，直到当时只有省委常委这么一小部分人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有损形象的承认；另外一点是夏征农表示省委常委已经采取步骤来宣传毛泽东的讲话，——比如将要在5月底召开党员和非党群众的一个宣传大会！(1957年4月24日《大众日报》)

45. 《江西日报》1957年4月27日和5月5日。江西的通知标明日期为4月23日，但到4月27日才发表。

46. 学习的指示4月26日作出，4月27日发表于《南方日报》；整风指示5月15日作出，5月20日发表于《南方日报》。

47. 这篇文章部分内容在麦克法夸尔的《百花……》中翻译出来，此书第27—28页。

48. 参见《反党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红旗》1966年第15期(《中国大陆杂志概览》556号，第5—6页)。在这篇文章中，指责翦和费孝通煽动资产阶级右派发动进攻；再参见《毛主席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红色批判者》1967年6月16日，第2页第2栏。这篇文章说，毛《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翦的回答。

49. 周扬在毛为驱散春寒进行的显然是不成功的努力中助了一臂之力，他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试图促使春暖的到来（参见姚文元《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分子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中国大陆杂志概览》559号，第11页))。

50. 参见麦克法夸尔《百花……》，第29—30页。邓初民关于4条标准的提议清楚地表明，在毛的矛盾讲话的初稿中没有讲到批评的标准问题。

51. 刘于4月22日在上海接见了伏罗希洛夫，并似乎一直陪同他，直到这位

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4月25日上午离开为止。4月27日，刘对上海干部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在此期间他似乎不大可能闪电般地回过北京。如果他4月26在日北京的话，他一定会迎接缅甸高级议员的到来。这是全国人大的客人，而刘是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可是，他4月28日才接见这位缅甸议员。

彭真4月25日在杭州陪同伏罗希洛夫，4月28日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到了广州，并于4月29日同他一同回到北京。在这个关键时刻，彭离开北京是令人奇怪的。所有其他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全国各处的重要官员——朱德（在东北）、刘少奇（在上海）、周恩来（在杭州）——都是政治局常委。如果邓小平在北京忙于监督整风指示的起草的话，还有陈云可以陪同伏罗希洛夫去广州，保持一位高级领导人陪同这位苏联领导人。（陈看来在一段时期里在北京的外交礼节上只起相对较小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理由说明彭为何留在北京。由于五一节即将来临，他的主要副手又刚从重病中恢复（《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在一个报道中提到北京领导人参加体力劳动），人们会认为首都的市长和第一书记将亲自监督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到来，五一的庆祝活动就显得更为重要。不管怎么说，彭真不习惯于作一个陪同官员，他几乎每天都需要在首都履行外交礼仪。（由于刘和彭此时同时外出，缅甸的首席议员只好由一位非共产党员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来欢迎了；彭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本应该在场。）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党中央书记处准备开始制订整风指示的话，那么第二书记彭真难道不希望参加起草，以便保证指示尽可能地同刘少奇和他自己的观点相吻合吗？可能起草指示的决定是在彭离开北京去杭州之后作出的；或者，彭也许公开希望自己不参加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

52. 参看《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661号，第19页。4月30日党委再次开会研究整风指示。

53. "右派"马哲民发表于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的坦白（译按：题为《我要重新做人》）中说了最高国务会议的会期。在毛对他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话作广泛的论述时，这位主席的话似乎是防御性的，强调了他讲话中关于敦促资产阶级忠于无产阶级的那一段话。（参看他在 1957 年 10 月 13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136、138—140 页。毛 1958 年 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上，第 158 页。再参上第 278 页）。

54. 这个指示的新华社英译文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0—42；这段引语出自第 40 页。

5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0页。

56. 参看毛的《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5—36页。这篇文章排列的顺序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当时与官僚主义等同）。在八大和宣传工作会议上，毛列的三大错误的顺序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的将它们排列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奇怪的是，在公开发表的关于矛盾讲话的文本里，没有象上面那样点明三大错误，尽管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引起人民骚乱的主要原因（参看《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其分析》第 291 页）。

57. 参见刘选集第四卷，第65页。除了已经引证的关于强调官僚主义或主观主义重要性的观点外，还应指出，毛一直把词语的顺序看作是政治态度的主要标志。1959 年，提到对大跃进的批评时毛说："例如他们说，'有失有得'。把'得'放在后边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麦克法夸尔《论照片》一文中已引用论述，《中国季刊》1971 年 4—6 月，第 291 页）。

58. 参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65—69 页。刘在对官僚主义的简短论述中说，他也为官僚主义大伤脑筋—我就有不少官僚主义（第 67 页）。刘也许打算说明，他自己承认这一点，可以强调官僚主义的普遍存在；事实上，这也许在听众眼中

减低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会认为，刘不大可能整顿自己的作风。

59. 同上，第67页。

60. 同上，第65页。

61. 从文革资料中有关刘的讲话的其他部分摘下来的几条引语可以看出，他在论断矛盾的普遍存在之后，话题转到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具体矛盾（见上文，第196—199页），例如工农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见1967年2月1日和8日《井冈山》所刊文章："《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言论100例》；同上，1967年1月1日第3页，《看刘少奇的凶恶嘴脸》；196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文章："《彻底批判反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驳斥中国赫鲁晓夫1957年在上海党员和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62. 麦克法夸尔：《百花……》第31页。

6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1页。

64.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71页。1月，邓小平在天津讲话中表示反对在人民和党内开展大民主（见上文，第178页）。

65. 文革中，刘由于在这一讲话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而受到批判。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38号，第5—11页引用过的文章。但是，正如刘在八大的讲话所进行的批判一样，这些批评似乎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刘并没有如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太过分，而且刘显然也不比当时毛打算做的更过火。

66. 1957年3月3日《人民日报》。

6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2页。

68. 虽然这一指示注明的日期是4月27日，但是在4月30日以前它并没有普遍地下发到全党，许多省的反应为此提供了证据。陕西省委4月30日才接到指示，省委书记们立即开会研究如何加以贯彻执行。次日晨8点召开了省委会，讨论书记们提出的计划（1957年5月1日北京电台的广播，见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661号，

第19页)。江西省委直到5月2日才开会讨论这一指示(1957年5月5日《江西日报》)。然而，中央国家机关于4月28日，抢先发动整风，这一行动表明，在首都，很多干部一定早已听到了风声。

6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5号，第1—6页。

70. 能说明5月2日社论重点的是这样一个例子，整风指示说，"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但社论却仅仅提到，不少同志倾向于靠发布行政命令这样的简单方法来解决问题。

7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5号，第2页。

72. 同上。

73. 这段引文摘自《纽约时报》记者在华沙得到的《正处讲话》文本，见本书第270页。

7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5号，第1页。

75. 同上，第3页。

76. 同上。

7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0页。

7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5号，第3页。

79. 同上，第1—2页。刘在上海的讲话支持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但是，他并未指出是生产关系落后还是生产力落后，从而模糊了毛的观点与八大决议之间的分歧(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第66页)。

80. 同上，第3页。

8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0页。

8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5号，第5页。

83. 这些年里，胡乔木在新闻出版界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吴冷西的交待中可以看出来。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号第65—66页、68页、72页、74—75页、79页。

84. 同上，第65—70页、72页、76—77页。

85.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06页。

评者所指责的具体内容。但是，为了对最高层领导在整风问题上的分歧提供背景和了解为什么毛泽东最终不得不同意放弃他发动的整风运动所采取的形式，对整风的发展过程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是必要的。

5月1日，整风指示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同时此报在下面刊登一条新闻，报道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已经决定立即发动整风运动。第二天该报又报道说，直属中共中央的机关党委已经开始为自身的整风进行紧急部署。周恩来、邓小平显然正在敦促他们所管辖的单位采取行动。然而，刘少奇和彭真在他们管辖的那一部分中央政府机构——人大常委会，似乎压制了对整风表现出来的热情：5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条具有启迪意义的新闻报道说，周恩来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国务院和人大常委

219 会所属部门的党委书记开会，决定怎样开展整风，会议还商定了关于整风的若干方面的问题。但是，当讨论到如何进行运动时，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习仲勋为首的仅仅负责国务院各部委运动的领导小组。对人大常委会各个机构的运动，却未做任何安排。看来，周恩来这次意在使他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同事开始行动的努力是不成功的。[2]

整风的反对者们所关注的是在运动期间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即保证执行"和风细雨"的政策，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如何使整风不致妨碍正常工作。[3]《人民日报》一方面公开支持整风，另一方面在阐述这三个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正好符合整风反对派的想法。然而，可能是由于毛的坚持该报也转载了上海党报发表的坚决支持整风的社论。[4]

但是，支持整风的一方采取的最主要的步骤是让党外人士参加整风。从5月8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主要的党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北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党的批评。[5]接着，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在各类组织的主持下，举行了类

似的座谈会。5 月 13 日，文艺界主管宣传的首脑周扬在中国作协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鼓励批评者说，甚至“那些讲了反革命话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6] 开门整风搞起来了。但是毛也不得不同意让批评者任意鸣放而不予反驳的状况上能持续 1 个月。一个秘密的党内指示把 6 月 7 日作为截止日期。[7]

到 5 月中，支持整风的一方在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上赢得了胜利。但他们的对手通过提供整风有害于工作的证据正在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然而一直到 5 月 19 日，毛似乎仍感到运动正在按计划进行。当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鼓励继续辩论，并指责那些忧心忡忡的党员。该报还宣布人大常委会已决定于 7 月 3 日举行人大年会。在 5 月 19 日到 25 日之间，最高领导层，也许包括毛在内，开始有了新的想法。5 月 25 日做出决定，人大会议推迟到 6 月 20 日召开。[8] 与此同时，毛对批评者发出了警告。他对出席青年团（译按：青年团这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9]（着重点是我加的）后来证明，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意味深长的。[10] 但是毛为什么发出这个警告，并且又是针对谁发出的这个警告呢？

220

毛选择青年团的领导来讲这番话表明青年是最令他担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5 月 15 日会议开始时，毛在与青年团的代表们谈话时并没有讲过类似具有分量的话。[11]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发生的情况是：以北京大学这个最高学府开始的鸣放已扩展

到其他大学，并正在象滚雪球般地迅速发展。5月19日，北大学生受到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激励，[12]开始在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墙"的地方贴出大字报。[13]据一个在场观察者说，"长期受压抑的感情、要求、不满和挫折感如暴风雨般爆发出来。每日贴出成百张的大字报。运动的目标不断扩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抨击。"[14]在这些大字报中，肃反运动造成的冤案、党对教育机构的管理、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高等院校课程的过度政治化、党的官员对党外教师和学生的宗派主义态度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15]不久，学生开始讨论那些和他们并非直接有关的问题：党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水平是否真正有了提高。[16]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女学生林希翎在北大的"民主广场"发表了演说。[17]她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生中最直言不讳的一个。林小姐提出了作家胡风的案子，此人在1955年被指控为反革命。林断言他没有严重的错误，说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讲到胡风问题时，林声称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18]她还指责党员想要压迫人民并采用目的在于压迫人民的政策。[19]

221

在讲演快要结束的时候，林希翎说："北大已经行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学生都正在行动起来。"[20]如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所证实的那样，正是这种前景使最高领导层感到担忧。5月25日，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宣布人大年会不得不推迟召开的时间，他警告说："……使整风运动搞得更好是每个人都应注意的问题。如果指导得不好，就可能出问题，人民会走上街头……大学和中学已经在活动中，如果工人群众行动得慢些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工人、中小学的教员和其他群众组织也开始动员起来，我们将无法坚守阵地……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事态，那么很快成百万的人将会起来，使我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对我们将是不利

的。"[21]

刘少奇表示出来的忧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直到5月25日他讲话的时候，各地学生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因缺少相互了解而受到约束。林小姐在两天前的演讲中曾抱怨说："我们无法相互联系，了解不到情况，存在着新闻封锁"。[22]

5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报道了北大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这些报道立刻对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发生了影响，[23]形势迅速起了变化。北大的一些学生也自己行动起来。6月2日，他们跑到天津去煽动那里的大学生。[24]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学生懂得他们是在玩火。[25]毛对青年团的代表们讲过，"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句话很快地被用白色的大字刷在了北大的"民主广场"上。[26]但是他们却宁愿对此置之不理。

学生的鸣放之所以迅速高涨以及鸣放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反党的倾向，一条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整风运动初期的关键时刻，那些最有经验的团干部都去参加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了，[27]原则他们是能够将辩论引导到较温和无害的基础之上的。当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到他们的校园时，他们发现形势已无法控制。[28]5月27日之前，[29]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部分章节已在北大张贴出来。这是从《纽约工人日报》发表的节译本译过来的。[30]尽管北大党委在一两天内揭掉了张贴物，但有关这一报告内容的新闻肯定已在北京高等院校不胫而走，广为流传。[31]

222

看到骚动在发展、毛和他的同僚必定想到了两个前例而感到不安。尽管1957年中国的国内形势与1956年匈牙利的国内形势有很大不同，但匈牙利的叛乱是个样板，[32]表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够对党发动强有力的攻击。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到他们正在模仿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其中有些人后来而因此受到非难。[33]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则有1919年五四运动的先

例。[34]1957年5月，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忘记，将近40年前，他和他的同伴们通过示威游行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周恩来就肯定不会忘记。[35]5月30日毛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对待这样一个民族，遵守某种界限是必要的。"[36]

6月6日，许多高级的党外民主人士和学者开会讨论形势的时候，引用了匈牙利事件和五四运动。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他想必是消息灵通的，当时曾说道："当前学生有很多问题，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一旦他们走上街头，市民将与他们汇集到一起，情况就将更糟。因为目前群众也对党不满……党脱离群众已到了严重的程度。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形势已非常紧急。目前的形势已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前夕的形势极为相似。党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当前整风的形势。**很可能党一直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会提出许多问题而青年学生则肯定不会，结果却恰恰相反，这已使党处于被动的局面**……（着重点是我加的）上海的形势可能比北京还要严重。"[37]曾昭伦对于党对整风形势的发展感到党外这一点所作的这番评价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后来被指责为两个主要右派领袖之一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同意曾的评价，并指出了另一点："当前的整风运动需要党外人士发表意见，对于这样做的结果，我想，年高德劭的毛泽东是这样估计的：民主党派总是温文尔雅地提出批评。但是这个估计是不全面的。谁也没有想到党竟然会犯了这样多的错误。"[38]

223

另外一位教育家、首都主要高等院校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在会上说，他收到农民的来信，要他劝告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这样做了，但是学生们决心已下。这看起来真象五四前夕的情况。他们不愿意听他们父母亲的劝告，就象我们当学生时不愿听我们父母亲的劝告一样……"另外一位会议的参加者，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正在发生的情况指出："有些人说，当前的形势是五四运动以来未有先例的。"[39]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如同后来批判他们的人所说的，可能从这次危机中看到了在政治上有机可乘。章伯钧似乎已经感到，如果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把局势平息下去的话，他和他的党——民盟是可以扩大影响的。[40] 但是，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如同后来有人断言的那样被事态的发展冲昏了头脑，以致认为大势无可挽回，过高估计当时形势所具有的爆发力。当然，6 月 12 日和 13 日发生了湖北汉阳学生闹事——被其煽动者说成是"匈牙利事件的缩影"显然很快又证实了章等人的看法。[41] 当章伯钧和其他人试图向周恩来表示愿助一臂之力时，这位总理不愿做出评论。[42] 但是，许多政治局委员私下里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赞成 6 月 6 日的会议对形势做出的估计的。

这一假设不仅可以从 5 月 25 日毛、刘各自所做的公开的与秘密的警告得到说明，[43] 而且可以从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大学师生对公共秩序不构成威协的估计得到说明。刘否认来自这方面的危险，他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44] 然而，在下述两个方面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中共表现得漫不经心，还让林业部部长罗隆基——据称，他和章伯钧一起，被说成是一个反党集团的头目——于 6 月 3 日，即反右即将开始之前，出国访问[45]；另一方面中共在进行反击时对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却大加挞伐，其中包括处决汉阳闹事的学生领袖。[46] 处决是在 1957 年——1958 学年开始的时候执行的。1 个月以后，1000 多名重要的党的官员被调到大学工作，其中 200 名被委以校长、副校长这类高级职务。[47] 而在此之前早就做出了一项决定，要求高等院校的每个毕业生在分配工作前参加一次政治考试。[48]

担心又一次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政治局的多数人确信有必要进行反击，毛可能一直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陈伯达参观了北大校园，断言新华社关于那里的骚乱的秘密报道是言过其实的。[49] 此外，毛曾公开宣称他对骚乱毫不在乎。[50] 然而，由于他

224

未能实现他对党的作出搞"和风细雨"的整风的诺言，他的立场动摇了。同时，中共的干部因在整风中受到严厉的谴责，士气已低落到危险的地步。[51] 这样，毛不得不同意实行反击。这一逆转使毛十分恼火，把他的愤慨发泄到了那些促使整风激烈程度逐步升级的报纸身上。5月中，他已经秘密写下了一篇关于新闻报导中的修正主义的文章，他写道：

>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52]

值得注意的是，毛的愤慨是通过谴责一份报纸——《文汇报》的方式出来的，尽管使用了匿名但这是他在反击开始之后感情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公开的表露。[53]

也许势难避免的是，党必须断言有一个反共产主义的集团存在，以解释整党中出现的反党潮流。但是之所以选择非党的部长章伯钧和罗隆基作为这一集团的领袖，很可能是由于他们与那些在鸣放中起了领导作用的非党报纸有联系。章伯钧是《光明日报》的社长。[54] 该报的编辑因派记者到9个城市去召开提批评意见的座谈会而受到攻击。[55] 罗隆基通过他的老朋友浦熙修小姐（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小姨子）对《文汇报》有巨大影响。浦小姐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实际负责人。[56]

225

第二节 “和风细雨”问题

当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它的反对者没有料到在5月底之前他们会得到借以要求停止整风的有力论据。因而当时他们找出了一些问题，据此至少可以使整风运动受到限制。其中，“和风细雨”问题证明是最重要的。

两个月之前，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提到过“和风细雨”。[57]他把“和风细雨”与“小民主”，即整风指示中提倡的同志式的谈心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是，象刘一样，毛也设想了“大民主”——大的斗争会的不可避免性。不过整风指示规定，除非官僚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一概禁止采取这样的方法。[58]显然，毛为了使整风更易于为党员接受而做了重要的让步。但是，党员的忧虑可能一直存在，因为毛认为中共对待资产阶级总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态度，从理论上讲也许是这样，但是5月里开展的批评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毛后来自己指出，中共对待知识分子要比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59]

5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反映了党员的忧虑。在解释为什么整风指示强调这一方法时，社论说：如果党不行动起来纠正不好的工作作风，“这对于一个以服务于人民为自己的天职的工人阶级政党来说，自然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党为要整顿自己的作风，就片面地强调给予所有犯错误的同志以纪律处分，甚至用纪律处分代替了思想教育，形成了惩办主义，这对于我们党也是极其危险的。”

226

在这里，社论实际上是把粗暴地对待人民的严重后果与粗暴地对待犯错误的党员的严重后果等同起来了。但是毛泽东发动整风却是出于对前者而非后者的关注。

社论接下去引用了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的话，强调指出那种对干部的错误不是从思想上根本解决问题的极为粗暴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然后，为了让心存疑虑的党员放心，社论在谈到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时指出："我们党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就确立了对待党内错误的正确方针"。正是在遵义会议上毛开始了对中共的领导。提到这一点意味着毛和刘在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整风问题上存在着分歧。[60]

在一次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讲整风问题时突出地论述了毛的反对者强调的"和风细雨"方法的重要性。《人民日报》报道了彭的讲话，其中一半以上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报道援引彭真的话说："和风细雨"的方法是这次整风运动的"特点"。[61] 这话是针对着党员的忧虑而说的。只要党员们被告知"和风细雨"的方法一直是先前思想教育运动的特点，他们就不可能安宁。彭好象是正在做出个人的保证，说"和风细雨"是一种新的方法。当然他不会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因为那将意味着指责以前历次运动的作法。

关于彭真讲话的报道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在它的第二版；这份报纸再次强调了"和风细雨"方法对干部的重要性。这一版的"党员来信"栏中登了一封信，要求澄清这一政策。信的题目是：《应当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作者曾志问道：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适合于任何人吗？这封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概述了干部的忧虑，而在于它的作者的身份。报上没有透露身份的这位作者——不仅是广州市委的一个高级官员，而且还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夫人——这一点才是更值得注意的。

227

与广东的党组织在体力劳动问题（将在下一节论讨）上的态度联系起来看，这封信表明4月底彭真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有政治考虑的。）

如同已经表明的，彭陪同伏罗希洛夫去广州可能是尽力使自己不公开参与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如果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也可能想要与陶铸商讨。陶铸对于整风的态度彭可能已由刘少奇那里得知了。[62]

当广东的党组织通过陶铸夫人的信强调“和风细雨”政策的重要性时，刘少奇和彭真似乎已在党员面前被精心地描绘成为这一政策的保护者。然而，如果把刘，可能还有彭看作是犯错误的党的干部的毫无疑问的保护者那就过于简单了。5月7日，刘少奇对高级党校的校长杨献珍和杨的一个同事说：“必须把原则性的问题搞清楚，但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决不应伤害人们的感情或者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当然，我们也决不应因为正在采取这种和风细雨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对原则性的问题漫不经心。这种用来解决思想问题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既要团结同志又要分清是非。在执行中经常出现的偏差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这是很高明的艺术，仅强调一方面是不行的。”[63] 如果以为陶铸与刘、彭在所有与整风有关的问题上看法都一致，那也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4月陶在广东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的精神比刘的观点更接近毛。此外，陶象邓小平而不象刘，他明确地承认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64] 刘、彭与陶是在反对可能使党陷于混乱的过火的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当“和风细雨”的政策未能实现的时候，毛只好同意停止运动。

228

第三节 体力劳动问题

整风指示的另一个基本点是坚持领导干部以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目的在于“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65] 整风指示指出关于这个问题将

另做专门指示，这充分证明这个问题对于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党的主席再次意外地遇到了来自刘少奇、陶铸等人不同意见。

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群众共甘苦》的社论。[66]社论指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避免脱离群众的重要途径。在提到延安时期领导者们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时，社论问道："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他们（译按：指领导者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呢？"[67]接着社论详尽地阐述了与群众同甘苦的重要性，并引用了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68]这段引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本未提到体力劳动。刘少奇勾画的是一个具有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善于了解群众愿望的领导者的形象，但是这个领导者并不必须是一个实际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实际上，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不必参加体力劳动，刘所列举的党员应有的种种品质已是以保证一个领导者具有美德。当然，刘的话是在党的领导尚未考虑到这个问题时讲的，他不必为没有提到体力劳动而负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957年5月形势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229 《人民日报》却仍从刘的报告中选引了这一段显然丝毫也没有涉及到社论主题的话。紧接着这段引文，在社论的最后一段里，社论的题目和刘的语录的含义已清晰可见："每个领导人员一定要做到关心群众的痛痒，同群众共甘苦，并且尽一切努力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把自己同群众之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都打破吧！把阶级社会遗留的影响尽快地象清除垃圾那样扫除掉吧！放下'官架

子'，走到群众中间去吧！"[69] 这些确实都是令人钦佩的情操，但却只字未提到要参加体力劳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中举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例子都只涉及下层官员。

这个社论表明存在着争论，即对于忠诚的党员来说参加体力劳动到底有多大的必要。社论还表明，那些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是不必要的人正在强调领导干部工作的极其繁重，他们可能希望在中央关于体力劳动的指示中能加上一条：如果谁能说明自己没有"时间和机会"的话，他们可以被允许免除体力劳动。

在整风指示公布以后，这一争论持续了两个星期。5 月 4 日，上述社论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省（它环绕着北京）和天津市的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消息；又过了一天，他们劳动的照片登出来了。[70] 这条新闻似乎已使全国各地的第一书记确信，他们不可能再逃避体力劳动了。随后，《人民日报》关于 10 省的一个综合报道把 5 月 5 日作为其他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早日期。[71] 5 月 7 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政治委员朱良才将军参加了体力劳动，然而他们的照片未出现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直到 5 月 9 日……彭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及其他官员参加了修路的劳动。5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参加劳动的照片，同时用醒目的字体刊登了他劳动时的讲话："我对体力活还很熟悉，从小干过 10 多年的庄稼活。在延安的时候，很多中央负责干部都下地劳动，现在应该发扬这个好的传统。"[72] 仅仅是到这时候《人民日报》才登了关于 10 省情况的综述。这一报道使人发现，这 10 个省的第一书记几乎都参加了劳动。[73] 但是从这个综述中可以得出一个更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半数以上的省和直辖市在这个问题上仍在观测风向。

230

彭真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中央关于体力劳动的指示所标明的日期是 5 月 10 日，正好是彭真参加

修路的第二天。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可以由这一指示直到14日才公布这一事实看得出来。在这段时间里，广东省则是我行我素。

广东是那些在体力劳动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己观点的省分之一。那里的党的领导官员直到5月11日才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比《人民日报》报道彭真参加劳动还要晚一天。[74]5月13日，广东省委常委会开会制定了关于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尽管中央的整风指示已明确地指出中央将随即下发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看来广东省委是在企图用自己的计划对中央即将做出的指示施加影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新华社关于广东这方面活动的一条长长的电讯中根本没有提到陶铸的名字，[75]这与5月10日《人民日报》简短地报道9个省的活动时每一篇都突出地提到第一书记的名字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5月14日，就在中央关于体力劳动的指示在北京下发的同一天，广东省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体力劳动的计划，[76]该计划规定，所有60岁以下适于参加体力劳动的领导干部每月平均劳动两个半天。[77]在中央的指示中则没有这样的年龄限制，它规定所有身体条件允许的人都要参加体力劳动。中央的指示指出，一些同志仍然对县、区、乡以及县以上的机关干部直接参加生产劳动顾虑重重，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影响领导工作，[78]从而指出了幕后争论中反对者所持意见的主要依据。中央的指示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指示中没有提到“时间和机会”的限制条件，并把中央委员也要参加劳动明确地写在3条款里。5月15日，中央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刘少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他对共青团的一个官员说：“如果你不参加体力劳动，那么你就做不好青年工作。”[79]

两位党的干部利益的保卫者现在都支持体力劳动的政策了。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二篇社论。这

231

的排列是正确的，文章中却不正确地说，在整风指示中中央委员会已经规定了"工作和整风两不误"的原则，这一排列次序在文章中出现几次颠倒，显然绝非偶然，因为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要指出许多中央国家机关过分突出了整风。虽然中央政府的机关党委规定每周学习两或三个下午，有些单位却占用了3个整天或5个下午。学习时工作完全停顿，没有人接电话，没有任何负责干部值班。文章说，这种现象必须制止。[83] 国家机关对于整风的过分熱情不大可能是"评论员"虚构出来的，但是可以肯定，《人民日报》是欢迎有机会强调整风的危险和批评周恩来的下属的。

这一假设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证实。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用笔名发表了邓拓写的一篇严厉指责"庸人政治"的文章。[84] 他用这几个字眼批评一些干部的爱管闲事，插手一切，结果却往往使事情办得更糟糕。邓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干部，他们仅仅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牠们无休止地召开会议，发表讲话，写各种报告，忙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很清楚，邓拓下笔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的状况。他建议人们等待这些庸人冷静下来，然而他又承认，实行符合情理的政策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身旁的庸人众多，他们又有权发号施令"。他提倡对不了解的问题要取谨慎态度，但是他又承认，在当前"我们的领导者要求我们放手、放手、再放手"的时候，是难以采取这样的态度的。因为这样的态度易于被指责为放弃领导。这些话无疑是对毛的有意挖苦。

233

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对干部指出了不应允许整风干扰日常工作。但是除了在广东，这一信息没有任何发生了作用的迹象。根据可以得到的证据，广东倒有可能已与《人民日报》联合起来，试图把反对整风支持工作的意图贯彻下去。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华社发自广州的消息。这则消息说广东党已决定支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力求避免"狂风暴雨"("和

风细雨"的反面）和"赶任务"。这两种现象已经出现。为了纠正这两种现象，5月17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星期内）广东省委决定整风计划规定的时间应延长。原规定6月开始9月结束的单位重新规定为5月20日开始11月结束。这一报道令人寻味的是，广东省泄露了还没有公布的一个整风计划的修改细节。广东的整风计划注明的日期是5月15日，但是直到5月20日才发表在《南方日报》上。[85] 假设新华社的消息是准确的，假设在判定出最初的整风计划的两天里广东省委常委会决定修改这一计划，常委会选择发表计划的修改案而非原案就意味深长了。这些改动是用来讨毛在北京的反对者的欢心的。再一点令人寻味的是，这个计划本身并没有提到据说是导致这些修改的理由，也没有对"狂风暴雨"或者"赶任务"的作法提出警告。这只能说明有人事先有意对新华社的记者透露了广东省委对于能否保证"和风细雨"和整风是否影响工作的忧虑。在广东的整风计划中关于体力劳动的那一部分里，第一书记陶铸的态度进一步表露了出来。这一部分涉及到关于体力劳动的两个相应的指示。尽管中央指示的态度是相当严肃的，但在这一部分里，看不出一点迹象，要放弃对60岁以上的干部所采取的让步。

234

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其它省并没有仿效广东省的做法。一星期后，《人民日报》又迈出了一步，发了一篇题为《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社论。[86] 这一次，它没有大胆到颠倒整风和工作两者的先后顺序——即把工作列在整风之前——的地步，但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它的看法。《人民日报》主要关心的显然是工作而不是整风，它从广东省那里接过指挥棒，主张延长整风，使之不致影响工作。它再次批评了国家机关，甚至谴责了每周仅仅拿出两个下午进行整风的大多数单位，理由是：如果这些单位按其计划在两三个月内搞完运动，他们将收效甚微，只能走过场。其次，《人民日报》还倡议，在遇到防洪一类的紧迫

任务时，整风必须停止或者至少减少时间。

由于一篇社论远比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具有权威，这些倡议迅速获得了响应。据新华社报道，第二天，即5月28日，河北省委鉴于夏收夏播季节已经开始，决定推迟整风检查。[87]5月29日，河南省委通过了类似的决定[88]。5月30日，《人民日报》披露：出于类似的原因，新疆也正在采取类似的措施。

《人民日报》所倡导的，当然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政策。就连毛也并非愿意让整风影响夏收。当然，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实际上也不大可能允许整风耽误极端重要的农业工作。不过《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发一篇社论，就赋予那些当初就对整风持怀疑态度的省一级领导人以变通处理问题的权力。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虽未被正式放弃或更改，但社论已经指出了怎样才可以对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制。人们一定记得，中国的"运动"的要害之处，在于它总是把人们卷入狂热的行动之中，使他们因目标的急迫而激奋。[89]在城市里，这往往意味着停止日常工作，不过
235 这一直被看作是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通过鼓励官员们拖延整风运动，《人民日报》显然是在倡议采取一些必将使这场运动的影响有所削弱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就常理而言是多么的正当。也许身为总编辑的邓拓认为可以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毛当时正担心着整风运动的进程，尽管这种担心是由于其它原因。

但是，毛的支持者们对于《人民日报》日益强烈的攻击显然并不打算认输。6月3日，周恩来签署了一份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国务院指示，从而在工作和整风的关系问题上激起了最尖锐的冲突。[90]

由于党报始终认为整风普遍影响了工作、尤其是长时间地使国家机关的工作停顿下来，人们当然会指望国务院的指示会针对着这个问题。然而，指示不但明显地忽视了这个问题，反而把周恩来的相反观点表述得十分明确。

首先，国务院的这份指示宣称，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大规模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括号内的话和着重号是我加的）它承认整风运动发展不平衡，并列举了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并不包括政府部门因过分强调整风而影响了日常工作这一点。接着它反而以有力的语气断言，整风是促进增产节约的一个先决条件：

>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地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固然与经验不足有关，（但是）同时也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所造成的。因此，整风运动的开展，就必将为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方针造成顺利的条件；同时，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又可以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整风运动得到更大的收获。[91]（着重号和括号内的话是我加的）

236 周恩来在这里拒绝承认整风对生产造成了任何有害的影响；恰恰相反，他断言整风运动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他的论点是：经济工作中的挫折是“三害”所造成的，尽管也与经验不足有关。

《人民日报》并不就此罢休。它在登载国务院这份指示的同时，在相邻的版面上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一篇题为《整风运动应该同增产节约运动相协调》的社论。这与国务院指示仅仅提出“进一步发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标题不同。《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在暗示：国务院指示的意图是要对整风运动加以约束，使之有利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其实，如我们所知，国务院的这份指示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含义。《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开头文笔犀利，

说国务院的指示“非常及时”。随后，它撇开了传统的套话，没有列举增产节约运动自发动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也没有对国务院指示中关于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的说法表示支持，而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但是运动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着重号是我加的）。[92] 这样，社论不仅只援引了整风指示中两个说法中较易接受的那个说法，而且甚至还通过“有了”成果而不是“获得了”成果这样的措辞来削弱这个看法的分量。在这用语吝啬的开头部分之后，社论再次引用了整整一段前面曾引用过的国务院指示，认为它阐明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新的含义。随后，社论又含蓄地抽去这段话本身的要点。

与着意强调整风对于增产节约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务院指示不同，社论指出，国务院负责的各个部门已经因整风而忽略了增产节约运动：

237

> 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需要同时进行两种以上重要工作的时候，决不要把两种工作对立起来，借口进行这种工作而放松那种工作。最近有些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就只顾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而把增产节约运动搁在一旁了；有些只制定了增产节约的方案，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连方案还没有制定。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加以改变。[93]（着重号是我加的）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批评政府部门破坏了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该报以这样的先后顺序来排列——之间原有的紧密联系，并且强调，经济部门的职责是抓好经济工作。这一指责含蓄地暗示，自 1957 年 5 月发起的整风运动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原来就是紧密联系的。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要检查"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就是要反对铺张浪费，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整风指示确定了"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对于经济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94]（着重号是我加的）

但是，对于国务院指示中关于铺张浪费和低效率产生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所以发起整风运动必将有利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提法，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呢？《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也仅仅把缺乏经验与"三害"这两个原因的相对重要性颠倒了过来：

经济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等缺点和错误，固然有很多原因，特别是同经验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从领导思想来检查，也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95]（着重号是我加的）

不足为怪，社论没有象国务院的指示那样去论证整风对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极端重要性，而只是勉强承认了这一点，即在当前，"为进一步发展增产节约运动……应该帮助领导干部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96]

238

《人民日报》6月4日社论的要旨，是指出国家的基本问题是经济问题，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引用了党的八大的政治决议的有关内容——包括曾经激怒过毛的那一段文字——来加强自己的论点。它暗示：根据这样的论点，整风与其说象周恩来断言的那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还不如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人民日报》的这个论点，很快得到了北京市委

的支持。

6月5日，北京市委召开了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形式上是贯彻国务院指示，实质上却是要强调《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北京市委承认了自己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缺点，并指出“最近有些部门因为忙于整风而忽略了对生产的领导”。[97] 国务院指示所强调的整风有益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的观点，在这里没有引起共鸣。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会议仅有的另一处提到整风运动的地方，北京市委谈到了要“认真地”贯彻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该报道的主要用意是，这种“认真”只有那些不允许整风影响到工作的那些单位才能最好地予以体现。

在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的同一天，《人民日报》试图暗示，那些热心于整风的省份是在不负责任地蛮干。于是，该报发了一篇关于江苏省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本报报道，并同时转载了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6月1日的社论。[98] 这篇题为《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省报社论，一开头便热情洋溢地号召采取行动：

> 现在，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这一伟大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决不允许满足现状，决不允许迟疑不前，更不允许退缩后退。[99]（着重号是我加的）

这篇省报社论以大量的篇幅不断地用这种语调来表示对鸣放和辩论的拥护。仅仅在最后的一段，它才谈到当前沉重的工作负担。在交待完那些务必要在最近几周内完成的农业等方面的任务后，社论说：“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在整风过程中牢牢抓住上述任务……”。（着重号是我加的）[100] 接下来，社论一方面承认，为了完成经济任务，有的单位只好暂时停止整风，但另一方面，它显然又把这种

239

做法视为一种特殊情况，认为省委勿须为此而发布一项全面减慢整风步伐的指示。社论指出：

> 暂不进行整风的单位一定要集中全力搞好当前生产和工作，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解决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做，一方面为本地区本单位的整风运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正在进行整风的单位，能够顺利地把运动继续深入下去。[101]（着重号是我加的）

显然，这并不是要江苏省的所有单位都暂时停止整风。

《人民日报》关于江苏省的经济问题的报道，正好登载在这篇社论的上方版面上。《新华日报》这篇社论把紧迫的农业任务仅仅说成是“十分繁重”，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则认为这个省的局势“十分紧张”：

>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十分紧张的阶段，夏收、夏种、夏插等工作几乎是在同时期内进行，已经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误了农时，将会造成极大损失。[102]（着重点是我加的）

《人民日报》报道接着详细谈到了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读过这篇报道的开头这一段，又读过那篇转载的社论的人，都不会看不出来这个意思，即尽管江苏省面临经济危机的前景，省委却被整风搞得晕头转向，耽搁了极端重要的农业生产。

可是，周恩来仍给那些赞成整风的省一级领导人打气。6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有关领导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的另一份指示，指出农业生产的大忙季节已经迫近，并承认上半年出现了严

重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一指示虽然承认有的干部不得不把全部时间用来抓农业生产，但绝没有要把整风运动搁置起来的意思，指示说：

240

> 搞好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了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各地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必须抓紧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切实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省级领导机关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力量领导农业生产。县级整风推迟到省级整风以后进行，更应该用全力领导当前的农业生产。[103]（着重号是我加的）

《人民日报》就国务院的这个指示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整风不能〔允许〕误了生产》，[104]这个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标题，又一次触及了问题的要害。社论谈到，"整风和夺取农业丰收的任务的高度协调，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必须很好解决"。[105]该报强调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的重要性，认为农业生产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而改变了国务院指示的提法。接下去，社论谈到："因此，必须十分注意使整风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不要因为整风而贻误了农业生产的千金一刻的紧要时机。"[106]社论赞许地提到了河南省领导的做法，允许在必要时中断或者推迟整风会议。

国务院6月10日的指示曾经暗示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整风还没有在农业生产基层领导集中的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单位中开始；仅仅需要保证的是让某些主要的省里的高级领导仍能腾出手来对下级单位进行监督。《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较为悲观，它指出：

> 过去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运动进展期间，下边工作中

的实际问题，往往因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忙于运动，而被搁置或积压起来……在这次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倾向，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凡是涉及当前生产的问题，都要及时加以解决。[107]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为止，争论主要还是理论性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社论——这是它为反击右派而撰写的一系列社论中的第一篇。事情立即趋于明朗：毛和周原先设想的整风运动将要被抛弃。但是，围绕着工作与整风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这场争论的持续不休——它一直持续到反右斗争开始，甚至更晚的时候，本身就足以表明：对右派的反击并不是导致方向转变的唯一原因。

241

第五节　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

党的领导人在整风是否影响生产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并不导致对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的非党批评者们发起反击。反击是由学生中出现骚动引起的。党或许能够平息校园里的风波，但它的信念和权威正在被持异议的学生们放纵的谴责所损害。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甚至那些一直支持整风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毛本人，都可能改变初衷。并且，即便毛象有些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不为情势所动，对整风感到失望的人，不需要多少，就能使他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当时政治局有17名委员——其中6名常委，6名候补委员。常委当中，毛、周恩来和邓小平是赞成整风政策的。陈云作为一个在对私有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的最初阶段就与工商业者保持良好关系的问题上表示过关注的人，想必会赞同对资本家采取宽松的政策。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台上，陈云坐在周和

邓之间，这是表明他当时的态度的另一个例子。

刘少奇在整风问题上同毛的分歧，已有材料根据。整风运动开始后，他的这种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材料。他在中央高级党校同杨献珍讨论工作与整风的关系时说，学生应当既读书（做他们本职的理论工作），又整顿自己的工作作风。[108] 据说文化大革命时，刘支持杨献珍拒绝康生提出的学校应当停课、以便集中精力学习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的建议。[109] 可以肯定的是，在同杨献珍的谈话中，刘两次把人民内部矛盾与同志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分，这意味着甚至在整风运动发起之后，刘仍然不愿让局外人参预整顿党的干部的工作，——就象此前的陆定一那样。[110]

在 5 月份刘对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班的演讲中，有一段话从学生的骚动对终止整风运动方面起了作用的观点来看，是极富启示意义的。

242

> 人们说，“好极了，你们是党员。但是你们夸耀自己是老战士，并且还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这种评论并非不真实。然而你们呢，你们不是党员，你们生来就居住在城市，你们是否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呢？我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高——我仅仅是一个中学毕业生。我昔日的同学有些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了，他们有没有一点官僚主义呢？我认为，那些从不是党员、从未在山区呆过的人，可能受官僚主义的影响更深——并且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我们呢？仅仅是受到一点官僚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即便有，也非常少。[111]

从这些话里，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学生们的极端行径的强烈不满，一种感到知识分子不可靠而产生的不满，因为他们批评了那些曾经帮助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老干部。共产党内部从

上到下无疑都有这种情绪。[112]

还未曾谈到的最后一个政治局常委是朱德。他没有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上出现，也许不能根据这一点作出定论。但需要补充的是，5月7日他对党中央机关的青年积极分子讲话时，压根儿没有提到整风或者矛盾的问题。[113] 这样，在整风运动的开始阶段，政治局常委们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是：4人赞成，1人或者2人反对。

在其余11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和陈毅似乎在患病。[114] 他俩可能没有参加围绕整风运动进行的那些讨论。但陈毅曾公开表示，毛提出矛盾问题和为整风做准备是"完全正确的"。[115] 至于林彪，自30年代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他与毛的关系密切，并且在重要场合都是毛的支持者，由此看来，他在整风问题上站在毛的一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从新闻照片上看，最高国务会议的缺席者除了刘少奇、朱德和林彪，还有彭德怀。看来，彭是整风的反对者。5月29日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他有个讲话，谈到了矛盾问题，但没有提整风。[116]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报告说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整风进行了指导；至少在表面上这项工作完全由他的下属在主持。人们一定还记得，正是军队宣传部门的官员在1957年2月攻击了毛的百花齐放政策。如果说这些官员事先就已知道国防部长站在他们一边，那么，人们对他们的勇敢举动将更容易理解。党的老战士、72岁的林伯渠的情况更难以确知，但他似乎也对整风持保留态度。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一次采访时，[117] 强调了"和风细雨"政策，认为它"非常重要"，很适宜，因为"许多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番话，象是在否定整风运动的必要性。[118] 他赞成这种说法，即由于党处于执政地位，问题要比以往的整风多得多，但他没有明确表示这就需要非党人士参预。[119] 看来，林是要缩小对非党人士歧视的宗派主义"病害"的

243

严重性。他仅在一个场合按照整风指示的提法来排列“三害”的顺序，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所有其它的场合，他或者把宗派主义排在最后；或者干脆把宗派主义省略掉，而仅仅提另外两个病害。如此随意地对待党的指示中的标准提法是不多见的。

从照片上看，第三个缺席者罗荣桓元帅也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他对整风的态度，看来还缺乏能够说明问题的线索。也许是由于患病在身，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直到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来访，他显然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尤其是从50年代中期直到1963年在61岁上去世时为止，他仅仅是扮演着一个礼仪上的角色。当时可能也患病的另一个元帅是刘伯承，他也很少露面。事实上和林彪一样，直到伏罗希洛夫到了上海，刘才出来迎接他。[120]

70岁的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大概处在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他对毛是忠诚的。董亲自领导了最高法院的整风。不过，象林伯渠一样，他也按错误的顺序排列“三害”，他的排法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121] 董似乎愿意强调思想问题(主观主义)，而缩小虐待非党群众的错误（宗派主义)。由于对党的批评者要求对肃反运动作重新审查，董的这种排列可能表示了一种对其下属司法人员的命运的关心。根据学生领袖林希翎的说法，法院非常担心受到调查：

244

> 全国的公安局和法院开始更改过去的案卷，怕它们受到人大代表的检查。这使我感到忿怒。法院里过去的案卷是党委成员拟写的，它们正在被撕毁。有许多指控是虚假的。[122]

这种说法如果多少具有一点真实性，那么董必武当时必定已意识到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原因是什么，并且无疑要保护他的下

属。但同时，董与毛的联系似乎十分牢固，使他愿意公开表明自己乐于贯彻整风指示的态度。[123]

贺龙元帅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在拿不出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他应当被视为整风的支持者。[124] 还有两个负责财经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和财政部长李先念。在 5 月 31 日开幕的国家计划会议上，李富春鼓励进行整风，并按准确的顺序列举了“三害”，但他似乎把工作中的缺点既归因于“三害”，又归因于缺乏经验。这样一来，他就在 6 月 3 日的国务院指示和 6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间奉行了一条中间路线。[125]

在整风期间，财政部长李先念只是在代表中央政府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庆祝活动时作过一次公开讲话。[126] 他的讲话与中央整风指示的发表都在同一天，因此，他在讲话中未提到整风运动可能并无特定含义，如果考虑到毛发出指示的时间很近，就更是这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先念在讲话中扼要地谈了如何处理矛盾的问题：

>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思想工作，对于自治区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必须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地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服务。[127]（着重号是我加的）

正如毛希望的那样，他把官僚主义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主观主义。也许是在自治区党的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的请求下，李对宗派主义——即“大民族沙文主义”，例如汉人对蒙古人的歧视——只是轻描淡写了一番。

245

表明李先念的态度的另一个例子，是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预算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认真地插进了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意义表示赞同的词句。[128] 但是报告没有谈整风运动，他也不象周恩来那样怀着满腔热情。在同一次会议上，周发表讲话说：

> 我国人民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129]

总的说来，李先念可以被视为整风的支持者，但并非充满热情。可以这样假定，当整风是为着改善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以及工商业者的关系——与这些人的合作对成功地实施五年计划至关重要——，从而促进经济建设时，李先念和李富春都是赞成整风的总目标的。但是，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这样一个运动容易引起工作混乱，特别在经济面临困难时更是如此，因此，他们是不会感到特别高兴的。[130] 尽管如此，如果把二李的有关言论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筹划人薄一波的有关言论相比，就可以看出二李毕竟还是对整风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

5 月 9 日，薄一波在四川省有个讲话，题目是"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如何进行整风"。两天以后，它成为《人民日报》头版的重要消息。这条消息说：

> 薄号召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在经济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克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薄一波说：勤俭建国是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人民

内部矛盾总方针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影响国家的建设。[131]（着重号是我加的）

246 接下来，薄谈到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和缺点，并且断定这"主要是由缺乏经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等因素造成的"。[132]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之外"，还要有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薄的这个讲话，其目的看来是要强调把整风当作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手段的重要性——整风指示确实也提到了这一点——而对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实际上是整风的主要意图却加以贬低。这是谈论生产比整风更为重要的一种微妙方式。仅在薄的讲话见报以前两天，《人民日报》曾刊载过一封"党员来信"，恰好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133] 那封"党员来信"的作者、一个署名郭军的显然不大为人所知的党员提出，在按照整风指示的规定检查内部矛盾的时候，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个单位既可以检查自己在贯彻政策方面的情况，也可以检查自己在处理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方面的情况。作者表示自己赞同前一种方式。《人民日报》加的按语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见"，并希望有人继续提出意见。两天后出现的薄的讲话，定会被许多读者视为党的最高层的一个领导人对于郭军意见的支持。

在李富春5月16日重庆讲话之后，薄又作了一些补充。据报道，他再次错误地谈论"三害"，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彻底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的关键，在于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34] 他在此略去了"三害"当中最重要的一害，即官僚主义，并且把宗派主义置于特别为刘少奇所重视的主观主义之后。他提出，增产节约的"基本关键"，在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说法，同6月3日国务院指示的有关段落，有着有趣的

相似之处。国务院的指示说：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关键”，是“积极开展整风运动和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两种提法的根本区别是：薄认为提整风运动是不适当的。

247 6月初，多半是由于获悉了党决心要对批评家们进行反击而变得大胆起来，薄在李富春主持的计划会议上驳斥了批评家们，把工作中的缺点全部归因于缺乏经验；而在一个月前，他也曾经谴责过“三害”。薄和李富春不同，他显然是缄口不谈整风运动或者人民内部矛盾；[135] 他和李先念也不同，7月1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仍然没有涉及整风运动或者人民内部的矛盾。[136]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因为同彭真关系密切而受到了攻击。[137] 这个罪名也许是颇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出生在同一个省，30年代都在华北地区工作，而且又是政治局里仅有的两个山西籍委员。

在政治局的其他候补委员中，可能有两人是毛的支持者。陈伯达与毛的特殊关系前面已有叙述，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这个也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人，1957年春天在天津和在高级党校介入了争端并且支持了毛。另一方面，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7年3月就已经表露出了对毛式的整风的不满，他未能促使邓拓宣传毛当时的讲话。并且，和副手周扬相比，他在整个运动期间表现出的沉默简直无以复加了。

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人、国家民族委员会主席乌兰夫副总理是可能对整风表示支持的人，他要把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4月30日，他在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确曾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任务之一。[138] 同一天，他在呼和浩特讲话时说道：

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强人民团结，必

须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必须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139]（着重号是我加的）

但是，和李先念一样，在这同一个场合，乌兰夫也弄乱了

248 “三害”的顺序，只是排列形式有不同。和刘少奇一样，他突出主观主义的危害，把注意力放在了干部的思想问题上。有关乌兰夫对整风的态度的另一个例证，可见于5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这篇报道谈到，两天以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已经就一项“新”的整风工作计划取得了一致意见。报道用一种新的眼光解释了这个“新”字，它说：从1956年12月到1957年3月末，内蒙古的党组织以增产节约运动和机构的合理化为核心目标，已经进行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篇报道是在暗示：新的整风运动是多余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人民日报》6月3日的社论采纳。它还进一步暗示：整风的实质与其说是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倒不如说是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

揭示乌兰夫对整风的态度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在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没有提到矛盾或者整风。[140]

还有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他对整风的态度，看来尚无明确的证据加以说明，但是，在30年代，他是毛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被降级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大跃进开始以后，他又成为最尖锐地批评党的主席的人当中的一个。因此，作出这样的假定是合乎情理的：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可能是毛的热情支持者，他在整风期间的沉默，大概就是一种不赞同的态度。

在所有这些显然不太完全的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试着把政治

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对整风运动的态度列表如下:

委　员

赞成，或者大概赞成的	含糊，但忠于毛的
毛泽东	董必武
周恩来	李先念
陈　云	
邓小平	
(林彪—病?) *	
(陈毅—病?) *	
李富春	
贺　龙	

反对，或者大概反对的	不能确定其态度的
刘少奇	(罗荣桓—病?) *
朱　德	(刘伯承—病?) *
林伯渠	
彭　真	
彭德怀	

249

候补委员

赞成，或者大概赞成的	反对，或者大概反对的
陈伯达	乌兰夫
康　生	张闻天
	陆定一
	薄一波

* 括号内的人在政治局内部关于整风问题的争论中大概不会起重要作用。

这种排列，如果说大致还准确的话，毛的地位不稳固就一目了然了。在整风问题上，政治局委员中支持他的有9人，但其中坚决支持他并积极参与辩论的只有5人；而他的反对者也能凑够5人。如果政治局要进行表决，候补委员大概不能参加，但他们的意见显然会起作用。[141] 这样，把候补委员计算在内，站在毛一边赞成整风的12人，9人反对，还有两个人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董必武、李先念有所动摇，毛的微弱多数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因此，对于继续整风是否明智，毛可能产生的怀疑都会由于意识到自己缺乏充分的支持者而增加。在1955年夏秋，毛曾经不顾同事们的反对独自推行合作化，现在，形势正好倒转过来了。当时，由于在执行中获得了成功，他的大胆创举很快就被大家接受；而现在，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敞开。当时，他曾得到党的省一级领导人的支持；而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支持他的反对者。据说，一个党内的"右倾分子"曾经讲过："毛主席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这场内部危机中，电报雪片般地〔从党内'鸣放和辩论'的反对者那里〕飞来，所有的电报都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142] 无疑，一部分电报出自省一级领导人之手，他们担心批评的迸发会使自己的下属官员们威信扫地。有证据表明：至少有9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参看附录8）。这9个省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以上。在这些省份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大学里的形势从5月末、6月初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难怪毛不得不放弃整风运动。

注释：

1. 有些主要的批评意见转引自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355—357页。
2. 我一直未能找到任何关于人大机关召开整风座谈会的报告，而只有关

于国务院5月份整风活动的正式报告。

3. 这三个问题分别在下文的三节里加以讨论。

4. 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论，题目是：《只能放，不能"收"》。这篇社论4月21日就出现在《解放日报》上了，《人民日报》过了这么久还转载这篇文章，表明那些支持整风的人认为，把这篇社论中的思想由党报传之于全国是很重要的。5月12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5月9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篇社论的目的在于缓和许多党员的紧张情绪，他们因前些时候在座谈会上受到党外人士的猛烈批评而感到坐卧不安。

5. 这些座谈会上的批评意见的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43号，第2—37页和1550号，第2—28页。

6. 参见1957年5月6日《进军报》第3版第2栏和《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讲话集》(《中国大陆报刊概览》646号，第7页)。在这一摘自讲话集第7—8页的大段引文中，周扬承认只有党员才有真正的权力，那些当官的都摆出一副官架子。然而，他的讲话里并没有什么党员象"特务"和"木头脑袋"一类的话，但姚文元却指责周在讲话中这样说过（见姚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杨》，载1967年第1期《红旗》《中国大陆杂志概览》559号，第11页）。既然这一大段引文是用来揭露周扬的罪恶的，但却略去了周对党的干部恶毒攻击的话，这是难以理解的。很可能，周扬仅仅承认，批评者用那样的语言来描绘某些党员也许是正确的，这与整风指示中承认某些党员有国民党的工作作风相比，也并不为过。

不管这段话的原文到底怎样，姚引用的周另一段讲话肯定是误解了原意。姚谴责周扬说："他（指周）说那些宣称要杀戒百万共产党人的人'不一定就是反革命'。"(《中国大陆杂志选》559号，第12页；（译文我已稍加修改）事实上，如同我在书中引用的周的讲话所表明的，周扬只是作了一般的表态，并不包含对一切反革命言论都可任其放纵的意思，更没有任何表示他对这种反革命言论将听之任之。（姚

文元引用的关于杀共产党的这句话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周扬的这次讲话之后才出现的。见 1957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报道的葛佩琦的讲话；这篇报道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反革命言论出现的时间，但看来很可能是在 5 月 13 日以后）。非常有趣的是，当周扬在一般表态中承认党在文化领域中领导不得力时，他却似乎已把他自己领导的文学领域排除在外了！（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46 号，第 7 页）。

7. 由毛亲自起草的1957年7月1日的社论透露了党内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见两报一刊社论："把新闻战线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1968 年 9 月 1 日新华社电讯稿，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53 号，第 17—31 页。）引自七一社论的毛的这段话登在第 22 页上。根据下列证据，我推测毛同意给一个月期限开展毫无限制的批评是被迫的：4 月初，他告诉上海市委，共产党要硬着头皮让人骂几个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101 页）；但是，鉴于 5 至 6 月已经发生的情况，在上海的另一次讲话中，他提出，"我们的"政策一直是要让党经受几个星期的磨炼（同上，第 113 页）。合乎逻辑的假设是，毛关于开展批评时间的改变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提议下作出的，刘等担心，如果党一直对批评保持沉默达几个月之久，就可能严重挫伤党员的士气。1958 年 4 月毛解释说，对这一指示保密是想看看基层干部在受到攻击时能否保持镇静（同上，第 185 页）。
8.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9. 同上。
10. 见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姚文元就各报刊如何对待这句话所作的分析。
11.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12. 戈德曼在《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1957年5—6月》一文中肯定了这些讨论会对校园内事态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见《中国季刊》1962 年 10—12 月，第 134 页）。当时作者正在北大学习。

13. 见1957年5月26日《光明日报》关于"民主墙"的报道，转引自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32至133页；1957年5月27日《文汇报》的报道，转引自《百花齐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34页。

14. 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141页。

15. 同上，第143至148页。

16. 同上，第148至149页。

17. 同上书第141页概述了《民主广场》的民主气氛，可以使人联想到伦敦海德公园。林希翎5月23日的讲话转引自杜林的《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治》第23至29页。5月30日林在她自己的学校所作的演讲转引自同一本书，第30至42页。《人民日报》后来对她的讲话作了详细的报道（见本书第140至141页）。

18. 杜林上引书，第24页。

19. 同上第27页。

20. 同上第28页。

21. 见《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3页。这份材料引用这些讲话是要表明刘想要压制那时已经开始的反右斗争。事实上，那时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刘的目标恰恰是要促其尽快开始而不是限制它。

22. 杜林上引书，第28页。

23. 6月1日，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游行并在省党报《新华日报》社外张贴大字报，要求解释：《文汇报》已经报道了发生在北大的"民主高潮"，为什么《新华日报》却一直不予报道（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54页）。尽管林希翎小姐抱怨新闻封锁，《中国青年报》稍后却指出，她的"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年青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十分盛行。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40页。

24. 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41至143页。

25. 林希翎在5月23日的讲话中说："我不怕这样讲话。我的朋友不断地告诫我：'你这个小鬼，有一天我们都要到监狱里去找你，要到监狱里为

你送饭'虽然这是在开玩笑，但确实有这种可能。如果你们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但是既然我已经来了，我就不怕危险。如果我被投入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杜林上引书，第28页）。毛1957年10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林小姐当前正在人民大学扫地，她属于那一类应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毛还嘲笑林小姐自称21岁而事实上已经28岁。

26. 戈德曼上引文。《中国季刊》1962年10—12月号，第149页。
27. 这次代表大会于5月25日下午结束，也就是北京大学出现了"民主墙"一周之后，以及林希翎小姐在"民主广场"发表具有挑衅性的讲话一两天后。
28. 根据戈德曼的说法，"大字报只在5月22日贴于北大"。
29. 参看那一天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戴维·奇帕的报道（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34—135）
30. 利尼·戈德曼上引文，第149页，
31. 同上。
32. 参看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93页。裴多菲俱乐部以19世纪匈牙利一位诗人命名；形成于1956年3月，是劳动青年联盟组织中的一个研讨问题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激烈地批评拉克西政权的罪行和错误，这对最终在匈牙利酿成叛乱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参看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骚乱》一书，第220页。
33. 戈德曼上引文，第228页。
34. 五四运动是以北京的一次学生抗议活动而得名，这个活动反对（1919年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将德国以前在中国的租借地让与日本。中国许多城市中的爱国者纷纷响应北京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五四运动"这一术语后来用于泛指本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骚动，当时进步的中国人摈弃儒家学说和热切考察外国的思想和学说，以寻找复兴中华、驱逐帝国主义之途径。（参看周策纵著《五四运动》）。

35. 参看他于1957年4月25日在杭州同苏联高级官员的谈话（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31页）。

36. 富尔：《狡诈之人与迟钝之人》，第29页。

37. 引自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68—169页。

38. 同上，第170页。

39. 同上，第169页。

40. 同上，第170页。

41. 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97号，第21—34页。

42. 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70页。

43. 值得注意的是，章伯钧和其他出席6月6日会议的"右派分子"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们可能不知道刘的警告。司法部长史良和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胡愈之这两位与会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可能参加了5月25日的人大常委会。但是，如果他们确实参加了这次会议，却没有证据说他们透露了刘少奇在这一场合对其他参加6月6日会议的与会者说了什么。胡愈之（据说中途离开会议）和史良后来都没有被打成"右派"。

44. 参看《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1页。

45. 参看罗对全国人大的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46. 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45—153、264页。

4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41号，第10、11页。被派来管理学生的新副校长中有北大的陆平，1960年他晋升为校长。1966年，历史车轮转了一整圈。当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学生作为红卫兵动员起来时，陆平是被赶下台的第一批官员之一。当我1972年秋天访问北大时，我听说陆平在北大自己的农场里进行体力劳动。

48. 参看《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10号，第28—30页。

49. 1959年2月，毛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透露了这一段情况。同时，他对林希翎小姐表示的恐吓嗤之以鼻。新华社的机密报道载于《内部参考资料》。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72页。

50. 关于毛在5月6日事件前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参见同上书第369页，第14条注；关于毛在5月6月事件后的态度，参见1957年10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说，即使把人民政权的死敌估计为占人口的2%，即1200万人，这些敌人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因为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30页）。关于毛满不在乎的许多其他的讲话可在《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中毛泽东1957年的讲话中找出。

51. 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驳斥关于《人民日报》第一篇反攻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得过早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这篇社论推迟发表，那么左派就会被击溃（《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7页。关于士气问题的详述，参（见上引书第249页）。毛泽东感到整风运动不断升级会造成自己的被动，这一点在他1957年10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抨击右派的讲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个会议上指出，他从没有提倡大鸣大放——这是右派的发明（《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33页）。

5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891号，第24页（翻译时稍有变动）；再参见本书第392页，第1条注。

53.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参见本书289—291。姚文元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指出了《文汇报》的一大错误，认为此报没有给毛泽东对青年团代表的警告以应有的强调。警告的大意是，所有违背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由于《文汇报》集中揭露中国共产党的缺点而很受学生的欢迎，毛泽东对此必定火冒三丈。（参见麦克法夸尔上引书，第154页）由于新闻报刊在毛泽东自己的发展中起的作用，他也许对报纸的影响十分敏感。参看斯诺《西行漫记》第147页。

54. 参见《光明日报》的自我批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85号，第7—24页，尤其第7—8页的翻译。

55. 参见总编辑储安平对全国人大的检讨（在麦克法夸尔的书中有摘录，第285—286页）。

56. 关于罗隆基通过浦女士与《文汇报》的联系，参看关于新闻记者工作座谈会的报道（译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66号，第43—47页），并参看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会上的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浦熙修是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参见《中国大陆杂志选》27号，第21页。

57. （和风细雨这一短语）可能在他的矛盾讲话中用过；但肯定在他3月1日的总结中用过（参看《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93页）。他也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用过这一短语（参看《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72页；奇怪的是，后来官方对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的译本第13页，把这句话干巴巴地译成了"我们一定不要太粗暴"）。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说，市委在1957年1月和2月检查思想工作和实际工作时，曾使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以响应1956年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号召（黄火青：《认真克服领导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这似乎提示说，毛泽东在二中全会作总结时创造了这个短语。然而，我发现这个短语最早是由邓小平在1957年1月使用的。参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红代会三红揪刘邓大军第一支队，1967年4月），第19页。

58. 整风指示严格限制大规模斗争会，引文同上，第212页。毛泽东对"大民主"的论述参看《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92—93页。在同一段中，他把"和风细雨"等同于小民主，刘少奇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讲话时也这样认为（《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68页）。刘少奇关于"大民主"的论述参看上书第178页。

5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95页。我判断毛泽东带有半幽默口吻，但也只是半幽默！关于毛泽东早期说过对待资产阶级一直是比

较温和的，参看上引书第92—93页，《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72页，及185页。

60. 理查德·所罗门让人们注意到引用刘少奇的话的重要意义是有道理的；尽管在这一时期关于整风运动的官方文件中，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引用刘的话，刘少奇的话还被5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引用，这篇社论论述的体力劳动问题，下面还将加以讨论。但是，所罗门认为，引用了刘的话使一篇本来带有威胁性的社论中出现一点调和的语气，他的这一看法则难以令人置信。事实是，有一篇社论专门论述"和风细雨"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篇很长的社论，这本身就是一种调和的姿态。所罗门说社论用了刘少奇的话作结语，由于这一错误他未能注意到上面引文中的话所包含的、自然带来的保证：即自从毛泽东成为全党的领袖以后，始终正确地对待了错误（参看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第307—308页）。

61.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62. 同样有趣的是，《新观察》杂志1957年5月16日第10期第11页，上只刊登了一张由中国领导人陪同的伏罗希洛夫的照片，下方是一篇文章介绍他在中国的旅行。这张照片上有彭真和陶铸陪同伏罗希洛夫。选登这样的照片是很奇怪的。在同样情况下，一张在上海拍的照片必然是这位苏联主席与刘少奇、林彪元帅和刘伯承元帅、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合影，所有这些人都到机场迎接了他（《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广州照片的选择是否一种暗示，提醒党的官员注意北京和广东党之间将达成某种政治协定？

63.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95页。这一辑似乎包括刘少奇对杨献珍的全部指示（第94—98页），题目是《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学员如何进行整风的谈话记录》，也可能有一处删节。（第98页）。刘少奇谈话的日期和听者的身份在这个材料中没有写明。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29页

中得到澄清，这部书从讲话中引用了另一段话。(试比较这一页第4段刘的引语，与《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94页倒数第2段；二者的内容不尽相符，但我认为这是编辑在《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刊登这个小册子的译文时进行压缩的结果。

64. 陶铸的讲话是在4月17日，其第一、二部分在1957年5月4日《南方日报》上发表。

6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2页。

66. 社论被译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8号，第1—4页。

67. 同上，第3页。

68. 同上，第4页。

69. 同上。

70. 毛泽东的支持者会强行发表这些照片吗？这些照片无疑暗示了彭真与北京邻近的省市高级官员是隔绝的。

71.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72. 摘自《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38号第16页译文。

7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没有提供河南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日期。

74. 在春收和春播期间，有70，000广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他们似乎并不是整风指示中所指的那种领导干部，(参看《南方日报》1957年5月6日)。

75. 新华社1957年5月14日电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38号，第19—20页。

76.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表整风计划前，广东省委发出了关于体力劳动的指示；前者5月15日作出，发表于1957年5月20日《南方日报》。

77. 有一定体力者。

78.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665号，第13—15页有这个指示的译文。

79.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刘少奇在青年团第3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会议休息时说的一句话。重要的是，《人民日报》的报道暗示，参与体力劳动是刘少奇和围着他的一些代表讨论的唯一话题。这也许是由于那一天这一指示已经发表了；但没有人传说，毛泽东在相同情况下同代表的谈话时也趁机阐述了这一指示的意义。

8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1538期，第14—16页对这篇社论的翻译，在这一点上是让人误解的。它译的是："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只要体力上适于这样的劳动并能抽出一部分时间，就会帮助形成新的社会风气……"这段话提示，社论提出了两项条件。事实上，这段话应当译作："而只要凡是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领导人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

81. 5月整个一月里，《南方日报》都没有刊登陶铸参加体力劳动的照片和头版报道。阿尔巴尼亚高级代表团5月15日抵达广州，并由陶铸于16日招待，这更加促使了陶铸对体力劳动的抵触。在《南方日报》报道这一欢迎盛会的同时，另一篇报道说，阿尔巴尼亚人在从武汉飞往广州的途中读到了中共中央关于体力劳动的指示，他们到了广州后，就要求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他们16日参加了体力劳动，但只由市长朱光陪同，陶铸则没有陪同。陶铸时年51岁，因此甚至按广东规定的年令条件也不能免于参加体力劳动。此时和后来，他都没有表示身体有任何不适宜的劳动情况。

8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3号，第42页。

8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84. 《废弃"庸人政治"》，同上。邓拓使用了卜无忌的笔名："预见并非迷信"。要不是作者的身份，文章将放在报纸背面不显眼的地方，但作者的身份只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暴露（参看《邓拓选集》第220页）。

85. 广东省委关于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在整风运动发动前，于4月26日发出（《南方日报》4月27日发表），但并没有规

定要在 6 月开始学习。这家报纸 5 月 2 日关于广东省委讨论整风问题的一则新闻，没有提到打算于 6 月开始学习。换言之，似乎可以肯定，17 日修改的计划正是 15 日起草的那个计划。

86.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7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47号，第18—20 页)。
87.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
88. 同上，1957年6月5日。
89. 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现场纪实，参看鲁姆《北京，1950—1953年》第 12 章。鲁姆小姐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孩童时期，是英国外交官考林·克劳尔爵士的妻子，生于美国。鲁姆的丈夫 50 年代初在北京使馆供职。
90. 《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91. 同上。
92. 同上。
93. 同上。
94. 同上。
95. 同上。
96. 同上。
97. 同上。
98. 社论可能是在支持整风的领导人的压力之下予以转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民日报》用来自江苏的报道设法削弱它的影响。
99. 《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 同上。
103. 同上，1957年6月11日。
104. 《整风不能误了生产》。使用"不能"这个词是有趣的，它意味着社论作者只要求说整风是一个不能损害生产的过程（如同国务院 6 月 3 日

指示所强调的）。但是，社论的内容清楚地表明，对不能必须了解为“不能允许”。

105. 同上，1957年6月12日。

106. 同上。

107. 同上。

108.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94页。日期问题参看本书第386页，注63。有一个资料认为，这一条日期为5月1日（《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3页），但其他两个材料认为日期是5月7日（参看《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1页，《中国大陆杂志选》652号第3—4页。随便说一下，后一个材料引用的最后一句话完全脱离了上下文，以便歪曲刘少奇的意思。材料中引用说，“……当你到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按照《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上更完整的译文，刘少奇实际上说：“当苏联同志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来到中国时，他们感到最有意思的是能买到任何东西”。这句话是批评苏联经济时说的。）

109. 《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51号，第2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少奇大约此时作的3篇重要讲话正文的几个部分（对上海干部的讲话，对杨献珍的讲话以及对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班的讲话）中，几乎没有提到毛泽东或者他关于矛盾的讲话。

110.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94页。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同志之间的矛盾被列为人民内部许多矛盾中的一个矛盾（参看《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58页）。刘少奇所谓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是指对部长、省长、厂长等的批评（同上，第97页），即对政府官员的批评，而不是对党的作用的批评。这当然在他的八大讲话中已作过区分了（参看上书第115页）。况且，他似乎认为这种批评是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在正式的会议上鼓励群众批评他的领导。

111. 《刘少奇选集，1945—1957年》，第418页。这篇讲话的准确日期尚不得知，但在10年后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批判这篇讲话的文章说，刘少奇在此"一个月前"作了上海讲话（4月27日），并说这篇讲话是在"毛泽东发表矛盾讲话（2月27日）不到3个月后"发表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34号，第447页)。这些说法提示，刘在地质学院的讲话是在5月27日前一周。通过我在正文中所引刘少奇话语的尖刻性来判断，他也许是在对北京院校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作出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是在5月22日和5月24日之间作出讲话的。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直到5月19日才贴出来，是在批评铺天盖地而来之前的一两天。由于在地质学院的讲话没有对学生提出任何警告(毛泽东于5月25日发表这种警告)，似乎有可能在5月25日前发表讲话。(有一种可能性是：讲话甚至是在5月19日之前作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材料引用了刘少奇的最初登载于1957年5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句话，这句话反映了地质学院讲话的情绪，尽管与那次讲话中的任何一句不完全一致；参考《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第3页，《刘少奇选集，1945—1957》，第423页)。

112. 这篇讲话不象刘少奇在4月27日的上海讲话，他在许多段中论述了官僚主义问题。但正如在所引的那次讲话中所表现的，他似乎是在愤怒地进行辩护。甚至有可能是学生迫使他谈论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在讲话中有一处这样说："你们不是刚刚提到了官僚主义吗？"(《刘少奇选集，1945—1957》第420页)。

11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朱德强调学习和工作。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学习和工作成为青年的两个主要指令。但似乎奇怪的是，他对一群正在整风领导机关工作的青年人讲话时，根本没有提到整风。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发出的祝贺信，也强调学习和工作（第3条要求是团结），但他也谈到必须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

114. 关于林彪的健康问题，参看本书第357页，注29。陈毅在《人民日

报》1957 年 4 月 28 日和 8 月 1 日文章中透露了他的病况。

115. 同上，1957年4月28日。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十分接近于整风运动的开始，这对毛泽东是很合适的；也许它不是一种巧合。

116.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

117. 《中国青年》第10期，1957年5月16日出版，第3—4页。

118. 同上，第4页。

119. 同上，第3页。

120.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121. 同上，1957年5月21日。

122. 杜林：《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治》第40页。在这一方面，人们也许注意到，董必武至少主持了他所在单位的批评会，公安部长罗瑞卿没被提到参加他所在部里的整风讨论（《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0 日）。

123. 参看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564页。书中指出，1934年当毛泽东在政治上面临蒙受耻辱的危险时，董必武对维护毛泽东起了重要作用。

124. 贺龙元帅陪同周总理访问东欧，也许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似的观点。

125.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李富春的说法是："我们过去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出现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有些固然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有些是和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分不开的。"李富春没有重复国务院指示中对二者作的对比，即与没有经验"相联系"的错误与不良工作作风"造成"的错误之间的对比，但另一方面，他不象《人民日报》社论那样强调缺乏经验（参见本书第 236—237 页）。李富春同薄一波到陕西和四川视察期间，于 5 月 16 日在重庆作了一个论述基本建设的重要讲话。根据 5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李富春着重论述了勤俭建国的问题，但也稍带提到整风问题。

126. 同上，1957年5月1日。

127. 同上，1957年5月3日。

250

附录 7　1957 年 2 月 27 日刘少奇在哪里?

刘是否没有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这次会上，毛发表了他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或者说发表的那张照片恰好是在他离开会场期间拍摄的? 自 2 月 14 日以后，刘的确没有在北京露面，很可能在那以后，刘便开始了长达 2400 英里的外省视察。即使如此，刘在 3 月只到了河南省，只要有必要，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 2 月 27 日以前从那里返回北京[1]；而且，如果他开始了视察，必须知道他为什么离京，要知道，毛已经决定做这次重要报告。

更有可能的是，刘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发表反映这一情况的照片。迹象之一是彭真坐在毛的右边，这个位置本应是刘的。这类场合的惯例是，国家主席的一侧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的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座，另一侧则由总理及若干副手同样按照顺序就座。这个惯例已为 1956 年 2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所证实。当时，彭真在副委员长里排第 8 位，应当坐在离开毛几个座位的地方。在 1956 年 2 月，他甚至没有在前排就座（见《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6 日刊登的照片）。可能是刘暂时离开会场，而要彭（他的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代替他坐在那里。要是刘根本没有到会的话，宋庆龄夫人肯定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席的副委员长在毛的右侧就座。

这一假设，即当拍那幅照片时刘只是离开了会场，随后便被证实了。这是由一位消息灵通[2]的学生领袖林希翎提供的。1957 年 5 月 23 日，她写道:

251

> 据说当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有 80%的高级干部不赞同，一些人甚至起身离开会场。[3]（着重号是我加的）

林小姐的陈述引来了一个很有趣的后果。就在林小姐声称高级干部离开会场的北大校园里，北京大学校长立即采取否认态度。不过即使是校长马寅初教授（他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也没有被轻易放过。贴出的大字报上向他质问下列问题："1.马先生是否坐在后排？2.马先生是否在全力观察有没有人离开会场？"大字报还为马寅初提供了答案："1.马先生肯定没有坐在后排，而且他也必定没有时不时地回头看。2.马先生肯定不能分清那些走出会场的人，究竟是离开会场，还是去上厕所。"[4]

马寅初教授也许被迫否认党内不一致的迹象。否则，那些离开会场的干部一定没有坐在主席台上（在那里马寅初是可以看见他们离开的），他们是那些在会堂后排就座的职务较低者。更有可能的是，刘少奇（也许还有其他人）确实暂时离开了会场，并在那张照片拍过之后回到会场，于是给人以非党人士恰好上厕所的印象。

另一个有意义的迹象是，这张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是从一个缺乏典型性的低角度拍照的，因此前排后面人物的面孔都十分模糊。[5]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读者知道这次会议有大量的重要缺席者，从而注意到党内有广泛的不一致；而是由反对毛的分子所谋划，以明显地显示出只有主席台前排的人（如上所说，也包括彭真）是真正支持毛的讲话的。即便如此，前排的人物里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些政治局的重要成员缺席。[6] 他们是朱德、林彪、林伯渠、罗荣桓和彭德怀。其中，林彪肯定是由于健康原因缺席的，[7] 不过，仍有5位政治局委员（包括刘）没有明显的原因而缺席。[8]

同样明显的是，《人民日报》没有附上这幅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如同它在1956年1月曾经做过的那样，并且列出与会者的名字。综上所述，要是刘露了面并且希望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只要把他的名字列入出席者中就可以使他的目的流产。这种

252

做法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重要的”缺席者。

注释：

1. 正如在第374页注58里论证的那样，刘很可能直接从北京到了湖南，并以视察河北作为这次巡视各省之行的结束。如果他在湖南的 3 月 5 日讲话标志着视察那个省份的开始的话，那么，2 月 27 日他一定还在北京。
2. 林小姐透露，据她所知，毛泽东本人在批判胡风中起了主要作用，但在当时一般群众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参见杜林：《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治》，第 38 页）。毛为批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所搜集的材料写了前言，但直到毛的文章和讲话集出版，这情况才披露出来（见《当代背景》891 号，第 19—21 页）。
3. 杜林：《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治》第25—26页。
4. 雷涅·戈尔德曼在《中国季刊》1962年10—12月号第141—142页。引用此话。戈尔德曼先生当时在北大学习，他说林小姐声称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中共成员有 80%离开会场，这大概是极不可能的，从杜林的书中所引用林小姐所说原话看，这一定是不对的。
5. 请比较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和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或者同中共八大开幕式及 1957 年全国人大的照片（分别见《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16 日，1957 年 6 月 27 日）作比较。在后三个场合里，坐在主席台前排以后面各排人是可以看清楚的。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上，尽管在前排以后就座的人难以辨认清楚，不过刊登在《人民画报》1956 年 2 月号第 5 页上的相同场合的一张出色照片，弥补了这一不足。（附带说一句，1956 年最高国务会议的那张照片，清楚地证明邓子恢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可能是因为他不赞成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也可能由于他在合作化方面遭受了挫折而受到冷遇。）《人民画报》没有刊登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时的任何照

片。

6. 指按其地位应该坐在前排的人。例如，在《人民日报》的照片上，贺龙坐在副总理行列的最末一个，副总理们在前排都有座位。然而，这里只有他的位置，因为地位比他高的二位副总理林彪和彭德怀没有出席。林伯渠和罗荣桓如果出席也应在前排中，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们坐在一起。而他们没有在前排露面，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到会。
7. 这一时期林极少公开露面。然而他在4月22日同刘少奇在上海机场迎接过伏罗希洛夫主席(《人民日报》4月23日)。朱德从这年年初起就一直没在首都出现过。据报道，2月6日他在广州（香港《文汇报》，1957年2月25日），3月中旬是在家乡四川省的成都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的(《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也许这位70高龄的元帅是为了躲避北京的严寒，不过这也不能成为阻止一位首脑人物为了听取毛的一次重要报告短暂地返回北京的理由。
8. 关于对此类证据如何评价问题展开的充分讨论，请参见麦克法夸尔的文章，载《中国季刊》1971年4—6月号，第289—307页。

253

附录8　各省负责人对整风的态度

各省负责人对整风的态度，可以通过他们发给这场运动积极分子的印刷品归纳出来。整风指示规定，第一书记要挂帅，并成立领导小组指导这场运动。可以假定所有的省级领导人都服从这个指示。不这样做就等于无组织无纪律，执行不力会受到严厉处罚；只有一个省的第一书记在整风运动中被撤职，这似乎也不是因为违背了上述指示。[1]

然而，很有可能各省负责人虽在执行指示，但是仍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个指示公布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报道，说明整风是如何在各省组织起来。这些报道肯定是以省

政府负责新闻发布的干部向记者提供的情况为依据的。这些干部可以公开强调，他们的第一书记在执行这个指示，并且下令成立专门小组来指导这次运动，以此响应中央的指示。在25个省级单位的报告里（见本书第255页的表格），[2]只有11份报告[3]毫无疑问的说第一书记发出过指示。在这11份报告里，有10份提到领导小组已经成立。[4]另外3份报告[5]很有可能是要表明第一书记试图公开表示赞成整风，而还有两份[6]也是如此。还剩下9个[7]省级领导人没有使其名字在这次报道中露面。其中，有6个[8]没有提到其专门领导小组，5个没有将其领导人的贯彻情况写入这次报道。[9]鉴于指示关于整顿领导的指令和11个新闻报道按部就班地表示服从这个指令，因此不难断定，未见诸报端的这9个领导者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不赞成。

不赞同的省份包括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如果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朱德的缺席表明了他对毛的想法的态度，那末他很有可能利用这年早春逗留家乡四川的机会去争取第一书记李井泉。刘少奇三四月间访问过的5个省中，有两个[10]属于上述9个省份之列（第三个省份[11]是属于有疑问的）。彭真的北京也属于此列，还有彭的家乡山西省。"遗漏"下的9省负责人，领导着总共约2.5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以上。

注释：

1. 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参见泰维斯：《省级领导人的清洗，1957—1958》，载《中国季刊》1966年7—9月号。河南是第一书记表示不欢迎整风的省份之一（见下）。
2. 正如表里说明的，未能得到对两个地区（广西和天津）的报道；而第三个地区（西藏）不在运动的范围之内。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
3. 安徽、黑龙江、河北、湖北、吉林、贵州、辽宁、山东、山西、新

疆、青海。

4. 这个例外是贵州省，所以如此，是因为报道采取了采访第一书记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新闻发布。
5. 福建、云南、上海。
6. 湖南、江西。
7. 浙江、河南、内蒙古、甘肃、江苏、广东、山西、四川、北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可能病了，见257页注14）。
8. 这些例外是北京、河南、也许还有江苏（见257页注15）。
9. 如表所示，我发现这27个省级单位的报道中，只有14个涉及体力劳动问题。由于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央专门指示的中心议题，因此，近半数省委书记们没有向全国公众保证执行这一政策，表明存在着广泛的不满情绪。
10. 河南和广东。
11. 湖南。

省级领导人对整风运动的反应

省别[1]	第一书记领导[2]	成立小组[3]	三害顺序[4]	出处[5]	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6]	出处
安徽	是	(是)	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37号第10页		
浙江	——	——[8]	——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号第26页		
福建	是？[9]	？[9]	正确的（顺序）	《人民日报》5月8日、11日		
黑龙江	是	是	——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号第24—25页	是	《人民日报》5月10日

省别[1]	第一书记领导[2]	成立小组[3]	三害顺序[4]	出　处[5]	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6]	出　处
河南	——	是	——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527 号第 25 页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河北	是	是	——	《人民日报》5 月 3 日	是	《人民日报》5 月 5 日
湖南	?[10]	?[10]	正确的	《人民日报》5 月 8 日		
湖北	是	是	——	《人民日报》5 月 9 日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内蒙古	——[11]	——	正确的	《人民日报》5 月 20 日		
甘肃	——[12]	——[1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37 号第 11 页		
江西	?[13]	是[13]	官僚主义	《人民日报》5 月 4 日		
江苏	?[14]	是[15]	正确的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16—17 页		
吉林	是	是	——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27 页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广西						
广东	——	——	正确的	《人民日报》5 月 3 日		
贵州	是[17]	——[17]	正确的	《人民日报》5 月 9 日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省别[1]	第一书记领导[2]	成立小组[3]	三害顺序[4]	出　处[5]	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6]	出　处
辽宁	是	是	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22—23 页		
山西	—	—[8]	—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20—21 页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山东	是	是	正确的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14—16 页		
陕西	是	是	正确的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14—16 页		
新疆	是	是	正确的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14—16 页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四川	—	—	正确的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号第 26—27 页		
青海	是	是	—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27 第 20 页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云南	是？[18]	？[18]	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 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是	《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了第一书记和领导小组。(当然，如果省里的官员希望公布他们的活动的话。) 至于新华社的报道，我仅采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转载了的。

6. "是"表示某个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具体报道。关于这个方面通常都是专题报道，而非一般地谈论整风的大块文章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没有发现报道的地方就仅仅留了空白，而不是"——"。
7. 没有成立专门小组，由省委常委领导运动。
8. 浙江和山西包括在《人民日报》5月4日的综合报道中。该报道谈到，8个省开始了整风运动。它还报道了哪6个省成立了领导小组，浙江和山西不在其中，这证实了新华社从这两个省发来的报道，该报道没有提及它们成立领导小组的事。
9. 5月8日的报道是关于若干省份的摘要报道的一部分，没有提到福建第一书记或许不是结论性的。(报道中也谈到了黑龙江但未提到第一书记，但在某些时候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到他领导了整风。) 对福建省，我以"是?"来表示，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也可能同样地提到了第一书记。我的依据是，在3月1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据称该第一书记在一次省的党代会上认真地做过整风报告。也可参见5月16日《人民日报》。我仅在"已成立小组"一栏中以"?"标出，因为在5月11日报告中没有提到这样的小组，但也没有理由要在该报告中提到它。
10. 一个"?"表示湖南，因为我所能找到的关于该省的报道是5月8日《人民日报》的摘要。
11. 内蒙古党的会议于5月18日召开。它向中央报告整风计划的两个星期的期限——整风指示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但是这个委员会或许是由于4月底开始的自治区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的压力而得到了特别的照顾。
12. 在新华社的有关报道中没有提到第一书记或小组。可是《人民日报》5月25日的报道中，已经指名提到从4月中旬以来第一书记主持了各种会议并要求展开批评。是不是第一书记又有了另外一些想法，使自己

的名字不出现在全国性的报刊上?

13. 在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另一摘要报道中，谈到了江西，所以，没有提到该省的第一书记也许不能以此下结论。(山东包括在摘要中，也没有提到第一书记。但是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他的领导。) 可是，这个摘要并没有具体说明，文中谈到的 8 个省——其中包括江西省——究竟哪个省成立了领导小组。
14. 据悉，江苏省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夏天的晚些时候生了病，参看"联合研究所"(香港)名人录中他的条目第 1 卷第 138 页。这次生病可以说明在发动整风时为什么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参加体力劳动。的确，《新华日报》6 月 1 日社论暗示，当时江苏省党组织肯定在整风运动中落后了。见上文第 218——219 页。
15. 按照译文，江苏决心组织几个领导小组，而不只是一个。
16. 我未能找到关于广西整风运动的任何报道，也许该省正忙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更可能的是，当北京制订出关于广西饥荒问题的最后决定时，省里的官僚机构已经瘫痪。由于饥荒，当地党的第一书记和其他两个省委书记被解职。(关于此事的一些报道，出自 1957 年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62 号第 13—20 页。)
17. 《人民日报》就贵州省如何进行整风采访了该省第一书记周林。我由此推断周林对在全国公布他对贵州运动的领导是很关心的。周没有说到任何有关成立小组的事。
18. 我没有发现云南省的党组织关于进行整风运动的深思熟虑的报道。可这里有《人民日报》关于第一书记谢富治在一次省政治协商会议上就这个问题的讲话的报道，所以我再次有把握地推断：谢富治用这种方式表明他愿意投身到整风运动中去。
19. 在省政治协商会议的讲话中，谢富治两次提到"三害"，一次(顺序)不正确，另一次内容减少。
20. 报道上没有提到彭真在5月3日、4日北京市委常委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甚至没有提他出席。这次会上成立领导小组，报道说这个小组将由书记处书记彭真领导。彭真的确5月5日向北京市委党委扩大会议作了报告，但没有提到他要领导这次运动。看来彭真试图两方面都兼顾到：做为全国最强有力的省级领导人，他不能在整风运动中回避向全市党员（市委）发表演讲而破坏党的纪律；同时，他通过公布他没参加（领导）小组的事实提出他对整风的不同意见。

21. 我未能找到有关上海市委对整风采取具体措施的任何报道。然而，《人民日报》刊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两次报告的报道。与北京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提到成立没有第一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的事。因此，我认为柯急于表明他对整风运动的支持。迹象无疑表明，上海比北京对整风运动更热心。

22. 我未能找到任何有关天津开始整风运动的报道，只有该市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报道。

第四编

反右运动

261

第十七章

关于矛盾问题讲话的公开发表

第一节 《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5月11日到20日之间，或许更靠近这段时间的后期，毛泽东谈了对大鸣大放的看法。讲话的题目叫做《事情正在起变化》，表明他内心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1]表明他开始更多地担心修正主义：

>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2]

在这里，毛泽东重申了1956年12月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制定的路线。

文中说，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都应当（受到）反对。[3]在12月文件里，教条主义仍然被看作主要危险。到5月中，毛泽东似乎快要改变他对这两种倾向危险性的主次关系的看法，他准备提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比教条主义者有更大的危险是因为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自由主义的产物，与资产阶级联系密切。但是，显然他还不大愿意说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认为，——这多少有点矛盾——"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并不比右倾机会主义的小；另一方面他觉得，在党内，修正主义只是个别现象。[4]显然，毛泽东这时的思想正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但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向修正主义发动全面进攻，因为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下，这样做势必使党的批评家也受到攻击。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寄予希望。毛承认，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留恋旧社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进行再教育，但是，发展经济需要他们的帮助。所以党"必须进一步改善同他们的关系。"[5]

262 在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交换了这些想法以后，最多不过5天，毛泽东不得不告诫青年人：所有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另一个较为含蓄的警告是在5月25日，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座谈会的那一天发出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说，共产党不会驳斥错误的批评，那是不对的，接着他代表党驳斥了一种错误观点。他说，在非党人士高级座谈会上有人反复提出非党干部没有行使他们与其职务相应的权力，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胜任。[6]看来，若不是得到某种认可，处于卢郁文这种地位的人是不会作出如此直率的表示的。中国总理对他的辩护肯定感到高兴，既说清了问题，又不用亲自去评判他的那些非党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卢郁文的讲话实质上是总理对非党人士的一个警告，即他们很可能会遭到反击。如果真是这样，那总理的这一着棋的结局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卢郁文

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个马屁精，如不悔改，将不会“有好下场”，6月6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公开了这封信，[7]6月8日，《人民日报》便以此为缘由，发表了第一篇反击党的批评家的社论。

第二节　批评标准的演变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文中说卢郁文收到恐吓信，这是一起重大事件，因为它标志着某些人想利用整风运动来搞阶级斗争。文章接着写道：“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这些话是不祥的兆头，[8]同一天，大胆鼓励批评家们畅所欲言而自己又直言不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提出辞职。[9]

储安平认为，尽管《人民日报》的文章已预示着情势紧迫，但有迹象表明，党的领导人在反击的范围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另一名政治嗅觉灵敏的高级记者浦熙修女士，6月8日打电话给宣传部长陆定一询问，《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是不是意味着大鸣大放要结束了。陆定一说不是这样。[10]看起来，陆定一绝不是在说谎，因为他满可以象周恩来在两天前那样，拒绝评论。再说，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理由去引导浦熙修女士和她的《文汇报》犯错误，因为文汇报已经承认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他不会再让他们随意行事，以致自取祸端。[11]而陆定一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消息的来源也不会有错，因此，结论就是政治局还没有最后形成决议。

263

从6月8日至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进一步证实，到6月8日为止，政治局还没有确定反右斗争的方向，关键的问题是批评标准的确定和给被批评者定什么样的罪

名。而制定这些政策需要时间。

6 月 8 日的社论采用了“右派分子”这个词（它出自非共产党的妇女领导人何香凝之口。[12] 社论并赞同她的看法，认为这些人错误地利用整风运动开历史的倒车、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第二天的社论题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很清楚，其目的在于防止整风运动完全停止。社论为确立正确的批评标准作了初次尝试。它说，那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团结”的人，违背了人民和整风运动的利益。前两点与 10 天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六条标准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一致的。但是在后者中的范围更广，含义也更严峻，第三点——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和六条标准中的任何一点雷同，但它可以被看作是第一和第五条标准演变的基础。第一条标准是要团结各族人民，第五条是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6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3] 对批评的标准问题有了进一步的阐述。社论提到了一些企图“使人民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观点[14] 再一次地预示了毛泽东的第二和第三条标准，但这一次的标准比前一天提到的涉及面更大。很清楚，被合法地谴责为“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批评）言论，可以说要比实际上“破坏”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批评）言论多得多。社论还预示了毛泽东的第五条标准——党的领导，提法上比前一天更确切。同时还介绍了第四条标准——民主集中制，但在这里将它与第三条标准裹在一起，而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它单列起来。6 月 10 日的社论还在为那些犯了错误的党的批评家们寻找一个合适的名称上前进了一大步。在《事情还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曾使用过“右翼知识

分子"[15]这一提法，6月8日的社论则用了何香凝女士的"右派分子"提法。6月10日的社论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给被没收财产的工商业者延长支付定息的期限。就是这两种提法的合二而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通常被简略成"资产阶级右派"，后来在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6月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一文中，这一名称被固定下来。

6月11日的社论又进一步发展了这六条标准。社论的题目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暗示人们尤其要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社论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提法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条标准。但由于使用了"拥护"这一词，就又一次扩大了标准的范围（毛泽东在讲话中所用的"有利于"大概就是这个词的先行词）。对这六条标准仅仅不反对还是不够的，而必需有一种积极态度对待它。6月11日的社论对什么是毛泽东第一条标准的要害再次作了暗示：

265

> 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

6月12日的第五篇反击社论以《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为标题，谴责"右派分子"利用批评运动"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又一次喻示了批评标准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条。两天以后，在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前夕，《人民日报》的最后一篇反右社论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批评要有标准，而且选出了一条最重要的标准：

> 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

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16]

简而言之，这就是从6月8日反右斗争开始到6月18日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这10天里批评标准逐步形成的全过程：

6月8日，没有提到标准。

6月9日，预示了第二、三条标准，暗示了第一、五条标准，使用了“破坏”这个词。

6月10日，预示了第二、三、四、五条标准，使用了“削弱”一词。

6月11日，预示了标准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条，暗示了标准的第一条，暗示了标准第二条（社会主义）的特别重要性，使用了“拥护”一词。

6月12日，预示了标准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条。

6月14日，第一次使用“标准”一词，确定坚持社会主义是进行批评的基础。

6月18日，毛的讲话由新华通讯社公开发表，确定的批评标准如下：

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

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7]

这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比原先提出的要全面得多。它们包括一个新的正面的提法（“有利于”）和两个程度不同的反面提法（“破坏”和“削弱”）。其次，一个迄今从未暗示过的新的标准作为第六条标准。第三，现在单独列为特别重要的标准有两个，而4天以前只有一个。再者，这两条特别重要的标准分别列为第二条和第五条，而不是第一条和第二条，这也许是由于决定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时过分仓促而造成的。还有一点能说明六条标准的形成过程：毛泽东在第二条标准中使用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词，而6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用的是“社会主义事业”，6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用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另一个情况是，第四条标准曾在6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过，后来不提了，这次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又出现了。

这些情况表明在6月14日的社论发表以前，还没有人拟定过一套正式的标准，也没有人从中确定最重要的标准，这（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在发表这篇讲话时，里面没有这六条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些情况表明，公布毛的讲话的决定是在6月14日社论发表之后才作出的。因为这时已经需要系统地订出若干标准了。可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第三节　关于公开发表矛盾问题讲话的决定

可以想象，政治局只可能在6月14日至18日之间作出决定，把经过修正的条文记录在案，将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后来称之为“不平常的春天”之后关于矛盾的分析意见通报给干部和批

评家们。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在政治局讨论发表这些条文是否适宜时必然成为理由之一。但是毛肯定会反

267 对这种理由。把塞进了这六条标准的讲话公开发表必然会引起人们怀疑他不讲信用，也会损害他同非党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中，不得不设法做出解释，来消除人们对他的这种疑虑。（参见原书 279 页）

看来，更可能的是毛泽东这样做是被迫的——也许是为了让其他人高兴——因为《纽约时报》在 6 月 13 日报道了有大量引语的毛泽东的讲话摘要。[18] 这一则长篇报道包括了毛的公开发表的文本中删节了的段落，[19] 这上消息传到北京已为时太晚，已不可能对 6 月 14 日的社论作任何改动。但是，《纽约时报》的特约稿还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重新思考。从 6 月 8 日到 6 月 14 日，除了其中的 1 天以外，《人民日报》每天都发表 1 篇反击社论。但是从 6 月 15 日到 6 月 19 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公开发表，便再没有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20]

当中国的领导人在理解和讨论《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有一点他们的意见大概是一致的，即只好把这个报道看作是真实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不公布正式的文本，任何官方的否认都无法使被泄露的文本成为不可信的东西。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表原始讲话的正式修订本，删去一些在华沙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本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内容，加进毛泽东在 2 月份时认为不那么重要的有关政治行为的准则，还有一个不大的，但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面子问题。毛主席大概不愿意让他的一次重要讲话由一位“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公布于世。他的讲话由一则波兰的消息泄露出去这一事实，可能是毛泽东对波兰共产党冷淡的原因之一，也许不是主要原因。但他无疑地把泄露

讲话这件事看作是对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粗暴践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波兰安全部门的无能。

第四节 关于矛盾问题讲话的正式文本

与华沙的文本，以及与罗伯特等人的报道作比较，可以看出6月18日新华通讯社发布的、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刊登的讲268话文本，删去了一些极为坦率的东西，2月份，毛显然透露了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的人数，按照华沙版本是80万人；按照罗伯特的报道是"不超过70万人"；[21]按照一位学生领导人林希翎的说法是"77万人"；[22]而另一位学生说是"70多万人"。[23]毛披露这个情况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表明他说话真实，同时如罗伯特所说的，为了让那些非党知识分子不要再去相信西方的估计（西方估计为2000万人）[24]，在2月份的讲话中，毛泽东同样十分坦率地谈了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错误，并说那里的改革不得不推迟几年。[25]

然而，上述删除的部分远不如增加的部分那样使鸣放者感到兴趣和关切。加进的部分中主要的是关于批评的六条标准。这些标准改变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鼓励批评者的作法。如果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中就有这六条标准的话，那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真正的鸣放。[26]

加进这六条标准是为了采取紧急行动的需要，另一些增加和改动的部分则反映了经过大鸣大放后毛的观念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讲话的各不同部分所强调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毛泽东一方面断言"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27]可接着他又这样说：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

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地解决。[28]（着重点是我加的）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最后胜负问题的看法，变化无常。这既不符合他前一年的讲法，特别是不符合由周恩来阐述过的那些讲话，同时也不符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所作的判断，即国家从未象今天这样统一，[29]大多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30]

269　表明这段话是后来加上的，另一个事实是，这段中的第一句是对6月8日社论中相似的一段话的阐述。那一段是这样的：卢郁文收到的恐吓信“告诉”我们，尽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如果毛泽东早在2月份就这么说，那么很清楚，这封信就不会告诉人们任何新的东西。

再一个相关的变化就是把修正主义看得比教条主义更危险。[31]这个看法在12月底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还没有，在那里，这两个危险是并列着的，因此，毛不可能在2月份以前改变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甚至在5月份，他仅仅只是准备提出修正主义者比教条主义者更危险，而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在1957年[32]三、四月间，毛泽东对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的态度不大可能比对更为保守的（即教条主义者）捷克总理西罗基更亲热；如果他在2月份就认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的话，那他也不会对波兰总理作出思想上的让步。直到1957年夏季，当毛泽东取消了访问华沙的计划时，他对这两者的危险性的看法才有了明显的改变。[33]

尽管毛的讲话在语气和内容上的变化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感到

惊慌，[34] 但是，无论从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对斯大林主义最彻底的背弃"这一点看，[35] 还是从它体现了毛所承诺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憧憬，[36] 他的这篇讲话仍然是一篇给人以新的希望的文献。这篇讲话仍然强调说服，而不是压服；[37] 仍然提倡对罢工要持克制态度；[38] 仍然答应给那些在镇反中被整错了的人恢复名誉；[39] 仍然谴责官僚主义。[40] 讲话重申了百花齐放以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41] 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也许已经改变，但他还是把他的这些观点公布了出来。

注释：

1.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5页。
2.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5页。
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9—290页。
4.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5页。
5. 《毛主席教育语录》第25—26页。
6.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又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48号，第10—12页。
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53号，第13—16页。
8. 《光明日报》曾向9个城市派出记者，专门召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59—40、64—68页。储安平以向毛和周恩来提意见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批评，认为关键的问题在党认为它应该在各个方面均居统治地位。（译按：即党天下）（同上书，第51—53页）。
9. 见《本报工作人员在民革、民盟座谈会上揭露章伯钧、储安平等共谋篡改〈光明日报〉方向》，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21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66号，第24页）。
10. 见《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章伯钧承认他与罗隆基结盟》，新华社1957年7月3日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71号，第

22 页)。

11.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负责人是浦(熙修)小姐)要对早些时候的一篇关于北大校园骚乱的重要报道负责(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34页)。

12. 何女士已80高龄,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廖仲恺的遗孀,廖在1925年孙逝世后不过几个月就被暗杀。其子廖承志在八大上再度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3. 题为《工人说话了》。

14. 同上。

15.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5页。

16. "这不是立场问题吗?"《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55页。

18. 这篇报道是驻华沙记者西德基·格鲁森写的。更早一些有关这篇报告的报道刊登在5月19日和29日的《纽约时报》上,但其内容在中国大多均已为人所知。

19. 两种版本的摘要均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265—277页。对原文的改动,下面还将讨论。华沙版本的可靠性有一个情况证明,即它包括了一段话,说已决定出版蒋介石文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1957年4月17日的讲话里(发表在《南方日报》5月4日上),已经透露了这一决定。他对此中缘由的说明和华沙版本相同,即需要了解敌方(参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276页)。

20. 《人民日报》于1957年6月15日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论。

21. 罗伯特·罗和汉普瑞·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20页。

22. 杜林《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治》第38页。

23. 同上书,第62页。两位学生并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的数字是根据毛的讲话,但是有理由假定他们确是如此。

24. 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20页。理查德·L·沃克:《共产主

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第219页称数字超过1400万。

25. 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21页。有关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在西藏东部的冲突的最初报道于1956年春季和夏季传到外界。1956年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对意共记者说，这些报道是夸大的。这是有关叛乱的已大为推迟的消息。这次叛乱开始于2月下旬，地点是四川东部的甘孜自治州，该州系藏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方（新华社1956年8月7日）。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此紧张，使得毛在1957年2月的讲话里估计当时在印度访问的达赖喇嘛可能留在那里，或申请到美国避难（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87页）。毛有理由感到焦虑；尼赫鲁也曾劝告达赖喇嘛最好回去（见理查森《西藏及其历史》第203页）。

26. 那是使人确信在原文中没有这些标准的一个论据。其余已在上面论及(见209页，262—266页)。罗伯特·罗听过实况录音，他说录音里也没有这6条标准（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91页）。

27.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8页。

28. 同上。

29. 同上书，第275页。

30. 同上书，第289页。

31. 同上书，第289—290页。

32. 毛只以便宴款待西罗基总理（《人民日报》，1957年3月10日），而对西伦凯维兹主席，他则设宴招待（同上，1957年4月9日）。毛和西罗基在一起的照片只发表过一次，而且还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同东道主合影留念的场面（同上，1957年3月10日）；而对西伦凯维兹，毛不仅和他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同上，1957年4月9日），而且还发表过一张和他在宴席间的谈话的照片（和西伦凯维兹夫人及周恩来。同上）和次日，他出席了这位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的答谢宴会的照德（同上，1957年4月10日）。在关于波兰人访问情况的报道中，提到毛和西伦凯维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同上，1957年4月9日）；但没

有报道毛对同西罗基总理的谈话表现出同样持久的兴趣（同上，1957年3月10日）。

33. 见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第64—65页。在西伦凯维兹访问结束时签署的中波联合声明中，没有象周恩来1月访问华沙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那样，声称苏联是集团的领导。记住下面一点很重要；毛的第6条标准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当1957年秋毛赴莫斯科时，他完全确信不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是有损于集团的，这导致他同波兰及南斯拉夫代表团的争论，由于毛的干预，最后公告，承认了苏联的领导地位，南斯拉夫代表团拒绝在上面签字（同上书，第146—147页）。1958年上半年，中国开始与南斯拉夫争论。换句话说，在1957年夏季，否认苏联的领导地位成了修正主义的标志。但这并非因为中国到了这时才意识到强调苏联领导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中国在5月到6月初的体验使他们明白，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对修正主义宽容下去了。于是，他们不支持波兰对苏联领导地位的立场。很难想象毛原来的讲话就包含对修正主义危险性的估计。谴责修正主义是最主要危险的同样的话，插入了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它与上下文很不和谐。

34. 参见罗和伊文斯：《逃出红色中国》第251—252页。

35. 杜切尔：《苏联、中国与西方》第104页；毛的讲话的章节标明日期是从1957年6月开始的。

36. 本杰明·I·许华茨：《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第115页；这句话的日期为1957年7—8月。

37. 《共主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9页。

38. 同上书，第291—292页。

39. 同上书，第282页。

40. 同上书，第291页。

41. 同上书，第288—291页。

第十八章

270 毛与右派的关系

第一节 罗隆基的建议

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国外受到了报界的好评，但是它的发表在国内看来是主席的让步。这时，成千上万[1]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毛是被迫让步，彻底纠正他在不到4个月之前充满自信的主张。对党的批评家的猛烈反击，是对在3月份曾主张“公开化”的这位领导者的打击。他被迫承认刘少奇等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彭真在6月7日召集北京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打算对第二天的工作作出全面安排，并且告诉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是绝对或永远正确的。斯大林自己认为他永远绝对正确，结果他在二十大上被谴责并被击得粉碎，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他的画像被摘下来，甚至被撕碎。由此可见，所有的人都会犯错

误；区别只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不同而已。[2]

彭还反复提示：党的主席不能凌驾于党之上或把自己摆在党的对立面。“我党的干部都是党的工具，问题在于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工具怎样才能运用的更好。”（重点为作者所加）[3]

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彭真正确之后，……在6月8日社论即将发表之前，据说他与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和任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频繁电话联系，显然他二人将在反右运动的舞台上扮演主角。[4]

271 但是北京市一位主要领导并不满足于仅仅看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被放弃。事实表明正是他对毛在前几个月中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反驳。这就是指责那些接受了建议的“资产阶级右派”。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最重要的指责是北京市一个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首先开始的。尽管吴晗不是中共党员——他是民盟北京支部的主席——他似乎与共产主义的同事们，如彭真和北京党的第二书记刘仁，[5]都有着密切的联系。8年之后，当毛在文革初期想摧毁北京党委的组织时，对吴晗的突然袭击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清洗。[6]确实，在1957年夏季，在没有得到高层人物的支持和保证下，吴晗甚至没有胆量对毛进行间接的批评。[7]

吴晗的批评是针对成立一个有关肃反的甄别委员会的建议，……毛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建议成立这个委员会，并允许这个建议公诸于众：

> 建议在今年或明年，对于镇反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以利于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不健康倾向。从全国来讲，这个工作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来抓。地方上由省市人大和政协来抓。[8]

吴晗以反驳罗隆基为手段来抨击这个建议，罗曾在5月22

日对非党上层人士的讲话中接受了毛的建议。罗主要关注的实际上不在于对过去失误的纠正；在毛的建议之后，他对此自然深信不疑。他更关心的是利用这个委员会来再次安抚那些仍对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心有余悸的人们。《人民日报》的评论说：

272

> 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成员）领导党（共产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9]

罗认为这个委员会应该具有3个特点：它的存在应当鼓励人们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它应给错判的人平反（进一步鼓励人们讲话）；它应制止那些可能会对批评者进行打击的具有报复心理的干部。[10]

6月10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中，吴晗原原本本地回忆了罗的建议，并告诉记者：

>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11]

吴晗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只是一个论点，而不是一种严肃的批评。很清楚的是，由人大和政协组成一个委员会并不会改变这些组织本身的性质。

6 月 19 日，吴晗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可能是由于他的文章是与毛的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同一张报纸上出现，而这个讲话中正包括了最初的建议。吴晗感到有必要对他批评的理由稍加改变。这次他只是批评罗隆基要"在党和政府组织之外建立一个平反委员会"[12] 的想法。这个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几天后周恩来在人大提出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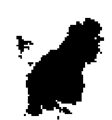
在周恩来讲话的前一天，6 月 25 日，罗隆基试图在民盟的一次整风上把自己讲的话加以澄清。

罗隆基对他曾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作了一番术语上的辩解。他说：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领导党也要参加。他又说，这话是错误的，他不否认。据他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13]

273

《人民日报》通过印发罗的解释，再次让人们注意罗和毛的建议的相同之处。为了使人们不致于对此发生误解，该报后来长篇披露罗在森林工业部的活动。据说在此期间，他的助手赵文璧曾反复指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建议，是在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与毛主席的讲话没有什么矛盾之处。[14]

但是，《人民日报》的读者关于对这个建议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在 7 月 15 日刊登的右派叶笃义在人大悔过的讲话中，他说："自从他（罗隆基）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反动主张后，他遭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怒指责，但却获得少数国内反动分子和右派的喝彩。"



面对罗隆基所谓的"平反委员会"的建议遭到反复攻击和罗与毛的建议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联系，连周恩来这样干练的政治家也是爱莫能助。在 6 月 26 日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说："他们

(指右派）企图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15] 严格说来，周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如果毛的建议被实施的话，人大和政协常委会的某种形式的联合委员会，就必须在人大之外建立起来。在这年后期，毛不得不默许批判罗隆基的建议。因此毛自己的建议看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是毫不足怪的。[16]

第二节　毛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受到批评

在报刊文章中，在记者采访中，在民主党派的座谈中以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都对罗隆基发起进攻。……[17]……

274

1957 年的人大会议原订 6 月 3 日召开，[18]5 月 25 日的开幕式一直延期到 6 月 20 日[19]。大概是担心学生会利用人大的机会闹事，因此决定将会议推迟到能使学生平息的时候。6 月 19 日，即毛的矛盾问题讲话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那一天，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将会议推迟到 6 月 26 日，会前这段期间召开预备会议。[20]

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预备会议似乎主要是对已经发表的毛的讲话进行研讨。因为许多或大多数人大代表都可能聆听过毛本人的报告，或听过录音，无疑，让他们知道"讲话"为什么要增补和修改是非常必要的。像宋庆龄这样的一些主要非党人士，从 6 月 27 日开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他们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即将来临的斗争中，批评他们那些犯了错误的朋友们和同事们。最重要的是，人大的主要领导肯定利用了这些预备会议来确定如何更好地开展批判的方针。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称呼批判的对象。因此有理由设想，《人民日报》6 月 22 日社论出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词，是

由于需要确定一个绰号以便提高人大会议讨论。事实表明，如果人大会议不是即将召开，中国领导人在一段时间也许不会一致同意这个词。

在人大会议第一天，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心议题。总理花费大量时间来维护他的政府，驳斥从5月初以来那些对政府的最激烈的指控。他说一旦右派被孤立，大多数人就会接受思想上的再教育的这句话也是对因那些怀疑毛犯错误的言论进行抨击，说毛对矛盾问题的分析是伟大的论断。(不仅是一般讲话和报告) 并且说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及通过我们在揭露和打倒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胜利斗争，形成我们更强大的队伍。"[21] 在这一段中，周恩来以正确的顺序提到了三大弊端。但在此之前，他曾使用了更适合刘少奇口味的提法，把思想上的改造置于行动上的改造之前，这正是对刘等人表示出的一种和解：

275

> 一方面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严肃认真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另一方面要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22]

如果周恩来希望与毛主要对手进行妥协，他必然会失望。他说话就是很有节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提到批判者时，只说是"某些人"，而不采用"资产阶级右派"的提法。但是周的调和，并未被普遍采用，7月1日之后，在人大会上的反右讲话变得更强硬。[23] 右派分子继续遭到谴责，章伯钧和罗隆基被说成是反党联盟。

章伯钧曾在5月的讲话中建议成立一个"政治设计院"。他的目标似乎是使全国政协和人大常委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讨论重要问题和政策时是应该邀请这两个机构的。[24] 该建议

所遭受的抨击比罗隆基提的"平反委员会"要少些，这也许是因为共产党的干部认为，他们更担心重新审查镇反运动，而不必担心这个从组织上讲多少有些含糊并可以无害的方式实施的建议。毕276 竟刘少奇在1956年11月曾把全国政协说成是一定意义上的人大的"上议院"[25]。但是，章的建议却被作为攻击毛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的借口。[26]例如，在一份给人大的联合声明中，以章为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4名成员宣称："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他意识到放弃他过去的那种消极态度现在可以勃勃雄心，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27]

吴晗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从1956年开始在共产党国家内出现的一切灾难联系起来，更尖锐地描绘了当时的形势：

> 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28]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章伯钧和罗隆基）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29]

另一个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内有人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例子是右派分子马哲民的自我检查。他引用了章伯钧在3月民盟全会上的讲话说：

> 我从习仲勋那儿探听了一下口风，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不易搞，所以我在这次会议中，极力主张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任务，有了这，则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了条件，否则只是空谈，兑不了现。[30]

在人大另一次会上，攻击章伯钧时，更多的高级官员受到牵连。有一篇报道说，在抗战时，尽管章伯钧打着虚伪的社会主义者的旗号，当时国民党首都重庆的共产党办事处怎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章伯钧，办事处的领导人周恩来和董必武又是如何与他讨论国事。[31] 言下之意是周和董曾经如此姑息养奸至少是很愚蠢的。由于周在整风问题上对毛坚定支持使他在政治经历上的污点能被理解；与董必武有牵连，也许因为他身为最高法院院长，必定要在镇反问题上成为党的坚定维护者。[32]

277

周恩来还有一层原因同毛联系在一起，这表示党的干部认为，对出现的错误他几乎与主席一样负有责任。被划成右派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宣称，罗隆基经常引用毛和周讲的话来吓唬人。[33]

民盟一位成员对章伯钧的攻击，提供了一个诋毁毛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机会，并附带地有力证明这类责备不是偶然产生的。胡愈之援引章对人大常委会发言时农工民主党成员传达毛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时说："尽管许多人说资本主义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34] 有趣的是，这句话除了影射这个部分毛的讲话有唤起资本主义的新的希望外，还说明胡愈之并不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35] 因此他不能参加章伯钧发表了这一言论的会议。看来是有意给胡愈之引用了这句话，以便晓诸于众。[36]

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因为"曲解"了毛关于中共中央要控制高等院校的讲话而双双受到攻击的。在无节制地开展批评的那段时期的后期，这一点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学生情绪的高涨，解除党对学校的控制就可能失控而引起暴乱。6月初一份关于上海复旦大学党委系统已经解散的报道立即被否认了。[37] 如果毛不论以何种方式鼓励事态这样发展的话，党的干部们的愤懑情绪就将更加强烈。

再来看看吴晗的讲话。他似乎第一个暗示应该受到责备的是毛。吴晗在人大的讲话中说，章罗在4月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散

278

布的要党委退出学校的观点："根据是假借传达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主席说学校党委制可以研究。章罗传达时变成'毛主席说，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38] 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铁道学院批判章伯钧的报道；据说他在5月18日，曾在那里发表一通所谓毛主席也不了解在高等院校执行党委制的谈话。[39] 章伯钧这段话的意思不很清楚的，但是明显地暗示毛对党委制是反感的。最后，另一份在人大的发言指出，章伯钧从两方面曲解了毛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方面是所谓毛建议党委制应在学校撤销；[40] 唯一能表明毛在这方面观点的是他4月初在上海党委会上的讲话，当时他倡议从根本上改组大学党委制，其中包括重新分配一些干部的职务。在4月底他是否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呢？[41] 总起来看，毛很可能讲了一些章和罗说他讲过的话。而刘少奇等人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第三节 毛的困难处境

毛对中国共产党在整风期间受到的大量谴责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就使他的对手们有足够的理由公开揭他的底。但是毛在反右运动中的作法更加重了他们的愤恨。毛的困境是，他制造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信用差距，要想消除两个差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得不争取。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在6月14日《文汇报》对自己在整风中所起的作用发表一篇社论进行自我批评，非常有力地暗示它的错误是由于对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倡议的"鸣放"理解不当：

279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42]这段话刺痛了毛，他在他为《人民日报》写的7月1日社论（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披露的）抨击《文汇报》时引用了这段话。[43]他拒绝了《文汇报》检查中的辩解，谴责这张报纸对无产阶级发动了疯狂进攻，对帮助党整风没有丝毫诚意。接着毛试图来弥补两个信用差距。为了党员的利益，他争辩道，当初反击的失败是有意引蛇出洞；对非党人士他多少有点自相矛盾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党的意图从一开始就说的十分清楚：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44]

许多听过毛最初任何一次讲话的非党人士，都不可能接受他

280 对近来形势所做的这种估价。4年之后，当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提百花齐放方针时，周扬在一次讲话中承认："如果争论是让毒草放出来以便可以把它除掉，如果举行斗争会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那么，它是与百家争鸣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的。"[45]

毛是迫于事态而否认他最初的意图，并同意进行反右运动的。的确，所谓章伯钧和罗隆基领导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运动的说法也许不过是他的臆断，旨在解释自己的失算。首次官方提到章罗反党联盟是7月1日的社论。不过毛仍然试图缓和这场风暴：他毅然提出要适当地处理右派。表面上，毛与某些强硬派的争论是词义上的，即给右派分子定一个什么样的恰当的称谓；但是，这种称谓的选择决定了对被宣布为有罪的人的惩办程度。这一点从毛7月1日社论的另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出来：

>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大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

在毛的解释中的基本矛盾是，当他准备同意将资产阶级右派

281

的言行说成是"反动的"时，他却不确定资产阶级右派为"反动分子"，这样做将会把他们同蒋介石及其一伙同等看待，使他们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个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毛在社论中所谈的与毛已发表的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所说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上。他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说："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不完全巩固"。[46] 后面又说："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7] 但是，在他7月1日社论中，毛提出要实行宽大政策，理由又恰恰是人民的国家已经巩固，认为右派分子不能把它推翻，即他们不能取胜。

毛没有使持不同意见者信服。宣传部长陆定一在7月11日人大的讲话中，把周恩来关于先讲整风运动和后讲反右斗争这种按重要性排列的顺序给颠倒过来，并且否定了毛的温和态度："一定要无情地批判右派，坚定地将整风运动继续下去。"[48]

第四节　毛与持不同意见者的分歧

就在毛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的纪念大会。邓小平致词，也许是想通过说几句比较缓和的话来弥合毛与刘之间的鸿沟。[49] 如果这是他的意图的话，那毛后来的行动却把它毁了。

毛在定性问题上坚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肯定触怒了持不同意见者，但在他的社论发表一个星期后，他又真的向持不同意见者挑战了。也许是在人大会上批判右派的那种日益强烈的声音激怒了毛，他便告退到更有同情气候的上海去了。[50] 7月7日，他在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其他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在一个由36位上海优秀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讲了话。[51] 他从数

无所适从。[60]

正在这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重要情况的发展，《人民日报》开始对毛发出直接的批评。时至今日，之所以勉强维持了对毛的体面做法，是由于这种虚构的故事，即右派曲解了毛的政策。而现在则公开印发了右派直接责备毛的言论。公开宣布的目的，当然是要暴露右派的罪行；但很难令人相信，引用右派的这些话不是为了表明在整风之后党的干部对毛的看法。

最早出现的对毛的直接批评是在7月11日，这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在上海的照片。该报谈到了毛在农业合作化中的作用。引用了章伯钧的话说："合作化的工作做的很不好；农民在咒骂毛主席"。[61]当时，尽管他的许多同僚并不认为毛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例如刘少奇不得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过于谨慎作自我批评。1955年7月31日毛讲话的强硬语气使合作化搞得过快，这无疑导致了许多有关如何组织和适应的问题。[62]用章伯钧的话来讲，这些问题使农民感到不满，他们不责怪那些具体实施合作化的党的官员，而是责怪那个让合作化搞得过快的鼓动者。言外之意是，如果毛按照刘所主张的速度行事，那么，他与农民的关系也许会好些。

7月15日，当右派部长们得知不会被撤职时，《人民日报》发动了一次对毛个人的无疑是最集中的批评。这篇攻击文章的标题是："陈铭枢公开污蔑毛主席"[63]陈污蔑毛性情暴燥，把他比作俾斯麦首相。他遣责他蔑视党的高级干部，还偏袒溜须拍马屁的党外人士——这个来自一个非党人士的批评是很不寻常的。但这个批评也许是被毛在上海的那张照片激怒了的干部们极为欣赏的。[64]

284

陈铭枢还批评了对毛的个人崇拜，特别是批评在歌词中把他描绘成"红太阳"和"救星"。在《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在人大上作自我批评的第二天，这种批评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转折。章承认

他与另一些党外人士未能执行共产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显然，政协曾经建议成立一所毛泽东大学，但这个建议被毛拒绝。尽管毛的拒绝应该使他赢得党的干部们的好感，但是章的交代，加上陈铭枢对拍马屁的党外人士的攻击，无疑给人们这样的印象：毛主席与那些不诚实的非党人士交往太密，正是他们以助长他的个人崇拜来献媚。言外之意是，毛的同僚们在助长个人崇拜上是没有罪的，党的干部们不能责备他们把毛推到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不可能对他进行批判。几天以后，对一个右派党员记者刘宾雁的批判中，又把毛与坏分子联系起来。[65] 据说，刘宾雁谴责了所有的党员，只有毛免遭抨击，因为这位主席坚决主张整风，而一些高级干部则是反对整风的保守势力。[66]

285 …[67]…[68]…[69]…另一个重要的表明刘少奇等人态度的一篇文章发表在7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是对陆定一写的一篇关于纪念整风运动三十周年的文章的更正。人们会想起，陆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57年3月5日。第二天的报纸上对此处看来是印刷上的错误进行了更正。那么，4个月之后又作了进一步的更改，只能说是有政治目的的，而不仅是作者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重读这篇文章时作出的更改。而更改只有3处，而且内容相同，即在下面一段中把"剥削阶级"改成了"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已经消灭，只有阶级的残余，即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阶级已经基本消灭……[70]

新的修改的意义是暗指阶级并没有从中国消灭，反过来讲，阶级斗争仍可能存在。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人士的观点来

看，这明显地是一个不祥的征兆。[71]

甚至更直接揭示刘少奇等人态度的是，他们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甚至——也许为了强调——在同一页上被提到，这就是在这里引用的清华大学右派副校长所说的一句话中被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是因为刘少奇等人不支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72]这张报纸能够，也许是奉命，发表这样一篇揭示高层领导不团结、损害极大的文章，充分表明，由于刘少奇等人对毛和周不愿意对右派予以严惩大为不满，到7月中他们仍然是不一致的。如果中共要与苏共竞赛，苏共刚清洗了4位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73]那末中国的干部会因为这个奇迹而被宽恕的。

第五节　青岛会议

286

大概在7月的16日至22日[74]"在青岛召开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对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性质和条件作了全面的估计，并提出了运动发展的明确政策"，[75]不清楚的是，其他政治局委员是否参加了这个会议，邓小平也许参加了。从他在两个月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作有关整风运动的报告时提到青岛会议的情况来看，说明他到会了。我们确实知道周恩来和乌兰夫在8月早些时候呆在山东这个避暑城市里，乌兰夫可能从7月20日开始就在那里参加一个少数民族会议。[76]乌兰夫虽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由于他的职务是内蒙古第一书记，[77]他具有省级领导人的资格，因此他在青岛的出现，不能认为这是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会议的迹象。如果其他委员也这样出现，就会被认为是召开一次在计划中的工作会议。但假如刘少奇和彭真在青岛确实见到了毛、周和邓，那么很清楚，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邓即使在回顾时也没有说毛在青岛作了指示，只是提出一

个政策；邓也没有说毛作了报告，只是作了一个估计。[78] 毛在三中全会上提到青岛"文件"时是含糊其词的——这说明他也许散发一个形势报告而不是发表讲话。不管用的什么形式，毛在青岛的声明看来包括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主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没有错误，但没有青岛文件，它就不完整。"[79] 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添上原来不曾有的一部分，显然是因为认识到在资产阶级中的反党倾向比当时估计的要强烈得多。然而，毛把这种认识变成武器；他争辩说，这表明在八大作出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的决议是不正确的。[80] 这一点，尽管持不同意见者会认为在反右斗争的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对毛坚持认为这也适合对党员的斗争感到极为不满。

毛在青岛以《1957 年夏季的形势》为题所作的讲话，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见到，而且还只能见到摘要。[81] 摘要之一包括关于"我们的目标"的概括性的陈述和两个有关共产党员必备条件的要点。

287

>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82]

尽管这段话作为表述毛的基本目标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仍然是一种也许是强加给他的妥协。他在 7 月初列举其中一些这样的目标时，把民主置于集中前面、自由置于纪律前面。[83] 在第二段摘录中，毛分析了反右斗争的重要性，称之为"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并预言反右斗争也许会再进行 10 年

或15年，也许更长些，同时阶级斗争本身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依然存在。[84]毛对10年或15年反右斗争的估计，可能是基于另一个估计，这个估计包括在他们讲话的第三段摘录中，即工人阶级必须利用这段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85]

虽然这些摘要在当时不是公开发表的，但从7月底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引用了其中一些词句或段落。[86]首次引用看来是在7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中出现的，这表明了那个讲话是在社论发表几天前，某个时候所作的。在开头和结尾的两段中，社论重复了毛在青岛讲话的一部分。它一开头便强调了在当前政治思想线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指出经济方面的所有制的革命是不足以巩固革命的。[87]在最后一段，它列举了毛在青岛讲话中所要求的党员应具备的条件。毛说：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88]《人民日报》7月28日社论的最后一段摘录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 共产党员一定坚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定要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永远保持朝气，永远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否则就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288

这一段反映了毛讲话的精神，并使用了毛讲话中的用语。看来下述的推论是合理的，社论的最重要的部分反映了毛对党员中存在的右派观点所要说的话，尤其是它重复了毛早在5月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某些观点。

社论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党员中存在着右倾思想——尽管有"一些善意的同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党内右派分子比非党右派更危险，因为他们能从内部进攻，因此必须象对待其他右派那样毫不留情地对待他们。毛后来解释说青岛"文件"讨论了"保护干部"问题，它说大多数干部的错误都是小错误，应给予宽大处理。[89] 尽管如此，这篇社论仍然是对持不同意见者反击。首先，它将问题的焦点从那些在最近人大会上受到攻击的非党右派，转到党员右派上，并且强调后者更危险。第二，这是对持不同意见者一个含蓄的批评；直到两三年之前邓接替这项工作，正是他们一直负责吸收党员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因此它是重申了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含蓄的批评。同样重要的是，这篇肯定是根据毛的明确指示而写的社论，要求突出毛在青岛讲话中涉及党内右派的那一部分。

289

第六节　毛刘等人分歧仍在继续

不管刘少奇等人是否参加了青岛会议，他们显然对毛在那里所采取的立场不满。邓小平后来提到这次会议时很谨慎，表明了这一点。更富有意味的是，以毛为一方、以刘等人为另一方的意见不一致再次公开化。7月29日以毛青岛讲话为基调的社论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党内右派的一段言论。……[90] 这一段引语大部分在8月3日再次披露于该报对这个右派批判的另一个报告中。[91]

再次披露上层意见不一致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披露是不必要

的。通过7月17日公布一个右派的早期言论，公众已经知道中央某些高层领导是反对整风的。因此下述看法是合乎逻辑的，即第二次披露的意图——也正是第一次披露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表明意见不一致仍在继续。

8月4日，在《人民日报》再次登载7月29日关于揭发了上层领导意见不一致的另一篇报道的第二天，北京市一位领导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话时，对资产阶级右派大加斥责：

>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92]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以前，甚至在大规模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后，不也是说他们只是反对共产党吗？[93]

290 后来，他不仅再次将右派分子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比较，为了加重份量，又把他们比作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接着他又引用了一段历史来作比较：我们应该同陈独秀“宽宏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么？绝对不能。[94]

这一番激昂慷慨的话，也许是对毛在7月1日社论中恳求宽大的一种讽刺，他接着又作了一些补充，但听起来很不协调，反而增加了这种讽刺意味。他说：

>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右派分子当蒋介石、汪精卫对待，而是说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劣，以及手段的毒辣。[95]

简言之，他将资产阶级右派比作蒋，警告他们不要模仿从前那些曾原谅过这些罪人的共产党领导人。他说了这一番充满火药

味的话之后，接着又说什么没有必要像对待蒋那样对待右派。通过这段历史比较，他指出毛在7月1日社论中所持的立场本身就有矛盾，并说毛的宽大政策是不合实际的……[96]……[97]……

柯庆施在8月15日上海市人大会上发表讲话。[98]他援引了毛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并加进一些与7月28日社论的结束语相呼应的话：

291

>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地去克服任何困难……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是朝气蓬勃地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奋斗。[99]

柯接着强调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列举了一些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域，他列举的几乎与毛所列举的完全一样。[100]但是柯在传达毛的青岛讲话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毛关于政治目标的概述。[101]有意义的是，柯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接着重新肯定了毛的"自由"政策的正确性：

> 这是我们党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的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为了造成这种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总方向。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各项政策，必须也将会继续贯彻执行，绝不因为反右派斗争半途而废。反右派斗争，正是为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创造条件，因为我们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没有共同语言，不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局面是不可能造成的。因此，怀疑不再整风了，不再鸣放了，是没有根据的。[102]

我们不能肯定，紧接对政治目标的概述的下面这段话也是引用的毛的话。但是有理由设想，毛也是在确认有必要采取他在前18个月内提出的各种政策的情况下，才得出这些概述的。如果确实如此，则北京市的领导不同意毛关于政治目标的提法，可看作是他对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政策不欣赏。在以毛周为一方、刘少奇等人为另一方的这种分歧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整风运动中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将不可能在这个目标之下安定下来。

注释：

1. 按照邓小平在八大上的说法，中共有107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辑，第209页）。也许相当大比例的人听到过毛讲话的某种文本。
2. 《彭真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载《北京日报》，1967年6月10日，第8版，第一栏。
3. 同上。翌年，彭指出刘少奇是这一提法的提出者。（参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第3页）
4. 《三反分子彭真罪证材料》，载《东方红报》，1967年8月8日，第2版，第2栏。
5. 刘仁是3个共产党干部之一，1948年劝说吴晗离开北平，投奔解放区的。参见联合研究院编：《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717页，有关吴晗的传记。
6. 见斯蒂芬·小乌哈利：《文化革命和对"三家村"的批判》，《中国季刊》1966年7—9月号，第149—161页。
7. 象吴晗这样的党外高级干部竟会对毛的讲话内容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的确，以吴晗如此重要的身份完全有资格出席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但他也可能因病未能参加（1957年6月19日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他近日病了）。
8.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2页。

9.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10. 同上。

11. 同上，1957年6月11日。这家报纸于6月10日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报道吴晗于6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此后，该报还采访了吴晗。

12. 同上，1957年6月19日。

13. 同上，1957年6月26日。

14. 同上，1957年7月22日。这篇文章是一长篇摘要，原文刊登在两天前的《工人日报》上。文章是由罗隆基负责的部里13名工作人员写的。文章使用的措词是"指出"而不是"提出"，这个事实表明，说在毛和罗的建议之间有不同之处，根据是多么的不足。

15.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

16. 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 第144页，该文尖锐地指责罗的提议正受到台湾、香港和美国的支持。据科恩说，对毛的建议某一家有所反应，不过它只是省级单位，而且是在反右运动之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程序（1949—1963)》导言，第41页）。

17.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明过他是如何在全国人代会会议前提交他的发言稿的，这可能具有典型性。参见《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附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6号，1957年7月18日，第20页。

18.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19. 同上，1957年5月26日。

20. 同上，1957年6月20日。

21.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中国》增刊，1957年7月16日，第39页。

22. 同上，第36页。

23. 见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第10章。

24. 张在统战部座谈会3月21日会议上提出他的建议，见《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2日。

25. 见《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建设》1967年11月号，增刊，第8页。当然，刘也建议设立全国人大8个常设委员会。

26. 如上所说，刘少奇在1956年间说过，他之所以赞同"长期共存"，是因为他相信民主党派能比共产党更好地动员社会的某些人士促进经济发展。

27.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28. 将苏共二十大称之为一个"主要的灾难"，我当然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起共产党世界的诸多动荡，并被中国方面视为一个极大的错误。

29.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30. 同上，1957年7月18日；"不可能执行"原文为"兑不了现"。

31. 见农工民主党领导人严信民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32. 在这篇讲话的正式公布文本中，周和董必武的名字是放在括号里的，因此可以很容易被删去，而不至于损害其他观点（同上）。

33. 参见关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7月3日整风座谈会的报道，题为《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同上，1957年7月4日）。在1957年10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在6月初他曾与费孝通谈话，劝他和他在全国的朋友们回心转意（《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36页）。鉴于毛的举动，很难肯定费的动机是要影射主席和周恩来；可能积极参加反右运动的官员们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选择余地。不论对此如何解释，毛始终认为，费和象他这样的人不应去劳动改造（同上，第134—135页）。

34. 同上，1957年7月11日。

35. 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主席，同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胡愈之只是民盟的一位成员；参见他的传记，（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293—295页）。在1957年初储安平接任之前，胡还是

《光明日报》主编；可以想象他对章伯钧有不满情绪，因为章在主编易人中间显然起了主要作用。

36. 那些在讲话和文章中插进损害毛的材料的右派分子和非党人士，如果察觉到是毛让他们跨台的话——无论是设下陷井，还是（这种可能性更大）鼓励他们大胆发言，但后来在愤怒的党的干部面前又无法保护他们——是会心甘情愿地那样做。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

37. 《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38. 同上，1957年7月7日，吴晗也说，章和罗同意在民盟中央的工作公告里印上这样一段断章取义的引文。

39. 《章伯钧在铁道学院点火》，同上，1957年7月11日。

40. 见马哲民讲话原文，同上，1957年7月18日。

41. 毛在后来谈到这场争论时，毛暗示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曾试图教育资产阶级，但是章和罗不听，他们只是对在学校取消党委制感兴趣；毛没有说他们误解了他的意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第 158 页。毛在 4 月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见同上书，第 108 页)。

42.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引用《人民日报》社论（该报 1957 年 7 月 1 日)。

43. 毛还为《人民日报》起草了6月14日批判《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文章（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披露出来的)。这篇短文以评论姚文元的文章的形式出现，在那篇文章里，姚批评了《文汇报》对毛 5 月 25 日的警告（"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的态度；姚指出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给它以极为重要的地位。8 年之后，他以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先锋面目出现。是否就是这一次，姚初次得到毛的注意？

44. 《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7月1日，毛后来为反右运动中激烈的斗争会辩护说：右派自己在 5、6 月间挑起"大"鸣；"大"放；无论在毛百花齐放的讲话里，还是在其论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从未提倡"大"

鸣,"大"放,他们是自作自受。(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33页)。

45. 《斩断周扬伸向科技界的黑爪》,《解放日报》1966年8月4日。

4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0页。

47. 同上书,第288页。

4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72号,第24页。

49. 见《邓小平反革命言论录》,《他们多坏!》(《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58号,第5页)。

50. 据报道,7月6日,毛在上海会见了一位来访的印度尼西亚贵宾(《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51. 同上,1957年7月9日。毛并非想对北京的知识分子完全置之不理。7月14日,曾经支持他整风的3个人(周恩来、康生、周扬)会见近200位作家和艺术家;不过,周扬的上级陆定一也参加了,这种场合没有他到场是不可能的。4位领导人都讲了话,随后与到会的人共进晚餐(《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73号,第7页)。人们一定会推测,这次会议和批判丁玲等老作家有关,这种批判已经开始,并且不久后已公开披露出来(见梅乐·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207—242页;福克玛:《中国的文学理论和苏联的影响》第151—185页)。不过,做主报告的周恩来无疑是企图为调整整风运动的方向作辩护的。

52. 毛讲话的原文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09—122页。这个本子标明的讲话日期为7月8日。但我推测,这是该书在日期方面经常出现的错误之一(如该书说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在1957年2月29日,但是1957年不是闰年,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见同上书第133、137页)。

53. 有关发表这幅照片意义的完全不同的解释,见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第320—322页;对所罗门的解释的批评,见我的《论照片》,载《中国季刊》1971年4—6月号,第38页。

54. 参见《邓小平召集的一次黑会的内幕》、《新闻战线》1967年5月13日，第3页。其中说邓小平在3日或4日的一次会上宣布了这一改变。

55. 同上。文章批评邓小平没有谴责邓拓。吴冷西在交待中说，起初他只负责安排；邓拓似乎继续履行他先前的大部分职责。按照吴的说法，邓拓的去职，可能是由于毛坚持这样做，不过很显然，毛无法使他受辱。估计是刘少奇和彭真制止了此事。其结果，在邓拓让位于吴冷西的那次会议上，洋溢着一种颇为彬彬有礼的气氛，而邓小平却不得不称赞邓拓，没有指责他（见同上书；《中国的法律与政府》第2卷第4号，第73—74页；及《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井冈山，1967年3月8日）。

56. 章伯钧是交通部部长，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是粮食部部长。

57. 关于他的秘书的揭发，参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9期，第24页。

58. 同上。7月10日，刘少奇说，右派在其罪行没有结论之前，应当受到信任（《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3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标准的做法，这表明刘对迟迟不做结论感到恼火。

59. 1958年1月31日，在下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毛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将这3人正式撤职（由周总理和国务院提议）。〔参见《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补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第1号，1958年2月6日。〕人们用不着去假设，部长们能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但在1957年7月中旬未采取正式撤职的办法，却是极为异乎寻常的。

60. 见《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话录》，载《进军报》1967年6月4日。这书称会议日期为1958年，不过邓在这次会上讲话的简短引文却清楚地表明这个日期一定搞错了。

61. 见7月11日高教部民盟支部整风会议情况汇报，题为《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62. 见沃克：《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第59—70页。

63. 值得注意的是，陈铭枢也许有充分的理由责备毛。1933年，陈曾经是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的领导者（参见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92页中他的传记）。这些"叛逆者"曾向江西苏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支持，尽管苏维埃政府早些时候已同福建革命人民政府订立了一个协定，但他们没有派兵支援，蒋介石镇压了这次反叛。当时，毛在苏维埃政府中的权力是有限的，他还是运用其影响反对给福建的"叛逆者"以援助（见施拉姆：《毛泽东》第172—175页）。陈铭枢很可能因此对他有怨意。按照周鲸文的说法，由于1953年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毛同样有理由不喜欢陈铭枢（见周鲸文：《风雨十年》第254—257页）。

鉴于陈批评毛喜欢接近非党人士中关系更紧密的人，提到9年后的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毛曾公开承认他有"许多右派朋友"（《当代背景》891号，第72页）；他列举的人物中周谷城和张基春（音），在1957年没有划为右派——他们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不过在政治上，他们确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右的。

陈铭枢的某些批评使毛恼火，这可以由1958年1月他在两次提到这些批评来证明。在这两个场合，他承认陈的批评是属实的，但又为陈所批评的行为作解释（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47、155—156页）。

64. 陈也引用了毛给《诗刊》编辑部的信，表示他不喜欢旧体诗。发表这一评论时，《人民日报》也许有些讽刺意味；从党的观点出发，毛的信以及他的诗词的发表，会提高古典文学的地位，而向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捍卫者泼冷水（同上书，第179—180页）。

65. 《刘宾雁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66. 刘宾雁对毛也有所批评。他引述毛的话说"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

群众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同上）。

67. 《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同上，1957年7月14日。在1965年1月成为高教部长的蒋南翔，在文化革命中也被指责为与北京党组织里的"三家村"有牵连（见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57页）。

68. 见黄药眠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69. 《李万春在京剧界兴风作浪 妄想重温百花时期的旧日梦》，同上，1957年7月24日。

70. 同上，1957年7月17日。

71. 显然这样修改涉及一个语义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那么就只有被剥削阶级存在，而由于阶级的存在有赖于两个以上的阶级的存在，因此也就意味着阶级已经消灭了。这个问题在30年代的苏联也同样被提出过（对它的讨论，参见亨特：《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202—208页）。不过，要中国资产阶级所了解的是，只有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是与蒋介石直接有牵连的集团），才会作为阶级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主和富农作为阶级继续存在，即使已经剥夺了他们的剥削部分，使之成为非剥削者，并成为人民的一员，因而能够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进行经过改造了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对陆定一文章的修改使正统的理论更接近于毛的意思（见上书，第119—121页）。虽然毛偏离了苏联的正统以便为他的整党意图服务（撇开他相信矛盾始终存在这一点不谈），但他的对手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他是一致的，以便对知识分子进行威胁（这一点是他们的目的，似乎可以从《人民日报》的社论上看出：《人民日报》已于1957年5月2日的社论中对他们的立场作了理论上的修正；见上书第215—216页）。

72.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73. 苏联的清洗于7月3日晚公诸于世。中共通过电报得到消息；邓小平在

为了公布邓拓被吴冷西取代的消息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开始时，手持这份电报，当即宣读了它的内容。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注 54），搞不清这次会议究竟是 7 月 3 日召开的，还是 4 日召开。

74.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指出，一些中央和省的负责干部在这些日子里没有露面（见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第 11 章注 6）。

75. 根据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手册》1958 年，第 33 页），在《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3 页上的译文略有错误。该译文的意思是，它可能是一次有几个省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原文措辞表明，这次会议和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为加快合作化而召集的各省负责人会议极为相似。

76. 7月20日至8月6日召开的会议上，乌兰夫在闭会前一天作总结报告。可以推想，他可能参加了早先时候召开的会议。8 月 4 日周到会讲话，8 月 5 日，他和毛接见了代表团。8 月 2 日，当毛接见一位缅甸贵宾时，周也和毛在一起（见《青岛日报》1957 年 8 月 5 日）。

77. 当时，彭真是唯一的一位兼任省市领导职务的政治局委员。

78. 与此相对照，陈伯达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合作化的报告时，却把毛 7 月 31 日讲话称作"指示"，并向他的听众说，各省负责人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人民手册》1956 年，第 92 页），尽管情况表明这次会议和讲话是毛的主动行为的一部分。邓的报告见《人民手册》1958 年，第 33 页。

79.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25页；"完成"一词见第123页。

80. 同上书，第123页。

81. 现在可以得到这次讲话的三个版本：（1）《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6页（《当代背景》891 号，第 25 页）；并见陈志让：《毛论文集：文选和书目》第 56 页。第二个版本删去了"用"这个词，只要同 1968 年 10 月 14 日《红旗》上发表的相同段落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一点（第 8—9 页）。（2）《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 号，第 21 页。（3）《文

上书，第269页)。我对4月15日这天的含义不大清楚。

94. 《人民日报》，1957年8月7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导人。从1921年至1927年担任党的总书记。他被指责造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灾难性结果。

95. 同上。

96. 没发表过彭讲话的全文，但是关于讲话的长篇报道见上书，其中也许包括了他试图强调的要点。

97. 见彭所列举的北京工作中缺点的第3项及第5项。同上，彭与7月28日社论不同，他使用与毛略有不同的措辞强调反右运动的严肃性。毛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彭则说“伟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98. 这次讲话的简短摘要刊登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37—142页。

99. 同上，第142页。

100. 试将上书同《文艺红旗》1967年5月30日刊登的毛讲话，或《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09号，第20页及该书4000号，第18页刊登的相同段落的译文作比较。

101. 见上书第287页，并参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38页。柯改动的唯一的一处是不太重要的，即将该段第7个字的“想”变为“要”。

102.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38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09号里的译本，删去了倒数第2句。

103.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38页。无论柯还是彭都没有单独提党内的右派，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听众大都是非党人士。

293

第十九章

和解

在 1957 年 8 月初，毛泽东和他的反对者看来仍在激烈地争吵着。然而，到了 9 月末，他们明显地各自弥合了他们的分歧。迄今为止，也不能确切地断言这次和解的来龙去脉，但是可以说它的最根本的基础好象是：刘少奇和彭真接受了毛泽东进行反击的主张，认为党的干部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毛泽东所遗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部分，由于这一双方妥协的结果，农村党的干部们不得不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让他们在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种和解，肯定是基于双方都认识到农业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到了需要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加以重视的程度了。

第一节　粮食危机

自然灾害使1956年成为全国农业歉收的一年。虽然1957年的气候好了一些，但3.5%与4.9%相比，增长是较慢的，而且集体农场的体制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1] 棉花的产量比1956年提高了11.4%，但是，由于受前一年产量减产的影响，8月份仍不得不削减了棉布的定量；[2] 更严重的是，粮食产量在1957年仅增长了1%，[3]，比当年的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半还少[4]，这就加剧了1957年夏末出现的粮食供应的危机。当国家粮食销售增加时，粮食收购却明显地低于前18个月，这个差额只能由国家调拨储备粮来弥补。[5] 毛泽东也正是利用这一形势来回击他的反对者。

294　《人民日报》8月5日关于粮食局势的社论中，把农业危机归罪于农民的"个人主义"和农村干部中存在着的"本位主义"[6]。农民中的"个人主义"认为在合作化之后，国家应给予个人更好的生活，农村干部中的"本位主义"则意味着只关心其本地区农民的直接利益，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本位主义"的干部为了必须让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企图隐瞒粮食产量，少报粮食收入，夸大粮食不足。此外，基层党的干部的这些行动得到了所在地区县级干部的宽恕，他们觉得以国家的利益来限制粮食消耗是"对不起农民"的错误作法。[7]

这个欺骗中央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农村干部中广泛地确信为了工人的利益农民正受到另眼相待，而农村中的生活水平比城市里的工人低得多。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8] 也许是由于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斯大林不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批评，才使得农村的干部有勇气去这样做。党的领导试图批驳那种认为他们也不顾农民利益的意见，刘少奇在他

视察地方工作的过程中曾谈到这点；[9]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在5月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事实和数字；[10]周恩来总理在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明了在收入上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差别，因为工人的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他辩解说，同样，由于存在着不同工作的合理分工，而高、低级职工的待遇也是不同的；并且，由于存在着简单工作、复杂工作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差别，其待遇也是不同的，否认这点就是平均主义。[11]也就是说，那些否认老工人与农民之间存在合理的差别的人，正是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

总之，农村中的“平均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与“本位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存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干部认为，农民与工人比起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就导致他们去犯“本位主义”的错误，不得不去支持和怂恿农民少报粮食产量，并宽恕农民中存在的“个人主义”，这就等于漠视国家的利益。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95

毛泽东在青岛的讲话中指出，这些偏差是有联系的，他号召党员制止“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严重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人民日报》7月28日的社论引用了一些毛泽东要求干部注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偏差的告诫，但是，没有谈到干部“本位主义”的严重错误（因为它是粮食危机问题的关键所在）。直到8月5日社论才开始抨击“本位主义”。5天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8月8日的指示，并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在整个农村发动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所要批判的是富裕中农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和那种无视国家和集体利益、集中表现在个人和集体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即“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12]这篇与中共中央指示一起发表的社论，重新提到农

村党员干部中存在着的一些错误:

> 可是，有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包括一部分县级工作人员在内，没有认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没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同志在象粮食问题这样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有极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错误地站到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有些同志，对于坏分子危害农村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没有及时地给予应有的打击。[13]

这篇社论继续描写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重要的特点:"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14]

在这里，《人民日报》社论清楚地指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消除党员中的错误，并为说明这些错误是如何与粮食问题紧紧地联系一起。社论又重申:"目前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正是一部分落后分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立的地位，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15]

296 在后来的3周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另外6篇社论，极力宣传所面临的严峻的粮食危机问题。[16]

粮食危机给毛泽东提供了向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时机，使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党的干部中的非常严重的偏差，即使这不是整风运动中所要批判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断定毛泽东在7月28日和8月3日社论中所讲的那几点，正如他在青岛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确信他的反对者们一定要同"本位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一旦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一点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就

有可能拟订出中共中央 8 月 8 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在整风运动中，城里党员干部成为主要目标，他们由于以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粗暴态度对待资产阶级而受到批判。现在，农村干部则是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过分宽容及“本位主义”的错误而受到抨击，按照分配一定人数限额的作法开除党内组织中的异己分子，这足以说明第二场斗争的严重性。如在广东，就有 3%的党员和 8%的团员被开除党籍、团籍。[17]

可是，农村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几乎没有象城里那些同样命运的人在 3 个月前那样容易受到攻击。在整风运动中要求干部轻松地、逆来顺受地接受批评；另一方面，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非党人士和党员的要求是一样的。而且，运动由共产党操纵，显而易见，干部们被紧紧地控制着，但也不是无可奈何地听取对他们的批判，毛泽东也许明白这一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做为说服农民确信只有走向共产主义才是正确道路的群众性辩论，但在基层讨论中却要给广大党员干部重新树立起坚定的信心，听从党的指挥，[18] 刘少奇等人很可能预见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早就准备作出一定的让步，与毛泽东进行妥协。[19]

国家在农村所采取的另外一条措施，是重申了干部对农村的管理权，这就是国务院 8 月 17 日公布的取缔自由市场的决定。[20] 那些农村干部迄今才发现要说服热衷于自由市场和私人产品生产的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是困难的，[21] 现在干部们倒可以指望实现人民公社化时能够松口气了。

297

如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关闭农村自由市场是对农村采取的强硬措施的话，那末，在农业上进行更大的投资便是进一步补救的办法，这也等于默认了农村干部抱怨对农业的忽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2] 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被通过

后，8月9日，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透露，已经决定在1958年国民生产计划中进一步增加农业投资。[23] 早在一个月前，他就提出要修改这个计划，并支持其他制订经济计划的人提出的节约路线。[24] 现在，他主张需要“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同样给予重视，[25] 强调必须提高农业投资，并要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即农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有利地促进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26] 最后决定把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国家总投资中的比重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8%提高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0%。[27]

薄一波的讲话，部分地重申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所阐述的观点和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主张在轻工业和农业上更多地投资，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来帮助重工业，这也可以有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显然薄一波重复了这一对农业投资问题的主张，但他并不打算给轻工业象农业那样更多的投资。相反，他却提出“由于原材料有限的供应，1958年轻工业的投资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减。”[28] 然而，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阐述的关于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农业的观点，现在显然已被那些计划制订者和党的领导所接受下来。[29]

第三节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幻想的破灭

在6月份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里，毛泽东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抱有乐观的态度，坚持认为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发挥其“重要作用”，“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7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

些，正意味着毛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关于知识分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也充分说明了他在青岛会议期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结论正导致了他后来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

第四节　中国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温和路线的失败

劝说蒋介石捐弃前嫌，使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的主张的失败也许正导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幻想的破灭。在中共中央强调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期，一个主张中华民族和解的政策是不可能实施的，毕竟国民党的领导人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的。但是1956年毛泽东一定曾经希望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来达到国内政治的安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从而能减少蒋介石对政治斗争的忧虑，可是，在周恩来正式提出进行新的国共谈判的那一年，没有任何公开的迹象表明国民党有接受和谈的意图。由于1957年中在台湾发生的反美暴动，蒋介石显然决不会同意与共299产党进行和谈，实现新的国共合作。

5月20日，在台北美军军事法庭上开庭审判了一位美军上士雷诺。[36]他被指控有意开枪打死了一位正在他的住宅外面徘徊的年仅33岁的中国工人。[37]雷诺却申辩他打死徘徊者是出于自卫，他是无罪的，[38]5月23日，由5名上校和3名上士组成的军事法庭陪审团宣布将美军上士雷诺无罪释放，据台湾报纸报道，当天就出现了中国人痛骂美国兵的事件，[39]第二天，这位被害者的妻子在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外示威，手里高举着一张标语牌，上面写着："凶手雷诺无罪吗？我向不公正的军事法庭抗议！"她坚持要见美国驻台湾"大使"，此刻，这位"大使"正从香港度假后返回台北。[40]人们开始在街头聚集起来，据后来对这次事件的分析，当一位国民党电台的记者将采访这位被害者家属的录音，通

过一个扩音器向周围聚集的群众重新播放，反美暴动真正开始了。[41]大约12点30分，人们向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2点30分，人群涌入"大使馆"院内，愤怒的人们把汽车推翻，并到处搜查使馆建筑。美国国旗也被扯了下来，换上了国民党旗，美国新闻处图书馆也没有幸免于难，当天晚些时候，聚集起来的大约20000到30000人的示威者企图袭击警察局，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政治嫌疑犯。警察开了枪，至少有8名示威者被打死，或被打伤。[42]

300

夜里，蒋介石抽调33000部队开进台北，并且实行了军事管制，局势才被控制住了。[43]蒋介石以此还撤消了国民党军台北卫戍司令、宪兵司令和台湾省警备司令的职务。[44]但是，他拒绝接受国民党立法委员的集体辞职。5月26日，蒋介石向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表示"深深的歉意"。两天以后，有消息说，国民党政府正准备开展一次群众教育运动，来弥补因军事法庭的不公正裁决所引起的对美国威信的损害。[45]

据报导，蒋介石痛切感到这次暴动是自义和团起义以来"中国历史上最糟的污点"，[46]6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电台发表讲话，就这次反美暴动承担了责任。但他警告他的手下说："今天我必须向我的人民再一次讲清楚，在进行反共和反对苏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站在美国一边。因为美国是我们民主国家的领导，我们不允许在内部或外部违反这一方针。"他还无疑是怀着对大陆共产党政权刻骨的仇恨声称：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处在土崩瓦解的边缘，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鼓动起在台北的人民群众进行反美暴乱。[47]

同时，在大陆，中国当局深受台湾人民反美斗争精神鼓舞，《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就是号召台湾人民下定决心，加倍努力，解放台湾，[48]社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蒋介石及其走狗若想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这可能反映

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可能接受这次反美暴动的教训与美国断绝外交及军事关系抱有一线希望。3天以后，报纸再一次号召台湾人民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赶出去。但是，它还指出，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从这次暴动中只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虽然用它的军事力量占领了台湾，但是它绝对征服不了台湾同胞们的心。"这篇社论还谴责国民党当局奴颜婢膝，向美国道歉。[49]

在这个阶段里，大陆新闻工具对在军事法庭的判决和暴乱中台湾人民的反美浪潮作了大量报道。但是，特别是在蒋介石6月1日发表了广播讲话后，有两件事情已经趋于明朗：国民党当局已经控制了局势，他们并没有因为所发生的反美暴动事件而重新考虑他们对整个局势的态度。在周恩来总理6月26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里，简要地表达了对当前台湾局势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国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而这次反美运动正是发生在美国在台湾建立了导弹基地以后。"[50]周恩来这段简短的评论正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在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后不久，曾出现了呼吁中华民族和解的势头。可是正当进行反右运动之时，再次提出民族和解的呼吁是无的放矢的，不识时务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51]但是，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国民党官方对反美暴动的反映表明，即使是在大陆开展反右运动之前，共产党对自己昔日仇敌的和解姿态也不会得到什么报偿，正是由于毛泽东对1957年夏季形势重新估计，并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没能把台湾争取回到国共和谈的桌前，就必然促使毛泽东决定要消灭右派。

301

第五节　和解的产生

8月初的关于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表明，在粮食危机面前，毛泽东和他的反对者开始初次和解；也暗示着中央政治局在8月份其余时间里已重新建立了一个正常的工作关系。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就标志着中央最高领导层重新恢复了团结。

在8月，有许多迹象证明，即使和解正在形成，但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仍然不愿善罢甘休，在党内有人大骂右派来嘲笑毛泽东的宽大的主张的一周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起来了。《人民日报》8月16日的社论试图把两种对立的观点勉强结合起来。它以"使斗争深入、再深入！"为题的社论，突出强调要深入开展反右斗争。这样在斗争中就要坚持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所作的分析：反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并重申坚持在整个知识分子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52]还扼要地提到了党内右派分子的问题，虽然党内的右派分子还没有被揭露出来，他们并不像毛泽东想像的那样比其它右派更危险，并且，在阐明拥护对右派进行更猛烈的斗争时，社论引用了两条精心挑选的警句，因为这些警句和毛泽东在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要采取宽容态度时说过的话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在宣传会议的讲话中，曾强调对犯错误的人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避免"把人一棍子打死"。[53]这篇社论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告诫对右派分子不要"姑息养奸"、"养痈遗患"。[54]

302

从这篇社论的最后一段可以清楚地看出，根据这些争论的措词，在中央政治局内仍有一定的分歧。这段提出反右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任务"，[55]社论中只字未提整风。但在社论的下一句话中，第一次提到国务院7月26日的决

定。这个决定指示国家机关干部要象在反右斗争中那样继续参加整风运动。正如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中强调反右斗争一样，周恩来也许想在国务院决定中，提出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大于反右斗争，尽管8月16日社论提到了、甚至引用了这个决定。但它仍设法避免使用整风运动这个词："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国务院7月26日所通过的决议'把参加这一运动（整风）和斗争（反右）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56]彭真在8月中旬也开始促进和解，应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邀请，陆定一和康生（他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在5600名宣传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讲话。陆定一在8月16日讲了关于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问题。他虽然使用了一些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讲话的语言，但是他把右派同蒋介石和汪精卫相提并论几乎根本就没有提到整风运动（不管怎样说，在他演说的标题中却将整风放在第二位）。[57]康生8月17日讲的是在这年下半年如何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与陆定一正相反，多次提到整风运动，总把它放在比反右斗争优先的地位上。[58]

303

但是，在8月中旬出现了一个领导层和解的重要征兆，《人民日报》8月16日社论指出，许多高等院校第一阶段的反右斗争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59]就像康生谈到北京那些高等院校一样，这明显地意味着大规模的反右群众斗争高潮过去了。[60]就是说，大学已被控制住，学生闹事的危险亦已消除，这样，在缓和的气氛里促成了中央领导层之间的和解。

9月初达成了这一和解，并由《人民日报》9月5日的社论开始向全党进行说明。和解的实质，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名义上的，在社论第一句中便指明了。社论是这样写的："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群众斗争……现在正发展为全民整风运动。"[61]这就是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要合并为一体。运动的目

的一方面要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另一方面，要整顿党的作风，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宗派主义摆在第三位，可能意味着这是减少对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注意力）虽然社论承认这两个问题（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是不同的，但它又提到群众辩论的方法对两者都适用，并且它还抨击那些担心在农村和工厂实行大鸣大放的群众路线的干部。实际上，社论再清楚不过地指出，将不会让5月所发生的事件重演。正如批评者所说的，当时党不得不靠边站"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通过群众的辩论解决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放弃领导，可以放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放弃劳动纪律和行政纪律。相反，辩论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加强应有的集中和纪律，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62] 第二是报纸报道了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处决6月汉阳304学生暴乱的首恶分子的消息，正证明了社论中对此事情的预见。

然而，和解的实质是什么呢？虽然刘少奇和彭真已明确地赞成继续改正官僚主义滥用职权的行为，但是却主张要在坚持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并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应该在整个社会各行各业中开展，这势必意味着重新恢复党的权威。不能肯定毛泽东是否愿意在这些条件下开展整风运动，但毛泽东已挽回了面子，并且与他有分歧的人现在准备赞成他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第一次（没有注明是在哪里所讲的五段话）引用毛泽东所制定的总的政治目标；[63] 这几乎可以肯定地讲，是这篇社论中唯一最重要的一段，而且，在13年后它将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国家宪法草案里。[64] 9月5日社论的精辟概括正是医治政治局分歧的重要标志。

9月11日社论重新转到党内右派这个问题上。它提到《人民日报》7月28日社论，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它真正的意图是重申毛泽东关于党内右派比资产阶级右派更危险的警告，防止在感情上对党内右派的宽容态度。看来，这

篇社论的目的所在是要表明领导在党内右派问题上现在已经统一认识了。"在党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同党外右派分子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以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65] 这篇社论增加了党的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一篇同样主题文章的内容。[66] 实际上安子文的一些材料都是根据北京市委的调查写的，这也表明，彭真现在正在配合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

4 天之后，《人民日报》又转到关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问题的争论中，报纸又一次提到毛泽东在 7 月 1 日写的那篇社论。[67] 报纸只不过是再一次重申原来的论点，并再次证明对反动的右派采取行动是正确的。认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人至今不清楚，这是站不住脚的辩解。这篇社论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要表明，为了党的信念，毛泽东和彭真如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社论的最后两段仍然提到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但是没有把他们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不过，社论还谈到："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蒋有组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只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了"。[68] 这也就是说右派从根本上来说不仅是右派，还是特务，为了有助于解决分歧，社论在措辞上再一次作了一些变动。[69] 社论在结束语中拒绝了要严厉打击右派的要求时说："最后，或许有人问：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许这样做，而且这也给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70] 这里除删去了对许多有资历的右派要宽容的主张外，重申了毛泽东在 7 月 1 日社论中的立场。这是一位主张平等的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非常令人怀疑的论点，毛泽东也许没有太大的把握能够取消这一观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出，对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可能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的规定，刘少奇在 1962 年曾评论到："这是

正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上太宽容了。”……[71]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天，《人民日报》9月18日发表了最后一篇有关的政治性社论，它旨在解释为什么在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之后，仍然需要在政治思想战线进一步革命。[72]它再次肯定对大多数右派不需要采取严厉措施的政策，306并且提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有10年至15年的时间，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讲的问题的重要性。[73]令人奇怪的是，社论表明，在是否应该给右派戴上反动派帽子的问题上，在措辞上再一次作了折衷的处理。在社论第一段结尾把右派称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74]在社论的其它地方也都称为“右派”或“资产阶级右派”，在我手头有的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讲话的摘要中，毛泽东曾把右派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右派。”[75]在邓小平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的报告里，他恰恰也把右派叫做“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76]刘少奇在纪念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0年周年的讲话中，也采用了同样的说法。[77]所以，看来形成了下面这样的和解：尽管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而且为了证明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在讲话中可以把他们叫做“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但是，我们必须采用的正式说法是“资产阶级右派”，以此来表示我们不想象对待其它反动派那样不客气地对待他们。

三中全会召开那天，发表了安子文写给会议代表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治性文章，[78]文章与党的干部政策有关，试图重新肯定党员的作用和党员的保证。安子文否认了右派声称的共产党以德取人而不是以才取人，过分强调政治资历的说法。[79]实际上，他在捍卫党的干部政策上反复讲“红”比“专”有更大的重要性。在1958年“红”就变成第一位的了。然而，有趣的是，安子文在坚持党在“红”与“专”问题上的路线时，引用了中国3位领导人的话：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80]这好象是说，在党的干部这个重要问题上，党的领导人是步调一致的。这篇文章一定是在三中

全会的召开时，要求与会代表们必读的。

第六节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于9月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历时约3个星期。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有416名基层干部参加了会议。这是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可以推断，这表明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它也是文化大革命前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这意味着党的上层领导人渴望向全体人民显示他们已经清除了分歧。[81]

307

陈云和周恩来都做了报告，在会议结束前两天，毛泽东就八大决议的错误讲了话，但主要的、也是唯一发表的会议报告是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82]它反映出两个月以来达成的各种和解，毛泽东取得了许多表面上的胜利和两个具体胜利——对右派的宽容政策和继续开展的整风运动。而刘少奇和彭真已能将党从夏初所处的被动地位中摆脱出来，并重新恢复了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邓小平报告的题目，正与一个月前陆定一报告的题目相反，只提到整风运动而没有提到反右斗争……只要党实现了恢复它的领导地位任务，反右斗争就能够在毛泽东倡导的整风运动的总的前提下进行。邓小平强调说不管反右斗争何时何地胜利地结束，整风运动一定要开展起来。[83]但是，重要的是反右斗争应优先于继续整风。尽管邓指出整个整风运动的胜利"不只决定于反右派的（第二）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84]可是党的干部很少关心在这种状况下的整风运动。并且，邓小平在提到整风时，列举了不同类型的"三种错误"，强调决不能草率收兵，前紧后松。[85]

关于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到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严重性的争论，现在很不适应了，而且领导人已一致同意反对这三种错误而不再提出所反对的侧重点是什么。

308 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在这几个月里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正确的，把它们称为“中央的方针”，这也许意味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和解的产物，这些和解的措施是：反右斗争，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内外干部中的整风运动，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群众充分地开诚布公地讨论。[86]

可能正是基于毛泽东、刘少奇的和解，邓小平在自己的报告中能够赞同并加进了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内容。邓小平还在几处重复了党内一个领导人一个月前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也是来自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在邓小平的报告开头讲到运动总的形势时，对毛泽东在青岛会议的讲话中的估计和政策意见给予很高的评价。[87] 接着，邓小平用毛泽东的话说明反右派运动的重要性，[88] 他宣称，只有党能够取得政治思想战线上大辩论的胜利，才有可能继续前进。[89] 邓小平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他又引用毛泽东的话，把人民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看成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90]

邓小平继续讲到，要区别人民中的不同类型的人，并采取不同的整风方法：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91]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92] 在人民内部主要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同时，对敌人一定要进行坚决斗争。[93]

正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明确地指出，运动的发展在过去的 4

309

个月里，是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的估计的，这正暗示我们以前的整个估计，也是按照毛泽东的青岛讲话而发展的。事实上也相当接近毛泽东7月所作的评价。这里还有一个证据可用来说明这点。邓小平对这点的大部分分析虽不能直接跟毛泽东的讲话联系在一起，但是却与柯庆施一个月前所作的分析有很大的相同之处。[94]然而在方法问题上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柯庆施主张在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中，都应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95]邓小平接受了他的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但是在对待敌人方面邓小平谈到采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96]这个差别可能反映出毛泽东在如何指导反右斗争上的让步。

在邓小平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又依照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估计，这暗示着，整个这部分很可能都是受到毛泽东的启发，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只有取得了反右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才能使中间分子和右派中的一部分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97]在9月下旬，邓小平便能宣布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且预言，现阶段反右斗争将发展到运动的第三阶段，重新整风。[98]后来，毛泽东在11月17日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肯定了这个评价，说已经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右派已经被打垮了。[99]

尽管宣布取得了这些胜利，但邓小平在9月下旬当讲到胜利具体意味着什么时，也象毛泽东两个月前那样谨慎，毛泽东曾说过战胜右派和争取中间分子的斗争也许还要10年到15年。[100]尽管右派被"打垮"了，邓小平的报告却表明，他，或许还有毛泽东在9月份仍坚持这一评价：……[101]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可能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102]

鉴于这个长远预见，并不奇怪，邓小平必然也要象毛泽东那样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需要在各方面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

子。[103]但是邓小平也许和毛泽东一样感到，要实现这个任务，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我们必须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104]

邓小平继续确信统一战线仍然是需要的，知识分子界实行双百方针必然结出政治之果，如果它具有这些性质："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在各党派之间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105]（着重点是我加的）

所有这些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前18个月的"自由政策"，事实上，邓小平试图在说：整风运动结束了，整风运动万岁！但是，反右斗争（和六条标准的公式）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能如当初预料的那样在实际上得到执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了。[106]毛泽东的大胆试验到此结束了。

注释：

1. 这些是官方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估计；某些西方人士（如刘积

叶）的估计较低，1956年为3%，1957年为0.5%。见珀金斯：《共产党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第81页注64。对合作农业体制的衰败的讨论，见沃克尔：《中国农业规划》，第72—73页。

2. 1956年棉花产量减少5%，棉布产量在1957年增加12.5%（见沃克：《中国农业规划》，第72页。

3. 同上书，第71页。

4. 从1952年到1956年，人口每年增长超过2%（见约翰·S·爱尔德：《大陆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分布》，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大陆中国经济概览》，第353页）。

5. 1956年，粮食收购减少了39亿斤，而国内市场的销售则增加了127亿斤。1957年，销售量继续增长，收购量继续下降（见《人民日报》社论《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该报1957年8月5日）。

6. 一些干部被指责为个人主义（同上）。

7. 同上。

8. 毛与著名党外人士梁漱溟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情况，见周庆文：《风雨十年》第254—257页。

9. 见《请看刘少奇的丑恶面目！》，载《井冈山》，1967上2月1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62号，第3页）。

10.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据谭震林说："从1956年秋收以来，不少同志却提出了'农民生活还很苦'，似乎党和政府只注意了改善城市职工的生活，而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却没有认真的注意。甚至有的同志对'共产党进了城市，忘了乡村'之类的说法也随声附和。"文章发表的日期——整风开始以前——以及提到"同志们"，都清楚地表明文章是针对党内成员而不是对非党人士的批评者，尽管后者之中也有某些人持这种看法。

11.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见《人民中国》1957的7月16日，第23页。

12.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80号，第5—6页。

13.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8月10日。在毛青岛讲话里称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也许就是对待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自由放任态度。8月7日还有一篇社论，题为《农业合作社不该做投机买卖》，批评农业合作社非法套购国家的粮食，然后到黑市上倒卖。并说党的基层干部对这类行为不闻不问，因为他们觉得不这样做就亏待了农民。

14. 同上。

15. 同上。

16. 《粮食销量是能够减少的》见8月12日《人民日报》；《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见8月15日；《自由市场要严格控制》见8月18日；《吃粮要有计划》见8月28日；《在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见8月30日；《城市用粮必须努力减少》见9月2日。

17. 见沃格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209页。没有中央的指示，广东是不会发表这数字的。

18. 对这次运动的探讨，以及它的可能的目的是如何被破坏的，见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订》第11章，第30—32页。

19. 许多干部缺乏远见，担心鸣放可能适于高级政府机构和教育部门，但不会下到农村去实行。官方的回答是，这表明了对党的领导力量和群众的聪明才智缺乏信心（《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也许干部们知道农民甚至会比资产阶级极右派更加不管对争论的限制，因而他们担心一旦鸣放起来，将会难以控制，没有这场运动他们同不满的农民已经有许多麻烦事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前广东农村的情况，见沃格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204—205页）

20. 译文见《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81号，第6—8页。

21. 见沃格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204—205页。

22. 在对明年布匹定量供应办法作决定的过程中，商业部选择了在城乡之间更公平的办法，减少城市居民的优厚条件，并承认这已引起过不满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0日)。

23. 这个指示公布于8月10日，薄的讲话发表于8月11日。后者的英译文见《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80号，第1—4页。

24. 见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第11章，第2—3页。

25.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80号，第2页。

26. 同上，第4页。

27. 见马里恩·R·拉森：《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农业》，见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大陆中国经济概览》第236—237页。

28. 《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经济附录，280号，第3页。原料来源有限是由于1956年的自然灾难。

29. 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第11章，第2页）指出，《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社论是将执行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第一个征候。

30.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5—286页。

31. 同上。

3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号，第21页。

33. 同上。毛对知识分子失望的程度可从他断言知识分子最愚蠢，罗隆基（也许还有象他一样的人）比文盲还无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19、132页）。

3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00号，第18页。

35. 见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51—253页；大规模地批判苏联作家始于1957年5月。

36. 《纽约时报》1957年5月21日。

37. 同上，1957年5月24日。

38. 同上，1957年5月21日。

39. 同上，1957年5月24日。

40. 《每日电讯》1957年5月25日。

41. 《纽约时报》1957年5月27日。

42. 《每日电讯》1957年5月25日。

43. 《纽约时报》1957年5月25日。

44. 《纽约先驱论坛》(欧洲版) 1957年5月26日。

45. 《纽约时报》1957年5月26日、27日和29日。

46. 同上，1957年5月30日。

47. 同上，1957年6月2日。

48.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

49. 同上，1957年5月28日。

50. 《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中国》1957年7月16日，第38页。

51. 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第265页) 指出，在这次动乱之后，共产党人没有立即停止向国民党人提议和解。其中一例是6月蒋介石的一位前侍卫官的广播讲话。他向蒋的儿子蒋经国呼吁，力劝其父摆脱美国控制，同共产党人第三次合作(《世界广播概要》(第五部分：远东) 675号，第4页)。

52. 社论的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04号，第6—9页。请用第7页第4至6段同《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号第21页的第1段(摘自青岛会议文件) 相比较，并同《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00号，第18页第2段的摘要对比一下。

53. 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3页。

5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04号，第8页。

55. 同上，第9页 (在英译本的倒数第2段)。

56. 同上。在8月23日的一篇关于生产节约运动的社论里，有一些在语义上有损于毛的地位的话。《人民日报》承认整风运动有助于这场运动，它恢复了5月之前对"三害"的顺序，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5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598号，第1—3页。

58. 同上，1599号，第1—4页。

59. 同上，1604号，第6页。

60. 同上，1599号，第2页。

61.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9月5日。

62. 同上。

63. 参见9月5日社论第6段后半段，及前引青岛会议文件（见287页）的一段话。

64. 见台北发表的文本第1章第13条，（刊登在《香港时报》1970年10月5日上）。这篇文章与1957年的原本，有一个地方不同，从形容政治气候的词句中"自由"一词被删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香港时报社的一个过失，因为这个词在纽约中国新闻社提供的英译本中依然存在（《中国背景》第2册71—81，1970年10月4日）。

65. 《严肃处理党内右派分子》，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16号，第1—3页。

66. 《接受教训，增强党性》，《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

67.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同上1957年9月15日。

6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15号，第6页。

69. 对立双方谋求达成妥协的办法，还有一个例子，即9月3日柯庆施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这个总结报告和他在8月中旬的讲话不同，他把资产阶级右派同帝国主义、蒋介石联系起来这倒和彭真在8月初的讲话很一致。

70. 同上。

71. 《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第37页。

72. 《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16号，第10—14页。

73. 同上书，第14页。

74. 同上书，第10页。

7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号，第21页。

7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3页。邓与社论及刘不同只是引用了毛的措辞。

77. 《刘少奇选集，1947—1957》第449页。

78. 安子文:《驳斥右派分子对干部政策的攻击》,《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20日。

79.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青年报上发表，可能是因为在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人中间对强调品行和资历方面的做法不满。

80. 安引用了毛关于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刘反对过分强调品行和资历，和周批驳党有宗派主义的说法（也意味着批驳党在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的说法）的讲话。安子文提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很聪明的办法。刘通常被视为党的辩护人，他不仅注意品行和资历，而且注意能力；周是主张对非党人士采取信任的宽容做法（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他们的人），他被安描述为代表党批驳党不够信任非党人士的人。

81.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1955年秋召开，除中央委员以外还有388人列席会议。会议是在最高领导层终于确认毛号召加速合作化的正确性以后召开的。与此相比，1954年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只有52位中委以外的人士列席，这次会议发动了对高岗的批判，而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仅有14位中委以外的人到会，会上彭德怀批评了毛及大跃进。

82. 这次全会的公报，见《人民手册》1958年，第182页；邓报告的中文本，见同上书第33—42页；英译文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3—363页。报告共分八个部分：运动的一般情况；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关于农村；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少数民族；关于军队；关于党和团；改进工作，争取全胜。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作了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毛的讲话（或部分讲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22—126页。在这里我不再论及它，因为其主要之点已在上面说过，见第119—121页和285—289页。

8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5页。邓称反右斗争为"当前的任务"（第347页）。

84. 同上书，第345页。运动的第一阶段当然是5—6月的鸣放。

85. 邓列举的顺序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同上书，第355页），"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第361页），"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上），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第358页）。（这是正确的）。

86. 同上书，第344页。

87. 同上书，第343页；参见前面第286页，在那里我已经说明，邓的谨慎措辞表明，毛的青岛会议讲话并没有立即赢得高层领导的一致同意。

88. 参见邓讲话第3段的前3句（同上书，343页），同毛讲话摘要的第1段前4句相对照（《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号第21页）。后者的简短引语见第287页。

89. 邓"不能继续前进"（《人民手册》1958年，第33页）；柯"不能前进"（《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41页）。彭真在8月14日讲话里以有些阴暗的词句描述了形势，并说，如果在这场争论中不能赢得胜利的话，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期，第144页）。彭不象毛、柯和邓那样，没有提到1956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从而强调了阴暗面。彭的估计和《人民日报》7月28日社论比较接近，社论在说到如果争论失利时，使用了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这个词。

90. 参见邓讲话第4段（《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3页），和毛的青岛会议讲话摘要的第5段，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号，第21页。

91.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3—344页。

92. 同上书，第344页。

93. 同上。

94. 邓讲话中区分了在人民中两种不同的整风，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41页，最后一段）；也可参见柯的讲话中最后一段的倒数第2句，与第308页上引自邓报告的段落相对照。

99. "现在右派是打垮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6页。

10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1号，第21页。

101. 这段关于"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的话见毛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译按：应为会议期间的一篇文章）。

102. 《共产党中国：1955—1957，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8页。

103. 参见同上书第348页第4段（邓），《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00号第18页（毛），以及1609号第20页第4段（柯庆施）。

104. 《共产党中国：1955—1957，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8页。

105. 同上书，第349页。

106. 邓也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同上书，第355页）。

311 结　　论

毛在自由化方面试验的失败，是对这位主席的声望权威的巨大打击。他傲慢地对待了党，引起了一些高级同事的反感，也损害了他自己的信誉。虽然他已正确地认识到改善党和人民关系的必要，但他严重地低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痛苦。这是毛在其政权建立后犯的第一个大错，并且他的失算可以十分简单地解释为：因为事先没有让不同意见发表出来，因此，毛无法知道人们实际上有什么想法。

毛关于通过整风对党员行为产生长期影响的设想，是不切合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在八大讲话中所说，毛和他的支持者清楚地意识到，正是执政党的地位导致了干部的官僚作风和宗派行为。因此，只有通过改变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才能改造干部的行为。对此，毛在1957年是不准备实行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永远相信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他那时十分满意党所缔造的新社会。

只是在他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完全不抱幻想时，他才准备打击党的本身，而不仅仅打击犯错误的干部，并且，他用自己在1957年同意压制的同一部分人——学生来打击先锋。

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观点上的一致，使1957年秋天的妥协成为可能。政治局的长期团结传统，也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1957年仲夏，苏共中清洗"反党集团"的运动，成了一个不可遏制的党内斗争危险将要出现的明确而适时的暗示。如同刘少奇1957年12月同一些印度共产党人的谈话中所说的:

> 不管党的路线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党都必须维护自己的统一……对革命来说，党的分裂比失败破坏性还大，所以人们必须忍耐，甚至忍受痛苦……我们党始终维护自己的统一，一直没有分裂，党的纪律一直被执行；没有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1]

312

那时，刘还能显得宽宏大量。第二个月，毛就对干部透露说，他将在1959年他的国家主席任期满时不再担任此职。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在三中全会前后做出的。这也许说明毛为何能取得刘对他青岛讲话的支持另一个理由。[2] 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刘明显地有着更好的机会作毛的继承人，并且私下也有毛将给予支持的保证。毛决定退居二线，几乎当然是他逐步从权力第一线退下来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消息公布的时机是在毛下来一年多以前，同时又是在他整风受到挫折几个月之后，这很可能被干部们认为是主席自我批评的明确形式。

刘在成为继承人方面相对有很高的地位，又由于周总理在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辞去外长的兼职而更加提高

了。因为周此后仍象过去一样关注外事。毫无疑问，被迫辞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在整风运动中作用的象征性的批评，虽然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周的地位也因经济状况不佳而受到损害。

毫不奇怪的是，毛甚至在打击地位较低的反对者时，也处于软弱的地位。邓拓在夏天被解除了《人民日报》主编的职务，但他仍象以前一样继续主管此报。广东第一书记陶铸在 1957 年 8 月被解除兼省长的职务，也可能是在毛的坚持下做出的，他事实上是 6 个兼双职的省级官员此时被解除一职中的唯一的人。[3] 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透露，1957 年又重新调查了陶铸同高岗的联系。为了说明自己的清白，陶不得不做了两个声明。[4] 可以想象，毛为打击陶支持刘等人而企图给他加上一个很重的罪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显然是不成功的，陶直到 1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失宠。[5]

毛刘经济上的联盟

毛和刘 1957 年秋的和解也存在于经济方面。在开始时，即在苏共二十大前，毛决定实行自由化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以调动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但经济过热——投资增长 60%造成了“强烈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供应困难和严重的消费品短缺，”[6]1956 年的“冒进”被取消了，但经济形势继续恶化，部分是由于 1956 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 1957 年稍微减轻的灾害；部分地是由于 1956 年冒进的继续影响。在 1957 年仲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据说要把投资比前一年下降 20%，1956 年的财政赤字将通过年支出减少 40%和收入增加 2%来消除，[7] 直到夏末，报纸还在谈论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虽然第一个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已超额完成，但经济仍处于不佳的境地。

313

过错不完全在计划制定者，但他们是明显的替罪羊。他们坚

持遏制1956年的跃进，但那以后的12个月中，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了。不光计划制订者被问罪，他们制定的体制也成了问题。在中国人口资源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情况下，中国人全盘采取苏联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吗？毛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暗示了他对苏联体制许多方面的不满。1957年中，刘少奇指出，他也深深地怀疑苏联发展方法，甚至它在苏联的运用。同党校校长讨论分配问题时，他说：

同这些问题相联系，人们从苏联教科书中学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必须调查、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我们也必须特别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同时它又是多方面的、灵活的。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方面，只完善计划经济，是僵化死板的，不是多方面、灵活的。一位负责经济部门的苏联同志告诉我："实行计划经济使苏联付出的代价太大。计划减少了经济的活力，导致经济生活的死板。"当苏联同志到资本主义国家或到中国，看到人们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时，他们很感兴趣。[8]

由于1957年秋的两个其他因素，对苏联发展模式的不满无疑地增长了。中国领导人有时一定会很清楚，苏联不能以中期贸易信贷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而这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苏联人迫于东欧人的动荡形势，把大约10亿美元以短期贷款形式转给象匈牙利、波兰这样的国家。这是1957年9月促使苏联放弃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一个主要因素。[9]这也促使中国人在1958年掀起"大跃进"运动时决定完全放弃苏联式计划。

314

放弃苏联模式的另一个因素是"反叛信号"，即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毛号召批评的反应非常强烈，并常是带"反党"性质的。1956年1月后，知识分子曾被重视，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主

要力量。但如果他们中这样一大批人不满（19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大赦中给26000人摘掉右派帽子，毛1958年4月讲总数300000人，[10]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说1957年定了400000右派），[11] 那么，让国家经济的未来放在这些人的技能的基础上就极端危险。没有忠实的知识分子，苏联经济模式的沉重的上层建筑能维持得了吗？况且，苏联人不也认为他们的经济体制甚至还不适于他们自己的吗？1957年5月赫鲁晓夫进行了激剧的改革，包括撤消25个中央经济部门，把它们的权力交给称为sovnarkhozy[12] 的新的地方经济委员会。

315

所有这些因素——经济不景气、对苏联模式幻想的破灭、暗淡的获援前景、对技术掌握和管理者的不信任、苏联经济改革——这一切都使计划制定者处于防御地位，也使毛和刘联合起来。1956年，两人都赞成加快经济发展，都深信不疑《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1957年秋，当农业的停滞成为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时，他们能够坚持主张恢复“十二年纲要”，作为发动新的跃进的信号。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宣称：“只有通过生产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来显示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可靠保证。”[13] 接着，他又谈到《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认为这个纲要已经鼓舞了农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修改了这个纲要，并要求全会批准它。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争论后，将要把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十二年纲要的农业生产问题上。这将导致这年冬天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涨，接着，中共中央将再次修改这个纲要，并将在年底党的大会上讨论后[14] 交国务院，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颁布。然而，纲要只有在同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中才能通过。“1956年生产高涨的巨大成就必须肯定下来”。[15] 全会结束一个星期后，谭震林象30年代邓小平作为毛“集团”的一个成员一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十二年纲要的报告，正如两

年前的合作化运动一样，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毛转向了一个他肯定能依靠的人。

不可避免地，毛企图发动另一个跃进的决心，严重影响了周恩来和计划制定者们的地位。周恩来经过一年时间才不安地意识到：他对1956年冒进的反对，即使在整风运动中毛重用过他的情况下，也使自己同毛的关系弄得紧张起来了[16]。大概就在此时，他对自己一年前攻击急躁冒进作了自我批评。周在整风和经济两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这更说明了他因被撤销外交部长职务(译注：此说不确，是周恩来因工作繁重辞去外长职务。)而丢面子的原因。大跃进准备就绪时，周和他的主要经济计划制定者陈云[17]退到了后面，他俩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没有发表。

打击的不仅是他俩的威望，整个中央经济机构因为毛和刘无疑地是受赫鲁晓夫榜样的鼓励，推行他们的下放权力计划而吃到了苦头[18]。1958年5月，另外两个计划制定者李富春和李先念被选进书记处，很明显，从那时起，任何中央经济计划都将通过党的机构进行，而不是通过政府机构，[19]中国开始放弃了苏联模式。

中苏关系

1957年秋，苏联人几乎还不会意识到中国人已放弃了苏联的发展战略。也许毛和刘在那时并不清楚他们正在做这件事。他们仅仅在开始制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赫鲁晓夫将会明白和高兴的是，毛已停止了他的整风运动。但这已经造成了中苏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因为，虽然苏驻华大使尤金已告诉周恩来，他的国家也容许人民内部的矛盾存在，[20]但后来赫鲁晓夫明确地否定这种异端邪说。[21]由于整风的取消，毛的内部矛盾思想就不再具有刻不容缓的实践意义了，同时，的确在一段时间里似

316

乎实际上被遗忘了。这样一来，中苏思想分歧暂时被弥合了。

然而，赫鲁晓夫如果也没有经历一个象整风冲击到毛泽东那样的被人幸灾乐祸的事，他就会更缺乏人道精神了。他也许被中国人的自信态度所激怒。中国人提出了共产主义集团非稳定化的规律，鼓励波兰要求更大的独立性，并创造了一个吸引东欧知识分子的“自由”共产主义模式。[22] 但现在百花已经凋谢，毛不再准备容忍波兰不肯承认苏联在共产主义集团中领导地位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自己关于矛盾的讲话在华沙被泄露而生气，但主要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国人已经对他们通过和国民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来收复台湾的设想失望了。甚至在反右运动前，北京就一定很清楚，蒋介石将不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有所反应。反右运动开始后，向国民党呼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合作的观点便是无的放矢了，在日内瓦向美国人提出帮助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也毫无意义了。中国人已得到美国的同意，允许中国公民在他们要求时回到中国。但所有试图说服国务卿杜勒斯同意双方放弃使用武力的建议都遇到了相反要求，即中国不能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23]1957年5月，美国人和国民党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允许在台湾安置美国斗牛士地对地导弹，这种导弹能把核弹头打入中国大陆几百英里远的地方。这个协定似乎成了在东亚地区用更现代武器全面317 加强美国力量的一个部分。周在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沉痛地讲到南朝鲜发生的类似事情。6月28日，杜勒斯在一个关于中国政策的主要演讲中，重新肯定了他的强硬路线：不承认中国，不同中国搞贸易，继续反对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受中国批评浪潮的影响，他确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只是暂时的。[24] 到1957年仲夏，很明显，北京对美国和台湾的缓和路线失败了。

鉴于这些情况，中国领导人一定极大地受到苏联空间技术巨

大进步消息的鼓舞。8 月 26 日塔斯社宣布，苏联第一个洲际导弹试验成功。6 周后的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个月后的 11 月 3 日，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又发射了，这颗卫星上面带了一只狗。美国接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因为它表明，苏联在空间技术上先进得多。中国人则又吃惊又高兴。[25]

毛在第二颗卫星发射的前一天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纪念活动。他对苏联导弹优势的重要意义的估计被证实了。他形象地称之为东风压倒西风。[26] 他号召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他不再打算容忍共产主义阵营内的不统一现象了。吃惊的波兰人被要求同大伙一致。现在毛强调的是纪律而不是自由，强调目的一致而不强调个人心情舒畅。同国内政策一样，在外交政策上毛主席也改变了路线。[27]

毛在国内外两方面都具有的新的战斗精神，使 1957 年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乐观主义和百花方针幻想的时期过去后，在下一个 10 年里出现了毛日益关注的问题：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性质、共产党的作用、经济发展的步子、苏联模式妥当与否，他本人立场的模棱两可、大跃进的狂热和非人道化、三年痛苦的岁月、中苏论战。在这期间，中国领导人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了。这些将是第二卷研究的问题。在第三卷中，我试图说明：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将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注释：

1.《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2—33页。

2. 见"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60条，《当代背景》892号，第13页；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未能得到这个文献。1958 年 1 月 31 日，毛在六十条前面加了导言，在第 60 条里，清楚地表明该工作方法已经在中央和各省许

多领导人的讨论，这说明此事已传达几个月了。该条说到政治局已同意了这工作方法，但没有说中央全体会议已讨论过。这也许说明，这个工作方法没有向三中全会提出，不过我推测在向下传达这个工作方法之前，刘一定知道了这个文件。一个材料说它确实是向三中全会提出过的（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 33 页）。不过，这也不能肯定，因为这一说法是在列举刘在 1958 年的一系列活动中提到的。

3. 伊泽亚·沃格尔暗示，陶的去职可能是想要平息地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广东一直很强烈；陶是个湖南人，他的后任是广东人。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很可能陶早在 1956 年 8 月就应当去职了，那时正如沃格尔清楚地说明的，陶正处于守势，而不应该是在 1957 年 8 月，因为此刻党已经指示反对地方主义（见沃格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 199、211–216 页）。
4. 《刘、邓、陶结盟由来已久——陶是怎样从高饶事件中逃脱的》，载《批陶战报》1967 年 4 月 10 日。
5. 1962年7月，陶自已检讨说，过去没有完全支持毛；他似乎没有提到他犯错误的那个时期（见沃格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 301 页）。
6. 见艾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第50页。
7. 休斯和卢亚德：《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第56页。
8.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辑，第96页。
9. 见赫德逊、罗文哈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35–38页；这篇关于"中苏经济关系"的没有署名的文章是沃纳·克拉特博士写的。
1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请记住，周恩来曾经估计，高级知识分子的总数为 10 万人；全部知识分子的人数为 380 万（见本卷，第 34 页）。无疑地，并非所有的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但是整风运动采取的方式说明，绝大多数右派都是知识分子。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右派中有 1／3 的人是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207、215 页）。

11. 《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5日第7页。

12. 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35–241页。

13.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52页。

14. 据我所知，还有另一个迹象说明，党的领导层想要坚持新的党章，并在第一次会议之后的一年里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见三中全会不久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141 页）。但结果第二次会议直到 1958 年 5 月才举行。

15.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52页。

16. 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讲话里透露："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希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要象民主革命时期那样付出大的代价。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问主席，他是否是指 1956 年的反冒进，他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并且接着说，冒进仅仅是一个小问题。"见"周总理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机关群众代表时的讲话"（未注明出版单位）。

17. 在1956年—1957年冬季危机时，陈云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平衡的原则（见《北京公社》1967 年 1 月 28 日）。"平衡"的观点同大跃进的精神大相径庭，对此将在本书第 2 卷中讨论。毛在 1959 年的一次讲话里，似乎说过在 1956 年到 1957 年期间，周恩来和陈云是他在经济政策上的两位主要对手（见《彭德怀案件》第 20、25 页）。

18. 见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二版）第195–210页。并见本书第 2 卷。

19. 见麦克法夸尔：《共产党中国的党内争论》，载《太平洋事务》1958年12 月号，第 332 页。并见本书第 2 卷。

20. 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第32页。

21. 同上书，第306页。

22. 尤其在波兰；同上书，第28、302页。

23. 见麦克法夸尔：《中美关系，1949–1971》第104–105、116–127页。

24. 同上书，第134–142页。

25. 哈尔波林相信，中国新闻界报道这次洲际导弹试验表明，北京已经估计到这件事。但是他认为中国报道国际地球物理年是他们不相信苏联会首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证据（哈尔波林：《中国和原子弹》第5章）。

26. 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07–408页。在毛为《人民日报》写的7月1日批评《文汇报》的社论里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27. 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毛流露出对波兰发展前途的担忧。在波兰，由于对知识分子周刊的压制，促使10月初学生们闹起事来。毛似乎感到禁止该报纸发行是个错误，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批评波兰人未能解决好反革命、右派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见毛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35页）；关于这一时期波兰问题的情况，见《集权国家的报纸》（苏黎世：国际出版公司，1959年）中关于波兰的那一章。

索　引

对书目和方法的说明

本书资料主要来源分属于两个极为不同的类型。首先是1956至1957年间公开发表的材料，象讲话、社论、报纸上的文章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当时对事件的看法。这些材料仅从表面上就提供了许多情况，但只要对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的手法有所了解，我们时常还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内情。中国领导人正是通过这种手法把更多的信息传递给更为老于世故的官僚机构成员的。这些方法通常被称为“奥秘传播”或“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它包括：字或词按某种特殊顺序排列，强调一项政策的某个方面而略去另一方面，援引历史上的事件来指当前的某一政治准则[1]，发表精心选择的照片以显示政治上的位置，[2]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手法。这里我不想讨论如何分析公开的信息以求得潜在的含意的问题；在其他场合，人们曾详尽探讨了“克里姆林学”，凡在本卷里运用了克里姆林宫学研究方法的地方，我都详尽地加以阐发。[3]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领导层也使用“克里姆里林学”。1959年毛在谈到对“大跃进”的批评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这些人不提冒进，但他们却有反冒进的味道。譬如，他们讲“有失有得”。将“得”放在后面，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4]

资料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但是与1956年和1957年有关。这一来源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过由于其发表的主要缘由是要败坏象刘少奇这样的被打倒的“修正主义”领导人的名誉，所以使用起来要特别小心。这类材料中许多都是从受批判的领导人过去的讲话和文章中节录下来的，并和

能补充许多东西。至于本卷涉及的这个时期，当时公开发表了大量的材料[5]。现在所得到的这些极为有意思的补充文件、引语及消息，总的来说，能肯定人们以前对1956—1957年所得的总的印象。例如，引自刘少奇1957年5月25日讲话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言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披露的（见221页（英文版）——译者），它证实了这样一种揣测：正由于大学校园的骚乱才迫使整风运动草草收场。在整风问题上，刘少奇、彭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这在1957年就已为人所知，虽然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只是在回过头去看时才愈见清楚[6]。新材料的价值正在于，它使人们对过去所讲述的事件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晰，而且更加充满自信地讲述这些事件。

毛泽东主要著作、文章及语录汇编

《毛主席教育语录》。

北京：红代会，北京电机学校，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

《毛主席论文艺语录》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路"编辑部，未注日期。

《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4月第二版。英译文见陈志让：《毛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北京：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1967年7月。

《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未注出版者和出版日期。《中国法律与政府》1968—1969年冬季版将这本书几乎全文翻译刊载了。只有一个文件除外，这就是彭德怀的《我的意见书》。来源于另外渠道的该文泽本刊登在《大陆中国报刊概览》4032，1–5页。这本汇编的某些文件的译本，也同时来源于其他渠道，见《彭德

怀案件》(香港：联合研究院，1968 年)。

《毛主席文选》。

未注出版者和出版日期。这卷书被全文翻译刊登在《出版物联合研究中心》49826 号（1970 年 2 月 12 日）和 50792 号（1970 年 6 月 23 日）上。

《毛主席语录》。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 年第 2 版。这本"小红书"的官方译本叫《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6 年版。

《毛泽东，基本战术》

纽约：普莱格，1966 年版。本书由斯图尔特·施拉姆译出，收入了毛从 1938 年起写的、迄今鲜为人知的论述游击战争的著作。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4 月。毛的合作化讲话（1955 年 7 月 31 日）和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1957 年 2 月 27 日）都选进去了。译本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 年)。毛的宣传会议讲话（1957 年 5 月 12 日）译本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6 年。

毛泽东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北京：人民出版社，3 卷本，1956 年。这本书包括毛写的一篇重要的序言和若干编者按语，并出版了一卷节选本，这个节选本被译成英文，书名为《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年)。这本书的一些文章还被译出，刊载在《当代北京》338 号上，序言的官方译本刊载于《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117—119 页。

《毛泽东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4 卷本，1960 年。这些卷是 1949 年以前时期毛的材料的主要来源，英译本题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北

京：外文出版社，1–3卷，1965年；第4卷，1966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未注出版者和出版日期。这本重要的汇编被全文译出刊载于《当代背景》891号上。一些文件还译载于陈志让主编的《毛：伟大的生平评介》（新泽西州，普林梯斯·霍尔公司，1969年。）和他主编的《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未注明出版者，1967年。见下一条。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未注明出版者，1969年。1973年夏季，台北国际关系学院将这本书和上面那本书制成照片透印版发行。显然，它们最初在中国国内印行时数量很有限。两本书都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是来自人民共和国有关当代事件的最为重要的原始文件。长达700余页的1969年版本具有更突出的价值，内容上包括了迄今尚未公开的大量讲话和文章，时间上则包括了50年代中期直至60年代后期。本书大量地引用了这些讲话和文章。1967年版本包含了1959–1961年的材料；其中一些已见于别处，但是1959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的一系列讲话则是我们前所未闻的。为了严格地区分上述三本标题相同的书，我这样来称呼它们：《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毛泽东：未名文集》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这是又一部重要的汇编，译文见《当代背景》892号；一些文件还被翻译收入了陈志让的两本书里。

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政治思想》。

（哈蒙斯沃斯：企鹅丛书，修正版，1969）本书包括了1917年到60年代中期毛的文章的译文，并有评注。

《最高指示》。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这个汇编被全文翻译刊载在《当代背景》897号上。

注释:

1. 文化大革命是由批判剧作家吴晗为先导的，他被指控为借一部描写16世纪明朝的一位官员的剧本来批评毛。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并不限于中国，甚至也不限于共产党集团。1970年7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班牙凭一条标题给编辑定罪》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西班牙法庭今天判决一家杂志的编辑入狱5个月，并处以300英镑的罚款，理由是因为一条'大不敬'的标题。……页首标题为'司法大臣卖官鬻爵'，指的是一篇有关19世纪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件丑闻的文章。在星期四的审讯会上，起诉律师指控说，这个编辑发表这样一条标题，是想败坏现任司法部长的声望和名誉。……在这个审讯会上，辩护律师声称，这位编辑没有犯法，而那个标题只不过是新闻界惯用的一种手法罢了，那是一句只求吊人胃口不求确切的话，无非是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章里来。"
2. 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论照片》，《中国季刊》1971年4–6月号，289–307页。
3. 对克里姆林学的充分讨论，见拉什：《赫鲁晓夫的崛起》，附录二，"奥密传播在苏联政治中的作用"；康库斯特：《苏联的权力与政治》，第三章，"证据问题"；扎戈里亚：《中苏冲突》，"对方法的说明"；对这种方法的现代评论，见拉奎乌尔：《革命的命运》，180–182页。当然，我并不是要说"克里姆林学"没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同样一个材料完全可能有极为不同的解释。这类例子可见迈克尔亚荷达："克里姆林宫学与中国的战略论战，1965–1966年"，《中国季刊》，1972年1–3月号，32–75页；唐纳德·扎戈里亚和尤里·雷阿年对这篇文章的答复，见《中国季刊》1972年4–6月号；亚荷达的进一步说明见《中国季刊》1972年7–9月号。
4. 引自麦克法夸尔：《论照片》，《中国季刊》1971年4–6月号，291页。
5. 50年代后半期的官方公开活动要比60年代前半期多得多。从1956年到1959年，有九次中央全会；而1959年8月至1966年8月仅召开两

次。

6. 如果读者受好奇心驱使，极想把本卷中作者对1956~1957年的看法与作者在文化革命前对该时期的看法加以对照的话，请看“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整风运动’”，《当代世界》，1957年8月；“批评与反批评：‘整风’运动的影响”，同上，1957年11月；“共产党中国的党内争论”，刊《太平洋事务》，1958年12月；《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中“幻觉的破灭”一节，以及介绍各种文献的部分。

书　目

A·多克·巴尼特：

《共产党中国：初创时代，1949—1955》　纽约：普拉格公司，1984年。

A·多克·巴尼特主编：

《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西亚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

詹姆士·伯特伦：

《重返中国》　伦敦：海因曼公司1957年。

包华德主编：

《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1册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

泽毕戈纽·K·布热泽金斯基：

《苏联集团：团结与分裂》　纽约：普拉格公司，修订版，1961年。

尼格·卡梅伦：

《中国在微笑》　伦敦：赫奇逊公司，1958年。

伊文思·F·卡尔逊:

《中国的双星》　纽约: 都德——米德公司

E·H·卡尔:

《苏俄史》第二卷:《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52 年。

第四卷:《权力真空 1923-1924》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60 年。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香港: 联合研究院, 1968 年。

张书成 (音):

《共产党中国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1955~1962: 三个事例的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未发表)。

赵国春 (音):

《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　伦敦: 亚洲出版社, 1960 年。

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

《共产党征服中国》　伦敦: 威登菲尔德公司, 1966 年。

陈志让:

《毛和中国革命》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

陈志让: 主编

《毛泽东》　新泽西州, 普林梯斯·霍尔公司, 1969 年。

陈志让主编:

《毛论文集: 文选及书目》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

陈迺润：

《中国经济统计》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67年。

陈迺润和沃尔特·盖伦森：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　芝加哥：爱尔丁公司，1969年。

陈锡恩：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

姬朝鼎（音）：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要地》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3年。

《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词典》　台北：国际关系学院，第1卷，1970年。

周鲸文：

《风雨十年》　纽约：霍尔特，赖因哈特，温斯乔公司，1960年，

周策纵：

《五四运动》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

杰罗姆·A·科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审判程序1949—1963：导言》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

《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及分析》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博伊德·康普顿：

《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　西亚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2

年。

罗伯特·康库斯特:

《苏联的权力和政治》 伦敦:麦克米伦兰公司,1961年。

迈克尔·克罗夫特:

《红地毯通向中国》 伦敦:朗曼公司,1958年。

大卫·克鲁克和伊莎贝尔·克鲁克:

《十里店——个中国乡村的变革》 伦敦:罗特勒基公司,1959年

艾萨克·杜切尔:

《苏联,中国与西方》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

奥德里·多尼索恩:

《中国经济体制》 伦敦:艾伦与昂温公司,1967年。

丹尼斯·丁·杜林:

《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治》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特:胡佛研究院,1964年。

亚历山大·艾克斯坦:

《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公司为外交事务委员会出版,1966年。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外文出版社,3卷本,1956年。

卡尔·埃斯克伦德:

《红色官员》　伦敦：阿尔文·雷德曼公司，1959年。

梅乐·范索德：

《如何统治俄国》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

埃德加·富尔：

《狡诈之人与迟钝之人》　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58年。

C·P·菲茨杰拉德：

《中国的革命》　伦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52年。

D·W·福克玛：

《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的影响，1956—1960》　海牙：摩吞公司，1965年。

约翰·吉廷斯：

《中国军队的作用》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约翰·吉廷斯：

《中苏论战之概观；对最近争论的摘要和评论，1963–1967》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梅乐·戈德曼：

《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

罗伯特·盖兰：

《蓝蚊》 伦敦：塞克和沃布戈公司，1957年。

摩尔顿·哈尔波林：
《中国和原子弹》 伦敦：帕·麦尔公司，1965年。

摩尔顿·哈尔波林和德怀特·H·波金斯：
《共产党中国与军备控制》 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1965年。

A·M·哈尔彭：
《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未发表）

哈罗德·欣顿：
《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 波士顿：豪顿—米佛林公司，1966年。

威廉·欣顿：
《翻身》 纽约：月评社，1966年。
《苏联共产党历史》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年。

查理斯托佛·豪：
《中国城市的就业与经济增长，1949—1957》 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

萧祚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力关系，1930—1934》 西亚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

谢兰莉（音）：

《核时代共产党中国之战略》 纽约：普林梯斯—霍尔公司，1962年。

许芥煜：

《周恩来：中国的卓越人物》 纽约：达堡戴—安柯公司，1965年。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伦敦：劳伦斯和威沙尔特公司，1951年。

G·F·赫德逊，罗文哈尔·理查德，罗得里克·麦克法夸尔：

《中苏论战》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1年。

T·J·休斯，D·E·T·卢亚德：

《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

R·N·卡瑞·亨特：

《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伦敦：布乐斯公司，修订版，1957年。

哈罗德·R·伊萨克斯：

《中国革命的悲剧》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修订版，1951年。

《人民手册（1956年）》

《人民手册（1957年）》

《人民手册（1958年）》

北京：大公报出版社，1956，1957，1958年。

埃丽斯·乔菲：

《党与军队：中国军官中的职业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　马萨诸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65年。

吉奥吉·麦克吐南·卡欣：

《亚非会议：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的万隆》　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6年。

唐纳德·W·科林，安尼·B·克拉克：

《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　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2卷本，1971年。

米哈伊尔·A·科罗契科：

《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　蒙特利尔：国际出版者代理人，1964年。

荷曼·科尔克维兹：

《苏联军队和共产党》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

《赫鲁晓夫回忆录》　伦敦：德乌兹公司，1971年。

郭华伦：

《中共史论》　台北：国际关系学院出版社，3卷本。

沃尔特·Z·拉克尔：

《革命之命运》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公司，1967年。

梅尔文·J·拉斯基：

《匈牙利革命》　伦敦：塞科和华尔堡公司，1957年。

沃尔夫冈·伦纳德:

《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

雅克·莱韦斯克:

《中苏冲突与东欧》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 1970 年。

约翰·韦尔逊·刘易斯:

《共产党中国的领导层》 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3 年。

李祁:

《共产党中国术语指南》 伯克利: 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术语研究第 5 号, 1958 年 12 月。

李卓敏:

《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9 年。

刘少奇: (一些主要资料来源)

《刘少奇选集, 1945-1957》和《刘少奇选集, 1958—1967》. 香港: 联合研究院, 1969 年和 1968 年。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分子刘少奇的一生》北京: 北京市第四医院井冈山战斗队, 1967 年 5 月; 英译文见"当代背景"834 页。

《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未注明出版地."只争朝夕"战斗队和"我自巍然不动"战斗队 1967 年 5 月 30 日.

刘少奇:

《论党》 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年。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北京：北京矿院东方红"换新天"红卫兵代表大会，1967年5月。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编》天津："誓与刘邓陶血战到底"联络站、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1967年4月；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51—653。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北京：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1967年4月10日。

罗伯特·罗，汉普瑞·伊文斯：

《逃出红色中国》 伦敦：迈克尔·约瑟夫公司，1963年。

库尔特·伦敦主编：

《分裂的世界中的新国家》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3年。

彼得·卢姆：

《北京（1950—1953）》 伦敦：黑尔公司，1958年。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

《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0年。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中美关系（1949—1971）》 纽约：普拉格公司；迪文顿·阿伯特：大卫和查尔斯公司，1972年。

J·M·麦金托什：

《苏联外交方针的战略和策略》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 年。

毛，毛主席，毛泽东：

参见“对书目和方法的说明”。

穆福深（音）：

《百花凋零》 伦敦：海涅曼公司，1962 年。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情况（1957—1958）》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出版）

德怀特·珀金斯：

《共产党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 年。

何炳棣和邹谠：

《中国在危机中》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3 卷本，1968 年。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年。

埃德温·O·赖肖尔、约翰·K·费尔班克：

《东亚：伟大的传统》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62 年。

《有关匈牙利的报告：向中国公众展示的匈牙利革命》， 香港，1957 年。

H·E·理查森：

《西藏及其历史》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

W·W·罗斯托等：

《共产党中国的前景》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纽约：怀利公司，1959年。

约翰·E·鲁：

《处在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迈伦·拉什：

《赫鲁晓夫的崛起》　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1958年。

伦纳德·夏皮罗：

《苏联共产党》　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1960年。

彼得·施密特：

《中国新貌》　伦敦：哈拉普公司，1958年。

斯图尔特·R·施拉姆：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伦敦：佩尔—马尔公司，1963；哈蒙兹沃尔斯：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66年；修订版，1967年。

斯图尔特·R·施拉姆：

《毛泽东》　哈蒙兹沃尔斯：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66年；修订版，1967年。

佛朗兹·舒尔曼：

《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修订版，1968年。

本杰明·I·许华茨：

《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

萧瑜：

《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 伦敦：哈钦森公司，1961年。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 伦敦：戈兰兹公司，1937年。

埃德加·斯诺：

《大河彼岸》 纽约：兰顿出版社，1961年。（修订版：《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哈蒙兹沃尔斯：企鹅图书出版社，1970年）。

理查德·所罗门：

《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

约瑟夫·斯大林：

《列宁主义》 伦敦：劳伦斯和威沙尔特公司，1942年。

根瑟·斯坦：

《红色中国的挑战》 伦敦：皮劳特公司，1945年。

S·H·彼得·唐：

《今日共产党中国》 纽约：普拉格公司，1958年。
米歇尔·塔特：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 伦敦：科林公司，1969年。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
《中国大陆的党的地方干部（1955—1966）》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67年。

王酊（音）：
《邓拓选集》 香港：明报社，1969年。

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
《大陆中国经济概览》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

S·V·厄特辛：
《俄国常用简明百科全书》 伦敦：邓特公司，1961年。

弗兰克·A·瓦利：
《匈牙利的分裂和骚乱》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

莱曼·P·范·斯莱克：
《敌与友：中共历史上的统一战线》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

伊兹亚·沃格尔：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 · R · 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 · L · 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 · S · 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 · E · 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E·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

肯尼思 · R · 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

理查德 · L · 沃克:

《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1956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联合研究院，修订版，2卷本，1969年。

唐纳德 · S · 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保罗 · E · 津纳主编: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骚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